



宋任穷回忆录

〔续集〕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
从紧跟毛主席的部署	
到成为东北头号“走资派”	(1)
周总理竭尽全力	
保护一大批老干部	(10)
造反派冲击京西宾馆	
周总理下令连夜砌围墙	(17)
“一号命令”遣散老干部	
被送往辽宁“二五”农场	(19)
周总理、邓小平批准回京治病	
老战友相见百感交集	(23)
“四人帮”强令重返农场	
困难中倍感群众情深	(24)
回京参加国庆招待会	
见到日思夜想的周总理	(26)
“四人帮”再掀恶浪	
老干部重陷困境	(29)
三巨星陨落举国哀悼	

	“四人帮”倒台普天同庆	(31)
第二章	在第七机械工业部	(34)
	深入揭批“四人帮”	
	广泛团结干部、群众	(35)
	以科研生产为中心	
	集中力量搞“三抓”	(42)
	各部门协同作战	
	省市八方支援	(49)
	亲切关怀 殷切期望	
	周总理、邓小平、聂帅作重要指示	(50)
	抓好群众生活	
	解决实际困难	(52)
	改变垂直领导	
	调整管理体制	(55)
	列席十一届三中全会	
	增选为中央委员	(57)
第三章	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一)	(62)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	
	到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62)
	冲破阻力 拨乱反正	
	耀邦同志功不可没	(64)
	抓紧部署 加强指导 全党动员	
	组织几十万人的办案队伍	(68)
	六项措施三个要求	
	善始善终抓好落实	(71)
	撤销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接收中央专案材料	(77)
	独裁专案 为所欲为	
	残害忠良 令人发指	(80)
	为数百名省部级干部复查平反	
	审理冤假错案三千余件	(85)
	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为有全国影响的集团性案件平反	(86)
	严格掌握政策界限	
	妥善处理历史老案	(88)
	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	
	为外国专家落实政策	(99)
第四章	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二)	(103)
	领导班子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急需调整充实和加强	(103)
	邓小平、陈云同志高瞻远瞩	
	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是战略任务	(105)
	反复酝酿 集思广益	
	提出干部队伍“四化”方针	(108)
	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四化”方针形成共识	(109)
	统一思想 制定规划	
	提出领导班子建设的具体要求	(111)
	遵照陈云同志意见	
	建立青年干部管理机构	(117)
	抓住省级机构改革的契机	
	推进领导班子“四化”	(118)

	调整省级领导班子的工作	
	中央书记处提出重要意见·····	(123)
	荐贤举能 发掘人才	
	机构改革取得可喜成果·····	(125)
	大规模培训干部	
	全面提高干部素质·····	(128)
第五章	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三) ·····	(135)
	加强党员教育	
	健全党的组织生活·····	(135)
	召开发展党员工作座谈会	
	积极慎重发展党员·····	(137)
	理顺中央直属机关的工作	
	恢复“文革”前的领导体制·····	(143)
	调整配备地方各级领导班子	
	改革命委员会为人民政府·····	(144)
第六章	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四) ·····	(147)
	平反昭雪 恢复名誉	
	做好受迫害老干部的善后工作·····	(148)
	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建立老干部离退休制度·····	(150)
	采取多种形式	
	发挥老干部的作用·····	(153)
	制定文件 提出要求	
	牵头抓知识分子工作·····	(156)
	成立联系小组	
	协调知识分子工作·····	(158)

	组织队伍	
	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161)
第七章	人选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	(165)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发言	
	联系自己总结历史教训·····	(165)
	受中央委托,同廖承志同志一起向	
	宋庆龄同志传达党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168)
	建议中央批准续建“固海扬水工程”	
	解决人、畜饮水困难·····	(173)
	成立五人小组妥善解决	
	对西北革命历史问题的争论·····	(175)
	根据中央部署	
	推进机构改革工作·····	(179)
	贯彻中央正确方针	
	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188)
	宣布河北领导班子换届	
	强调省委领导核心团结·····	(191)
	呼吁全社会重视	
	青少年思想工作·····	(193)
	实地考察榆林地区	
	建议重视防沙治沙·····	(197)
	呼吁治理大江大河	
	改善生态环境造福后代·····	(202)
第八章	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	(205)
	与王震同志联名上书中央	
	主动要求退出第一线·····	(205)

成立顾问委员会	
是邓小平同志倡议的·····	(208)
任中顾委副主任	
协助薄一波同志工作·····	(210)
召开省、市、自治区顾委主任会议	
贯彻小平同志对顾委工作的指示·····	(214)
列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批评帮助胡耀邦同志·····	(222)
十三大加快领导班子年轻化步伐	
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	(224)
陈云同志主持中顾委常委会	
坚决支持中央撤销赵紫阳同志总书记职务的决定	
·····	(226)
中顾委光荣完成历史使命	
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229)
第九章 出访朝、南、罗、意、匈五国 ·····	(234)
东北三省负责干部访问朝鲜·····	(234)
欢迎崔庸健、金日成访问东北·····	(240)
率代表团访问南和罗·····	(244)
赴意参加《团结报》节闭幕式·····	(248)
赴匈休假·····	(254)
同越南同志的亲密友谊·····	(255)
附 录 ·····	(257)
纪念陈昌、夏明翰老师	
(1987年9月)·····	(257)

冀南十个月来的抗日政权工作 (1939年1月31日、2月1日).....	(263)
纪念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一周年 (1939年8月).....	(277)
讨逆工作简略报告 (1940年11月21日).....	(285)
冀南游击战争的坚持与灾荒问题 (1943年12月).....	(295)
关于新区工作问题给中央局、毛主席的第二号 综合报告 (1948年10月10日).....	(305)
新区的基本政策 (1949年9月3日).....	(312)
为建设真正健全繁荣的新南京而斗争 (1949年9月6日).....	(318)
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为工业建设打下基础 (1952年5月7日).....	(328)
在在职干部学习班开学典礼上的动员报告 (1952年10月6日).....	(335)
生产改革的中心是生产管理 (1952年10月).....	(338)
加强集体领导 坚持群众路线 (1955年9月20日).....	(342)
克服干部工作中的保守主义思想和干部 工作的全面规划问题 (1956年2月28日).....	(350)

地矿技术工作必须贯彻群众路线 (1958年7月).....	(366)
原子能事业并不神秘 (1958年12月).....	(373)
在东北局第一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1960年11月7日).....	(378)
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1961年5月14日).....	(394)
关于揭生产斗争盖子问题的一些讲话、 插话要点 (1965年11月25日).....	(398)
给东北局书记处的一封信 (1965年11月28日).....	(408)
落实干部政策要善始善终 (1979年6月9日).....	(411)
认真解决组织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1980年7月3日).....	(419)
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 建设好干部队伍 (1982年9月5日).....	(444)
后 记	(455)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有这样两句话：“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关于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决议》写道：“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上述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从紧跟毛主席的部署到成为 东北头号“走资派”

1966年3月18日，我从沈阳经上海到杭州参加中央

召开的会议。会上主要研究了关于学术批判问题、工业管理体制问题和农业机械化问题。当时毛主席讲话的要点是：学术界、教育界事实上已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所掌握，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所垄断。现在，有些共产党员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克思主义。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搞这场斗争就要出修正主义，全国 28 个省只有 15 个省展开了这场斗争，还有 13 个省没有动。主席要求各大区都注意这个问题，对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各个方面都要管。关于工业管理体制问题，毛主席主要强调要进一步调动地方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并提出发动大家对这个问题进行鸣放。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毛主席也发表了重要意见。在 3 天的会议上，主席在重点谈学术批判问题的同时，对工农业生产也给予相当的重视。

3 月 20 日会议结束后我没有马上回沈阳，在上海和北京各住了两天后，到辽宁的兴城、锦州、北镇、黑山等地作了一个星期的考察和调查研究，主要就学习毛主席著作、工农业生产、工业管理体制、工业支援农业、农业机械化等问题同当地的干部、群众交换意见。3 月 31 日回到沈阳，第二天又同沈阳市的贫下中农代表座谈了农业生产问题，完全没有涉及到学术批判问题。可见，我对酝酿已久，即将迅猛兴起的“文化大革命”，在认识上非常迟钝，思想上几乎没有什么准备。

直到 4 月 6 日，我才在东北局第九次全体委员（扩大）

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的指示精神。会议除了讨论加强对学术批判的领导问题以外,还就如何在东北地区调整工业体制,开展关于工业体制问题的鸣放以及加快实现农业机械化进程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意见。会议开了一个星期,到12日结束。

4月16日中央又通知我到杭州开会,事先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到杭州后,才知道是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问题。4月22日至24日参加了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席在讲话中提出了所谓“朝中有人”的问题。他说: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中有人”,中央有,地方也有,各省市都要批判一两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否则,这样搞下去,要出修正主义。主席还说,要先破后立,不破不立,破中有立,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要彻底地破。主席的后一段话是针对彭真同志主持起草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讲的。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建议,中央决定调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并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此时,陶铸同志向正在杭州开会的几位中央局书记征询意见,到中宣部后如何工作。他说,主要抓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一致赞同,并表示支持他在中央的工作。

杭州会议结束后,中央让我到哈尔滨迎接阿尔巴尼亚客人谢胡、卡博。5月3日,周恩来、李富春同志陪同阿尔巴尼亚客人抵哈尔滨,参观122厂后即坐直升飞机到大庆参观,第二天回哈尔滨,5日离哈尔滨直飞上海。在东北的几

天，我全程陪同。当时中阿关系很好，迎送十分隆重。之后，我又在哈尔滨、长春两地调查研究，召集了几次教育界、文艺界同志参加的座谈会，讨论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5月13日回到沈阳。

经过几天的准备，5月19日至6月7日，召开东北局扩大的第十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一开始，我传达了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会议进行中，陆续接到中央5月16日《通知》以及关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同志问题等几个文件。在“五·一六”通知中有主席亲自加的几段话，其中有一段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未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五·一六”通知集中反映了毛主席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严重错误估计。他认为，党的领导层出了修正主义，这些人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地和各部门都有代理人。毛主席对一些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的不满和不信任也日益严重。

会后，东北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我们就对“文化大革命”认识迟，抓得不紧问题作了检查。报告中说：“东北地区是处于主席所批评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态，认

识迟，抓得慢，跟主席思想跟得不紧，同其他兄弟地区相比有不少差距。……没有及时组织力量揭发、批判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没有像主席教导的那样，造修正主义的反。”

由于我也存在着“左”的思想，同时也由于我们对主席的迷信和崇拜，对于当时主席的讲话以及在主席主持下形成的文件，都是努力紧跟和积极贯彻的，虽然在某些方面行动迟缓一些，但总的态度仍然是拥护和贯彻的。因此，我们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表示，“到会同志坚决拥护中央、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和指导方针。”同时，我们对东北地区的形势，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还不适当地批判了一些同志。这是我们特别是我“左”的思想的反映，这方面的错误应当由我负主要责任。

当时按我们的理解，“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五界即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进行，准备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组织一些批判，最后处理一些人，就告结束。其他领域特别是工厂和农村只进行正面教育，参加全国和省内的批判，不搞运动。在东北局内部统一认识后，即按此作了部署。但是，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竭力煽动下，形势越来越乱，我们很难控制。当时，搞起了全国大串联，学生坐火车不花钱，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免费管吃管住，接待方面稍有不周，就说你反对“文化大革命”，不支持革命群众。大串联的高潮正值夏季，东北天气凉快，不少红卫兵往东北跑，东北地区接待外地红卫兵最多时每天达到 30 多万，压

力很大。我们要求各单位尽量搞好接待，不敢稍有懈怠。后来，他们要把运动搞到工厂去，东北局讨论后一致不同意，认为工厂主要搞生产，切不可把工厂搞乱。会后，我立即坐飞机（当时中央给了我一架小飞机供随时使用）专程到北京请示。一到北京，直奔人民大会堂，当时总理、富春、先念、震林、秋里、谷牧等同志在座，我汇报后他们都同意东北局的意见。可是，当时国务院领导同志说话不灵，只有“中央文革小组”说话才算数。结果，对工厂的冲击最终未能制止住。过了一阵，他们又要把运动搞到农村去，我们又尽力制止。东北局7月11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各县，重点是文化界和教育界。农村社、队的文化革命，决定结合四清进行。……农村现正处于紧张时期，在发生虫灾的地区要大力动员男女老少灭虫，防洪防汛需要抓紧准备，城乡人民生活需要注意安排。对此我们都已分别作了布置。”6月22日东北局书记处会议又明确指出：“公社、生产队和农业中学，目前主要是组织学习讨论。……现在农业生产已处于大忙季节，要领导群众搞好铲趟。”尽管如此，在东北地区，运动对农村的冲击也没有能完全制止住。后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下发了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工厂、农村的情况就更难以控制了。

1966年8月，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

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反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这张措词严厉、上纲很高的大字报，虽然没有点名，但显然是指刘少奇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和一部分省市的负责人，大字报公开发表后，各地批判所谓“走资派”的斗争不断升级。

在群众分裂成不同的派以后，我又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关于这个问题，我在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作过多次检查。1984年9月，我在广西一次干部会上讲过：“我这个人，以前远的不讲，从1957年以后，我的‘左’的思想也是比较厉害的。我挨过整，并不等于我思想上没有‘左’的东西。我在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四清运动中，都犯过‘左’的错误，整过人。‘文革’初期在东北支了一派，压了一派，也有错误。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把人整得很苦。挨整是一个问题，但是自己犯错误是另一个问题，你不能说自己挨了整就抵消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你过去整了人家不算啦？不能这样，实际上你还是整过人家嘛！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有错误的，不是英雄，不那么高明，是犯过错误，整过人的。”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贯态度，我在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和其他场合不止一次地讲过。

毛主席开始是保我的。1966年6月10日主席会见胡志明同志时，还建议他“找各大区书记陶铸、刘澜涛、宋任穷……等同志谈谈，见一见面，多交几个中国朋友。”8月召开

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我还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年秋天，主席知道我在北京，专门把我叫到钓鱼台，见了面就问：你检讨了没有？我说检讨了。主席又问：过了关没有？我想了想说，这个关恐怕过不了了。主席听后面露不悦。不过，他还继续保我，在酝酿成立辽宁省革委会时，曾考虑我出任副主任。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周恩来同志更是尽全力保护我的。1967年2月，黑龙江成立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时，周总理让我去参加，并安排我讲话表态。我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做了。我在讲话中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并说：“我犯了路线错误，在毛主席的教导下，我要坚决改正过去的错误，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周总理的用意很清楚，是想为我出来工作创造条件。后来，周总理让辽宁省的一位负责同志转告我：以后不要再打电话找他了。我知道周总理有难处，他也保不了我了。

江青对我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度。一次，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12楼开会，研究吉林省“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东北参加会的同志进会场后，都跟江青等人握握手，这本来是正常的。不巧，我那天感冒，发烧到38摄氏度，为了怕传染，没有同她握手，只作了个揖，对她说：我感冒了，就不握手了。江青一下脸色变了，顿时勃然大怒，站起来拍桌子说：别看你是东北局的第一书记，你对毛主席有刻骨仇恨，你跑到刘少奇、邓小平那里下跪去吧。由于江青撒泼，那天研究吉林问题的会没有开成。过去我同江青没有什么来往，在毛主席

那里开会时见了面打个招呼，寒暄两句而已。但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次看戏，很可能得罪了她。那天看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我坐在主席的前排，江青坐在主席的后排。我对主席讲，这个戏最早是在东北演的，原来的剧名是《革命自有后来人》，那时剧中的铁梅被敌人在火车上烧死了。东北局的同志看后提出，既然写革命自有后来人，铁梅最好还是留下来，建议修改一下剧本。他们接受了这个意见，改了剧本。金日成同志1964年9月到东北后看了修改后的戏，反映很好。江青一直认为几个样板戏的版权都属于她，听了我跟主席讲的这段话，恐怕是很不高兴的。江青在钓鱼台当着许多人的面冲着我发那么大的脾气，我预感到被“打倒”的日子不远了。

1967年8月6日中央作出了停止东北局工作的决定。此前，东北局名义上还存在，这个决定公布后，都认为中央不再保我和东北局了。

不久，我便不断遭到批斗，我的问题也不断升级，说我一贯反对毛主席，从历史上就把枪口对准毛主席，在东北推行修正主义，是东北地区头号走资派等。我就这样被打倒了。在开始批斗我的时候，我曾经到李富春同志家里，向他汇报了情况，并对他讲：不管怎么斗我，我决不会走自杀的路，宁可被打死，也不自杀。如果我死了，你要出来为我作这个证明。

周总理竭尽全力 保护一大批老干部

“文化大革命”初期，东北局曾几次向中央文革写报告，请示运动中的政策界线，但是没有得到过一个字的答复。于是，我们就直接向周恩来总理请示。在林彪、江青一伙肆虐的动乱时期，周总理顶着他们这一伙的压力和干扰，夜以继日地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其处境之艰难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周总理除了参加各种会议以外，几乎每天都要花大部分时间接见北京和外地的群众代表和红卫兵，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 1300 多万人次，他们的吃、住、往返、谈话一整套组织、接待、宣传教育工作，都由周总理一手操办。周总理总是以极大的耐心，以他几十年的亲身经历，深入浅出地、不厌其烦地讲解党的历史，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想方设法地引导千百万青少年走上正确的道路。谈了一批又一批，送走一批又来一批，夜以继日，连续几个月，热情地给他们做工作，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东北局请示的问题，周总理每次都有明确指示，并先后指定李富春同志和陶铸同志负责同我们联系。1966 年底造反派冲击东北局机关，扬言要夺东北局的权。我们出面做工作，他们不听。于是，我们打电话向周总理报告，周总理立即明确指示：东北局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不能夺权，要坚决制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总理就挺身而出，竭尽全力保护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干部。东北地区许多同志也受到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坚决保护。

吉林省副省长兼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长朱德海同志，是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为延边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1966年8月，他从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回到延边以后就遭到批斗，地区的局势陷入混乱，州委已难以控制。周总理获悉后明确表态：朱德海是好同志，并指示我和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同志到延边去做工作，保护德海同志。我与马明方同志和吉林省委书记赵林同志一起立即赶到延边，召开州委会议，我说：“这次是奉周总理的指示专程到延边来的，中央认为朱德海是好同志，要让他站出来和群众一起搞好‘文化大革命’。”并要求领导核心统一认识，掌握好局面。我还建议州委常务副书记多出面，让德海同志先下去抓生产，免得出面多了造成被动。马明方、赵林同志留在延边召集群众代表座谈，希望他们尊重朱德海同志的领导。周总理几次讲：要爱护干部，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培养一个少数民族干部更不容易。9月底，周总理亲自点名让朱德海同志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让他的名字见了报。同年年底，周总理又一次表态：朱德海是好同志，要保护他。可是，横行一时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公然对抗周总理的指示，派他们的帮凶到延边，给德海同志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横加迫害，德海同志最终未能免遭劫难。1972年，当德海同志病重时，周总

理指示中央组织部尽快查清问题，恢复德海同志党的组织生活。马明方同志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保护了朱德海同志等一批干部，但不久他自己也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

马明方同志是一位早年加入党的老党员，是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被捕后，同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一起领导狱中的战友同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忠贞不渝。建国后，历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财贸部部长、东北局第三书记等重要职务，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为“叛徒”和“走资派”，遭到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病重住院期间，不让人前去探望，由于体弱多病，上卫生间只能爬着去。经过调查并查阅历史档案，确认马明方同志在狱中不仅没有问题，而且表现很坚定，中央决定为马明方同志平反，召开追悼会并发了通知。但当天我们又接到电话，说追悼会不开了。许多同志到了八宝山又不得不返回。大家都感到突然。后来，才知道，是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东北的代理人的阻挠。这个人利用他当时的特殊地位，在江青的唆使下，居然擅自推翻中央的决定，说什么：马明方不是叛徒，也是走资派，怎么能为走资派开追悼会呢？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马明方同志才得到彻底平反。

东北局第二书记兼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早年赴欧洲参加勤工俭学，是我党的老党员。他很有见地，对1958年“大跃进”的一些做法有过某些保留。对1959年

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同志的所谓右倾错误，欧阳钦同志和东北的其他几位省委书记态度都比较消极。欧阳钦同志很顾全大局，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主动为国家分忧，尽量从黑龙江多调些粮食出去，而不让本省居民的粮食定量定得过高。他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抵触得厉害，对当时的许多做法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唆使下，东北的几派群众组织都要批斗欧阳钦同志。他身体不好，态度又强硬，如果再遭批斗，身体可能支持不住。“文化大革命”前，为了加强东北局的领导，中央决定欧阳钦同志不再兼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在他离开黑龙江后，我们没有马上把他接回沈阳，而是先把他安排在长春休息一段，后来才到沈阳，住在沈阳军区总医院。不久，林彪、江青一伙说什么：军队不要当保护伞。这样，军区总医院就不能住了，我们只得把他安排在原英国驻沈阳领事馆的房子。我们让他尽量不要露面，避免同造反派接触，以免引起顶撞。在领事馆只住了一个晚上，于1966年底我们秘密地让他随我坐飞机到北京，安排在北京饭店。因事先来不及请示周总理，到北京后我立即写信给周总理，建议欧阳钦同志留在北京住院治病。周总理很快批示：“拟同意。请康生、伯达、江青同志审核。”总理这样批，是为了免得这些人日后找麻烦。周总理已经明确表态，他们尽管心里不一定同意，也只得划个圈。就这样，欧阳钦同志遂被送进空军总医院保护起来，避开了造反派的纠缠和批斗。

赵林同志被造反派揪斗后，周总理又挺身而出保护。赵

林同志也是一位老同志，吴德同志被调北京工作后，由他代理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三十年代，赵林同志秘密到上海参加我党召开的会议，不幸遭国民党逮捕。造反派据此要把他打成“叛徒”。他们把赵林同志从长春拉到沈阳，并准备从沈阳拉到北京，扬言要到北京去解决问题。赵林同志找到了我。我出面向造反派做工作，劝说他们不要上北京。我反复向他们讲：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东北谈，上北京解决不了问题。他们当面答应了，但没有遵守诺言，背着我们赶在午饭前带着赵林同志坐汽车上路了。我闻讯后，马上带着秘书、警卫员坐车去追，在途中的一个小饭馆截住了他们。我对他们讲，你们不要去北京，我可以打电话向周总理请示，接着又费了不少口舌，总算把他们劝回了沈阳。回沈阳后，我立即打电话向周总理汇报情况，请求指示。周总理说：赵林同志历史上的事，中央清楚，没有问题。他原来的名字不是赵林，是罗林祥，他同刘锡五同志一起，是第四批放出来的。出狱前办手续是经中央批准的，没有问题。周总理的记忆力好得惊人。我向造反派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但他们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下，置周总理的指示于不顾，还是批斗了赵林同志。

周恩来同志还保护了一大批国务院的部长。

1966年底，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同志暂住在黑龙江省军区。霖之同志从哈尔滨经沈阳回北京后，因家被抄不能回去，暂住在段君毅同志家。第二天，霖之同志回到煤炭部后，即被造反派直接拉到矿业学院批斗。江青、康生、戚本禹这

些人亲自跑到矿业学院煽动，他们说：张霖之不是好人，是彭真线上的，你们揪斗张霖之好得很，对他不要太客气，要狠狠地斗。在他们的直接煽动下，造反派对霖之同志的批斗日益升级。

据张霖之同志的夫人李蕴华同志讲：对霖之同志的批斗有记录可查的是 55 次。家属 5 次向造反派提出要求看望，都不准。大女儿偷偷去看了一次，被打成反革命，关押几十天。在家属的一再要求下，终于允许全家于 1967 年 1 月 22 日前去看望。全家怀着急切的心情于上午 8 时许赶到那里，可是造反派通知我们霖之同志已经死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对我们的打击太大了。后来才知道，前一天的白天，他们给霖之同志戴上六七十斤重的铁帽子，用绳子拴住，跪着挨斗。晚上不让他睡觉，脖子上挂一个用布包着的铁炉子，勒得脖子上一道很深的伤痕，跪在小凳子上不许动，一动就踢倒凳子，连人带炉子一起摔下来。就这样逼供了整整一夜。到天刚亮的 5 点多钟，被残酷地折磨死了。我们要求看遗体。他们说已经拉走了，他是黑帮，有什么好看的，且不告诉我们尸体在哪里。一直到死后的第 5 天，我们才打听到了遗体的下落，便全家赶到东郊火葬场，看到霖之同志只下身穿了一条棉裤，上身赤裸地躺在那里，背上 30 多处伤痕，脖子上有被勒的深痕和血迹，惨不忍睹，我们全家泣不成声。第二天，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报告了周总理办公室。周总理的秘书周家鼎同志说，当天晚上周总理有好几个会，只有十几分钟的休息时间，我一定报告他。隔了一天，家鼎同

志告诉我，周总理听了汇报后很生气，说：为什么40多天都不报告我？说着落了泪，并指示公安部、煤炭部、矿业学院和家属联合验尸和调查原因。第二天，总理专门召开会议，严厉批评和责问造反派：你们把霖之同志扣起来，40多天不让他回家，也不向我报告，一斗十几天，别说对一个部长，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能这样办啊？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对老干部不能都用敌视的眼光看待，你们觉得现在可以把老干部统统抛开，可以为所欲为吗？总理在另一次会又讲：霖之同志不明不白地死了，他是中央候补委员，叫我怎么向中央交待！这样整人怎么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一定要调查清楚，把所有情况都调查清楚。一次，总理召集各部部长开会时讲：今天我见到了钟子云同志（当时任煤炭部副部长），见不到张霖之同志了，我心里很难过。总理当即作出决定，把所有的部长都找到国务院来，并规定今后各部开会批斗部长必须经总理批准，批斗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两小时之内必须把人送回来。事后，周总理告诉身边工作人员在中南海腾出一些房间，让各部、委、办的领导同志轮流住进来作短暂的休息。在周总理的保护下，许多部长幸免于难。后来，组织上为霖之同志作的结论为：惨遭诬陷，毒打致死。1992年11月民政部批准张霖之同志为革命烈士。证书上写着：“张霖之同志于1967年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

张霖之同志是我的老战友，我们在抗战时期就在一起工作。他是一位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杰出的领导干

部,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一伙残酷迫害致死,令人十分痛惜。

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说:“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对于周总理的这一段评价,我和原东北局的同志有深切的体会。

造反派冲击京西宾馆 周总理下令连夜砌围墙

1967年,中央将大区和省市一些靠边站的领导同志集中到京西宾馆住,我被安排在6楼东头的套间。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唆使下,经常有些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来揪斗我们。东北的造反派曾经把我从京西宾馆拉到西苑饭店,3个省轮番批斗。在批斗会上都坐“喷气式”,左右两个人把我的胳膊使劲往后扳,把我的身体向下压得很低。每次批斗回去浑身疼痛,躺下就起不来了。有一次还拉到西苑饭店的院子里游了街,用“喷气式”的姿势推着我走,几乎就是在地上爬。一次批斗时他们把一张方桌的桌面压在我的肩上。还有一次给我挂铁牌子,回家后发现脖子上勒出一条血印,连腰都直不起来。记得有一次批斗会是专门批判五十年

代初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改造卢汉起义部队问题向中央报告中的4个字：“以诚相待”。1950年，陈赓同志和我率第4兵团进军云南后，对卢汉充分尊重，事事协商，待之以礼，相见以诚，这是经党中央和西南局批准的方针，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贯彻这个方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们硬要以此来说明我反对毛主席，是修正主义。这些人主要是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挑唆，同时也缺少起码的历史常识。我一听几个发言都是批判这4个字，心里觉得好笑，但如果向他们解释，他们不但听不进去，一定还会说我态度不老实，对抗群众等，我就干脆只听不说，有时索性听而不闻，趁机打个瞌睡休息一下。还有一次，造反派到京西宾馆来抓我，他们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气势汹汹地从1楼冲到6楼，有个别人趁机对我进行殴打，并把我拖到阳台，准备用绳子将我从阳台吊下去，强行抢走。此时，傅崇碧同志负责指挥的警卫部队急速赶到6楼，将我从造反派手中夺回，转移到安全地点，我才幸免于难。周总理对冲击京西宾馆事件很生气，为了保护一大批老干部，亲自指示立即修围墙。京西宾馆现在的围墙就是在那个时候突击建成的。

1968年4月，把我们从京西宾馆转移到海运仓的总参招待所。我去时，陈再道、钟汉华、李成芳、秦基伟、甘渭汉、王必成、鲍先志、林维先、左齐等一批被打倒的领导同志已经在那里了。我同陈再道同志在抗日战争期间一起在冀南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在艰苦的环境中并肩战斗，是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了。他对我说：现在有些人整我整得厉害，挨过打，

非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可毛主席到武汉是保我的，也是主席下令把我从外地先接到京西宾馆的。我相信，我的问题最后一定会搞清楚的。

当时，有些同志带了家属。他们不准我带老伴和子女。老伴钟月林和孩子被他们强制从北京送回沈阳，老伴在那里替我挨批斗，说她是“东北头号走资派的臭婆娘”，宣布对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月林同志是贫农出身，是位老红军，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仅仅因为她是我的老伴，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原则，他们就如此对待她。有时儿子也被拉去游斗。我只身一人，在海运仓住了一年多。招待所管理比较严，外人不能随便进来。除了专案组让我写材料和接待一些外调人员外，没有别的事。伙食还可以。

“一号命令”遣散老干部 被送往辽宁“二五”农场

1969年10月，突然通知我离开海运仓招待所，但又不告诉我去哪里。后来才知道，这是林彪发布了所谓“一号命令”，让我们这些人都离开北京，疏散到各地去。上了火车，见到了黄火青、黄欧东等同志。当时不便交谈。

他们一直把我拉到沟帮子车站，下火车后坐汽车往东走一百多里路，来到一个机耕队。我自己带被子，让我同机耕队炊事班的同志们住在一起，任务是帮助厨房整理大白菜。从这个时候起，就一直有专案组的人跟着我。我住了大

约一个月，老伴钟月林同志来了，分给我们的一间房子是干打垒式的，没有窗户，只在墙上挖个洞，从外面用塑料布挡住。人上了炕，只能坐，站都站不起来。做饭烧水还要拉风箱。月林同志看后说：我们还有孩子，一间房子不够住，条件太差，我不会拉风箱，这儿没法住。她要求搬家的态度很坚决。陪她到沟帮子的那位同志还比较通情达理，经过反映，决定让我们搬家。

不久，我们搬到“二五”农场，这是第39军的一个农场，也在盘锦地区，条件比机耕队好。分给我们三间房子。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喂猪，农忙季节同大家一起收庄稼。同时还要没完没了地写交待材料，并且不时被拉到沈阳、阜新、朝阳、凌源和大石桥等地批斗。批判我的问题很多，当时整理的材料，说我有一百条罪状。有一次，着重批斗我所谓反对“林副主席”的“罪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回沈阳向东北局干部传达全会精神。他们说我故意封锁消息，不传达林彪为毛主席的副统帅。当时，林彪的问题没有暴露，我也没有察觉林彪有什么大问题，这次会议我是原原本本传达的，根本不可能删去什么内容。因此我十分肯定地说：我传达了，是在东北局3楼会议室16级以上干部会上由我亲自传达的。他们硬说我没有传达，是有意反对“林副统帅”，还专门找了几个当时参加会议的人来证明我没有传达。我说我肯定传达了。主持会的人对我说：你是不是说证明你没有传达的那几个人是在造谣？这是个带煽动性的问题，企图造成一部分人同我对立。我思考了一下，回答说：我不能说他们造谣，但我

确实是传达了。他们翻来覆去地这样问，我也一再重复这句话来对付他们，僵持了好一段时间。最后，当然没有弄出什么结果来。

有一次是批判我提出的“治山治水，植树造林，养猪积肥”这12个字。这是东北局在农村调查的基础上，经过东北局书记处集体讨论，针对东北农村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当时对推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们把这12个字作为我反对毛主席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的“罪行”进行批判。还有一次在阜新，批判我们在六十年代初搞的工业工作十二条。十二条的主要内容包括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行奖励制度，提倡小包工等，在当时受到工人群众的普遍欢迎，对于调动群众积极性，促进生产起了很大作用，也被作为我反对毛主席，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进行批判。

1970年发生了林彪叛国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九·一三”事件。林彪是个典型的两面派和野心家。“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鼓吹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最厉害，每次讲话几乎“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不离口，当时的党章上已经法定了他作为毛主席接班人的地位，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竟走上了阴谋杀害毛主席的罪恶道路。这个惊心动魄的事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认真思考和总结的教训。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们很长时间没有向我传达。其实，1970年国庆节林彪没有出来，我们已经有些察觉。到

元旦还不告诉我们，直到春节前几天才通知我。他们照稿宣读，讲了这样几句话，我至今还记得清楚。第一句：陈伯达是坏人。第二句：林彪反革命集团已经被彻底粉碎了，你要同林彪划清界线。听完后，我请他们重复一遍，他们又念了一次。批斗我时说我对林彪，现在又让我同林彪划清界线，听后我哭笑不得，只冷笑了一声。

林彪这个人能打仗，对革命有过贡献，但在历史上有劣迹。南昌起义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曾擅自离开过部队，当了逃兵。井冈山斗争时期产生过动摇，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长征途中，上书中央要求撤换朱德、毛泽东。解放战争时期，按中央原来的部署，由第二野战军进军中南，小平同志告诉我，湖南解放后中央考虑由我任湖南省委书记。但林彪提出他要中南。中央遂改变决定，二野进军西南，并决定云南解放后由我任云南省委书记。林彪又提出要云南。小平同志对我讲，二野可能不下云南了，准备安排我到四川工作。后来，中央没有听林彪的，仍由二野入滇。林彪当时就企图多占地盘，其政治野心已露倪端。解放初期，中央原决定派林彪率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他托病抗命，后才改派彭德怀同志任志愿军司令员，彭老总欣然从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可见，林彪最后走上自绝于党的道路不是偶然的。

林彪、江青及其在东北的代理人(东北的“太上皇”)残酷迫害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斗争的干部群众，不少优秀同志如张志新、陈钧(均为女)等惨遭他们的蹂躏和杀害。

周总理、邓小平批准回京治病 老战友相见百感交集

我在农场劳动了几年，还不时遭到批斗，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体重下降到 90 斤，腹部疼痛，不压一点东西根本不能入睡。长此下去，身体实难支持。我的几个孩子见到我这种状况，十分着急。在北京的 3 个孩子于 1973 年联名写信给周总理，是由周家鼎同志转交的，要求让我到北京检查身体和治病，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很快就批准了。

在这以前，毛主席已开始抓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他亲自为所谓的“二月逆流”平了反，为陈毅同志恢复了名誉，并亲自参加了陈毅同志追悼会，还提出要为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志平反。1973 年 3 月，恢复了邓小平同志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还有一些老干部先后被“解放”。此时，“四人帮”仍在台上逞凶，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不断遭到他们的重重阻挠，步履维艰，但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等的亲自主持下，先期“解放”的老同志鼎力促进，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实干部政策，一些老干部的处境比前几年有所好转。

我到北京医院检查身体时，受到许多老同志的亲切关怀，邓小平、谭震林、滕代远（代远同志正在北京医院住院）等同志到北京医院看望我，谭震林同志还故意在医院的走廊上大声说：“老宋，你住在哪里，我看你来了。”王震同志不

久也住进北京医院。他不能起床，我到病房去看望了他。昔日的老领导、老战友，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历经了劫难，此时相见，百感交集。热烈的握手，短短的几句问候和鼓励的话，充满着同志间深厚的情谊，使我深受感动，同时，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此时，北京正在召开外交工作座谈会，由于黄镇同志听力不好，周总理把将要出使美国的黄镇同志和夫人朱霖同志从后排请到前面就座，并在会上大声问黄镇同志：“你去看过邓小平同志没有？”黄答：“看过了。”总理又大声问：“你去看过宋任穷同志没有？”黄答：“还没有，正准备去。”总理说：“好，应该去看看宋任穷同志，你们过去都在一起工作的嘛。”当时，我还没有被“解放”，总理以这种形式再一次表达了对我的关怀，意图很清楚，希望我能够早日“解放”，出来工作。可见总理虑事之精细，亦见其用心之良苦。会后，黄镇夫妇即到医院看望我，转达了周总理的关怀。几乎在此同时，“四人帮”一伙对我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四人帮”强令重返农场 困难中倍感群众情深

我在北京医院检查完身体以后，他们决定要我立即返回辽宁。我要求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多住几天，看看熟人，遭到“四人帮”一伙的无理拒绝，竟然令我从北京医院直接上火车站迳返辽宁。

由于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月林同志认为回辽宁后如继续住在“二五”农场，看病是个大问题，应当有一定的就医条件。我们住的“二五”农场离铁路和公路线远，下雨后道路泥泞，连吉普车都不能走。附近又没有医院，万一有病，无法就医。同时，由于离交通线远，孩子们来探望很不方便，往往要步行很长时间。于是，离京前，她向辽宁提出，希望再换一个住处。他们开始不同意，说什么不能住在铁路和公路沿线，那里阶级斗争复杂。后来，还是同意了。于是，我们于1973年12月搬到了高家农场。这里离公路比较近，道路状况也比较好，汽车进得去，农场还有个卫生所。附近有个小镇，买东西也比较方便。

到了高家农场，他们就不让我劳动了，我还是主动地去拾粪。当时，我整天感到头昏，人总是晕晕乎乎的。到大洼的一个医院去检查了一次身体，回来后请农场的一位大夫看检查结果，那位姓韩的大夫看完后给我量了血压，顿时吓坏了，告诉我高压220~230，低压157。我头昏是高血压所致，让我立即服用脉通缓解病情。同时，马上把情况报告辽宁省革命委员会。韩大夫为人正直，工作也很负责，连续十多天，他天天来看我，替我量血压。后来，突然不来了，据说上面有人讲他同我划不清界线，不让他再同我接触。不久，省里派来了沈阳军区总医院的一位大夫和几位助手，还跟了专案组的不少人。省里来的这位医生是主任医师，也很负责任，敢讲实话，检查后说：你的高血压很严重，与原先反映的情况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服用脉通也是对的。他颇

同情地对我说：像你这种情况，应该马上送沈阳住院治疗；可是，你现在的处境，又不允许这样做。让我接着吃脉通，同时要注意休息。我重新出来工作后回到沈阳，专门把高家农场的韩大夫夫妇接到我的住地叙谈，还专程到沈阳军区总医院看望了这位医生，向他表示感谢。我对他们讲：在当时的情况下，你们敢于讲实话，不容易啊！

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部分人反对我，对我进行批斗，主要是受林彪、“四人帮”一伙的不断煽动和挑唆。他们误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在他们中间，很坏的只是个别人，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少人对我表示同情，并以不同的方式帮助我。如看管我们的警卫战士主动帮助我们盘炕，有人经常悄悄地给我们传一些消息，我们到商店买东西，售货员态度很和善，热情地向我们介绍商品。就是开批斗会坐“喷气式”的时候，有好几次站在我两边的人用膝盖顶在我的臀部下面，让我坐在他们的膝盖上。“文化大革命”过去将近20年了，回想起来，我们痛恨的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并不怨恨反对过我的群众，对他们我是完全谅解的。当然，我们大家都应当认真从“文化大革命”中吸取必要的教训。

回京参加国庆招待会 见到日思夜想的周总理

1974年9月中旬，他们突然通知我回北京。同时又向

我宣布两条：此次去北京对外是秘密的，不公开；钟月林不能去，留在农场，派一名专案组的人跟随我去北京。我离开农场去北京的前一天，辽宁省“革委会”的两名负责人赶到农场，说宋任穷这次去北京是临时的，时间不会长，还要回来的。

到北京后住在万寿路的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住在那里的有一批刚刚“解放”或者即将“解放”的老干部，熟人很多，有江华、叶飞、江渭清、廖志高、陶鲁笏等同志，见了面感到很亲热。专案组的那个人一直跟着我，老同志来访，他坐在旁边；我去看别人，他也跟着。一些老同志很有意见，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向上面反映。结果，决定把月林同志调来，让那个人回辽宁了。

我们这些人当时都归由康生控制的中央组织部管。康生讲，郭玉峰是全军最优秀的军政治委员，因此把他调来当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康生从1970年起曾3次提名郭玉峰任中组部部长，第一、第二次都未获毛主席和党中央同意，第三次才被认可。可见当时中央和毛主席对郭玉峰任中央组织部长，并不是康生一提就同意的，而是有过较长时间的犹豫的。康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大军区的政治委员中只有两个人是好的，一个是南京军区的政委张春桥，另一个是北京军区的政委谢富治。康生这个人历史上同王明搞在一起，“文化大革命”中又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沆瀣一气，干了许多坏事。他在我的历史问题上也作过文章。有一次，他亲口对我讲：你下井冈山以后的这一段历史，毛主席说他了

解,没有问题。可是过了没多久,我受到冲击以后,他又心怀叵测地问我:你下井冈山以后的历史情况究竟怎么样啊?我反问他:你不是对我说过主席清楚这一段历史,主席讲过没有问题吗?可见此人出尔反尔,心术不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一次研究《毛泽东选集》的会上,康生转达林彪的意见,说什么毛选中对刘邓和二野的注释太多,对林彪和四野的注释太少。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林彪、康生这一伙人在当时提出这样的问题,其用心昭然若揭。

我回京后,孩子们见到我高兴极了。我对他们讲,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要等拿到参加国庆招待会的请柬,参加了会议回来以后才算数。9月30日,我被邀参加了国庆宴会,远远地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敬爱的周总理。当时总理已经重病缠身。他一出现,全场长时间掌声雷动,场面十分动人。我远远地望见总理那消瘦的身影,思绪万千,忧心如焚。我真想去拜望总理,以表达对他的敬意和慰问,感谢他对我多年来的亲切关怀,但是“四人帮”此时仍在以种种借口整总理,为了不给“四人帮”一伙对总理进行刁难找藉口,经反复考虑,我还是没有去,只通过一位老同志给邓大姐捎了一封信,请大姐转达我对总理的崇高敬意和亲切慰问。直到总理不幸逝世之前,我都未能亲自去看他,这是我终生的一件憾事。

“四人帮”再掀恶浪 老干部重陷困境

1974年,开始了全国性的“批林批孔”。江青利用这个运动大做文章,到处煽风点火,以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为名,矛头直指周总理、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实际上是对前一时期落实干部政策、安排一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进行攻击,并企图否定在周总理主持下恢复“文化大革命”前某些政策措施的正确做法。“批林批孔”运动使得林彪事件后政治局势逐渐趋向稳定和国民经济开始有所发展的好局面重新遭到破坏,一些领导干部重新遭到冲击,又开始靠边站。

毛主席对江青一伙的做法有所察觉,对他们进行了多次批评,并决定对邓小平同志重新委以重任。1975年1月,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决定邓小平同志同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在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总理病重期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并迅速收到显著的效果,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迅速回升。这些符合党心、民心的正确措施,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

我们住在招待所,中组部组织我们每周学习一两次。多

数同志虽然名字上了报,但都在“参加的还有……”之列,没有分配工作。因此,大家都比较谨慎,串门子也不多。李一氓同志对我讲:老宋啊,在现在这种形势下面,我们还是谨慎一点为好。当时不少老同志住在北京医院,那里倒成为一个互相看望的场所。

1975年春节前后,我到朱德总司令住所去看望他。总司令看上去老多了,着实使人忧心;但看到他仍是那样慈祥,那样持重,那样坦然的时候,又使人感到欣慰。我紧握着总司令的手,向他问候,祝他健康长寿。他也拉着我的手,目光凝重地望着我。我有许多话要向总司令讲,但是没有讲。我知道,总司令心里也有许多话,但也没有讲。此时,相对似是无言,实则尽在不言中,无声的语言把我们的心连在了一起。这次相见,总司令只同我谈了学习问题。他对我说,要认真学习,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活到老学到老。在情况复杂、处境困难的那些日子里,他一面积极支持恩来、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面坚决同“四人帮”进行斗争。而对他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种种冤屈和不公正对待只字未提,表现了总司令的博大胸怀和对党、对理想的忠贞。这次见面,交谈不多,但我亲眼见到了敬爱的总司令,心理感到非常高兴。没想到,此次相见竟是我同总司令的诀别。

到北京后,我希望尽快重新出来工作。邓小平同志给我捎话,他只能负责我的“解放”,让我回北京,至于我的工作安排,他无能为力。

1975 年底，毛主席轻信了“四人帮”的诬告，发动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场运动否定了在全面整顿中行之有效的许多正确政策和措施，打击了一部分坚决执行正确政策的领导干部，全国形势再度陷于混乱。

三巨星陨落举国哀悼 “四人帮”倒台普天同庆

1976 年 1 月，周总理病逝，巨星陨落，全国各族人民对失去这样一位杰出的领袖感到无限悲痛，人们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在北京出现了十里长街、万人同哭的悲壮动人的场面。令我最难忘的是向总理遗体告别的日子。那是一个寒冷、肃穆、宁静的早晨，吊唁的人涛滚滚，泪浪滔滔。我带领全家向总理的遗体致哀，悲痛欲绝，但强忍着热泪。回到家里，我失声大哭了一场。1976 年 7 月朱总司令逝世。同年 9 月毛主席逝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3 位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相继去世，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可是，“四人帮”却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对他们的倒行逆施，广大人民群众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和愤慨，并急切地希望尽快改变当时那种极不正常的混乱局面。此时，我到北京医院就医，到病房看望了廖承志同志，我们忧心忡忡地谈起了当时的一些情况，承志同志笑着对我说：“老宋啊，别着急，好戏还在后头哪，你等着瞧吧！”我心里明白，承志同志的这句话指的是令全国人

民切齿痛恨的“四人帮”的末日快到了。承志同志同叶剑英同志很熟，此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正在酝酿解决“四人帮”的办法，承志同志可能得到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

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也逐渐认识到必须除掉“四人帮”，于是，他同叶剑英、李先念同志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粉碎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反党集团。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覆灭的消息传开后，全国人民奔走相告，一片欢腾。我们这一批住在中组部招待所的老同志都深受“四人帮”的迫害，听到这个消息后更是兴奋无比，一起参加中组部的队伍上街游行，表示坚决拥护粉碎“四人帮”的英明措施。群众高兴得纷纷上街买酒喝，以致一部分商店的酒几乎脱销。还有些同志专门去买三公一母的螃蟹煮着吃，可见群众对横行一时的“四人帮”的切齿痛恨。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同志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使我国两年间处于徘徊前进的局面，各项工作包括平反冤假错案和“解放”干部的工作进展缓慢。邓小平同志于1976年蒙冤后也没有恢复工作。此时，我去看望了邓小平同志。我从抗日战争初期开始，多次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十分敬重。我向他汇报了这几年的情况，他说他仍然坚持每天锻炼身体，有时还爬爬山。谈到前两年的工作时，他说进行全面整顿，尽快把

国民经济搞上去是没有错的，当时他这样做的时候已经作了再一次被打倒的准备。他那种敢于坚持真理、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令人敬佩。

第二章 在第七机械工业部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标志着动乱不止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当时，我国面临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急需大批老干部出来主持各方面的工作。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书面提出，应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并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和其他重大冤假错案平反。

张爱萍同志当时向中央提出尽快分配我的工作，并具体建议我到七机部任部长，杨勇同志建议我回军队工作。

1977年10月，华国锋、李先念同志找我谈话，说中央意见由我出任七机部部长。我对华国锋同志说，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辽宁省委给我作的历史结论，我不能同意，希望修改。华说，不好改。我说，七机部那么重要的部，如果我的历史结论不修改，怎么能到那里去当部长？究竟去不去，我征求一些老同志的意见。有的同志说，历史结论不修改，坚决不去。多数同志主张，还是先出来工作再说。胡耀邦同志也持后一种意见。张爱萍同志当时主管国防科委，催促我早日到七机部上班。我接受了多数同志的意见，决定先出来工作，同时把我原来写的针对辽宁省委给我做的错

误结论的4条意见,报告中央。此时,我的老伴找到卓琳同志,请她把辽宁给我做的结论和我写的4条意见送给小平同志审阅。卓琳同志很快就答复说,小平同志同意我写的意见。我即将小平同志的态度告诉了胡耀邦同志。中央在1977年10月20日发出电报通知,决定由我担任七机部部长、党组书记。

10月27日,我正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参观,接到张爱萍同志通知,要我去参加“七七一〇”会议。此会是国防科委与七机部共同召开的,议题是研究武器与空间技术任务的落实问题。会议10月27日闭幕,张爱萍同志到会讲话。就在这个闭幕会上,我同国防科委、七机部的领导同志和与会同志见了面,我向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同大学一起努力做好工作。我就这样到职了。

深入揭批“四人帮” 广泛团结干部、群众

七机部是搞航天工业的。航天工业属于国防尖端技术部门,保密性强,当年无论是配备领导班子,还是挑选技术干部和工人,都是好中选优。因此,七机部的队伍,政治上、业务上都很强,是我国国防科技战线上一支极其宝贵的队伍。原来我对七机部的情况不甚了解,到七机部以后,看了一些文件,听了同志们的介绍,才了解到,在十年动乱中,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挑动和破坏,造成七机部多年大乱不

止。“九一五”革命造反总部和“九一六”革命造反兵团，两派斗来斗去，打来打去，征战不息，成为北京市以至全国闻名的“老大难”单位。周总理曾经接见两派代表几十次，苦口婆心，不知做了多少劝告、说服工作，不知作了多少批示和指示。但是，极少数坏人和派性很强的人，就是不听。人们的思想被搞乱了，七机部的科研生产几度陷于瘫痪、半瘫痪的局面，无政府主义状况严重。1975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各行各业要全面整顿，特别要求七机部两大派要消除派性，都做“七一”派，在“七一”前解决问题，增强团结，搞好科研生产。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同志深入群众，反复进行教育、动员和整顿，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七机部一度有了起色。科研生产逐步恢复正常，并取得了许多成绩；广大干部、群众对派性已经很厌恶，几个派头头相当孤立。当时，中央为迅速改变七机部“老大难”面貌，下达了1975年中央14号文件，调整、加强了七机部的领导班子，派强晓初、陆平、王星、程连昌任七机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但是，1975年下半年，“四人帮”再次作恶，舒龙山等人在“四人帮”支持下，上书诬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整顿是右倾翻案风，在七机部掀起了“批邓联张”的狂风恶浪，折腾得张爱萍同志病卧301医院。由此，又把七机部搞乱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为了尽快解决七机部的问题，中央派出了由北京市、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军委一些总部、军兵种和北京军区等单位组成的600多人的强大工作队，于1977年3月7日进驻七机部。工作队由王纯、段毅、李

峰、贺伯升、齐振华等同志负责，由北京市委领导。我到七机部时，中央工作队已经工作了7个月。工作队的同志们很辛苦，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使七机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逐步深入，清查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在京单位600多名清查对象基本上都做出了结论，各级领导班子初步调整配备起来，科研生产秩序初步恢复正常，各方面的整顿初见成效。工作队在1978年2月要求撤出。张爱萍同志提出，待清查对象的结论全部搞出来以后再走。因此，工作队到1978年4月才撤出。这对七机部的工作是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我到七机部，经过一段时间调查，并同部党组和工作队同志共同研究后，认为揭批“四人帮”要反复强调以下几点：要充分肯定七机部的干部队伍是好的，知识分子队伍是好的，工人队伍是好的，是完全可以依靠和信赖的；要始终把矛头指向林彪、“四人帮”，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凡经过教育能够拉过来的就不要推过去；群众之间不要纠缠历史旧帐，不计较个人恩怨，不争高低；要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加强团结，有利于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就不做；坚决落实干部政策，特别是知识分子政策；对清查对象的问题，要认真调查核实，材料准确，结论恰当，做结论特别是进行处理要慎重，宁可放慢一点。

我们在大会小会和其他各种场合反复宣传和强调以上

各点。实践告诉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一点也马虎不得的。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极其特殊又极其复杂的大动乱中，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许多人对一些问题一时认识不清，或者有程度不同的缺点、错误，这是难免的。所以，必须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尽最大的努力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如果我们不能把大多数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则将一事无成。所以，我在各种场合特别强调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的重要性。1977年11月，我在到职后不久的一次大会上讲话，特别讲到：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一定要搞好整顿工作，落实好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关心群众生活，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搞好革命大团结；一定要千方百计，大力协同，完成党中央交给我部的科研生产任务。在1978年1月上旬和1978年10月的大会上，我都反复强调了以上各点。这些也是部党组全体同志的共识。

由于部党组和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从1977年的11月到1978年的10月，我们先后召开了5次几千人以至上万人的大会，进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坚决处理舒龙山的问题，这是七机部揭批“四人帮”斗争的一个重大步骤。舒龙山是七机部230厂的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四人帮”的直接支持和指使下，在七机部层层揪“走资派”、“代理人”，以莫须

有的罪名肆意打击陷害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1976年，使七机部1.6万余人受到迫害，383人被非法关押、开除党籍、降职降薪，两名同志被迫害致死。那时，他连与他原属同一群众组织的人也不放过。宦国瑞同志因去天安门送花圈、悼念周总理，她和她的爱人罗抗竟遭舒龙山的无情打击迫害，被关了起来。宦国瑞在1977年10月一次万人大会上发言，揭发控诉了这些情况，使大家进一步认清了舒龙山的反革命真面目。“四人帮”粉碎后，舒龙山不思悔改，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密谋拉队伍“上山打游击”，妄图策反军队，搞反革命武装叛乱。1977年被监护审查后，态度恶劣，两次潜逃，是不肯改悔的“四人帮”的死党。1978年8月，七机部党组向中央写了《关于对舒龙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依法惩办的请求报告》。同年10月1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我们遂于10月13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1.8万人的大会，集中批判舒龙山，并由司法机关宣布逮捕。

我们在揭批“四人帮”搞乱、破坏七机部的同时，用了很大的精力，抓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工作。七机部在“文革”中冤假错案有440多件。部党组和工作队不断研究情况，组织力量进行复查平反工作，基本上都得到了解决。如当时二院有一个包括院党委书记董启强、院科技部长（后任院长）柴志在内的所谓“董柴复辟资本主义俱乐部”，把9位厂、所以上主要领导干部都列为俱乐部成员，在北京和上海进行轮番批斗。经查，这完全是一起假案。部党组和北京市共同决定，给这个假案平了反。在为他们平反之前，我和

张爱萍同志同董启强等 9 位同志谈了话。

当时，七机部在一线工作的技术干部有 1.8 万余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稳定住这支队伍刻不容缓。1978 年，经部党组决定，给无线电老专家、一级工程师蔡金涛，留美著名教授卢庆骏，空气动力专家、三级工程师庄逢甘等，恢复了院一级领导职务；提拔了有突出贡献或突出成果的优秀技术干部，如黄纬禄、谢光选、孙家栋、宋健等同志，担任院级主管科技工作的领导职务；随后又提拔了 60 名左右的技术人员担任厂、所级领导职务。在提拔科技干部时，遇到过阻力，我们顶住了派性的干扰，凡是本人符合德、才条件，不论曾经参加过哪一派群众组织，都坚决地提拔起来，给以适当的安排。

我们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执行的政策和采取的措施，得到七机部群众的广泛支持。随着斗争的深入，广大群众的觉悟不断提高，逐步消除了派性，进强了团结，七机部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正常的轨道。《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七机部形势大好。1978 年 3 月 2 日，我在党组会上就此说了一番话。我说，我们七机部的同志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忘乎所以。我们在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是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七机部还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任务还极其艰巨，我们不可有丝毫的松懈，要谦虚谨慎，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做好各项工作。这件事要给各级领导同志打个招呼。

1978 年 5 月，张爱萍同志在七机部党组会上讲了这样一句话：七机部被“四人帮”破坏得不像样子，现在已经走在

国防工业的前列。就此，我在5月29日的党组会上又讲了一番话。我说：张爱萍同志这句话使人出冷汗。我们怎么办？攻关怎么搞？运动怎么搞？毛主席曾经用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诗鼓励大家，我们要有雄心壮志，要搞出点名堂。

揭批“四人帮”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七机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迫切要求尽快恢复科研生产的正常秩序，把科研生产搞上去。

1978年5月间，全国展开了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是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讨论，其实质是从根本理论上否定华国锋同志提出的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场讨论，对推进七机部的运动和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在一次万人大会上，对这次讨论专门讲了一段话：“现在全国正在热烈讨论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这个讨论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仅是一个根本理论问题，而且是重大的现实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我希望七机部的工人、科技人员和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关心和参加这个讨论。要通过这个讨论，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领会毛泽东思想体系，彻底砸烂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要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根本观点，总结我部22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指导当前的运动，指导科研生产和各项工作。”

以科研生产为中心 集中力量搞“三抓”

我对航天工业不熟悉。五十年代我当过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搞过原子弹。这两个部门都是在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集中统一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同志都亲切关怀和指导过这两个部的工作。没有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关怀、支持，这两个部门都难以迅速发展。航天工业和核工业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部门。七机部的其他领导同志，有的已经工作多年，时间短的也有年把时间，其中还有的是航天工业专家，情况都比我熟悉。我不熟悉情况，到任后，边工作，边学习。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参加上面的和部内的重要活动外，抽出相当多的时间，包括节假日，先后到七机部在北京的第一、第二、第五研究院、各研究所及直属厂，到内蒙、川北及南京的部属单位，看望那里的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探望了一些老同志、老专家，同他们进行交谈和座谈，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所到之处，同志们对“四人帮”的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慨，对“四人帮”搞乱的局面表示了十分不安和焦虑，迫切要求恢复正常秩序，纷纷表示要加强团结，克服困难，尽快把科研生产搞上去。同时，还提出了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和积极的建议。同志们表现出来的极大的革命积极性，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科研生产怎么抓法？全盘工作怎样抓法？我当时的主

要考虑是：一、“三抓”任务，是当务之急。“三抓”是指一抓东风5号洲际导弹，二抓巨浪1号潜地导弹，三抓三三一通信卫星工程。完成“三抓”任务，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对国防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而七机部和国家的现有条件是有可能完成的。所以，我对此信心十足，决心很大，一定要完成任务。二、要使七机部迈开步子前进，需要对积累多年的大量实际问题，逐步地切实加以解决。要以任务带动其他，带动各项工作。为使大家对全盘工作的指导思想、任务部署和要求统一认识，统一行动，1978年5月6日、7日，我主持召开了部党组会。在会议开始时，我首先发言。为如实反映当时的基本思想，现将这篇发言重述如下：

“这次会议的议题有两个：一是讨论确定党组成员的分工；二是讨论确定我部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任务。

“当前，我们所处的形势很好。一年多来，在党中央亲切关怀下，中央工作队和七机部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改变了我部的老大难面貌。工作队撤出后，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继续努力，巩固和发展了我部的大好形势。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任务十分艰巨。我们的任务就是狠抓工作，完成‘三抓’任务，把航天事业搞上去。我们党组的分工，拟分科研生产、基本建设、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四条线。党组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互通情报，大力协同的原则。就是说，重大问题由党组集体研究决定，日常工作要搞分工负责制和岗位责任制。很重要的问题是作风革命化。要少说多做，讲实效。要到下面去，到基层去，到实际中去。无论下去

的同志,还是在家(机关)的同志,都要分工协作,分工不分家。要同心协力,把各项工作搞好。总之,我们要组织起来,要集中力量,要到下面去,要搞‘三抓’,关键在于实干。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关于今后工作任务怎样确定、怎样安排,我讲几个问题。

“总的说,我们要狠抓各项工作,把航天事业搞上去。中央要求我们完成‘三抓’任务,其中特别强调把‘东5’搞出来。我们要着重抓‘东5’,同时要抓‘三三一’和‘巨浪1号’。这些任务的完成,对我国、对世界,其影响和意义是很大的。我们的工作要往前赶,要有紧迫的时间观念。从现在起,我们必须在18个月内完成‘三抓’任务的各项工作,保证‘东5’在1980年打到太平洋。总的设想就是这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抓好以下各工作:

“一、明确以阶级斗争为纲、科研生产为中心,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的指导思想。(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虽然意在强调科研生产为中心,但仍沿用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此处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指揭批‘四人帮’和肃清‘四人帮’的流毒。)现在工作很多,科研、生产、基本建设、物资保障,还有规划工作,等等。各抓各的不行,要把各项工作融合在一起,拧成一股绳。究竟怎么抓法,怎样把问题解决好,把工作做好?现在有个好的做法,就是采取三结合攻关的办法。230厂和13所大力协同,组织三结合攻关,通过攻关把政治思想工作、企业管理、物资供应、后勤保障

以及加强团结、改进作风等各方面的工作一起抓起来。171所也是采取三结合攻关的办法。230厂、13所、171所它们搞出了一些经验,应该认真学习和推广。总之,科研生产是中心,‘三抓’任务是重点,‘东5’是重中之重。要抓‘东5’,带其它,要采取三结合攻关带动各项工作的办法。

“二、提高管理水平,搞好3年、8年、23年的规划。邓小平副主席一再强调管理问题的重要性。管理工作是我们的薄弱环节,提高管理水平是很重要的问题。在认真抓管理、提高管理水平的过程中,同时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把3年、8年、23年的规划搞出来。我们的目标是:前3年打好基础,后5年大发展;本世纪末达到什么目标,要有设想。这个规划要既有雄心壮志,又切合实际。要在保证完成‘三抓’任务的前提下,把预研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加强预研,加强技术储备,把‘三抓’和预研的关系解决好。

“三、把一、三线的关系调整好。一线要充分发挥现有力量,尽快出成果。三线要逐步建成完整的科研生产基地,3年内要形成生产能力,同时搞科研。布局要搞好。给三线大量调人有困难,除做好工作、少量调去一些外,可以采取几种办法:抽调一些人去三线,包教包学,给以补助;在三线办技校,就地培养;大学毕业生,主要分配到三线;一线科研人员可以出差到三线搞科研,三线科研人员可以出差到一线,又搞科研又学习。

“四、抓好物资工作。物资是搞科研生产的物质基础,必须解决好,否则会拖后腿。我们的物资,元器件是大头,一是

搞好定点生产供应；二是自己搞小厂，自行研制一点精度高、用量少的；三是进口一些。总之，物资工作要狠抓。

“五、通过‘三抓’解决体制、机构、作风问题。要协同有关省、市、自治区，抓紧配备七机局的领导班子。必须尊重地方的领导，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同时，要抓好基层，搞好基础，要分批分期地把厂、所、部、站搞好。地方的积极性发挥了，基层搞好了，我们才能打胜仗。

“质量问题非常重要，要狠抓。前天，罗瑞卿总长说：你们那里有个质量问题。罗总长讲得很对。我们的工作任务，不能讲基本完成，而是必须百分之百完成。要扎扎实实，做到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一切事故都要在地面解决，不能带着问题上天。从物资到工艺、设计都要这样做。抓质量不仅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必须狠抓、抓好，而且也是一个严重的作风问题。

“整顿作风本身就是革命。我们要通过‘三抓’进行整顿，通过整顿促进‘三抓’。要上下一体，认真学习石油部、大庆等先进单位的好思想、好作风、好经验、好方法，在全部树立起革命化、科学化的作风。关键在各级领导班子，关键在实践。从部开始到各级领导，都要通过实践，特别是通过‘三抓’实践，使我们从思想上、政治上到管理等各项工作中都有一个明显的提高。不实践，对事物的症结就体会不到，理解不了。要通过‘三抓’实践来鉴别领导班子，并不断调整、加强领导班子。揭批‘四人帮’要继续搞好，重点是肃清流毒。只有把这些搞好了，才能把‘三抓’任务完成好，才能把

我们的事业搞上去。七机部的队伍是很好的，技术力量是雄厚的。我相信，我们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在国防科委具体指导下，加强团结，努力工作，依靠广大群众，一定能够胜利完成‘三抓’任务和各项任务。”

召开这次部党组会议之前，我报告了张爱萍主任、李耀文政委。开会时，他们也到会作了重要指示。部党组进行了两天的认真讨论，取得了一致的认识。

提出“三抓”任务的是张爱萍同志，批准的是邓小平等同志。1977年9月16日，国防科委向中央提出了关于“三抓”任务及安排意见的请示报告，9月18日邓小平同志批示“同意”，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都圈阅同意。10月14日至27日，张爱萍同志召集国防科委和七机部一起开会，共同研究落实“三抓”任务问题。12月4日，七机部在廊坊召开1978年度计划会议，制定了科研生产与基本建设计划，共计安排各型号及配套设备23项，预研课题40项，明确了重点是“三抓”。12月24日，罗瑞卿同志和张爱萍同志到会，作了重要指示。

根据机关和专家们的分析，当时我们在武器研制方面，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很大。“东风5号”按原计划应于1973年定型，结果推后了7年。在空间技术方面，比世界先进水平大约落后15至20年。实现“三抓”目标，是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之必需，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党组会上认真分析了存在的困难和基本的有利条件，提出我们必须要有个紧迫的时间观念。与“三抓”有关的各项技术难关、各

项试验、各种关键性问题，必须在1979年年底以前全部解决，以确保“三抓”任务按时完成。1977年11月16日党组会上，我就说：要以“三抓”任务为中心。27日，我又讲：要大战12月。不然不得了。“三抓”任务，关键在明年，明年关键在第一季度。大干12月，为明年打好基础。1978年1月20日，在党组扩大会议上，我说：七机部的事业直接关系到国防现代化，我们一定要把“三抓”任务搞好。要全体总动员，大干、巧干、苦干，一定要按时完成。8月21日，我在部党组同一院领导同志讨论体制问题的会上说：1980年“东5”进行全程试验，这一点要明确，不能动摇，要定死。10月28日，在部党组研究运动问题的会上，我特别强调：1980年一定要打到太平洋，不能有丝毫动摇。有什么困难也要克服。讲运动，完全不排斥以科研生产为中心。经过各单位普遍进行动员和组织工作，对提出与确定“三抓”任务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很快为大家所认识。以科研生产为中心，重点任务是“三抓”，东风5号洲际导弹又是重中之重，成为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的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党组讨论分工时明确强调：分工不分家。大家要把分管的工作干好，同时必须把“三抓”任务的事干好。不管谁碰到“三抓”任务都要办；办不了的，马上报告。要天天到第一线，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要搞现场办公，现场调度。所有同“三抓”任务有关的同志，其中一大批人尽管是老干部、老专家、老工人师傅，有的还有生活困难或身体不好，他们都是不顾一切地埋头苦干，夜以继日地工作，为完成“三抓”任务争做

贡献。那时我们还开展了学大庆、学石油部活动，要求把学大庆、学石油部同“三抓”任务紧密结合起来。这方面表现突出的单位是 230 厂，该厂承担着人们称做“东风 5 号”心脏——平台的生产任务。他们的口号是跑步学大庆，争当排头兵。在 1978 年以前的 7 年中，他们生产平台 7 套，在“三抓”任务下达后，1 年之内要干出 10 套。他们同 13 所搞三结合技术攻关，过去七、八年未能解决的问题，8 天就找到了解决的措施。广大职工发誓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有的带行李吃住在车间，有的把孩子锁在家，有的准假也不回去。全厂职工半年加班达 6 万 5 千多小时。到 1978 年 6 月中旬以前，他们已经生产了 5 套平台。

各部门协同作战 省市区八方支援

为了完成“三抓”任务，我们除了抓紧内部各项工作外，还十分重视争取各地、各部委及许多企事业单位的援助，搞大力协同。1977 年 11 月，罗瑞卿、张爱萍同志召集国务院有关部委开会，商量“三抓”的大协作问题。1978 年 3 月，国防科委又召集有关部委主管同志开会，安排“三抓”任务所需协作项目。这对七机部的工作是极大的支持和帮助。这以后，七机部派出多批多人向各部委求援，向各省、市、区和许多企事业单位求援，我亲自到了四机部等单位，都得到了他们极大的帮助和支持。仅在 1978 年 3 月份，七机部就提

出“三抓”所需物资器材 1 万多项,上半年有关部委和有关单位就安排落实了 9000 多项。所需协作单位有 20 多个部委,许多省、市、区,500 多个工厂,协作项目 5000 多项。由此可见,完成“三抓”任务决非七机部一个单位所能胜任,而是要靠大力协同,靠国家各部委、省、市、区,靠许多企事业单位的共同努力。由于上下左右共同努力,1978 年“三抓”任务和其它科研生产任务,完成得比较好,某些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例如:“巨浪”发动机试车,连续 3 次获得成功;氢氧发动机试车突破了 150 秒;平台的技术与生产基本解决。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石油部。在康世恩同志的关怀支持下,石油部派来了 10 人小组,向七机部传授他们的好思想、好作风、好经验、好方法。他们到七机部以后,还自带粮票,不给七机部增加一点负担。这些同志的传帮带,推动了七机部的各项工作。

我还专门讲了要摆正同国防科委的关系。我说:张爱萍同志很客气,说要同七机部拧在一起干。但我们要明确:国防科委是领导我们的,张爱萍,李耀文同志是领导我们的。他们考虑问题全面、周到,作风深入扎实,我们要充分尊重国防科委和张爱萍、李耀文同志,要多向他们请示汇报。

亲切关怀 殷切期望

周总理、邓小平、聂帅作重要指示

对七机部的作风建设,周总理生前曾作过 16 字指示,

即：“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聂荣臻元帅在这方面也有过许多重要指示。我们强调，在完成“三抓”任务中，要遵照周总理和聂帅的指示，认真整顿和改进七机部的工作作风。在一次党组会上，特别讲到：必须尊重省、市、区的领导；必须向石油部和大庆学习；要下基层，少开会；要做到“三个面向”、“五到现场”，要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扎扎实实、埋头苦干。

在进行了八九个月的实际工作之后，我们请求向邓小平同志作一次汇报。1978年8月1日、2日，我同郑天翔、王纯、芮杏文、任新民同志去汇报。听汇报的还有：王震、杨勇、张爱萍、李耀文、洪学智、李人俊、李懋之、钱学森、马捷、刘华清等同志。我们全面汇报了七机部的运动情况、科研生产情况以及一些想法等。小平同志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对许多重大问题都给予了明确的指示。对揭批“四人帮”，他指出：运动最大的目标是落实政策，整顿组织。首先是搞好领导班子。对国防尖端同国民经济的关系，他指出：要把钱花在国民经济发展、提高生产力、提高技术水平、提高人民生活上。军事费用尽可能缩小。提出了“以民养军，军民结合”的原则。对战略武器的发展方针，他指出：要以洲际为主，陆基为主。要集中力量搞“东风5号”，搞小型化、机动的。用最现代化的武器打游击战争。武器要更新，方针是少而精。此外，他对空间技术发展的方针、技术引进、三线建设等，都作了重要指示。他说：搞实用、急用卫星，不搞太空竞赛。小平同志听取七机部工作汇报并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表

明党中央对航天事业和航天战线广大职工的关怀与重视，寄予殷切的期望。对当时的“三抓”任务和各项工作都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对以后的工作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抓好群众生活 解决实际困难

在抓科研生产的同时，抓好群众生活问题，是一件大事。我到七机部以前的 20 余年中，七机部在一线已建成比较系统、完整、配套的科研生产试验基地，并且完成了许多重大科研生产试验任务，同时也初步建成了同一线相对应的三线基地。截止 1977 年年底，三线建设投资 12 亿，完成 8 亿多，建筑面积达 100 多万平方米，拥有仪器设备 4700 多台套，职工已有 2 万多人。当时，国防科委和七机部已经决定，三线基地要承担部分“三抓”任务。我们在大干“三抓”的时候，必须了解科研生产试验条件，也必须了解广大群众的生活情况。我们了解到，一线单位职工生活上存在不少问题，一部分老同志夫妻两地分居多年，一直未得解决；子女上学、就业受到影响；有的单位职工吃水、住房十分困难，等等。三线单位职工生活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亟须看望那里的职工，也亟须获得一手情况。

1978 年春节期间，我同部机关几位同志，先到了驻内蒙第四研究院。当时，该院向其后方基地（陕西省蓝田县）搬迁已基本完成；原已确定的组建七机局的工作正在进行；留

在内蒙的单位承担着“三抓”任务之一——“巨浪1号”潜地导弹发动机的研制工作。总之，他们面临搬迁、科研生产、改变领导管理体制，还有清查工作等多项任务，情况复杂，矛盾突出，而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思想很不安定。留在那里的单位有3个研究所、2个工厂、1个动力站、1个职工医院，还有托儿所、食堂，商店等。我们于2月5日晚出发，6日晨到达呼和浩特，12日回到北京。在整整7天时间内，我们走遍了上述各单位，慰问广大职工群众，分别召开了干部座谈会、技术人员座谈会、工人座谈会、全体职工大会。在我们的慰问活动中，所到之处都受到广大职工的热烈欢迎。看到广大群众非常高兴，我们也十分高兴。在我们活动过程中，除四院党委书记王树明、院长林爽陪同外，内蒙古自治区尤太忠同志和国防工办的同志花了大量时间陪同。特别是我们去44所时，因为正值遭受暴风雪袭击、大雪封山之后，而该所地处距呼和浩特市百余公里外的卓资县，为安全起见，尤太忠同志特意搞来一台高底盘面包车并亲自陪同。我们深深感到自治区领导对我们的诚挚和热情，也深深感到他们对七机部在内蒙的单位，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帮助。经过了解和群众反映，在内蒙各单位，生活方面的问题较多，科研生产方面主要是材料与设备问题，还有领导管理问题。有些问题，我们同院领导商定，由院里解决；有些问题，我们向尤太忠同志、池必卿同志作了汇报，交换了意见，他们有条件解决的问题都迅速解决了；有些问题带回部里，也逐步解决了。

1978年6月18日，我同王纯同志及机关的一些同志去川北062基地，还同李耀文同志相约同时到达。按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决定，该基地承担着“三抓”第一位的“东风5号”洲际导弹的部分任务，而他们地处偏僻山区，职工生活艰苦，科研生产条件也很困难。原想对那里情况作一次全面了解，但可惜的是，我到达县、万源看了几个单位部分职工之后，就在6月23日夜间病倒了，发烧到40摄氏度以上。四川的省、地、县及铁路部门、军分区都派来医疗组，在李耀文同志的主持下，对我进行了积极的治疗。七机部把我患病的情况报告了国务院。李先念、罗瑞卿同志得知我患病的消息后，立即派了一架飞机到重庆，接我回北京继续治疗。这次患病的直接原因是腹泻引起发烧，实际上同我年老体弱有关。当时我已年近7旬，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的磨难，身体虚弱，体重只有90多市斤。看来，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负责人要经常下基层，年纪大了确实不行，中央作出干部要年轻化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通过下面汇报、部党组和机关同志下去了解，我们知道，三线职工生活上的困难更多、更突出，如两地分居问题，子女问题，地方病问题，等等。

我们了解情况后，都感到这些问题非解决不可，不然将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三抓”任务的完成。对在京单位，北京市委、市政府给予了极大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一次就解决七机部两地分居户口1000多户；对子女上学、就业、吃水、住房等问题，也做了不少工作。对三线职工生活问题，我们同

张爱萍、李耀文同志几次商量，几次向中央和中央专门委员会写请示报告，最后“中央专委”于1978年12月2日下达文件，批准解决三线职工生活中的几个问题：三线职工的生活补贴；三线职工的保健；三线职工的食品供应；三线职工子女的上学、就业等。这些实际问题的解决，进一步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密切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推动了“三抓”任务的进行。三线广大职工在十分艰苦和困难的情况下，为科研生产和“三抓”任务付出了极大辛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改变垂直领导 调整管理体制

过去，七机部基本上是垂直领导的体制。经过多年实践，特别在“文革”之后，这种体制暴露出它的不足、不利方面，有些单位，如二院和三线基地等，其方向、任务亟待调整。在我到七机部之前，部属在京单位已改为部与北京市双重领导；京外单位改为部与省、市、区双重领导的问题也已提出并正在研究过程中。我到七机部以后，继续进行这项工作。经同各院、基地反复研究，多次同国防科委和张爱萍、李耀文同志商量、请示，大家一致意见，为了加强领导，更好地开展工作，更好地发展航天事业，管理体制及某些单位的方向、任务，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当时确定在有关省、市、区设立七机局，既是七机部的派出机构，又是所在省、市、区的

办事机构。为解决这一问题，1978年3月初，我在参加人大会议期间，同陕西李瑞山同志、山西王谦同志、浙江铁瑛同志、内蒙尤太忠同志、湖南毛致用同志、甘肃宋平同志分别进行商量，他们都表示支持。在研究二院及其他一些单位的方向、任务调整时，我们提出3条原则：一、有利于集中人力、物力搞进攻性武器；二、有利于向专业化发展；三、有利于备战。为此，李耀文同志专门到七机部传达了张爱萍同志和国防科委的8点意见。张主任同意我们的意见，说要加一条：有利于预研。由于多年积累的问题和形成的客观条件，调整工作难度很大。为了保证1980年以前完成“三抓”任务，我们只对条件比较成熟的问题逐步予以解决，整个管理体制的调整则不大动。

我到七机部之前，部长是汪洋同志。1977年10月20日，中央任命我为七机部部长的同时，免去了汪洋同志的部长职务。当时的副部长有：强晓初、王星、陆平、程连昌、张凡、张钧、任新民、张怀忠同志。还有顾问谷广善同志。1978年4月22日，中央任命王纯同志为七机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昌安、段毅、芮杏文、杨培先同志为副部长。1978年5月，又任命郑天翔同志为党组副书记、第一副部长。七机部的领导班子做到了这样几条：一是思想统一，行动统一；二是团结一致，互相配合；三是工作勤奋，作风比较深入；四是不尚空谈，重视解决实际问题。应该说，这个班子是比较好的。这也是七机部工作取得成绩的基本保证。

列席十一届三中全会 增选为中央委员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举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我以全国政协副主席(1978年3月恢复了我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和七机部部长身份列席了这次全会。

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的两年间,由于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仍然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党和国家的工作在总体上受到了严重的阻挠,我国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按照华国锋同志的原来计划,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的主题只是经济问题。由于在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等老同志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全会突破了原来的议题,开成了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旗帜鲜明地提出要解放思想,克服思想僵化,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公报指出:“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就从根本思想上解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为克服多年来的“左”倾指导思想,恢

复党的优良传统,按正确方向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全会在充分肯定揭批林彪、“四人帮”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作出了应当及时地、果断地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全会还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在1976年发出的有关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处理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

这次全会开得非常成功。同志们畅所欲言,为了党的利益,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是党内多年来所没有过的,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

12月22日我作了书面发言,表示“完全拥护中央关于明年1月份结束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完全同意增补陈云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项人事安排”。我还联系七机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四人帮”严重破坏的实际,提出要认真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我在发言中说,“林彪、‘四人帮’对我们党的干扰破坏,时间之长,危害之大,都是空前的。他们在党内经

营 10 几年,大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党内生活搞得极不正常,把党的组织原则和思想作风践踏得不成样子,所造成的内伤和外伤都是极其严重的。而内伤尤其严重。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肃清流毒、医治内伤应当是我们长期的一项艰巨的政治思想任务。……七机部是深受‘四人帮’之害的‘重灾区’,内伤极其严重,他们把队伍搞分裂了,思想搞乱了,使许多工作受到很大影响。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严重内伤,还表现在严重地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肆意践踏党章、国法。这种内伤,至今还在不少同志身上、一些地区存在严重的影响。我们党历来实行集体领导,重大原则问题都必须经过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人就可以代替党的领导,一个人的话就可以是党的决定,别人只能奉命行事。重大案件,可以不经过集体讨论,一个人批了以后,就可以把许多老干部投入监狱。……这在我们党内都是罕见的,是极不正常的,这说明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内伤是多么严重,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们应当认真总结这个血的历史教训,尽快完善我国的法制。要党有党章,国有国法。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要模范遵守党纪国法,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党章和法律之上的特权。……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牢记这个历史教训,保证我们党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使我们党的事业永远健康发展。”

小平同志在这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要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重要政策。他说:“我认为要允许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后来的实践证明，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个政策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对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在这次全会上，陈云同志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同志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黄克诚同我、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同志增选为中央委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三天，即1978年12月25日，中央发出了77号电报通知，决定调我到中央组织部任部长。郑天翔同志接任七机部部长、党组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担任辽宁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同志到北京后对我说：我看了辽宁省委原来给你做的历史结论，是错误的，要修改。我对仲夷同志讲，需要修改审查结论的人不少，我已经是党中央委员，当了中央组织部部长了，你先解决其他人的问题，修改我的历史结论可以放到后面再解决。到1980年2月，辽宁省委正式修改了我的历史结论，同年4月中央批复同意。

我在七机部仅仅工作了1年又2个月，时间虽短，但对那里的同志、那里的事业怀有深厚的感情。七机部从一个大

乱不止的“老大难”、“重灾区”到再次“启动”“腾飞”，集中力量完成“三抓”任务的大转变，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在国防科委的直接指导下，部党组、中央工作队团结七机部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这个大转变的年代，我赶上了一个开头，尽自己的努力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更大量、更繁重的工作是我离开七机部以后由以郑天翔同志为核心的部党组和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共同做的，也是各地区，各部门大力支持和协同的结果。在我离开七机部以后，1980年5月18日，“东风5号”洲际火箭向南太平洋海域发射成功；1982年10月16日，“巨浪1号”潜地导弹水下发射试验成功；1984年4月8日，我国第一颗同步轨道试验通讯卫星发射成功，航天战线不断取得激动人心的新胜利。

我衷心地祝愿航天战线的同志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继续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第三章 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一)

从1978年12月党中央决定我到中央组织部任部长，到1983年2月离任，这4年多时间，是我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很值得回顾的岁月。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 到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胡耀邦同志找我谈话。他说：中央决定调我任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长，我要走了，由你接替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我没有思想准备，感到很突然。耀邦同志说：不要犹豫了，中央已经决定了，你就赶快来吧。就这样，我到了中央组织部。12月27日，胡耀邦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局、处负责干部会上，宣布了中央的决定，介绍我正式到职。耀邦同志介绍了中组部的情况之后，我讲了话。我说：1954年底我任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时曾兼任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但没有到中组部上过班。这次中央决定我到中组部工作，自己感到担子很重，压力很大。我今年已经70岁了，三国时期有个老黄忠，我恐怕连黄

忠还不如。我这个人能力不那么强，魄力不那么大，四平八稳，有时有点优柔寡断。但是有个办法可以补救我的不足，那就是加强集体领导，充分发挥集体的作用。我一定不偷懒，依靠大家的力量共同把工作搞好。会上，大家表示支持我到中组部工作。同时，希望耀邦同志到中央后继续关心和指导下组部的工作。

一到中组部即面临着组织部门如何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问题。1979年是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第一年，面对这个伟大的战略转变，当时我们研究确定了组织部门的中心任务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三中全会决议，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搞好党风，抓紧完成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加强党员教育，做好干部的培训和考核，从组织上保证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其中的紧迫的任务是继续抓紧抓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当时这项工作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但是做好这项工作也具有两个有利的条件。

一个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召开了为党的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陈云同志根据党的组织工作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文件，对解决一批党的重要领导骨干的冤假错案、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等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一些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错误的中央领导成员提出了批评，对康生、谢富治的严重问题进行了揭发批判。与会同志还批评了华国锋同志

提出和坚持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同时，会议确定了进一步解决好“文化大革命”中遗留问题的方针政策。

12月18日至22日，具有历史重大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全会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在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假案、错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要尽快实事求是地、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

这两次会议，对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所确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以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犹如温暖的春风，融化了“两个凡是”和“左”的思想禁锢的坚冰。党以雄伟的气魄，坚决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表明了党的高度原则性和生命力，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迅速全面展开，使全会前那种步履维艰的局面有了很大的变化。

冲破阻力 拨乱反正

耀邦同志功不可没

另一个有利条件是，1978年中组部在胡耀邦同志主持

下,作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为以后的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通过研究中组部1978年工作总结,我对耀邦同志主持这一年的工作情况,有了更为具体的了解。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组部是受到林彪、康生、江青严重干扰和破坏的一个单位。粉碎“四人帮”以后,郭玉峰继续坚持错误路线,给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造成极大困难。耀邦同志到中组部以后,首先起用了一批组织关系在中组部,但是没有“工作”的老干部。他在中组部全体工作人员会上说:中组部要把“四人帮”颠倒的东西颠倒过来,要尽快投入拨乱反正、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原来没有工作的老同志只要身体健康,都可以参加。为了接待受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干部的申诉和复查平反冤假错案,经他提议请陈野苹同志负责组建了老干部接谈组,由章蕴、毛铎、郑伯克、蹇先任、王直哲等几十名老同志组成;为了使中央国家机关待分配安置的6000多名干部尽快得到分配和安置,请曾志同志负责成立了干部分配办公室;请杨士杰同志负责成立了右派改正组。这些老同志日夜操劳,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做了大量工作。

这一年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确是步履维艰。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设置了许多“禁区”,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同时,“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也严重地干扰了这项工作。不解决这些问题,干部政策就落实不了,工作就寸步难行。耀邦同志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坚持解放思想，大胆拨乱反正，同“两个凡是”的错误作了坚决斗争，顶住各种压力，冲破重重阻力，大刀阔斧地推进落实干部政策工作。

首先是广泛宣传了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意义，和落实干部政策必须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实事求是方针。面对“两个凡是”的禁锢，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两个不管”，即：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来。他还先后提出落实政策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方法是群众路线”、“既要能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全党办案”、“必须严格尊重事实，事实是办案的基础”、“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正确评价干部的功过是非”等一系列指导原则。狠抓了提高思想、统一认识的工作。为了打通思想，排除干扰，耀邦等中组部领导同志在部召开的各种会议上讲了 20 多次话，下发了 40 多个文件，在报刊上发表了 10 几篇文章，《组工通讯》刊出 30 多期、近 10 万字的政策评论。

同时，还分批召开了许多小型疑难案例座谈会，耀邦同志亲自到会参加讨论或讲话，对上百个久拖不决的疑难案件提出了处理意见，划分了政策界限，提出了落实政策的标准。这一年里，在耀邦同志的主持下，中组部直接办理和复查平反了 130 多名副省长、中央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大案要案。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批示，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人”案件进行复查。当时原中

央专案组不肯交出材料，复查遇到很大阻力。耀邦同志果断决定由中组部重新组织力量，查阅档案，一个一个进行调查。我记得耀邦同志派贾素萍同志亲自向我了解过“六十一人”中赵林同志的情况。在耀邦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调查组经过几个月努力，终于还了历史本来面目，向中央写出了平反报告，中央同意报告并发了通知。还对李维汉、帅孟奇等一批受迫害被“流放”外地或被关押的领导干部，在来不及复查的情况下，经报请中央同意，先接回北京治病。这一年还狠抓了复查改正错划右派的工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和复查“四清”中冤假错案，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工作等等。

耀邦同志逝世后，党中央的讣告中，肯定他 1978 年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表现出非凡的实事求是的胆略和勇气，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我觉得是很客观公正的，当之无愧的。耀邦同志在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功不可没。

我到中组部后，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抓了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部里直接分管这项工作的陈野苹同志，及其他几位副部长李步新、曾志、杨士杰、白治民、赵振清、王照华等同志，都在这项工作上花费了很大精力。经过 3 年努力，到 1982 年底，基本完成了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的任务，全国共复查平反被立案“审查”的干部 230 万人，集团性的冤假错案近 2 万件。另外，协同有关部门完成了错划右派改正工作和“四清”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全国共改正了

54 万余人的右派问题,复查“四清”运动中处理的案件 63 万余件。

这一时期,我们着重从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抓面上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部署和督促,通过调查研究,制定政策,加强指导;二是加紧直接复查平反副省长、中央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的重大冤假错案,特别是集中力量复查平反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一、三办的案件。

抓紧部署 加强指导 全党动员 组织几十万人的办案队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贯彻全会精神,大大促进了全党解放思想,冲破了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有力地推动了落实干部政策工作,这项工作在全国大规模的普遍开展起来。全国有几十万干部做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各级组织部门集中很大力量投入这项工作。1979年,即在我主持中组部工作的第一年,经请示中央同意,把继续抓紧抓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作为组织部门的中心任务之一,进行了部署。强调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按照“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的原则,继续抓紧解决。要求对省委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或相当这一级的干部的政策落实,力争在1979年6月底以前或稍长一点时间内搞完。对其他干部,包括不脱产的基层干部的政策落实,争取在今冬明春基本

搞完。

考虑到落实政策涉及的问题很多,工作量很大,难以齐头并进,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从实际出发,区别轻重缓急,作出妥善安排,分期分批地加以解决。强调首先要抓紧解决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前历次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和其他有关问题的处理,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穿插进行。还要求各地对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落实,应注意不影响农业生产。对落实政策对象,一定要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鼓励他们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团结起来向前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这一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加强了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进展比较快。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和必须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有一些领导干部和从事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同志,对善始善终地完成落实干部政策任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比较普遍地出现了差不多的思想和松劲情绪,有的未经检查验收,就撤掉了办事机构,调走了工作人员;有些地区和单位的领导同志和一些工作人员受极左路线和两个“凡是”的影响,思想还不够解放,对一些案子迟迟不研究,不解决,对一些上级交办、应该解决而又不难解决的问题,硬是顶着不办,甚至认为落实政策过了头;有的由于派性作怪,对有的人的问题长期不予解决,甚至还在捂盖子;有的忽视了深入细致的解疙瘩和促进团结的思想工作;也有少数被落实政策的人或者亲属,提出一些过高的、不合理的要求。由于上述原因,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还面临

着十分艰巨的任务。据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干部队伍中的案件，大约还有 20 余万件没有复查结案。复查工作进展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和单位，应当复查的案件只复查了 50—60%，个别县复查的不到 10%。有些人虽然做了复查结论，但还有些善后工作没有做好。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在已经复查的案件中，据一些省市重点检查验收，大约有 10%至 20%不合要求，多数定性处理偏高偏严，有些给留了尾巴。也有极少数把不该否定的问题给砍掉了。“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大批材料，许多是无限上纲、诬蔑不实和重复无用的，需要花很大力量和时间，才能清理好。改正错划右派的工作和反右倾运动中错案的平反改正，还没有全部完成。

以上这些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落实干部政策就不可能做到善始善终。为此，中组部在 6 月召开了全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座谈会，我在这个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着重强调落实干部政策一定要做到善始善终，要对每个同志的政治生命负责。我们不能只看到面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80%、90%，只要还有一个错案没有得到纠正，那么，就这个同志来说，他的问题就不是解决了 80%、90%，而是 100%地没有解决。要一个案件一个案件，一个人一个人的扎扎实实地搞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六项措施,三个要求

善始善终抓好落实

1979年9、10月间,我们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主要文件之一就是《关于善始善终地搞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意见》,当时提出了六项措施三个要求:

一、要继续加强领导,坚持全党办案。领导同志要亲自抓大案、难案,亲自做思想工作,亲自监督检查。在检查验收以前,落实干部政策的办事机构不要撤销,工作人员一般不要调走。

二、没有复查的案件要抓紧复查,对经过复查但不合要求的案件,要及时纠正。对于一些行动迟、进展慢的后进单位,可以抽调一些得力干部加强督促检查,进行具体指导,帮助解决问题。

三、继续认真做好落实农村、城镇基层干部政策的工作,解决好历史上遗留的问题。要着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不要在枝节问题上纠缠,防止草率从事,走过场。

四、在复查工作接近结束时,及时组织力量清理好干部审查材料,将应该保存的,分别归入档案,该退还本人的退还本人,该销毁的予以登记销毁。对受牵连的家属子女和亲友的档案中保存的不实的材料,也要采取负责态度,认真清理,消除影响。

五、认真做好检查验收工作。验收的标准是:(1)过去受

审查的需要做结论而没有结论的,已做出了正确的结论。(2)做过结论但不正确的,已改正过来,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已予推倒。(3)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已分配适当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已做妥善安排。(4)对受审查期间去世的同志,已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善后工作已经做好。(5)无辜受牵连的家属、子女、亲友和有工作关系的人员中应予解决的问题,已妥善解决。

六、要贯彻始终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干部政策不是“过了头”,而是有的冤假错案还没有平反纠正,或者解决得不够彻底;不是“差不多”,而是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一定要注意克服松劲情绪。要坚决克服派性干扰,绝不能对亲自己的搞一风吹,从优照顾;对反对过自己的故意拖延,揪住不放。对极少数抵制三中全会精神,顽固阻挠落实干部政策顶着不办的,一定要严肃处理。对被落实政策的干部,要从政治上关怀爱护,多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在贯彻《关于善始善终搞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意见》的基础上,当时着重从以下3个方面加强对面上的指导工作。

(一)加强思想指导。着重解决由于对落实干部政策的艰巨性认识不足,产生的松劲情绪;清除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中反映出的“左”的思想影响和流毒,克服极少数领导干部存在的派性干扰。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庄严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告,为刘少奇同志平反,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

纠、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不仅是为了刘少奇同志个人,而且是为了使党和人民永远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用一切努力来维护、巩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类似刘少奇同志和其他许多党内外同志的冤案永远不致重演。全会要求各级党组织本着这一精神,积极负责地继续解决类似的尚未解决或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中组部为了贯彻五中全会精神,于1980年4月18日转发了贵州省委《关于平反纠正因刘少奇同志问题造成的冤假错案,善始善终地落实好党的政策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把因刘少奇同志冤案受株连的和“文化大革命”中其他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务必争取在当年上半年结束。全国因刘少奇同志冤案受株连的有数万人,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领导干部的冤假错案都有所谓“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地方的代表人物”等等。通过刘少奇同志这个在全国影响最大冤案的平反,使广大干部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平反纠正了数万人因刘少奇同志冤案受株连的案件,同时也推动了其他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

(二)加强政策指导。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对落实干部政策有过许多指示和文件。在贯彻中央的这些基本政策精神过程中,根据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中遇到的问题,由中央组织部或者经中组部分别协同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教育部、

国家科委、国务院侨办等有关部门，就某一个方面的问题，研究制定一些具体政策规定。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1月至1982年底，发出这类政策性文件共有27件。在复查案件过程中，对一个干部的定性和结论是否正确，一靠事实，二靠政策。及时进行政策指导，对落实干部政策健康地开展，体现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的原则，十分重要。

例如，一些同志在对敌斗争中历史上有过被捕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同志被诬陷打成“叛徒”、“特务”，受到严重迫害。对这方面的问题，中央在1953年11月和1957年2月的有关文件中，都有明确的规定，绝大多数干部的问题，早已按这些规定作出了正确的结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否定了党中央通过的这些文件和根据这些文件作出的结论。落实政策中必须把“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纠正过来。因此，中组部在有关政策文件、案例通报中，反复重申：干部中的这类问题，如果过去已有结论，定性处理基本符合上述文件精神，应当维持原结论；如果事实有重大出入，或处理明显不当的，应按照上述文件精神，予以改正。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对在这类问题上形成的冤假错案的平反。

又如，“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同志受到政治迫害的同时，家中的财物也被查抄，而且数量较大，到落实干部政策的后期，这些同志在政治上平反后，要求退回被查抄的财物。妥善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查抄财物遗留问题，是做好落实干

部政策善终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于1982年初向中央、国务院作了《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查抄财物遗留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经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同意后，中央组织部将这个报告转发给全国各地，参照执行。这是当时解决查抄财物问题的一个较全面的政策指导性文件，各地、各部门对于处理这类问题有了政策依据，加快了善终工作的进度。

再如，“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干部，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达200多万，每个人都有数十件、上百件，甚至上千件、万件的材料，其中绝大部分是无限上纲、诬蔑不实和重复、无用的材料。也有一部分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们写的材料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可以做为考察了解干部的依据和研究革命历史的参考。在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强烈要求对这些材料进行认真清理，把一切诬蔑不实的材料全部销毁。一些省、市、自治区对于干部审查材料也着手进行了清理和分类，但对哪些材料应当销毁，哪些材料应当存档，在认识上不尽一致，等待中央做出统一规定。为此，我们经与一些省、市委组织部的同志共同研究，拟出了有关规定，并征求了全国组工座谈会到会同志的意见，经中央批准，下达执行。从而统一了认识，统一了做法，使这项工作有所遵循。

（三）加强组织指导。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中，在深入调查研究、掌握情况的基础上，及时提出和采取一些有力的组织措施，是十分必要的。首先是要求各级党委建立强有力的

领导小组和专门工作机构,挑选那些党性强、品质好、办事公道、能积极为受迫害同志洗刷冤屈的干部从事这项工作(全国最多时达60万人)。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以党委负责同志为首的,组织、纪检、政法、统战、民政、财政等部门领导参加的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地、县也建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形成层层部署、逐级负责,专门班子与依靠群众相结合,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全党上下一起动手。有些地方和单位干部政策落实不彻底,甚至形成死角,重要原因之一是主要领导权没有掌握在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同志手上。有的领导班子里还有派性严重的人,和制造了冤假错案而又不愿意改正的人。他们对中央落实干部政策的方针采取抵制的态度,硬顶或者软拖,对应该平反纠正的冤假错案迟迟不解决。为此,我们提出,对那些批评教育坚持不改的要坚决调离。

为了使一些有争议的案件或是长期拿不准的案件,早日结案,从中央到省、市、自治区继续采取分批召开一些小型疑难案件座谈会,走群众路线,集体“会诊”的办法,一件一件地研究解决,收到很好的效果。对有些证据不足无法查清的案件,根据现有材料以及本人历史上和现在的申明,全面地加以分析,作出结论,对个别有一定证据,但证据不够充分,调查线索中断,本人又一直否认的,采取把审查情况和本人交代如实写清楚,以证据不足不能认定的办法予以结论,尽量不采取挂起来的办法。

在落实干部政策、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工作

的后期，狠抓了检查验收工作。并组织力量到一些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进行了抽查。1981年3月，中央书记处指示由中纪委、中组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对各省、市、自治区落实政策情况，进行一次检查，中纪委和中组部为此专门发出通知，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通过检查验收，查错补漏，保证了办案质量，巩固了复查成果，使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善始善终。

撤销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接收中央专案材料

我刚到中组部时，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上，首先遇到的是接收并复查平反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第三办公室和“五·一六”联合专案办公室移交给中组部的大量案件。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立的。本来党中央在1978年6月就曾确定把原中央专案材料全部移交中组部，但专案办的主要负责人把着不交，说什么：专案办没有“四人帮”干扰。意思很明白，就是不能复查平反。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提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在1978年底三中全会上，许多同志尖锐地批评了中央专案办主要负责人的错误做法。全会决定指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

查干部的方式,弊病很大,必须永远废止”。决定撤销中央专案机构,将所有档案全部交中组部。为了贯彻执行全会的决定,1978年12月19日,由原中央专案负责人汪东兴和纪登奎、吴德召集中央专案组和中组部的同志讨论交接工作。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副部长陈野苹,公安部部长赵苍壁等同志和3个专案办以及中组部干审局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上宣布: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第三办公室、“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办公室,自即日起撤销。所有专案工作,一律交中央组织部办理。在移交过程中,不准销毁材料。会议后各专案办公室即停止办案;已送交中央档案馆的专案材料,全部调出,统一交中组部。1978年12月20日上午,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同志在中组部厅、局长会上,传达了移交会议精神,并对中央专案材料接收、复查工作,做了具体部署,决定从中组部部内有关局抽调和从外面借调几十名干部成立3个组:一组是案件组,负责清理一办、三办和联办的案件;二组是材料组,负责清理、借阅材料等;还有一个组负责文书档案处理工作。专案材料的移交工作,1979年2月底全部完成。

专案材料的接收工作是我到中组部任职前开始的,我任职后继续进行。日常领导工作由陈野苹同志负责。中组部接收原中央专案组移交的专案材料17349卷、391363件,涉及受审查人员共计669人,据中央专案组1975年的一个《报告》,上述被审查的人员,定为“问题性质严重或敌我矛盾”的就有320人,占被审查人员的47.8%。

被审查的人中,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南征北战的元帅和将军,有原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正、副省长,有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部长,司局长和一批专家、教授、作家、工程技术人员,甚至还有少数居民和学生。据统计,被列入中央专案审查的,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及省、市、自治区副省长(包括军队中相当这一级的干部)以上干部 213 人,其中八届政治局委员 10 人,中央书记处成员 10 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71 人(不包括省、市审查的),国务院副总理 7 人。

过去,中央专案组的情况是被严密封锁的,很少有人了解全貌。在一次中组部办公会上听取了专案材料接收组对上述情况的全面汇报后,大家无不感到震惊和愤慨,对林彪、“四人帮”、康生、谢富治迫害领导干部的罪行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我们对抓紧复查平反这些案件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更加坚定了我们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这项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的信心和决心。此后,中组部领导和承办的局、室昼夜不停地投入了复查平反工作。但是,这么多的大案、要案,加上受他们株连的家属、亲友和工作人员,也要随着他们本人冤案的复查平反一并加以解决,案件的数量之多,工作量之大,情况之复杂是空前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短时间内把这些案件实事求是地作出复查平反结论,只靠中组部的力量显然是不可能的。有鉴于此,中组部采取了以下措施:首先是把被中央专案组下放到外地仍在监督劳动的领导同志全部接回北京

和有关单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组部在这个问题上，有了更大的主动权。会后回到北京的有彭真、张洁清夫妇。原被关押的王光美同志也被接了出来。其他同志也由各单位陆续接了回来。其次，对一部分同志采取了先分配工作，后作复查平反结论的办法，使这些领导同志尽早走上工作岗位。再次，是按照全党办案和群众路线的原则，采取转请本人原单位进行复查，然后送中组部审理，转报中央审批的办法，这样就大大加快了复查平反的进度。实践证明，这些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1979年到1980年，由中央组织部直接作出结论并报中央批准的有445人，其中包括彭真、陆定一、陶铸、刘澜涛、习仲勋、安子文、钱瑛、胡乔木、帅孟奇、赵毅敏、林枫、谭震林、李立三、王任重同志等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

独裁专案 为所欲为 残害忠良 令人发指

从原中央专案的材料和有关同志对专案组的揭发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四人帮”一伙打击迫害老干部的罪行。“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和康生、谢富治等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他们打着审查干部的旗号，把持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残酷打击迫害老干部，制造了我党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冤假错案。他们把许多老干部早已有结论的历史问题，重新翻出来，采取歪曲事实，无限上纲的手法，给他

们扣上“叛徒”、“特务”、“反革命”的帽子。他们还把一些同志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或工作中的失误,有意夸大,给他们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三反分子”的帽子;更有甚者,他们随心所欲,点名诬陷同志,先定性捕人,再交专案组“调查”搜集“证据”,当时仅凭江青、康生、谢富治的一句话,就可以把人投入监狱。据不完全统计,“文化大革命”中,原中央专案组先后共关押和监护的干部有 1124 人,被隔离在单位、干校或外地的,不计其数,实际上受株连被关押、审查的人员远远超过了移交名单上的数字。有数以万计的无辜干部群众受到株连,有不少证人和家属受株连,也被投入监狱,深受牢狱之苦。

林彪、“四人帮”、康生、谢富治等大搞逼、供、信,对老干部进行政治迫害,鼓吹什么“办案的过程,就是不断反右的过程”,“办案要立足于有,着眼于是”,“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和“棒子底下出材料,后半夜里出成果”等谬论,要求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对被审查人员要“无限仇恨”。他们的手法主要有:

(1)突击审讯,搞车轮战。对受审查者严刑逼供,直到“招供”为止。一办还规定:“对一些年老体弱以及病重的要抓紧审理调查,人死了就不好办了”。中监委委员王世英、河北师院教授张重一等同志,身患癌症,生命垂危,被突击审讯致死,康生公然说:“死有余辜,可惜将他知道的材料带到坟墓里去了。”

(2)指供诱供、逼取假证。他们采用小型审斗会的方式,

抛“材料”，点问题，诱供指供，罚站罚跪，拳脚相加，康生甚至下令，“陆定一、刘仁不老实，要带上铐子连续突击审讯”。许多“口供”、“证词”就是用指供、诱供、逼供搞出来的。

(3)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他们歪曲历史事实，把革命工作说成是反革命活动，把对敌斗争的某些手段，诬为“资敌通敌”、“叛徒内奸”。

(4)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文化大革命”前，中组部曾调阅过北京市公安局的一部分敌伪档案，“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就诬蔑安子文同志销毁档案。安子文同志家有一部只能作收音机用的旧电台，也被康生诬蔑成搞特务活动的“证据”。

(5)无中生有，造谣中伤。吴晗、周扬等同志从来没有被捕过，却被打成“叛徒”。北京市体委拆掉废弃的旧电台，专案组却写成“砸毁”电台，当作证据，拍照登报，为此康生批捕了5人入狱。

(6)捉刀代笔，强迫签字。办案人员根据需要口授或拟好供词、证词，强迫被审查人员或证人抄清、签字，不签字的，就被强迫按手印。

(7)断章取义，拼凑“罪行”。在中央专案的定案材料中，把一些同志的日记、文章、电稿等，剪接拼凑在一起，设计成“罪证”上报。

林彪、“四人帮”、康生、谢富治等大搞法西斯暴行，进行人身摧残。大批老干部在狱中或被监护后，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少奇同志重病在身，不但得不到应有治疗，就在他生命

垂危之际，竟然把他秘密转送到开封监禁，终于被折磨致死。彭德怀、陶铸、张闻天等同志，在备受折磨之后，含冤逝世。幸存者也被长期监禁，甚至刑具加身，陆定一、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等同志被带上手铐关押在秦城监狱，刘、徐冤死在狱中。据1975年4月统计，在狱中因不堪忍受凌辱和虐待，被逼死的有15人，由于延误治疗死亡的有66人。1979年2月，原中央专案组移交中组部复查时死亡人数已达到141人。1967年至1971年期间，仅在秦城监狱中被逼死的就有5人，其他原因被迫害致死的29人、被折磨成精神病的60余人、被打致残的20余人。

林彪、“四人帮”、康生、谢富治等株连无辜，造成数万人家破人亡。他们从炮制“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到打倒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株连了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许多集团案件，株连一大片。“新疆叛徒集团”案，株连129人。“东北叛党集团”案，株连700余人，加上亲友、工作人员不下数千人。西安事变前后，在东北军地下党和东北救亡总会工作过的领导干部都被打成了“叛徒”、“特务”、“通敌策反”。贺龙同志一案，原二方面军不少干部受到株连。他们在迫害老干部的同时，还有许多老干部的子女被妄加罪名，有的长期隔离，有的逮捕，有的被打伤打残，有的被迫害致死。

林彪、“四人帮”、康生、谢富治这伙人窃踞中央专案小组的大权，他们滥捕无辜，诛除异己，残害忠良，使许多革命老干部蒙受不白之冤，遭到残酷迫害和打击。数量之大、范

围之广、手段之残酷,这是我党历史上所罕见的,对党和国家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教训是极为沉痛深刻的。设立中央专案机构审查干部,弊病极大。一是专案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成了凌架于党政机关之上的专政机构,凭少数人非法决定,就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高、中级干部进行立案审查,破坏了法纪。二是动辄采取监管、监护和逮捕等专政手段,混淆了敌我。三是中央专案组采取的是单线领导的方式,专案组只对个别领导人负责,这样就为康生、江青一伙野心家陷害好人创造了条件。为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必须永远废止”。这是用无数干部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沉痛教训。

中央专案组的种种严重问题,许多是林彪、“四人帮”、康生、谢富治等人一手造成的,专案组主要负责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于专案组的一般工作人员,他们多是由组织派去的,其中坏的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同志是奉命办事,责任不在这些同志身上。他们中的许多同志在觉悟和认识提高以后,主动地揭发了专案组内部的许多严重问题。当然,有些同志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在执行中犯的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应当引以为戒。

为数百名省部级干部复查平反 审理冤假错案三千余件

“文化大革命”前，全国共有副省长、副部长以上干部1253人，“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有1011人，占81%。其中，由各地各部门立案审查，被诬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司令部代理人”、“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有453人，占总数的36%（不包括由原中央专案组直接审查的）。对这些干部的所谓审查，大都是捕风捉影，捏造诬陷，或是抓着一点，无限上纲，扣上帽子，实行专政，从而使这些同志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严重的摧残，有40位同志在“审查”期间含冤逝世，还有一些同志造成终身残疾。

中组部受中央委托从1978年开始到1980年12月底，先后对453名副省长、副部长以上干部的结论进行了复查或审理。“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敌我矛盾的85人，全部平反，恢复名誉；过去有历史问题结论，“文化大革命”中又加码定性处理的，大多数维持了“文化大革命”前的结论。经过落实政策，这些同志身体好、能工作的都走上了领导岗位，身体不好的做了适当的安置，含冤逝世的进行了昭雪，因这些同志的冤假错案受到株连的同志、家属子女，做了消除影响的工作。

1979年是复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进

展最快的一年。到年底为止,经中组部办理、审理了中央领导批示复查和各地、各部门上报的复查结论 1235 件。审理结案的 961 件,其中中央管理的干部报中央批准予以平反、昭雪的有 228 人。

1980 年继续进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一年中,经中组部办理或审理的案件共 924 件,其中报中央批准的中央管理干部的复查结论予以平反、昭雪的 117 人。

1981 年,各地、各部门按照完全彻底、善始善终的要求,继续对遗留案件进行复查。这一年中,中组部办理和审理的案件 946 件,已办理结案 782 件。中央管理干部中报中央批准或备案的复查结论予以平反、昭雪的 149 人。

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为有全国影响的集团性案件平反

中组部还直接复查平反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大案、要案和集团性案件,例如:

“六十一人案件”。1978 年 12 月 6 日,中央以[1978]75 号文件转发了中组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指出:“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六十一人案件是一起重大错案”。后来我们从接收原中央专案组的档案和查阅中央档案馆的材料中,又发现 4 份文、电,进一步证明“六十一人案”是一起重大错案。1980 年 4 月 21 日,报经中央批准,中组部又印发了《关于复查“六十一人案

件”的补充报告》。

关于为受所谓全国“第一张大字报”诬陷的同志平反。“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抛出聂元梓等人的所谓“第一张大字报”，不但在电台广播，还组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诬陷北京大学党委和陆平、宋硕、彭佩云同志，在全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是一起冤案，中共北京市委 1979 年 2 月为北京大学党委和陆平、宋硕、彭佩云同志彻底平反。1980 年 8 月 21 日，中央组织部转发了北京市委《关于为受所谓全国“第一张大字报”诬陷的同志平反的通知》。

为所谓“红旗党”问题平反。在 1943 年的延安审干运动中，康生制造了所谓“红旗党”案。甘肃、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等地的地下党都被诬陷为“红旗党”，不少地下党员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延安审干后期，中央发现康生制造的所谓“红旗党”案纯属假案，及时进行了纠正。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作出全面的结论。“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历史问题又被翻腾出来，许多同志再次遭到诬陷和残酷斗争，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残、致死。为了彻底解决所谓“红旗党”的遗留问题，于 1981 年 9 月 9 日，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关于印发中央为甘肃、河南、陕西等省地下党被诬陷为“红旗党”问题平反的通知》，决定给被诬陷为“红旗党”的地下党组织正式平反，推倒强加给这些地下党组织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对因此案受到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昭雪。

为所谓“黑党”、“假党”问题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原杨虎城部 38 军我地下党组织被诬陷为“黑党”、“假党”。经查，所谓“黑党”、“假党”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报经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转发了陕西省委《关于为原杨虎城部 38 军我地下党组织被诬陷为“黑党”、“假党”等问题进行平反的请示报告》。为原杨虎城部 38 军我地下党组织和因此案受迫害的地下党员彻底平反，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做好善后工作。

严格掌握政策界限 妥善处理历史老案

在大规模平反“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冤假错案的过程中，要求解决“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也陆续提了出来，申诉逐渐增多，反映日益强烈，这既是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与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有着直接的联系。“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冤假错案，就是林彪、“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把历史上已经处理过的问题，重新翻腾出来，无限上纲，打击迫害广大干部，因而在平反这些冤假错案中也必然涉及许多历史上的问题。1978 年，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的工作开展起来不久，关于复查“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中历史遗留问题就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1978年4月中央下发了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9月，中央明确提出了对错划右派进行复查改正的任务；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五部联合成立了办公室，中组部内成立了审改办公室专门负责这项工作。

中组部在1978年11月下发的关于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几点意见中，提出了复查“四清”、“反右倾”、“整风整社”等运动中的错案的问题。

1979年7月，中央又下发了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按照中央的部署，关于处理“反右倾”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当时主要是由中纪委负责，中组部协助作些工作。

那时在群众中把“文化大革命”、“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简称为“四大运动”，实际上全国各地把它们都纳入到落实政策范围内同时进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很快。但在1979年上半年，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苗头性问题，这就是有一些人持否定一切的态度，要求把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问题统统翻腾一遍，而且呼声越来越高，来信来访呈猛增的趋势。如何正确、妥善地处理好这个问题，关系到落实干部政策工作能否稳妥健康地进行，也关系到能否稳定大局。针对这一问题，在1979年6月，中组部召开了“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座谈会”，在会上我和陈野苹同志讲了话。我在讲话中强调了处理“文化大革命”前历史老案的方针和原则，明确提出：“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案件，包括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倾，还有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中也有搞错了的。这几方面的案子，该复查的还要复查。……除此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案子，不一定再来搞什么平反。三反五反、统购统销、肃反、土改，还有男女关系、贪污腐化、蜕化变质，处理轻一点重一点，没有必要统统翻一遍。至于重要案件完全搞错了的，把人家错开除了党籍，错开除了公职，把内部问题错当成敌人处理的，个别案件个别解决。基本事实没有什么变化，就不要再动了。主要是政治上解决问题，不要在经济问题上纠缠。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确定了以下几点：

第一，历史案件作为正常工作来解决，找上门来的要受理，要具体分析，结论没有错的要进行教育，要跟他们讲清楚，犯了错误改正了很好，党组织可以量才使用。对于错被开除公职、错被定为敌我矛盾的，要认真复查改正。

第二，由现在单位受理为好，因为相隔时间长，变化很大，有的原单位已撤销。

第三，改正后，工作由现在单位解决，就地安排。生活有困难的可以适当补助，不补发工资。

会后，经中央批准，中组部下发了《关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案件处理意见》，明确提出了处理历史老案的原则、方针以及政策界限。实践证明，这些原则和方针是正确的，及时统一了各方面的认识，端正了工作方向，对妥善地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1981年开始，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把复查工作的重点转到“文化大革命”前其它历史遗留案件的复查工作上来

了。我们要求各级党委要把这项工作继续列入议事日程，要有一位负责同志分管，力争在两三年内基本完成。当时我们强调，处理这些老案要注意防止两种偏向：一种是继续用“左”的观点看待历史老案，对定性处理错了的也不纠正，甚至对自己经办、批过的案件明明错了，也顶住不办；另一种是用否定一切的观点，把不该改的也改了。这项工作，各地一直坚持进行，没有间断，直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全国平反“文化大革命”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的工作才基本完成。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复查了“文化大革命”前历史遗留的案件242万余件（反右倾运动中的案件未统计在内）。其时间之长、内容之广、规模之大是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解决问题也是较为彻底的，在党内外、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我在中组部工作期间，直接参与研究解决的涉及全国或部分省（区、市）有重大影响的历史遗留问题，其中有主要是错划右派改正工作，解决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复查1946年新四军5师“中原突围”时隐蔽、掉队人员的遗留问题，复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肃反被错杀人员问题，等等。

关于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我到中组部时，已在进行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项工作大大加快了步伐。1979年2月，我们和中央统战部召开了全国右派复查改正工作经验交流会，公安部、中央党校、河南永城县委等单位介绍了他们解放思想做好复查改正工作的经验。我和刘澜涛等同

志在会上也讲了话,着重阐述了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实事求是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重大意义,并且第一次提出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犯了扩大化错误”的问题,强调指出:“改正错划的右派,就是改正我们在反右派斗争中的错误”,“无论哪一级组织或哪一个人批准定案的,凡是错了的都要改正”。这是一次经验交流会,也是解放思想的促进会。随后,各省、市、自治区,以至地、县都召开了类似的会议。此后,针对这项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突出矛盾,党中央又就错划右派改正后的安置等善后工作的政策问题发出了通知,使反右派斗争中遗留的问题,从政策规定上得到了较彻底的解决。到1981年上半年,这项工作已胜利结束。全国共改正了54万余人的右派问题,占原划右派总数55万人的百分之98%以上。对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了公职,重新安排了工作或安置了生活,对原来工作安排不当的作了调整;另外,对被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余人以及受到株连的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关于解决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建国初期,在对地下党组织进行普遍清理的工作中,一些地方由于对地下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对于地下斗争的历史环境和特点缺乏了解,也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工作上的失误,致使一些地下党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和不公正的对待,造成了不少遗留问题。在1979年至1982年期间,这方面的工作只是开了个头,还没有全面地展开。1981年7月,中组部致函福建省委转达胡耀邦同志关于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要很好抓

一下,公公正正地解决,请先从福建抓起”的批示,要求福建省委指定有关部门予以调查了解,并把结果告诉中组部,以便共同研究处理办法。福建省委对处理地下党的遗留问题非常重视,由省委书记负责,自1981年10月开始,到1984年底,对福建地下党的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都作出了明确的结论,恢复了地下党原来的革命形象,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1982年3月,中组部印发了经中央批准的云南省委《关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和《关于为郑伯克同志恢复政治名誉的报告》。对“文化大革命”中省军管会和省革委会给云南地下党、“边纵”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予以推倒,造成的大批冤假错案给予彻底平反。同时还解决了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几次政治运动中,由于领导工作上的失误和“左”的思想影响,对云南地下党、“边纵”所作的的不恰当的结论,解决了五十年代中,省委对云南地下党主要负责人郑伯克同志的错误批判等问题。充分肯定了云南地下党和“边纵”在远离中央的边疆多民族地区,艰苦奋斗,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为解放云南做出了贡献。1982年8月,中组部还批准下发了陕西省委组织部《关于西北联大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和有关人员党籍处理意见的报告》。

“中原突围”历史遗留问题,是涉及到湖北、河南、湖南等省,影响较大的问题。1980年8月,郑绍文、张执一等同志给党中央写信,反映1946年我中原部队在突破国民党大军重重包围这一特别紧急的情况下,部分部队和地方工作

人员由于复员、隐蔽、掉队等原因，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要求组织上实事求是地妥善解决好。胡耀邦同志对此作了批示，要求加以研究，定出具体实施办法加以解决。中组部把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和郑绍文、张执一等同志的信转发给湖北、河南等省委。此后，湖北、河南、湖南等省按照中央要求，做了许多工作。解放初期，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对有些同志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分析不够，定性处理过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同志又挨了整，定性处理升了级。通过这次复查，共解决了约5万余件隐蔽、掉队人员的遗留问题，纠正了解放初期错误处理的案件，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

关于苏区肃反被错杀人员的历史遗留问题，这是一件涉及面广，有重大影响的问题。1930年至1935年，苏区在“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开展了肃清“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取消派”的运动。苏区肃反中大批同志被杀，是一桩历史错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一切经过调查确系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但是，建国前没有来得及解决这个问题，建国后，1954年中央就妥善处理这个问题提出了意见，比如江西、福建、湖北等省平反了近两万人，其他省对被错杀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也进行了平

反昭雪,但对多数人的问题尚未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被错杀人员的亲属和一些老同志多次强烈要求解决好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由中组部和民政部研究提出处理办法。两部经过反复研究,于1983年3月和6月向中央和国务院上报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处理意见,明确提出了开展这项工作的方针和政策界限。有关省的组织部门与民政部门密切合作,开展了深入细致的复查工作,解决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中组部还对建国以来下发的一些干部审查方面的专题性文件规定作了一次比较系统的清理,对其中受“左”的思想影响制订的或情况变化已经不适用的规定作了必要的修改或予以废止,对于因此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给予复查改正,解决了一批多年遗留的问题。

例如:1982年10月,中组部印发了经中央书记处同意的《关于解除一些干部历史上受限制使用问题的意见》,指出:建国前后,在审干、肃反中,中央和中央组织部曾对有政治历史等问题的干部作过限制使用的规定。这些规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但这些受限制使用的干部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和锻炼,绝大多数表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有些同志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当中有许多同志现在年事已高,有的已经离休、退休和逝世,对其限制使用已无实际意义。但由于档案中仍存有限制使用的记载,使这些干部在政治上继续受到影响。为了合理地使用干部,充分发挥他们在四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原有规定应

予改变。

从1979年到1982年底，中组部还直接复查或参与复查研究了一批历史遗留的大案要案，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件：

1979年8月，中央批转了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这件事是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发生的。由于康生的发动，批判了尚未出版的长篇小说《刘志丹》。会后，把写这部小说作为反党事件在党内作了传达，并对小说本身，对小说作者李建彤同志，审阅过书稿的习仲勋、刘景范等同志，以及组织创作这部小说的工人出版社有关同志，进行了长期的专案审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专案审查尚未结束，没有作出正式结论。“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在《刘志丹》问题上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姚文元发表文章，公开宣布《刘志丹》是反党小说，宣称作者和支持该书的同志是反党分子。此后，已被专案审查的同志遭受了更重的摧残，受到株连的人数更多。曾经看过书稿、支持过这一创作的领导同志，原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一批老干部、老党员，甚至一些参加过此专案审查工作的同志，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李建彤同志被定为“习仲勋反革命集团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骨干分子”。直到1977年5月，中央专案组给刘景范同志作的审查结论中，仍说刘“伙同习仲勋抛出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经过这次复查，事实说明，《刘志丹》(送审样书)不仅不是反党小说，而且是一部比

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是“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变本加厉,搞出的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因此,彻底平反这一案件是深得人心的。通过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澄清是非,对受到诬陷的同志一律昭雪平反,并做好善后工作,使这一大错案得到了公正的解决。

1980年1月,中组部转发了经中央批复同意的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这是中组部协助陕西省委复查的一件大案。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康生主持审查习仲勋同志问题的专案所捏造出来的,他利用职权,下“批示”,乱点名,搞了一系列揭批“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活动。1965年把经过康生审定的《关于习仲勋反党问题的传达提纲》批发下去,在各级干部中进行传达,搞所谓“彻底肃清彭、高、习的罪恶影响”。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彭德怀、习仲勋同志受到诬陷和迫害,而且株连了一批曾经同他们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同林彪、“四人帮”及其在陕西的代理人,进一步在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上大作文章,说什么“陕西敌情严重”,“彭德怀、高岗、习仲勋把陕西西安作为他们的后方基地”。他们借“清

队”为名,搞什么“查黑线”、“挖黑根”,把原西北局、陕西省委、省人委、西安市委、市人委打成“五个黑窝子”,视为彭、高、习的“旧势力”,统统予以“彻底砸烂”,解放以来省委历任四届常委成员,大多数被他们打成叛徒、特务、彭高习死党。他们把西北局、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的 50 多名领导干部关进监狱,罗织罪名,进行法西斯迫害。通过复查,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提法,是极其荒谬的,纯系诬蔑不实之词,由此造成很多冤假错案,打击株连了大批干部、群众,对陕西工作的损害和影响是很严重的。虽然中央已经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习仲勋同志的问题也已经得到解决,但考虑到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在陕西株连甚广,影响较大,各方面反映强烈,因此,仍有必要郑重宣布为这一假案彻底平反昭雪。

1981 年 8 月,中央书记处批准同意中组部《关于为原红 5 军团季振同、黄中岳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这是中组部直接复查的一件发生在三十年代的错案。1979 年 6 月,姬鹏飞、李达、黄镇、王幼平、袁血卒、苏进等 12 位老同志上书中央,反映原红 5 军团季振同、黄中岳同志于 1934 年被错杀,建议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中组部派人向 70 多位老同志作了调查,并查阅了有关档案材料。季振同原是国民党 26 路军 25 师 74 旅旅长,黄中岳为 1 团团长,1931 年 12 月 14 日率部参加了中共党员赵博生、董振堂领导的震动全国的“宁都起义”。一万数千名官兵起义后,编为红 5 军团,季振同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

员，任军团总指挥，黄中岳任 15 军军长。1932 年春，国家保卫局发现以季、黄为首的少数军官有企图拉走队伍的背叛活动，将他们定为反革命，并将季、黄等监禁，后因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于长征前夕被处决。对于此案，叶剑英同志批示：“我听毛主席说过（似在延安），杀季振同、黄中岳是杀错了的，现在我觉得这一冤案应该昭雪。”从中组部复查的情况看，季、黄在宁都起义中是有功绩的，影响较大，应予肯定。季、黄本人有爱国抗日思想，我们已吸收季为特别党员，并决定季去苏联学习，对他在政治上还是信任的。何应钦曾派人与季、黄取得联系，进行策反，季、黄虽未向组织报告与他们的来往，但敌人策反阴谋并未得逞，季表示拉队伍离开苏区办不到，是可信的。把季、黄定为反革命是错误的，违背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决议，把他们处决更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并恢复季的党籍。平反的办法，采取发表纪念文章，对季、黄在起义中的功绩适当予以评价。这样，就使这件沉冤近半个世纪的错案，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解决。

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 为外国专家落实政策

1981 年 9 月 12 日，有一位外国专家给习仲勋同志和我写信，要求修改审查结论。信是通过邓颖超同志转来的，邓颖超同志批示：“对他提出的要求，似应予以考虑酌处，请

习仲勋同志与宋任穷同志、赵苍壁阅商，报中央书记处决定”。按照邓大姐的批示，我提出：这位外国专家要求对他的结论作修改，请公安部对此作全面考虑，如果要作公开平反，则请中组部和公安部一并研究，还有其他外国朋友受到审查和拘留是否也有类似情况，也应一并考虑（如修改平反结论，公开平反等）。建议中组部和公安部对外国朋友的落实政策问题作一次全面清理，提出处理方案报中央书记处作统一考虑和审定。仲勋同志同意我的意见，并批示：这位外国专家的“要求是合理的，应予彻底平反，不留尾巴为妥。对外国朋友的落实政策问题作一全面复查处理，是完全必要的。”中组部、公安部遵照上述批示，对这位外国专家和原在外文局工作的专家爱泼斯坦、邱茉莉夫妇，原在新华社工作的英国籍专家夏皮诺，原在外语学院工作的英国籍专家柯鲁克等人的结论作了复议，落实了政策；我们还向外国专家局等单位了解了对外国专家落实政策的情况。据初步调查，这些单位对“文革”初期受到冲击的外国专家，大多数已复查平反，恢复名誉，补发工资，分配了工作。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认真解决好。为此 1982 年 3 月 17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组织部、公安部党组《关于对外国专家朋友落实政策情况报告》的通知，肯定外国专家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应受到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要求对外国专家朋友的落实政策问题，必须认真地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和清理，发现问题要尽快解决，消除不良影响。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伤害的专家，做到在政治上彻底

平反,生活上充分照顾,工作上热情支持。我党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应在外国专家朋友中全面贯彻,认真落实。并且照顾他们的特点,从优对待。

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是各级党委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全党和 60 万从事落实政策工作的同志,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结果,成绩是巨大的。遵照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政治上分清是非,思想上解开疙瘩,组织上增强团结的要求,经过落实干部政策的实践,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些案件的本身。通过落实干部政策,进行了拨乱反正,把“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颠倒过来。从组织工作上讲,是恢复了党的正确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恢复了干部工作上的优良传统。肃清了“左”的影响,分清了是非,恢复了党在干部问题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促进了安定团结,增强了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协力搞四化的凝聚力,使一大批受错误处理的干部,特别是一些久经考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有专业才能的知识分子得到起用,调动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

落实干部政策的实践,充分体现了我党的光明磊落,大公无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高度原则性,在党内外、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大提高了党的威望。正如小平同志所说:“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总之,通过落实干部政策的实践,使全党进一步吸取了历史的教训,积累了正确处理干部历史问题的经验。以史为鉴,对我们做好新时期党的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避免失误和挫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四章 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二)

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培养、选拔合格接班人,调整配备好各级领导班子,是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抓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领导班子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急需调整充实和加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的重点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政治路线需要组织路线作保证。当时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在许多方面还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急需调整、充实和加强。我认为主要是4方面的问题:

一是领导班子中政治上不纯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少数人仍坚持过去“左”的一套,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公开抵触。到1979年,尽管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但“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种人”(即“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还没有完全被清理出领导班子。有的甚至被列入培养提

拔的对象。

二是年龄偏高,领导班子老化。当时属于中央管理的干部中,65岁以上的占26.7%,61岁—64岁的占23.8%,两项合计,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56岁—60岁的占27%,45岁以下的仅占1.6%。其中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在61岁以上,他们之中32%在65岁以上,30%为61—64岁,只有3%在45岁以下。

三是文化程度较低。属于中央管理的干部中,大专以上占33%,初中以下占38%。其中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大专以上占17.7%,初中以下占46.5%。特别是有专业知识,懂得现代化建设的干部比较少。

四是班子配备的职数多、不精干。中央国家机关部委正、副部长、主任职数,1979年平均在10人以上,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成员平均17人,政府领导成员平均11人以上。最多的省,正、副省长20多人;而且,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班子中,正、副书记人数占常委班子的一半。

领导班子成员年龄偏高、文化偏低、班子职数偏多的问题,有它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党执政以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基本上是过去在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工农干部。加上我们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干部的选拔培养重视不够,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从总体上说,文化程度偏低的多。但这一批干部是我们党的骨干,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迫害。粉碎“四人帮”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

后，党中央及时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有一大批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班子存在的这些问题，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政治路线，同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解决这些问题，是我担任组织部长以后遇到的一项十分艰巨而必须认真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

邓小平、陈云同志高瞻远瞩 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是战略任务

对领导班子存在的上述问题，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及时地多次强调党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要解决好组织路线问题，要大胆选拔拥护党的路线的有文化专业知识的优秀中青年干部，积极培养接班人。我记得小平同志第一次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是1979年7月，他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指出：“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尽管有人不通，但总是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组织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各级领导班子岁数太大，精力不够”，“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并强调选人的标准，主要是两条，一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讲党性，不搞派性。以后，邓小平同志又多次强调解决组织路线，培养、选拔好接班人的问题。1979年11月小

平同志在一次会上强调：“我们老干部的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他接着说：“我们要求三几年内调整、安排好各级领导班子(包括党支部)的一、二、三把手。高级一点的机关,可以考虑先解决选拔较年轻的同志当二、三把手的问题,老同志继续坐镇一段时间,还当第一把手;下面的机关能够选到好的青年人当第一把手,就直接选。如果我们不能在三几年内从上到下解决这个问题,将来就更难办了。”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在三年内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知道出什么事。要忧国、忧民、忧党啊! 要看到这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又说：“老同志现在的责任很多,第一位的责任是什么? 就是认真选拔好接班人。选得合格,选得好,我们就交了帐了,这一辈子的事情就差不多了。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

在这一段时间,陈云同志也非常关心选拔中青年干部,培养好接班人的问题。在我的印象里,当时,陈云同志特别强调的有两点:

一、提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几个,也不是几百个,而应当是成千上万。要趁老同志还在的时候,尽快把大量中青年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包括领导的辅助岗位),进行锻炼和考察,以便从中发现和培养真正合格的接班人,使新老两代的交接班能比较顺利地进行。

二、提拔中青年干部，一定要严格掌握政治标准，要切实是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基本上不存在解放前的政治历史问题。但是，建国已经 32 年，“文化大革命”进行了 10 年之久，“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也有 5 年了，这些也是历史。对他们进行政治考察，主要应当考察他们在这段历史中的具体表现。对每个干部的考察要具体，要看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后各个关键时刻及“真理标准讨论”、“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四项原则”等等时候的表现如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比较确实地了解他们的基本政治表现，了解他们的“德”。当然，考察必须认真走群众路线，材料必须真实可靠，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系列重要指示，许多我是亲自听到的。当时，作为组织部长的我，既受鼓舞，又感到压力很大、责任很重。1979 年在邓小平同志几次强调选拔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后，中组部曾于 1979 年底 1980 年初先后派出 10 个干部考察组，由副部长带队到各省、区、市考察优秀中青年干部，形成了一个 160 多人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名单。由于我们当时对小平同志提出解决组织路线的战略思想理解得还不是很深刻、全面，选拔的对象中 50 岁以下、45 岁左右年轻干部，特别是具有大学毕业文化程度程度的干部还比较少。邓小平同志看了这个名单以后，严肃地指出，选拔的干部，年龄偏大，文化偏低。这是对我们工作作出的批评，也是对我们的鞭策。

反复酝酿 集思广益 提出干部队伍“四化”方针

这里，我要介绍一下干部队伍“四化”方针提出和形成的过程。1979年、1980年我们讲到调整、加强领导班子，更多地提到年轻化，也分别讲到知识化、专业化和革命化，但干部“四化”作为一个方针，完整地表述并提出来，是在1980年以后的事。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时，我在山西代表团的会上有一个书面发言，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党中央关于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的提出和形成过程。我把这段话摘录在下面：

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是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的一个大方针。这个方针的提出和形成，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大家还记得，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在新时期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以后，1979年7、8月，小平同志到山东、上海、天津视察，走一路讲一路，反复指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已经确立了，现在是组织路线问题，是干部问题，特别是选拔接班人问题，必须选懂行的和比较年轻的。同年9月29日，剑英同志在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提出要注意干部队伍的逐步年轻化和专业化，努力使我们的组织状况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任务相适应。1980年5月，耀邦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召开的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说明，所谓理想的领导班子，就是领

导班子的成员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组织领导能力的，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这期间，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把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在这年8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小平同志表示完全赞成陈云同志的意见，说这些意见讲得好。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时，又把这一提法正式写进了党的决议，《决议》要求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从以上我的简略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干部队伍“四化”方针，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在反复酝酿、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反映了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

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四化”方针形成共识

在党中央提出干部队伍“四化”方针之后，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但是并不是一下就在全党形成了共识。当时思想认识上的阻力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是不少领导同志对选拔有文化的年轻干部，对培养接班人问题的紧迫性和深远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表现在有些老同志认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冤假错案

获平反,好不容易重新出来工作,板凳还没有坐热,就要他们让位,这岂不影响老同志的积极性吗?还有些老同志认为,我虽然年不富,但是力还强,身体尚好,还可以干几年,何必那么急嘛。

二是思想不够解放,在选拔人才问题上还受到一些旧传统观念的影响,老框框的束缚。主要表现为:①论资排辈。这是影响大胆选拔年轻干部的重要障碍。一些同志用干部,往往习惯于在资历上搞平衡。总认为年轻人不成熟。提拔了年轻的,怕影响老同志的情绪。②对知识分子缺乏正确认识。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影响,党内和社会上存在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的错误观念,一些人对知识分子不够信任,对他们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够,认为只能用其一技之长,不可委以重任。③唯成分论。认为只有工农干部才是可靠的,只有直接从工人、农民中提拔干部,才是坚持党的阶级路线,不注重本人的现实表现和真才实学。④用派性观点识别和使用干部。“文化大革命”形成的派性在选拔任用干部中还有反映,“不是一派的,表现再好也不选拔;是一派的,不符合条件也要作为选拔对象。”

三是思想方法上形而上学。表现在对“德”的标准缺乏正确理解。对有创见、有能力,敢于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批评建议的,就认为是骄傲自满,是“德”不好。对于有过一般性错误的干部,尽管本人已经作过检查、并且在行动上已经改正,仍不予信任。对年轻干部的德才要求上求全责备。不看干部的基本方面、主要方面,要求完美无缺。

由于党内思想认识问题没有完全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选拔年轻干部的工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中组部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比如利用《组工通讯》,大力宣传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做统一思想的工作;加强领导和指导,先后多次召开选拔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谈会、汇报会和电话会议,制定规划,提出明确的要求;妥善安排老同志,解决好老同志退休的问题。遵照中央指示,先后作出或制定了关于在县以上单位设置顾问的决定,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等等。为防止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把“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选进领导班子,制定了清理“三种人”的具体政策,对清理“三种人”做了具体部署;在各级组织部门成立了专门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的工作机构;在进行机构改革的同时,大刀阔斧地推进领导班子的“四化”进程,等等。在后面的回顾中,我将分别回忆这些具体措施和做法以及取得的成效。

统一思想 制定规划 提出领导班子建设的具体要求

要真正贯彻好中央关于干部“四化”的方针,把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调整配备各级领导班子这项工作真正抓好,首先必须花大力气用中央的指示精神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特别是统一领导干部和老同志的思想认识,使大家真正

认识到这项工作的紧迫性和重大战略意义。我们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和各种会议,大力宣传干部队伍“四化”方针,进行正面引导,同时对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以理服人的批评。在1979年至1982年期间,中组部主办的《组工通讯》先后发表过40多篇这方面的言论和经验材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小平同志强调,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工作,光靠组织部门不行,必须动员全党、特别是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动手,才能抓好。遵照中央指示精神,我记得在1979年至1983年期间先后7次召开各种全国性的座谈会、汇报会、电话会,部署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工作。特别是在中央组织部于1979年9、10月间和1980年5月召开的两次座谈会上,通过集思广益,制定了《关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几点意见》和《关于抓紧做好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的意见》。这两个文件对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和主要措施:

①要求在3年或稍长一点时间内,努力把各级领导班子调整好,建设好,使之成为能够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密切联系群众,勤奋学习,熟悉和精通业务,善于管理,团结一致搞四化的坚强有力的工作班子。

②要求把各级领导班子配备成精干的工作班子。在3年或稍长一点时间内,逐步地、有计划地做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一般7至13人,正副书记的人数不应超过常委人

数的一半。地县市委常委一般 7 至 11 人。正副省长、正副专员、正副县长一般 5 至 7 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正副部长一般 7 至 13 人,正副局长 3 至 5 人。国务院各直属局、总局正副局长 5 至 7 人。现在看来,当时确定的职数仍然偏多,但是比原先已有所减少。

③为了提高各级领导班子的业务领导能力,要求大力充实精通业务的干部。工业、交通、农林、财贸、文教、卫生、科研等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都要在领导班子中配备熟悉和精通业务、懂外文、懂技术、会管理、热心四化事业并有组织领导能力的干部。力求在三五年内,使这样的干部在领导班子中达到 50%以上。

④要求在 1982 年以前,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和中央、国家机关正副部长的平均年龄逐步降到 50 至 60 岁;地(市)州委常委的平均年龄逐步降到 50 岁左右;县委常委的平均年龄降到 45 岁以下。对省、地、县政府和厂矿、院校、科研等单位的领导班子,以及中央国家机关的正副局长,也应根据这个精神把平均年龄降下来。61 岁以上的同志,除特殊需要者外,不再提拔担任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和中央国家机关的副部长。提拔担任司、局长和地委领导职务的,应当更年轻一些。

⑤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都把干部后备名单的制度建立和健全起来,要从 50 岁以下、大专、中专、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优秀干部中,选拔一批可进省、市、自治区党委、政府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的

领导班子的对象。省、市、自治区各选出 4 至 8 名，中央、国家机关的部委各选出 1 至 3 名。省委要掌握 200 至 300 名 45 岁以下，准备担任地、市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后备名单。地、市委要掌握 100 至 200 名 40 岁以下，准备担任县、市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后备名单。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也要掌握一批能担任司局长和直属厂矿、院校、科研等单位领导干部的中青年后备名单。

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 1980 年内或 1981 年上半年，都要选拔两三名优秀中青年干部参加党委常委，要有一两名任书记；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要选拔一两名副部长。地县、厂矿、院校、科研等单位，也要选拔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班子。

⑦要求从 1980 年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国家机关各部委，每年要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挑选一定数量的政治品德好、作风正派、学习成绩优良、身体健康、有培养前途的，放到基层锻炼。党组织要对他们加强管理和教育，严格要求，热情帮助，条件成熟时，择优逐级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⑧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都制定出 1980 年至 1982 年选拔中青年干部和培养接班人的规划。

在这两个会议上，我们总结了前一段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工作的经验，我们特别强调了以下几点：

一是要发挥老同志在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和培养接班

人的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要求每一位老同志都要把选拔和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当作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担当起来。老同志不但要抓紧选拔出一批优秀中青年干部,而且要以极大的热忱,扎扎实实地搞好传帮带,把丰富的领导经验和党的优良传统传给他们,支持年轻干部大胆工作,使年轻干部能尽快成长起来。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绝大多数老同志都能自觉地把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作为自己的第一位的责任,做到了“重党的事业的兴衰,轻个人职务的去就”。

二是选拔中青年干部一定要树立适应四化需要的新的用人观点,坚决破除论资排辈、唯成分论等老框框。要扩大选拔干部的视野,放眼于 1800 万干部,广开才路,积极发现人才。不仅要从党政部门中选拔,还要从工矿、院校、科研等单位中选拔。不仅要从党员干部中选拔,还要注意从非党干部中选拔。要着重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大中专和高中毕业的干部中挑选,同时也要注意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毕业的,已具有大专、中专和高中毕业程度的中青年干部中选拔。

三是配备领导班子要搞“五湖四海”。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就应当给予信任,鼓励他们大胆工作。

四是要坚持走群众路线。挑选和任免干部,必须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先由组织部门进行认真考察了解,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然后提交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任何个人或少数人都不能决定干部的任免和调动。

五是要根据不同情况妥善安排退下来的老同志,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德高望重、身体不能适应繁重工作的,可以担任荣誉职务或顾问,请他们出主意、当参谋、搞调查研究,在制定大政方针和其他重要决策方面,倾听他们的意见,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年老体弱基本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干部,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离休和退休。对担任荣誉职务和离休的老干部,要按照规定组织他们看文件、听报告、参加必要的会议和节日活动。由于他们年老体弱,在住房、用车、医疗和生活品的供应等方面,应当按照担任现职的同级干部的待遇优先解决。

在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中央组织部 1983 年 7 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虽然当时我离任组织部长已经 5 个月了,但我对这次会议还是非常关心的。会上中央组织部新任部长陈野苹同志作了题为《以改革的精神加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的报告。我也到会讲了话,强调培养选拔接班人,实现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是党中央十分关注的头等大事;强调不仅中央一级和中央各部委、省一级要有第三梯队,地、县各级领导班子都要建设好第三梯队,要选拔、培养成千上万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后备干部。这次会议制定的《领导班子建设的八年规划》、《关于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制度的意见》等 4 个文件,对推进以后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四化”进程,做好培养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遵照陈云同志意见 建立青年干部管理机构

建立青年干部管理机构的意见，是陈云同志于1981年5月提出的。他说：中央组织部要成立青年干部局。这个局的工作人员应该是优秀青年，或者是熟悉青年干部情况的。同年6月8日，陈云同志同我们中组部的领导同志谈话时，再次强调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性，又一次提出中央组织部应成立青年干部局，省、地也应成立相应的机构。

根据陈云同志的意见，我们于同年7月31日向全国组织部门发出了《中央组织部关于建立青年干部管理机构的通知》。《通知》传达了陈云同志对中央组织部成立青年干部局提出的3点重要意见，即：

(1)建“庙”要十分慎重，这个局从领导到每个成员，“菩萨”个个都要是好的。

(2)这个局的干部，第一，要有一个正派的、水平比较高的老干部带头；第二，要有“文化大革命”“逍遥派”中优秀的、德才兼备的；第三，“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也要有，但也要优秀的，不是乱七八糟的，因为他们了解“文化大革命”中青年的情况。

(3)这件工作是关系重大的，现在不要忙着去提拔干部，首先要花3个月至5个月的时间把“庙”建好，这是“大庙”，因此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一直到县委都要按这个方针

来办。

《通知》还对省、市、自治区党委建立青年干部管理机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建立青年干部处，首先要按照陈云同志的要求物色好人选，从领导到一般干部都要经省委审查同意后报中央组织部。

(2)青年干部处的机构要精干，设处长、副处长各 1 人，一般干部几名。

(3)青年干部处建立以后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培养选拔青年干部的政策；制订培养选拔青年干部的规划；调查了解和综合研究培养选拔青年干部工作的情况、问题和经验，向部提出做好青年干部工作的建议；经常深入地考察了解青年干部，从中发现人才，掌握青年后备干部名单，推荐能进入领导班子的青年干部。

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上到下成立青年干部管理机构是十分必要的。实践证明，当时全国的青年干部管理机构，对遴选各级领导班子的优秀后备人才，推进领导班子“四化”进程，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抓住省级机构改革的契机 推进领导班子“四化”

1981 年底至 1982 年初，开始了改革领导班子结构的艰巨工作。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中央国家机关率先进行机

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副部长曾志同志具体参与了这项工作。省级党政机关的机构改革,于1982年第四季度和1983年全面开展。中央决定,由我牵头,成立省、市、自治区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我按照中央的精神,组织起草了指导省级机构改革的文件,即《关于省级领导班子配备的几点原则意见的通知》,经中央审定,于1982年10月26日以中央文件下发各地。《通知》体现了中央关于推进领导班子“四化”进程的要求,是关于省级机构改革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性文件。主要内容包括:

(1)人员配备要精干。党委书记、副书记:小省4人,一般省5人,大省6人;常委:一般省11人,小省9人,大省13人,个别省不超过15人;常委中,应有军区主要负责干部参加;注意要有女同志;少数民族比较多的省应有适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干部。省长1人,副省长3至5人,个别省不超过6人。顾问委员会主任1人。副主任2至3人,常委9至15人;沈阳、西安、武汉、广州、重庆、南京6大城市,可以设顾问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人,副书记2至3人,常委7至9人。人大常委会主任1人,副主任7至13人。政协主席1人,副主席9至15人。

(2)坚决执行德才兼备的原则。党委常委和政府领导班子中要有熟悉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人才;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要占1/3左右。要大胆选拔一批

德才兼备、年富力强、能够开创新局面的干部进入省级领导班子。进省级领导班子的对象要从 55 岁以下的优秀干部中挑选。年满 60 岁的，一般不要作为选拔对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搞好对中青年干部的传帮带。

(3)掌握好干部任职年龄。担任省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以及纪律检查委员会主要负责干部的，正职一般不超过 65 岁，副职一般不超过 60 岁。超过上述年龄界限的，确因工作需要，身体又能坚持正常工作，经中央批准，可以继续任职，过渡一段。省委二、三把手中，至少要有 1 名 55 岁左右的年富力强的干部。在常委中，55 岁以下的不得少于 1/3。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年龄应比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年龄更年轻一些。

(4)减少交叉兼职。除省长可由书记或副书记兼任，常务副省长可参加省委常委外，副省长、人大正副主任、政协正副主席原则上不参加省委常委班子。

(5)妥善安排年老体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同志。年老体弱、不能坚持工作的，不再安排担任党委和政府的实职性工作；基本上丧失工作能力的也不安排进顾问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人大、政协的领导班子。这些老同志退出第一线以后，要把扶持年轻干部出来主持工作当做自己对党对人民的光荣职责。党组织对他们要切实做到政治上充分尊重，生活上妥善照顾。

(6)认真走好群众路线。谁进谁出，要经过个别了解、小型座谈、民意测验、组织部门考察、党组织集体研究等方式，

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复酝酿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报中央批准。

(7)成立领导小组,协助各省进行工作。

1982年11月,中央决定省级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由我任组长,成员有:李锐(中央委员、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局长)、赵毅敏(中顾委委员)、雍文涛(中顾委委员、林业部顾问)、王鹤峰(中纪委常委)、赵振清(中组部副部长)、李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王国权(民政部顾问)、金树望(劳动人事部顾问)、张灿明(原外交部副部长)、李一清(原邮电部副部长)、刘雪初(原化工部副部长)。

中央文件下发以后,我们领导小组的同志即集中在京西宾馆办公。开展工作以后,即向各省、市、自治区派出工作组,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帮助工作。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在省委领导下,帮助搞好省直机关和部、委、厅、局及地、市领导班子的调整和配备;继续做好退居二、三线老同志的思想工作,搞好新老交替和合作;大胆放手地采用民主推荐办法发现人才,充实各级后备干部名单等。同时,分别请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同志来京汇报省级党政领导班子调整方案。我觉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当时,领导小组的工作是有力度的。对有些省区调整方案,没有达到中央关于领导班子“四化”要求的,果断地要求他们重新酝酿方案。针对机构改革中出现的一些带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还专门召开了电话会议。

在1982年11月13日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

要负责同志参加的电话会议上,我强调了以下几点:

1. 要领会中央精神,统一思想认识。省级机构改革工作宜前不宜后,宜早不宜迟。各地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抓紧贯彻落实。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特别是第一把手,要亲自挂帅。只有领导决心大,思想一致,方法对头,才能卓有成效地完成这项工作。

2. 按照中央要求,掌握好省级领导班子成员的结构。另外还提出两条要求,一是党委二、三把手中,至少要有1名55岁左右的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现在,各省党委一把手中没超过65岁的只有10人,政府一把手中没超过65岁的只有13人。按照年龄杠杠,有相当一部分同志要退出第一线。如因工作需要,身体又好,经中央批准,可以过渡一段。所谓过渡,也就是一两年,两三年,不能拖得太长。因此,现在就必需配备1名55岁左右的任二、三把手。二是省委常委中,55岁以下的不得少于1/3。现在省委常委502人中55岁以下的只有74人,只占14.7%,离中央的要求有很大差距。

3. 认真选拔一批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干部进入省级领导班子。现在,全国省级省委常委、副省长以上干部696人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143人,只占20.5%,离中央要求的占1/3还相差很远。有24个省、市、自治区没有达到1/3的要求。

4. 要依靠老同志,充分发挥老同志的作用。这是搞好机构改革的关键。

电话会议以后,全党思想,特别是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同志的思想进一步统一,进一步解放,各省、市、自治区呈报的领导班子调整方案都有突破,有力地推动了省级,乃至地、县的机构改革工作。

调整省级领导班子的工作 中央书记处提出重要意见

中共中央书记处对各省、市、自治区报来的领导班子调整方案,逐一进行了认真讨论,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意见,主要是:

(1)关于是否继续使用第一书记名称问题。书记处认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现任的第一书记、书记继续担任原职务的,仍可用第一书记、书记的名称,但不要再用第二、第三书记的名称。今后新提拔任命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成员时,可按党章有关规定,称书记、副书记,不要沿用第一书记的名称。

(2)关于抽调文化较低的干部脱产学习的问题。现在,各地有一批 50 岁以下,党性强,有工作经验,但文化程度较低的干部。中央要下决心,在学校新设文化班,安排这一部分干部脱离工作岗位,学习两三年文化,增长知识,毕业以后重新回到工作中去。这一条要作为一个政策定下来。

(3)在机构改革中有些人诬告的问题。在配备各省、市、自治区领导班子的时候,有些人到处写信、诬告攻击;有些

人站在派性立场上，借题发挥；还有些是道听途说，不负责任。书记处认为，这是党内的一股歪风邪气，若不坚决加以制止，会把局面搞乱。后由中纪委专门就此事发了通知，说明利害，以儆效尤。

(4)在配备各级领导班子时，一定要十分注意选拔一些优秀的、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中青年干部，实现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现在，有许多同志对这一点仍然认识不足，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现象还相当严重。几十年来，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大体上经过了吸收、培养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排斥知识分子的几个阶段。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更加大胆地使用知识分子。

(5)关于地市合并，要从各地具体情况出发，能带多少县，就带多少县，不要小市带几百万人口的大地区。条件成熟了的可以先搞，成熟一批，解决一批，不要一阵风，一刀切。其基本条件是，当地有中心城市，经济比较发达，市周围可以带起几个县；凡是条件不具备，不成熟的，仍应保留原来地区党政机关的领导工作体制。

(6)在选拔党政领导干部时，必须扩展视野，扩大范围，不要局限于党政系统现有干部，而要从各行各业，尤其是有专业才能的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才。在知识分子中选拔党政干部须注意：既要有专业知识，又要有组织管理能力。在有专业才能的知识分子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既有专业知识，又有领导才能，或者在领导才能方面有发展前途，这种

人可以提任党政领导干部；另一种是虽有专业知识，但不善于或不愿意作党政领导工作，这种人不宜提任党政领导干部。还有的人搞专业正处于上升阶段，留在原岗位工作，对“四化”建设更为有利，也不宜提任领导干部。现在有的知识分子提任党政领导干部后，可以发挥领导才能，有的不但做不好领导工作，连自己的专业也无暇顾及。因此，从有专业才能的知识分子中选拔党政领导干部时，要统盘考虑，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作到人尽其才。

(7) 搞好新老交替，充分发挥老同志传帮带作用。从原领导班子中退下来的老同志要做到：一是起模范作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二是对新的领导班子要充满信心，要支持和鼓励他们大胆工作，并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维护新领导班子的威信；三是说话、办事要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要干扰新领导班子的工作。

荐贤举能 发掘人才 机构改革取得可喜成果

我认为，1982年至1983年的省级机构改革和领导班子调整，尽管还有不尽完善的地方，个别人选得不那么准，但应该说，它为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为以后领导班子的“四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特别是在通过走群众路线广泛发掘人才、荐贤举能

等方面,创造了一些成功的做法。

经过机构改革,省级领导班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职数普遍减少,平均年龄下降,文化程度提高。省委党委、正副省长的人数,由原来的 698 人减少到 452 人,减少了 35%;平均年龄由原来的 62 岁降到 55 岁(其中 55 岁以下的由原来占 15%提高到 48%)。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由原来的 20%提高到 42%。新提拔省级党政领导干部 201 人,占新班子成员的 44%,大多数是中青年干部,71%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其中专家、教授 76 人,占新提拔干部的 37%)。机构改革上来的这批年轻干部,许多人后来成为省级领导骨干,担任了省级党政领导班子主要领导职务,有的还进入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

这次机构改革,调整领导班子,不仅发现和选拔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文化和专业知识的优秀中青年干部,领导班子结构同“四化”建设要求不相适应的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变,而且广大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对干部“四化”方针的认识普遍提高,思想进一步解放,选拔人才的视野进一步开阔,选拔方法也有突破。新班子公布后,各方面反映比较好。这次调整省、地两级领导班子是在开创干部工作新局面方面迈出的一大步。

这次调整领导班子之所以进展得比较顺利,我认为,主要的经验:一是中央的决心大,指导思想明确,抓得紧;二是省委重视,第一把手亲自抓,省委核心领导中的老同志起了很好的作用;三是大胆放手地走群众路线,发动各级领导干

部民主推荐人选；四是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分类指导，既坚决按中央指示办，又充分考虑各地实际情况，在要求和做法上不搞一刀切；五是指导小组进行具体指导和派工作组下去帮助工作。

在总结这次机构改革工作时，我曾说了三点体会：

第一，必须有勇于改革和敢于创新的精神才能发现人才，选准人才。几个月机构改革的实践证明，决不是没有可供选拔的人才，而只是没有被发现，或者发现了不去大胆使用。只要那里的党委，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解放思想，开阔视野，不拘一格，人才就在我们面前。当时全国有 2000 万干部，有四五百万“文革”前毕业的大专生，两三万留学生和研究生，多年来又涌现出大量的自学成才者。人才是有的，关键的问题是要善于发现，善于挑选，善于培养，善于使用。

第二，必须充分走群众路线，实行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相结合。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广泛发动各级领导干部推荐进省级班子的人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实践证明，在适当的时间和范围内，打破神秘化，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民主推荐，是广泛发现人才，加快选拔人才步伐的有效办法。可以说，这种做法是改革干部制度的一项重大突破，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应当由人民来选择和监督自己的公仆的原则。经验还告诉我们，要搞好民主推荐人才，领导必须真心诚意，相信群众，事先不要提候选人，不要在内部打招呼，不然，表面上票数可能相当集中，实际上并不真正反映民意。

在民主推荐基础上，要认真组织考察，反复比较，按照

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由党委集体决定。上海市采取个人推荐与组织推荐相结合，民意测验和组织考核相结合，下级党组织考核和党委人事安排小组考核相结合，经过“两上两下”，从 370 多人中最后筛选出 18 人，供市委常委好中选优。他们工作做得细致、周到，效果比较好。

第三，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既要依靠组织部门，又要组织多方面的力量协同办理。中央书记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对省级班子调整抓得很紧，党委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挂帅。中央决定在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下，成立省、市、自治区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同时动员中央党政机关 300 多位退出第一线的老同志，组成工作组分赴各省、市、自治区帮助工作。他们比较超脱，联系各方，沟通情况，交换意见，协助各地解决有关人事的困难问题，考察了干部，发现了人才。这样，就便于中央和地方党委下决心。如此艰巨的任务能在较短时间内顺利完成，单靠组织部门是难以办到的。今后应当继续运用这一经验，即全党都来关心党的组织工作。

我认为上面谈到的 1982 年机构改革的一些经验和体会，在今天的领导班子建设和培养选拔领导干部工作中，仍有参考价值。

大规模培训干部 全面提高干部素质

我们党在历史上是重视干部教育的，有过许多成功的

经验,为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就了大批建设人才。但是五十年代以来,干部教育工作,包括工农干部文化程度的速成教育,不断被削弱,教育内容越搞越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被摧残殆尽。结果,造成很大一部分干部的理论水平、业务水平、领导管理水平,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在新形势下,我们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最大的困难是许多新东西我们不熟、不懂,全党都面临重新学习的任务。有计划地、大规模地培训干部,全面提高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成为当务之急,也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

中央于1982年和1983年专门作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央党政机关干部教育工作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决定》。1982年至1983年,中央书记处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曾4次讨论干部培训工作。中央要求:“立即着手把干部教育工作规划好,组织好”,“使干部教育工作经常化、正规化、制度化,力争在3至5年内,使中央党政机关干部队伍的政治和业务水平得到明显的提高”。“中央设想,经过5年左右的努力,中央党政机关的干部都具有高中或中专毕业以上的文化、业务水平;大专以上学历的干部比例,逐年有相当的增大;部委、司局两级领导干部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干部占有较大的比重。”并明确规定了以下各项政策和制度:一、干部教育应纳入国民教育计

划。二、中央党政机关的所有干部,都要分批分期参加轮训,一般要做到每3年离职学习半年,成为一种制度。三、把干部培训和干部任用结合起来。四、干部离职学习期间,工资福利和其他待遇包括工资调级,同在工作岗位上的干部一样对待。五、对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但缺乏基层工作经验的年轻干部,要有计划地安排他们到第一线去取得实际工作的经验。中央还对培训干部的教材编写工作以及干部培训所需的经费等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指示。

中央组织部对干部培训工作很重视,把它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干部培训工作的指示和决定,在我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先后召开了5次全国性的干部培训工作会议:1979年底至1980年初,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党校联合召开的党校工作座谈会;1981年2月中组部、中宣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干部教育工作电话会议;1981年11月中组部、中宣部联合召开的部分省市干部教育工作座谈会;1983年2月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党校联合召开的第二次党校工作会议;1983年中组部、中宣部联合召开的各省市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全国干部教育工作座谈会。我和王震、王任重等同志先后在有关会议上讲话,强调要大规模地组织干部重新学习,使广大干部经过边干边学,增长新的知识,学会新的本领,逐步适应四化建设的要求。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就不能前进。当时,一些同志说到干部培训就强调缺校舍、缺教员、缺教材。我看还是有些领

导同志缺乏远见,认识不足。我在一次会议的总结讲话中说,如果不解决思想问题,这些都是不会有的。现在解决房子问题,再难也比延安时期挖窑洞容易吧?当年我们办抗大,在破庙里、树底下上课,只要用这种精神来解决现在的问题,房子就有了。教员缺,可以请。教材也是有的。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站得高,看得远,决心大,要立即动手。这几次会议对于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认识,推动干部培训工作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这期间,我们还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或与有关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干部教育工作的意见》等文件。为了起草好这些文件,中央组织部和各地同志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我记得当时文件着重强调以下几点:新时期干部教育的方针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解决我国四化建设的问题为中心,学习有关的理论和实践的知识,培养一支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和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专业知识,富于艰苦创业精神的干部队伍,并从中造就一大批各行业专家。在学习内容和要求上,紧紧围绕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进行政治理论教育。坚决改变对不同行业、不同程度的干部不加区别一刀切的做法,实行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加强业务知识和管理知识的培训。大办短期轮训班,普遍轮训干部,争取3至5年内把干部轮训一遍。要逐步建立起以党校、专业干部学校为支柱的干部教育网,逐步实现正规的干部教

育制度,使干部教育工作做到经常化、制度化。要重视在职干部的学习。各大专院校和中专,有条件的都应当积极举办夜大学和函授大学,吸收在职干部参加。

由于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重视,1979年以来,各级党校和干校有较大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培训能力不断提高,承担培训任务的大、中专学校也有较大的增加。到1983年,全国培训干部的学校达到8400所,其中各级党校为2750所,省地两级党校最大容量为11.4万人,县级党校最大容量为32万人;各级各类干部院校近4100所,全国承担培训干部的高等院校600多所,中专950多所。

当时培训的重点是在职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及后备干部。为加速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省市主要领导干部的“四化”,经中央批准,从1980年至1982年,由中央组织部在中央党校直接承办了两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在全国范围内遴选,第一期55人,第二期143人。后来他们中间的许多同志担任了部委、省市的主要负责人,有的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各地各部委也仿照这种做法,培训了一大批优秀中青年干部,其中不少学员后来进入了省、地领导班子。

从1980年开始,为了提高组织部门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和业务水平,适应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需要,经与中央党校商定,为参加党校学习的组织工作领导干部单独编班,用一定时间专门研究、讨论组织工作业务方面的有关问题。

1981年由中央组织部和农业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全

国县级以上主管农业的领导干部到全国 9 所高等农业院校进行培训,使省、地、县分管农业的领导同志都经过业务培训。1981 年以来,有近 4 万名地、县两级主管农业的党政领导干部参加了农业科技和管理知识的轮训。

党校历来是我们党培养干部的重要阵地,是增强党性锻炼的大熔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校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校于 1979 年 12 月和 1983 年 2 月,两次联合召开党校工作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相继恢复的各级党校,在轮训和培训干部,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等方面,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党的十二大以前,各级党校以短期轮训干部为主,以拨乱反正为主要内容,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党的十二大以后,党中央决定,党校的任务,要以短期轮训为主逐步转向以正规化培训为主,这是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和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党校事业的新发展。会议认为,党校是党委领导下的培训党的干部的学校,是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党校和党委的各部、委一样是党委领导下的一个重要部门,党委要把党校的工作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加强对党校的领导。党校的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教学内容要按照四化的任务和当前的形势来确定,特别是围绕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来进行。两次会议还就师资队伍建设和教材建设、班次和课程设置、经费、

编制、领导体制、各级党校之间的分工和衔接以及大型企业党校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研究。两次会议对推动党校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特别是在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此外,在采用多种形式办学方面有新的发展,如组织大量干部参加电大、业大、函授教育等形式的学习,广泛采用电视、广播、录音、录像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由于多渠道、多层次、多学科成龙配套的干部培训网络比较系统地建立起来,进一步加快了培训干部的速度,使越来越多的干部得到了培养和提高。1980年到1983年的4年时间里,全国共培训干部1130余万人。

干部培训是全党、全社会的任务,中央组织部在这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第五章 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三)

在1979年9月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上,我们把加强党员教育,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了出来。我在讲话中提出: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是党的建设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我们党历来重视对党员的教育工作,几十年来,尤其是在革命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党组织总是首先抓紧对党员进行教育。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共产党员在民族斗争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要求,在当时是深入人心,深入民心的。今天在新的长征中,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把党员教育工作做得更有成效。

加强党员教育 健全党的组织生活

针对当时党员队伍的实际情况,我们强调要对党员进行新时期形势与任务的教育,党的基本知识和党规党法的教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教育。首先要认真搞好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的补课,普遍地、深入地进行一次辩

证唯物主义的教育,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在党员教育中,要把批判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林彪、“四人帮”煽动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使派性活动在党内合法化,实行以帮代党,他们破坏党、瓦解党,给党造成严重的创伤,内伤重于外伤。林彪、“四人帮”以派性为标准的组织路线的流毒和影响还在侵蚀着我们党的肌体。有些地方“四人帮”帮派体系的残余,还在利用派性在那里兴风作浪,严重妨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对此,应当在全党引起足够的重视,下大力气,切实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从这一点看,抓紧对党员的教育很重要,是一个战略问题。我们把教育党员的工作切实搞好了,这些同志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思想路线端正了,就可能是很好的党员。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入党的同志,也要进行教育。有些同志党性差了,党的观念淡薄了,不进行教育是不行的。

在座谈会结束时,我对党员教育的内容,又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抓好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二是进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和新时期形势与任务的教育;三是进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教育;四是进行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教育。对党员的教育要发扬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坚持正面教育。要把一些基本原理向党员讲清楚,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在学习方法上要强调学好文件,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提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不同意见要善于引导,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无限上纲,乱扣帽子。

健全党的组织生活,是对党员进行经常性教育,提高战斗力的一项重要措施。健全组织生活,要严格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党内既要有高度的民主,又要有高度的集中。针对当时党内的实际状况,我提出:现在既要民主,又要集中,在某些方面更要集中;既要自由,也要纪律,在某些方面更要纪律;既要个人心情舒畅,也要统一意志,在某些方面更要统一意志。要加强纪律,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统一纪律。健全组织生活,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干部要带头作自我批评,不要争功诿过。要克服当面不讲,背后乱讲和批评不得,一触即跳的坏作风。批评要与人为善,实事求是。同志间要讲真话,互相支持,互相谅解。要恢复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建立健全一些必要的制度。

这次会议前,中央组织部组织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个《关于加强党员教育,健全党的组织生活的意见》。会上,大家进行认真的讨论。会后,根据大家讨论的情况,进行了修改,以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文件形式下发全国。

召开发展党员工作座谈会 积极慎重发展党员

十年动乱中,发展党员工作遭到了林彪、康生、“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存在不少问题。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文化

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扩大帮派势力，肆意篡改党章，另立党员标准，采取非法手段或利用合法形式，大搞突击发展党员的活动。“九大”前后，首先在上海突击发展了一批人入党。后来，主要是1974年批林批孔和1976年“四人帮”横行时，不少省、市、自治区也程度不同地发生了突击发展党员的问题，特别是被他们严密控制的地区和单位，问题更为严重。

粉碎“四人帮”以来，通过揭批查运动和整党整风，对突击发展的党员作了一些处理，清除了一些混进党内的反革命分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打砸抢分子，以及其他坏人。但是，大多数地区和单位突击发展党员的党籍问题还搁置着，等待解决。有的地方为了迅速消除混乱，曾宣布在某段时间内突击发展的党员一律不承认，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就全国范围来说，仍有一些遗留问题需要妥善解决。中央组织部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反复征求意见，发了一个《关于解决文化大革命中突击发展党员的意见》的文件，对指导全国妥善解决突击发展党员的问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应该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多数地方和单位的党委比较重视发展党员的工作，有重点地发展了一批新党员。许多地方注意吸取“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训，重视了新党员的质量，党内外群众反映比较好。据许多地方典型调查，新党员中，具备或基本具备党员条件的，一般都在95%以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1979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上，曾就发展党员工作进行过讨论。我在座谈

会上也曾强调,发展党员工作应该采取积极慎重的方针,积极培养,慎重发展。发展党员不能搞突击、搞运动,同时又要不失时机把那些同林彪、“四人帮”斗争中表现好的,在四化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此后,又召开过几次小型座谈会作过研究。但总的来说,当时我们对发展党员工作进行专门研究还是不够的。在发展党员工作中,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需要开个会统一思想,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部里经过研究,决定在1981年下半年召开一个发展党员工作的座谈会,讨论在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党员标准,保证新党员质量,做好发展党员工作,提高党的战斗力的问题。为开好这次会议,1981年2月,中央组织部向全国各省市发了关于发展党员情况的调查提纲。各地接到调查提纲后,认真做了调查研究。除西藏外,28个省、市、区都报来了调查报告或典型材料。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也分别在北京、广西、山东、河南、甘肃、安徽等地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草拟了《今后几年发展党员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情况的报告》两个草稿,并将这两个草稿印发给各地征求意见。在听取各方面对草稿的意见之后,再次作了修改。

经过充分准备,发展党员工作座谈会到1981年12月12日在北京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17个省市党委组织部的领导同志和组织处长,中直机关党委、国家机关党委和总政治部组织部、铁道部政治部组织部的同志。中央组织部

副部长杨士杰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在讲了为什么要开这个会以后,讲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发展党员工作的情况和目前党员队伍状况;讲了发展党员工作的方针、要求和重点,强调了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的问题。他说,在一些单位和部门,对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还重视不够,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中党员还比较少,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相适应。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进一步肃清“左”的错误影响,提高对发展知识分子入党重要性的认识。各级党组织要结合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继续提高思想认识,纠正“左”的思想影响。同时,要对知识分子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关心和鼓励要求入党的知识分子不断进步,帮助他们端正入党动机,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他还讲了坚持党员标准,保证党员质量问题;讲了加强领导,实行分类指导的问题。会上,与会代表还进行了热烈讨论。

12月21日,我到会讲了话,强调了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发展党员的指导思想问题。(一)发展党员工作要从建设“两个文明”,从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来考虑。四项基本原则中党的领导是最重要的。(二)发展党员工作既要考虑到需要,又要考虑到目前党风还没有根本好转,还存在思想、组织、作风不纯的问题。所以就全国来说,既不能停止发展,也绝不可以大发展。大发展很容易降低标准,突击发展党员则更是错误的。只能坚持党员标准,适当发展。考察积极分子,要重点考察他们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态度,要结合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个重要环节的

表现进行考察。发展党员时,对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要搞清楚。“三种人”绝不能发展进来。现在有些青年人不要入党,主要是我们的工作问题。青年中的绝大多数是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各级党委和工、青、妇组织,都要加强对青年的教育工作。青年人的觉悟提高了,要求入党的就多了。(三)要在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基础上发展党员。党的基层组织没有经过整顿,或虽已经过整顿仍然问题很多的,先要搞好整顿。

关于抓好党员教育,提高党员素质的问题。(一)“文化大革命”以来发展的新党员,占党员总数的半数以上,缺乏系统的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有些人不合格或不那么合格,迫切需要加强教育。对老党员也有一个教育提高的问题。(二)只有教育提高现有党员,才能做好发展党员工作,才能保证新党员质量。(三)当前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学好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党的基本知识,解决思想入党的问题。

关于发展党员工作的计划问题。(一)计划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着搞。(二)计划必须从实际出发。自上而下就是确定哪些单位可以发展,哪些单位需要整顿暂不发展,领导上心中要有数。可以发展的单位,有多少积极分子,能发展多少党员,把下面报的情况综合起来。各省、市、自治区不要先搞发展党员的数字规定。自上而下明确发展党员单位,再自下而上提出发展党员大概数字,这个计划就比较稳妥可靠了。(三)为了保证发展党员的质量,各地要把组织员制度恢复起来。明年在精简机构过程中,可以挑选

一些党性强,适宜做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去担任组织员。

在实行生产责任制中,加强党的工作问题。(一)党的基层组织要加强对这场变革的领导。在工作中要改进方法,力求实效。(二)教育党员在实行生产责任制中起先锋模范作用。(三)不仅农业要搞责任制,工业,财贸、各条战线都要搞责任制,希望大家注意研究。

党风问题。(一)党风问题是全党的大事,组织部门要主动协助纪律检查部门抓好党风。(二)组织部门抓党风,主要是通过加强党员教育,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严格组织生活,健全民主集中制,抓好、坏典型,加强党员的党性、组织纪律性来端正党风。抓党风特别要注意抓政治思想路线问题。(三)各级组织部门在端正党风中,要起表率作用。

1982年1月,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发展党员工作座谈会,把上次没参加会议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的领导同志都请来了。这样,就等于开了一个全国性的发展党员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在全国得以贯彻落实。

这两次会议之后,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修改形成了两个文件,一是《发展党员工作座谈会纪要》,一是《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座谈会纪要》,并以中央组织部文件形式印发全国。这两个文件下发后,对指导全国发展党员工作和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理顺中央直属机关的工作 恢复“文革”前的领导体制

“文化大革命”前，中央组织部和党中央其它工作部门的领导体制都是实行党中央领导下的部长负责制，同时建立部务会议和部长办公会议制度，实行集体领导；在部内成立机关党委，管理本机关党的日常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片面强调党的所谓一元化领导，党中央机关各部门中有的建立了党的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也有的成立了党委，领导业务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央还先后规定党中央各部委应成立党委，由机关党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选举产生。部党委和它的常委会是各部委实行集体领导的班子，同时负责管理本机关的党务工作。

我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后，听到不少反映，大家认为，中央机关的领导体制，还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形式为好。我也感到当时的领导体制关系不顺。党中央各部委是中央的办事机构，它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中央组织部是协助中央管理全党干部工作和党的建设的主要业务部门，部的领导班子是由中央决定任命的，若由本机关党员选举产生的党委来执行这样的任务是不适宜的。其次，让部党委纠缠于处理机关党的一些日常事务工作，也不利于部领导集中精力考虑和研究重大问题，抓好大事。于是，我们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把组织局的同志找来，当面作了交待，由

组织局写出专题报告,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报给耀邦同志并转报党中央。耀邦同志对此事很重视,也很支持,专门就此事给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写信,作了说明和解释,使此事得以顺利通过。1979年,中央办公厅以中办发28号文件形式转发了中央组织部的报告。从此,党中央各部委建立了部务会议和部长办公会议制度,实行集体领导,不再成立部党委,另在部内选举产生机关党委,管理机关党的日常工作,理顺了中央直属机关的领导体制。

调整配备地方各级领导班子 改革革命委员会为人民政府

1979年9月11日至1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原则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在1979年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将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决议》。

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个决议,中央组织部会同中央统战部代中央起草了有关调整好领导班子和干部配备的意见,后经中央批准转发。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党政不分,领导班子臃肿,办事效率低的状况,要求各地乘设立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时机,按照党政工作要分开、权力机关和执行机关要分开的原则,对地方县以上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和加强。文件指出:

在遴选各级人大常委会成员时,要对同级党委常委、政

府负责人和政协常委的配备全面考虑,统筹安排。

党委常委会是党委的核心。党委常委会的组成,要力求精干,注意搞“五湖四海”。要挑选一批经过考验的、有贡献的、德高望重并且能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老同志到人大常委会去工作,同时要注意老中青相结合。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执行机关,要尽可能由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熟悉业务的同志担任领导工作,使各级人民政府真正成为坚强有力的工作班子。

人民政协是在我党领导下的发扬民主、联系各方面人民群众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要注意吸收各方面有影响、有贡献的代表人物参加。

为了改变有些领导干部兼职过多的现象,调动各方面干部的积极性,除确实因工作需要的以外,应尽量减少交叉兼职。党委第一把手一般不宜兼任省长、自治区主席。人大常委会主任可由党委主要负责人兼任,要经过选举。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名额,规定7—15人左右,人口特多的省不超过19人。

各省、市、区在筹备过程中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央组织部于1979年10月6日行文,就一些带有共同性的问题作了答复。文中指出,军队干部参加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的人员不宜多,除大军区和省军区的领导干部两三人参加外,野战军的领导干部一般不要参加。关于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的组成,副省长(包括市长、主席)的配备,要逐步做到5—7人,目前最多不超过10人。副省长(包括副市

长、副主席)原则上可以有非党同志,但要符合副省长条件,一般不要搞照顾性安排。

关于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中安排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的问题,中央于1979年10月12日批转了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的报告。报告中重申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是我党的一贯政策。实践证明,我党的这一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过去在各级人民政府中安排党外人士,对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功,都起了积极作用。各级党委要根据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克服清一色思想,继续做好对党外人士,特别是具有专长的党外人士的安排工作,并同他们真诚合作,共同把国家的事办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凡有条件和对象的,应选拔一两名党外人士担任副省长、副市长、副主席;厅局长中也应安排一些条件合适的党外人士。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有关法律规定,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79年、1980年,先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和省长(市长、主席)、副省长(副市长、副主席)、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最早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是西藏(1979年8月14日),最晚的是天津(1980年6月23日),其余大部分是在1979年12月至1980年1月召开的。

第六章 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四)

中国革命经过漫长的斗争历程,造就了一大批老干部。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和地下斗争的岁月里,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是推翻三座大山,创建新中国的中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带领人民群众,发奋图强,艰苦创业,为改变旧中国的落后面貌,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十年浩劫期间,他们中间的大多数遭到迫害,但忍辱负重,坚持斗争,为党和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他们振奋革命精神,为拨乱反正、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做了新的贡献。经历几十年的战斗,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老同志在职时是党的宝贵财富,退下来后仍然是党的宝贵财富。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有关老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做好老干部工作,关心他们,爱护他们,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是中央组织部的一项重要任务。

胡耀邦同志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就十分重视老干部工作,他请李步新同志筹建老干部工作的专门机构——老干部局。第一任局长是郑伯克同志。1982年以后,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也陆续成立了老干部工作机构。

我到任后,在老干部工作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平反昭雪 恢复名誉

做好受迫害老干部的善后工作

在大批冤假错案平反后,还有大量的善后工作。妥善处理各项善后事宜,也是中央组织部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老干部局成立初期,我们用很大的精力,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有:

(一)遵照中央指示,为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几年来与有关部门协同,先后为已逝世的刘少奇、彭德怀、陶铸、张闻天、徐海东、李立三等 53 名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予以昭雪,并在报上发表消息和悼念文章,宣传他们的功绩和贡献,批判林彪、“四人帮”迫害老干部的罪行。

(二)对老干部平反后政治上和生活上的照顾。协同有关部门办理了一批老干部恢复党籍和原工资待遇,解决了住房、用车、医疗、生活补助、配备服务人员等问题。

著名作家高士其同志是一位老党员,因病生活不能自理,食道功能失调,每餐进食稀烂食物需一小时;终日哮喘,痛苦异常;每到夏天总因中暑而发高烧,送往医院抢救。他希望组织上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1983年8月,我看到关于高士其同志的情况反映后,即请老干部局、宣教局协同高士其同志所在的中国科协研究解决。同年9月3日,中国科协党组报告:1. 已在高士其家中安装了空调,既能制冷,

也可取暖。2. 批准高士其同志夫人为工作人员,专职护理高士其同志;从10月份始,每月发给保姆费,自雇保姆,配合护理。3. 按照高士其同志的意见安排疗养。4. 根据高士其同志的意见,将其子调任他的秘书。78岁高龄的著名科学家、作家高士其同志的困难获得了圆满解决。

(三)看望、照料老干部的遗属和烈士遗孤。如派人看望彭德怀同志夫人浦安修、李达同志夫人等,并协助其所在单位,解决他们的一些实际困难。将李立三同志夫人李莎接回北京安置。为王若飞同志夫人李培芝、王维舟同志夫人等解决住房和治病问题,解决一些遗属的工作安排、住房和生活困难补助等问题。

我到中组部不久,适逢春节。节前,我到北京医院看望老干部。从1层到4层,逐个慰问。以后,春节前看望老干部逐渐形成了制度。

原红四方面军25军军长蔡申熙同志,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光荣牺牲。其女儿蔡萍踪在冶金部矿冶研究总院任工程师,患有乳腺癌、风湿性心脏病、脑血栓偏瘫等病。遵照徐向前同志的意见,中央组织部派人看望了蔡萍踪同志,并与冶金部党组共同研究,妥善地解决了这位烈士遗孤的实际困难。

已故原西北局秘书长任作民同志的儿子任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他所在的轻工业部干校解散后,调到北京工业学院任工会主席。1981年他曾两次给我来信,分别要求安排适当工作和恢复家里电话。关于工作问题,我于7月29

日批示：“请有关单位商量，能否安排适当工作，否则也可按本人的意见当顾问或离休。当然请有关单位同他本人商量办理。”经中组部老干部局同北京工业学院党委商量，任楚同志任学生工作部顾问。电话的问题也很快得到了解决。

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建立老干部离休退休制度

“文革”十年动乱期间，正常的退休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到1976年，全国到了退休年龄而未退休的干部达到60多万人。1978年6月2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颁发了《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对老干部的离休条件和离休后的待遇做了这样的规定：“1949年9月底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地委正副书记、行政公署正副专员及相当职务以上的干部；1942年底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县委正副书记，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及相当职务的干部；1937年7月7日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可以离职休养，工资照发。”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规定。这个“暂行办法”的实施，总的反映是好的，但在试点中，许多同志提出，最好能对干部离休单独作出规定。于是，中央组织部经过调查研究，代国务院起草了《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1980年10月7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这是我国第一次将离休制度从退休制度中分离出来。这个规定把享受离休待遇的对象扩大为：第

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副县长及相当职务或行政十八级以上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行政公署副专员及相当职务或行政十四级以上的干部。

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建议，要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正常的退休制度。中共中央于1982年2月发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这个《决定》的颁布，为新老干部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合作与交替，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决定》指出：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是保障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正常进行和健全发展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制度。我们的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是从我党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广大老干部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的。《决定》对广大老干部为革命为共和国的建立而立下的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规定对他们“基本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还要略为从优，并注意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这一坚定不移的政策原则，为逐步完善老干部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决定》还规定了老干部离休退休的年龄界限，省部级正职一般不超过65岁，副职一般不超过60岁；司局一级的干部，一般不超过60岁。除了上述原则规定外，还特别强调指出，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需要保留少量超过离休退休年龄界限的老革命家，这是全局的需要，是保持国内安定团结和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的需要，是完全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根据中共中央这个决定，中央组织部又代国务院起草

了《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这个规定进一步放宽了享受离休待遇的范围：1948年底以前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9月30日以前参加革命工作，享受供给制待遇的，都可以办理离休。还规定对参加革命工作较早的老干部，生活上给予补贴。这是党中央从我党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所采取的一项特殊政策。在过去70多年间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胜利都是经过党的老干部英勇斗争，发动并组织群众取得的，他们是我们的老前辈，是党和国家的栋梁，是干部队伍的中坚。对这些为中国革命做出特殊贡献的老干部采取特殊政策，就是肯定他们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是适合中国特点的，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华民族“敬老尊贤”的传统美德，具有中国的特色，对推动整个干部制度的改革，促进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

遵照中央指示，中央组织部还起草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设置顾问的决定》，中央于1980年8月正式批准。《决定》规定，在县级以上单位设置顾问，并明确顾问的工作主要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帮助党政领导出主意，当参谋；完成党政领导委托办理的任务；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和自己的经验传给年轻一代。

采取多种形式 发挥老干部的作用

中央组织部在认真贯彻中央关于选拔年轻干部，培养接班人的战略决策时，反复宣传和强调老干部在这方面的作用。根据党中央和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我在当时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讲话中，一再强调：“老同志的责任很多，第一个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好接班人，选得合格，选得好，我们就交帐了”，“每一位退下的老同志都要把选拔和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当做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担当起来”。同时也提出，要注意不要干预一线领导班子的工作。广大老干部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不仅努力协助党委抓紧选拔了一批优秀中青年干部，而且还以极大的热忱关心、支持和帮助年轻干部，通过传帮带，把丰富的领导经验和党的优良传统传给他们，使这些刚走上领导岗位的年轻干部尽快成长起来。在这方面，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这样一些老同志，带头执行党的路线和决议，以宽广的胸怀，主动让贤，为培养一大批革命事业接班人甘做搭桥铺路的工作。总参孔原同志，主动要求当顾问，当中央批准后，他表示：这是中央对我的信任、关怀，这对工作有好处，对我也有好处，我应当努力，争取做一个合格的顾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老红军张世功同志，多次要求离职休养，让位给年富力强的同志，并表示要在新疆安度晚年，请求组织

不要考虑调他到北京等地另做安排。

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十分注重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发挥老同志的作用。1982年10月,中央书记处批准了中央组织部起草的《关于发挥中央、国家机关离休老干部的作用的意见》。这个文件要求根据老同志的精力、专长和志趣,采取多种方式安排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参加某些重要问题的调查,写回忆录,担任某些学会、协会、理事会的特约研究员,协助基层组织兴办福利事业,教育青少年等等。文件发出后,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区加强了对老干部工作的领导,做了大量的工作。河南安阳市的一些老同志成立了关心下一代协会,中组部很快表示了对其支持。根据1982年底中央、国家机关89个单位的统计,在1514名身体尚好的司局级离休干部中,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和意愿,安排了各种工作的有783名,占52%。江西省委组织离、退休干部到400多个单位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听众达32万人次,效果很好。

为了体现党和国家对那些对革命有特殊贡献的老干部的关怀,中央组织部建议,在1979年国庆30周年之际,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邀请全国各地和中央一些部门的老同志参加国庆节的庆祝活动。中央采纳了我们的建议,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90名顾问和离休老红军、老干部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这些老同志大部分参加过长征,部分同志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他们有的在井冈山和长征途中直接为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同志服务

过；有的身经百战，多次负伤，屡立战功，身上至今仍有敌人的弹片；有的舍生忘死，长期在白区坚持斗争，为党做出了贡献。他们听了叶剑英同志的重要讲话，出席了国宴，参加了国庆晚会，参加了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座谈会。我在座谈会上向他们以及全国所有受到党和人民尊敬和关怀的离、退休老干部表示了敬意和慰问。希望全国所有的离、退休老同志积极帮助所在地区和所在部门培养和选好接班人，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努力发展生产，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党赋予的光荣的责任担到底。会后，老同志们一起合影留念。这次活动的情况，在报纸上进行了宣传报道，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中组部“各地举行国庆活动时，都要邀请对革命有特殊贡献，现在没有担任实职的老同志参加”的通知精神，邀请部分顾问和离休的老红军、老干部参加了当地的国庆活动。这次活动是对顾问和离休老干部工作的一次广泛宣传，增强了他们的光荣感和责任感，促进了关心和尊重老干部的社会风气的形成。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决定中央和省一级设立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干部合作与交替的过渡性机构，以发挥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富有经验的老同志的作用。十二大的《党章》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其任务：一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二是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三是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四是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小平同志作为中顾委第一任主任，在

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要求中顾委委员注意3件事:第一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第二要联系群众;第三要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方面以身作则。中顾委遵照党章的规定和小平同志的指示,本着“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和“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进行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党中央关于设立顾问委员会的决定和指示,使老干部工作特别是顾问工作的任务更加明确、更加完善。

制定文件 提出要求 牵头抓知识分子工作

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时中央组织部的一项重要工作。耀邦同志任中组部部长期间,对这项工作极其重视,不仅大声疾呼地宣传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性,还作了大量的批示。他在批示中指出,党要给知识分子解决的问题成山,解决这些问题既要有中央的指示、规定,还要有职能部门的组织实施,二者缺一不可。中央已经有一整套关于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去解决实际问题。现在是说大政方针的人多,做具体事情的人太少,一定要亲自去办,一竿子插到底。他还指出:知识分子,不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党和国家的干部,按照干部要统一管理的规定,知识分子的工作,当然应由中央组织部抓总。但由于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对数已经不小,情况又复杂,加上历史上形成的习惯,照管好

知识分子各方面的问题，中央其他部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党外民主人士、起义军官、宗教界人士，中央统战部就要多负责任；民族干部，特别是民族上层干部，民委就要多负责任；作家、文化人，中宣部就要多负责任；科技人才、教授、医生，国家科委、教育部、卫生部就要多负责任；归国侨胞，侨办就要多负责任，等等。他建议搞一个联系小组，由中组部一位副部长牵头，其他有关部门派人参加。定期（如每星期一次）开碰头会，出题目、摸情况、作检查、办事情，办不了的向上反映。

我到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前夕，中组部在耀邦同志主持下，经过调查研究，于1978年11月制定了《中共中央组织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这个文件，首先肯定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业绩，指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了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要求：（一）对知识分子队伍应当有一个正确的估计。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党的依靠力量。一些地方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不力，主要是对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二）继续做好复查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科技和文化教育战线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案审查的案件，还有40%左右没有复查。如果加上“四清”、反右派等运动中的错案，工作量更大。（三）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有职有权有责。争取三五年内使我们企事业的各级领导班子真正懂技术、会管理的干部占到30%、50%以至70%。（四）调整用非所学，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

用。(五)努力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六)加强领导,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成立联系小组 协调知识分子工作

我在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继续把知识分子工作放在同管理党、政干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由中组部牵头成立了知识分子工作联系小组,于1981年5月5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个联系小组是协调各部门知识分子工作的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各部门、各地区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措施;调查研究知识分子工作中带普遍性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和意见;了解各部门、各地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和问题,并督促有关单位积极解决存在的问题;向中央反映知识分子工作的情况,提出有关政策性建议和措施。联系小组每半个月开一次会,每半年向中央作一次工作报告。参加联系小组的有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国家科委、国家农委、国家民委、教育部、卫生部、文化部、国家人事局、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国务院侨办、北京市委共13个单位,这些单位确定一名副部长主管知识分子工作,一名干部、人事部门的局级领导干部参加联系小组会议,中组部陈野苹、白治民同志担任小组召集人。1983年机构改革后,联系小组又增加了国家计委、财政部的领导同志。根据会议议题的需要,还邀请过经委、建委、国防工办、公安部、能源委

员会、粮食部、商业部、中纪委、高检、高法、中科院、社科院等部门的领导同志参加会议。

在联系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我讲了三点意见。（一）在新的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工作要有新的认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更是工人阶级中具有现代化科学知识的一部分，是进行现代化建设，进行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当前做好知识分子工作，最重要的是领导部门要认真清理长期存在的“左”的影响，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的路线上来。各级组织部门、人事部门要把知识分子作为党的干部的一部分，统一管理起来。（二）当前加强知识分子工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注意5个方面，即政治上关心他们，工作上关心他们，组织上关心他们，生活上关心他们，以及善始善终地解决好平反冤假错案的遗留问题，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三）加强领导，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把知识分子工作列入职责范围，有专人管理。要向“压、推、拖”的官僚主义现象作斗争，亲自动手，解决一批实际问题。

在此后召开的联系小组会议上，文化部、卫生部、农业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国家人事局、北京市分别介绍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交流了工作经验，提出了一些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如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提高工资待遇的问题，知名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的保健医疗、住房、用车问题，专业技术干部农村家属迁往城市的问题，稳定和加强农业战线和边远地区知识分子队伍的问题，落实私房

政策和归还查抄物资的问题，对知识分子入党卡得过严的问题等。大家还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

根据会议提出的意见，有些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如卫生部作出了调整老专家保健医疗照顾的办法并付诸实施，有关部门作出了中央国家机关高级知识分子用车的规定等。联系小组将会议讨论的情况及时向中央报告，争取中央的指示。在1982年3月19日召开的联系小组第八次会议上，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有关指示。中央书记处提出：医疗要优先照顾退休离休老同志和党内外专家、名人。在住房等问题上，有些专家、知名人士按部长或副部长一级待遇。新提拔上来担任部级、司局级领导职务的干部，应当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让出目前已经很紧张的医疗和住房设施，优先照顾退休离休的老干部和党内外各方面的专家、名人。大家一致拥护中央书记处的上述意见，并由中央组织部牵头组织卫生部、中宣部、统战部、教育部等部委具体落实。经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审阅同意，1982年7月19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央组织部和卫生部起草的《关于对离休老干部和党内外知名人士、专家扩大医疗照顾的报告》和《中央、国家机关在京单位离休老干部和知名人士、专家医疗保健暂行办法》，为350名在京的知名人士、老专家解决了住院医疗照顾问题。这些措施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好传统，得到了专家、学者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好评。

组织队伍

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1981年10月到1982年初，中央组织部还对中央国家机关落实高级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组织了一次检查。检查对象为中央、国家机关相当于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检查的重点是政治上落实政策的情况、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三个方面。中央组织部委托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国家人事局、国家机关临时党委、中直机关临时党委分别组成八个联络组，分片负责有关部委的检查工作，要求边检查边解决问题。检查结果表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国家机关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是有成绩的，但存在着“左”的思想影响，存在着重“长”轻“家”的习惯势力，在政治上落实政策以及工作条件、生活条件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应该解决的问题。检查结束后，联系小组开会专门作了研究，着重讨论了三个问题：

(一)提高认识问题。这次检查表明，在干部和群众中进一步加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宣传教育，继续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充分认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克服长期形成的重“长”轻“家”的习惯势力，很有必要。

(二)需要统筹解决的一些老大难问题：①“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落实私房政策和清退查抄财物问题，在检

查中反映最为强烈。中央已经批准北京市为解决上述问题向中央、国务院写的请求报告,应当坚决按有关规定抓紧落实。②高级知识分子居住条件差,是检查中反映出来的又一个突出问题。许多单位的高级知识分子,住房困难的占1/3以上。中央在1979年、1980年两次拨款给高、中级知识分子建房,建议国家建委和北京市建委给予优先安排,力争早日建成使用。③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夫妻两地分居或身边无子女照顾。对此应作为特殊问题帮助解决。有些老专家提出要从外地调入助手问题,也需商定具体办法。④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用车问题。已由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商业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共同拟定了一个暂行办法,准备尽快实行。⑤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医疗保健问题,因受物质条件的限制,只能分期分批解决。

(三)在这次检查中,不少单位反映,目前各条战线上承担繁重任务的,大多是中年业务骨干,他们需要落实政策的问题也很多、很迫切。应当继续组织力量,检查对中年业务骨干落实政策的情况。

1982年1月,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在当年上半年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切实制定改进措施,力争在短期内做出成绩。中央组织部对落实中央通知精神作了具体部署。

中央组织部于1982年3月就中央机关检查对高级知识分子落实政策情况,给中央写了报告。同年4月,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指出:中央书记处原则上同意这个报告中对

需要统筹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意见，中央和国家机关各有关部门、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党组要抓紧研究、落实。希望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按照《中央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参照这个报告中的经验和意见，认真做好这一工作。对于那些应该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各地方、各部门都要根据实际情况，积极主动地想办法予以解决，不要拖延。对于那些应该解决而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也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加以解决，同时实事求是地向有关人员说明情况，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取得他们的谅解。只要我们这样做了，就一定会进一步调动和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加发奋工作，做出新贡献。

1982年，各省市自治区都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并根据当地的情况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大大地推动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

知识分子工作联系小组成立后共召开过17次会议，根据中央的精神，研究讨论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重大政策和具体措施，对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协调各方面力量，推动知识分子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在中央组织部4年多的时间里，任务是繁重的，工作是紧张的。当时的工作，头绪很多。我的主要精力是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和推进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工作进程。我的工作习惯是，大事多请示，

小事不干扰，平时多商量，批件不过夜。常常是一天三班：上午、下午、晚上。当时中央组织部的许多干部精神振奋，努力工作，经常加班加点，到了晚上，办公大楼的许多房间灯火通明。

组织部的领导班子，除了陈野苹、李步新、曾志、杨士杰、白治民、赵振清、王照华几位副部长以外，还有林铁、李楚离、帅孟奇、廖志高等几位顾问。我们这个领导班子，按照中央的要求，坚持民主生活会制度。在民主生活会上，同志们能畅所欲言，交流思想，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一个团结合作，互相支持，配合默契，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坚决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很有战斗力的领导集体。

当时，由于中央的坚强领导，在胡耀邦等同志的直接指导下，经过全体干部的共同努力，组织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当然，工作中也有不足，如对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抓得不紧；干部制度改革力度不够；有的干部也选得不太准等。组织部的工作，尽管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但总的来说，离党中央和新形势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这些当由我负主要责任。

我离开组织部以后，组织战线的工作，有许多新的进步和突破，我是非常高兴的。

第七章 入选中央书记处 和中央政治局

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在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处理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胡耀邦同志任总书记。我和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姚依林、彭冲同志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当时，我已71岁，是中央书记处中年龄最大的，仍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年2月，经中央批准，我不再担任中央组织部的职务，由陈野苹同志接任部长。在我离开中央组织部以后到退居二线的两年多时间里，除了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主要从事组织、干部方面的工作和完成中央交办的事项，还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发言 联系自己总结历史教训

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是建国以来

我党历史上又一次重要的会议。全会的主要议题是审查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文件从1979年底着手起草,经过党内4000余人的讨论,根据各方面的意见进行多次修改后,提交六中全会审议的。《决议》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进行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作出了基本的总结,指出了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决议》明确指出,党在建国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由于经验不足,党的领导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上发生过主观主义的偏差,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但是,32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或忽视、否认成就及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都是错误的。

《决议》还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决议》对于统一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维护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纠正当时存在的“左”的和右的

错误观点，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在讨论我党由于经验不足犯过各种错误包括严重错误时，不少同志认为应该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把责任都推到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身上。当然，毛泽东同志应当负主要责任，但是我们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作为一个地区或者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也有自己的责任，也应当从中吸取教训。对于这个问题，我在六中全会上有这样一段发言：“我讲讲自己在这一段（指‘开始全面建议社会主义的十年’）的情况。这一段我是属于坚决执行的一类。所以，不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问题。我在全国右派改正的会议上的讲话和在中央党校关于组织工作的讲话，都讲了这个问题。1957年以前的错误不讲，1957年以后，一是反右扩大化，二是大跃进，我双手赞成。北戴河会议上，我的发言就头脑发热。提出每省搞一个加速器，每个大区搞个原子反应堆，以后这个计划撤销了。当然，个别问题上我也曾有怀疑，但是，整个思想是‘左’的，执行了毛主席提出的各项要求。庐山会议前一段我没有参加，讨论彭德怀同志的信我参加了，并发言批判彭德怀同志，而且是积极分子，这个发言经中央转发全国。反右倾机会主义，我在二机部搞了6个司局级干部，其中3个检讨不好的，当时没有贸然给他们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放两年再说，改了就不戴了。这种做法，也不是认识到批右倾机会主义批错了，只是方法上的改变，从思想上检查，还是‘左’的。以后到东北，还是‘左’的

思想。但有一条，怕死人。抓了代食品、瓜菜代、自留地、小片开荒，政策上放宽了一些，这也是不搞不行，并非思想解决了问题。四清，我虽比较谨慎，但也错整了一些人。我对辽宁省委同志说，凡是我整错的人都应纠正，不要同我打什么招呼。真正认识‘左’的错误，还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以，这一段的错误，当然毛主席要负主要责任，但是像我这样的人应该真正承担自己的责任。在传达这次会议精神时，我自己应当主动讲，不要都推到毛泽东同志身上。”

在全会上，许多同志对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来工作中的错误提出了批评。特别是对他在“文化大革命”后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错误提法，以及对小平、陈云等老同志恢复工作和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问题上采取消极以至阻挠的态度，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大家考虑到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有功，也做过有益的工作，仍然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陈云同志专门提醒大家：不要忘了选华国锋同志。这次会议，胡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受中央委托，同廖承志同志一起向 宋庆龄同志传达党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1981年5月14日晚，宋庆龄同志病情突然恶化。党中央十分重视，指示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同志、副部长黄树则同志和吴蔚然同志为首，汇集各方面著名专家的医疗组全

力进行抢救。5月15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宋庆龄同志一贯是共产党的最亲密战友,是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的领袖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为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光辉业绩,考虑到庆龄同志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病重时又一次提出入党要求,一致决定接收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时,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廖承志同志和我列席了这次会议。中央委派廖承志同志和我立即赴宋庆龄同志住处把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转告她并征询她的意见。

会后,廖承志同志和我来到宋庆龄同志病榻前,廖承志同志习惯地称她为“叔婆”,先用汉语讲一遍,后用英语又讲了一遍,传达了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后,说:“叔婆,您听清楚了没有?同意不同意?如果听清楚并同意的话,请您睁开眼睛。”庆龄同志睁开了双眼,露出了笑容,微微点头表示同意。廖承志和我马上返回,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后来,邓颖超同志又亲自向庆龄同志报告了中央政治局接受她入党的经过,邓小平同志专程前往祝贺她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5月1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一致决定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会议刚刚结束,彭真、廖承志同志便驱车前往宋庆龄同志住宅,把人大常委会授予她荣誉称号的决定告诉她并表示祝贺。

在宋庆龄同志病重期间，我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保健委员会主任，一天数次接到病情报告，并经常到她的住处探望和了解情况，有紧急情况，便连夜赶去。同时，中央决定把宋庆龄同志的挚友、邹韬奋先生的夫人沈粹缜同志请到北京帮助照料。

医疗组尽最大努力进行抢救，但庆龄同志的病情仍不见好转，一直高烧不退，最高达到 42 摄氏度，血压下降，胃肠道出血，肾功能减退，最后咽部粘膜大出血，呼吸困难，继又发生肺水肿，终于不治，于 1981 年 5 月 29 日 20 时 18 分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 90 岁。宋庆龄同志停止呼吸后，邓颖超同志当晚召集了由廖承志、宋任穷、钱信忠、沈粹缜等同志参加的小会，研究了丧事安排的初步意见，向中央建议。会从晚上一直开到第二天黎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于当日发出公告，宣布了这个噩耗，并决定为宋庆龄同志举行国葬。5 月 31 日到 6 月 2 日，首都各界 12 万多人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来到人民大会堂悼念宋庆龄同志，瞻仰她的遗容。宋庆龄同志的儿媳陈淑英、孙女孙穗英和孙穗华、外孙女戴成功等亲属守在她的身边，党和国家领导人轮流为她守灵。3 天隆重的吊唁仪式之后，于 6 月 2 日下午，宋庆龄同志的遗体由廖承志、宋任穷、杨尚昆、杨静仁、康克清等同志和孙穗英、孙穗华、戴成功等护送，从人民大会堂移往八宝山。首都群众伫立在长安大街两旁，目送宋庆龄同志的灵车缓缓驶过。近百万人自动组成的厚厚的人墙，从人民大会堂一直延伸到 20 多里外的八宝山。在八宝

山革命公墓停灵厅里，廖承志、宋任穷、杨尚昆等同志及宋庆龄同志的家属再次在遗体前默哀，向这位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久经考验的前驱告别。

宋庆龄同志生前留下遗言，要求身后骨灰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埋在她父母墓的右边，把已经故去的伴随她 50 多年的李妈埋在左边。6 月 4 日上午，宋庆龄同志的骨灰由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等同志护送，由专机从北京移送到上海安葬。我随邓小平等党和中央领导人一起到机场送灵。当天，在上海万国公墓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在宋庆龄同志病重和治丧期间，廖承志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忙前忙后，最为辛苦。他几乎整夜守候在宋庆龄同志身旁或徘徊在楼下的走廊里，亲自指导医护和抢救工作。宋庆龄同志的家属来京后，都由他亲自张罗，安排接待、迎送等。医疗组起草的宋庆龄同志第 1 号至 11 号病情公告，都是经廖承志同志审阅后发表的。

我最早见到廖承志是在 1947 年。当年，国民党军队投入胡宗南等部 25 余万兵力突然袭击延安。党中央果断地主动撤出延安，转战陕北；同时决定，将解放日报合并于新华社，转移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廖承志同志率领新华总社大部分干部于 6 月间抵达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冶陶附近，在这里坚持工作。当时，我任中央局组织部长。我们初次见面，便一见如故，这是因为在这以前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朱光

同志(全国解放后曾任广州市市长)向我讲起过承志同志和他一起在四方面军工作时受张国焘迫害的不少情况。承志同志博学多才,为人随和,是一位革命乐观主义者。在不长时间的相处中,我们谈得很投机,我还到他家里吃了一顿饭,承志同志和夫人经普椿同志亲自下厨掌勺。我们一起参加土地会议时,他为我画了一幅速写画,陈赓同志在画像上写了“穷像”两个字,并注明“1947.12.26日夜半全区土地会议闭幕时廖承志同志为任穷造像”,我一直珍藏至今。1982年中央派廖承志同志赴广州和杭州,分别向叶剑英同志和陈云同志通报中央关于重要人事安排的情况并征询意见。时逢叶帅八十五寿辰,我和王震同志也正在广州。我同承志,王震同志一起赴叶帅住处祝寿。叶帅身体欠佳,会见了前来祝寿的客人,向大家敬酒后便退席了,委托王震、承志同志和我3人代表他宴请来客,同大家一起共进午餐。过了两天,我便搭乘承志同志的专机到福建的漳州。当时,中央经过研究,建议由承志同志出任国家副主席。从各方面看,这是很合适的人选。令人遗憾的是承志同志还未担此重任,就病倒了。在承志同志病重期间,我到医院探望,一再劝他遵医嘱安心治疗,不要外出活动,承志同志事业心很强,仍抱病参加人大五届五次会议的最后一次大会。1983年6月10日不幸病逝了。后来,中央建议由乌兰夫同志担任国家副主席。

建议中央批准续建“固海扬水工程”

解决人、畜饮水困难

1981年8月17日至31日，我到宁夏走了一趟。在银川、贺兰、吴忠、中宁、盐池等市县看了几个生产队、工厂和商业网点，走访了10多户回、汉族工人和农民的家庭，看望了一批老干部，同工、青、妇的负责同志进行了座谈。10多天的走马看花，对宁夏总的印象是：自然条件良好，发展潜力很大。全区370多万人口，平均每人占有耕地3.6亩（其中水田0.9亩），草原10亩以上。日照时间长，又有黄河自流灌溉，十分有利于农作物生长。能源条件好，电力比较充足，煤藏量丰富，还产一部分石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形势很好。宁夏的工业，由于重工业占的比例大，调整中遇到的困难比较多。就全国来讲，宁夏的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山区仍然相当贫困。但是宁夏确是个大有作为、大有发展前途的好地方。

期间，自治区领导同志向我反映，为了解决固原、海原、同心等县8万多人口、几万头牲畜的饮水困难，急需解决续建“固海扬水工程”的问题。

宁夏境内的黄河灌区，排灌渠道配套成网，是主要的粮食产区，而南部山区的大部分地方却干旱缺水。固原、海原、同心等县年降雨量稀少，且蒸发强烈。这些县的地下水埋藏很深，矿化度高，难以利用。由于缺水，大大增加了人民生活

的困难,成为西北最穷困的地区之一。20年来,这些地区年年靠救济。近几年,国家平均每年救济500多万元,返销粮6000多万斤。1980年,仅拉运人畜饮水补贴款就花去120万元。

为了解决这个地区干旱缺水问题,1978年曾建成“同心扬水站”,解决了一小部分人民生活用水、牲畜饮水和土地灌溉问题。同时于1978年7月开工兴建解决人畜饮水为重点的“固海扬水工程”。该工程4个泵站,干渠长50公里。1981年4月,国家农委派出工作组对工程进行调查,对其经济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这项工程是解决固原、海原、同心等县数万人口和牲畜用水的最有效措施,同时也有利于发展该地区的农林牧生产,有利于人民、特别是回族人民从根本上摆脱贫困。但原计划规模偏大,国家农委提出了调整方案。我听了汇报后,专程到宁夏南部的中宁县实地考察了一泵站和二泵站。

回京后,我向耀邦同志和中央书记处写了报告,提出:“考虑到固海地区是回族聚居区,由于干旱严重,虽然国家年年拨大量救济款,但该地区的贫困落后面貌仍没有大的改变。而解决水源,又只能依靠黄河,除此无其它办法。这个工程已经投资了4000多万元,如果停下来,损失太大。看来,可以同意国家农委审定的调整方案,在1985年以前每年再投资1000多万元,建成这个扬水工程”。中央批准了这个意见。

后来,宁夏的同志告诉我,1983年6月1日固海扬水

工程一至四泵站通水运行,当年试水灌溉 6 万亩,冬灌扩大到 12 万亩;1986 年 9 月工程竣工时灌溉面积达到 22.7 万亩;1987 年以后,灌溉面积年年递增,1994 年灌溉面积已达 56 万亩,灌区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灌区人年均收入 1980 年前只有 30.5 元,1994 年提高到 600 多元。解决了灌区内和邻近地区大约 20 万人、3.2 万头大家畜、10 万只羊的饮水问题,祖祖辈辈喝苦水和到几十公里外拉水吃的历史已告结束。1986 年到 1987 年灌区 22 个月干旱无雨,因为有了固海扬水,同心县省去拉水运费 300 余万元。灌区营造了大量的防护林和地埂林,农民的房前屋后都栽上了林木,果林发展迅速。由于林业的发展,植被面积的扩大,灌区大风沙暴逐年减弱,小气候有了明显改善,土地开始熟化肥沃,生态环境出现了良性循环。同时,还先后从干旱贫困地区向灌区搬迁安置贫困户数万人,既减轻了山区的压力,又加快了灌区的开发建设。

成立五人小组妥善解决 对西北革命历史问题的争论

1983 年初,一部分老同志对西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的革命历史问题,即三十年代前期以错误肃反为中心的一段历史问题,发生了相当广泛和激烈的争论。一些老同志致信中央,要求中央过问此事。中央研究后认为,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有利于增进党内团结,而且还关系到如何运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全局出发,实事求是地正确对待和处理好我党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问题。因此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处理这件事,并指定由我代表中央负责联系。经我与李维汉同志商议,并经中央批准,决定由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同志组成 5 人小组,会同原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有代表性的负责干部,共同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我参加了 5 人小组的第一次会议,共同商定了两条:一、由陕北、陕甘边两方各推出 4 位同志同 5 人小组同志一起组织座谈会。二、解决争论问题的方针是分清是非,团结同志,不再追究个人责任,不纠缠枝节问题,最终结束争论。分清是非,主要是分清路线是非,大是大非;团结同志,就是要团结一切同志包括犯了错误和反对过自己的同志在内。

5 人小组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陕北和陕甘边的老同志也都能顾全大局,严格遵循分清是非、团结同志的方针。经过认真讨论,大家在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使这个问题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

关于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原陕北、陕甘边的党、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领导下,为中国革命立下了重大的功勋,两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后,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应当载入光荣的史册。

1935 年 9、10 月发生了错误肃反。当时,我们的党还没有脱离幼年时代,各方面都缺乏经验,同时王明“左”倾路线

正统治着全党，很难免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和干扰。因此，各革命根据地包括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都发生过一些错误和缺点，在这方面只有性质和程度的差别，没有有无之分。对于党史中有争论的问题，要从全局上、根本上来看，除了路线是非必须分清外，对其他具体问题的分歧，不要再纠缠不放。事情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了，半个世纪以来，大家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如果对具体问题的分歧争论不休，不利于团结前进。因此，应当把一切有碍于党的团结的争论，一概终止下来。至于在错误肃反中杀错了的人，应由中央组织部或民政部通知平反，也不要算细帐。大家一致同意，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党的历史，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来对待自己的历史。

关于错误肃反问题，大家也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大家认为，1935年错误肃反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产物，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王明控制的中央驻北方的全权代表派到陕北参加特委领导的同志，曾在那一段时间拥护和执行了王明“左”倾路线。这位同志表示，“陕北的‘左’倾错误我负主要责任。”大家都欢迎他的这种态度。几十年来，他已经接受了教训，勤勤恳恳地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有不少贡献。

最后大家认为，应当遵循毛泽东同志“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不要“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的教导，从事有关的党史研究。对陕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和错误肃反问题，都应以此取得的一致认识为准。凡不符合这个精神的

文件和文章,不要再扩散。

陕北、陕甘边两方 8 位同志联名写了一封信,对 5 人小组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意见表示了一致的拥护,全文如下:

“以李维汉、王首道同志为首的 5 人小组,为解决西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历史问题,作了大量的工作,解决了最主要的问题。他们向中央写的《关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报告是正确的,符合十二大精神和历史实际的。我们同意这个报告。

西北党和人民英勇斗争的实践证明,正确路线和团结统一,就是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最基本经验。今后,我们对西北历史问题将以此报告为准,在光辉的十二大路线指引下,以‘三大作风’为武器,重新学习和认识已往的历史事实,达到统一思想,更加团结一致,为实现伟大祖国的四化奋斗到底。”

中央于 1983 年 7 月 13 日批准了 5 人小组的意见,肯定这个小组“对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做了很好的工作,他们所提的方针是正确的,采取的方法是稳妥的。”关于错误肃反问题,中央在批示中指出:“我们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指出其错误的严重危害,另一方面必须看到产生这种错误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根源,看到事情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犯错误的同志也接受了教训,几十年来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不少成绩,不应再着重个人责任。”

在研究党史中有一些不同看法是难免的,我以为 5 人

小组采取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的方针,把争论双方的同志请在一起,敞开思想,实事求是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最终达成共识,这种做法是成功的。

根据中央部署 推进机构改革工作

1983年6月16日,在六届人大开会期间,我在京西宾馆与各地负责同志座谈,会上我通报了下一步机构改革工作的安排,谈了4个问题。

一、关于调整省属部委厅局和地市领导班子问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对调整省属部委厅局和地市领导班子一般都抓得比较紧。从已调整的情况看,厅局班子的人数减少30%至50%,平均年龄大多在50岁左右,大专文化程度所占的比例明显提高。北京、天津、河北、安徽、浙江、河南、湖南7个省、市的厅局班子中,大专文化程度的占50%以上。地、市班子,人数减少了30%以上,平均年龄由57岁多降到48岁多,50岁以下的占53%,大专文化程度的占44%。

目前,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要进一步把好政治关、年龄关、文化关。一定要把好政治关。这主要是说,“三种人”和反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路线的人,以及有各种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人决不能进班子,已经在班子中的要坚决清理出去。有些人虽不属“三种人”,但犯有其他严重错误、又不很好改正的,或

者思想品质不好,惯于闹不团结,没有责任心和事业心的,不能进班子,已在班子里的应当调整出去。此外,有一些德才平庸、无所作为的以及不讲原则的“老好人”,也不能进班子。对于有争议的人,要实事求是,把问题搞清楚,作出公正的评价,然后按照选拔领导干部的标准,确定是否进班子。对要害部门的领导班子,尤其要认真进行考察了解。

从前段的情况来看,有些地方年龄关、文化关还把得不严,对必须选拔年轻的、有较高文化和专业知识的干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新班子的年龄和知识结构没有达到中央的要求。各级领导班子都要选拔年轻的、有较高文化和专业知识的同志,不仅省委和省政府中要选拔一批,省属部委厅局和地市以及所属局和区县更应当成批地选拔。这样,才能做到陈云同志讲的成千上万地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

我们强调从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决不是“只讲文凭不讲水平”。主要还是看他们有没有真才实学和组织领导才能。

再就是,不注意安排党外人士,领导班子中女同志少,是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现在有10个省(市)、自治区政府中没有党外人士,应争取在今年内补上。

出现这些情况,主要是一些领导同志对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缺乏深刻的认识,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左”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此外,选拔干部还有派性或派性残余的干扰,总想照顾一派或安插亲信,而这些人往往并非德才兼备者。总之,各地党委和工作组一定要把好“三关”,决不能

有丝毫动摇。

第二、坚持走群众路线，民主推荐干部。

各地大都注意走群众路线，实行群众推荐和组织考察相结合。这是这次调整领导班子一个很突出的特点，不同于过去的习惯做法，确实有许多创新：（一）不是依靠少数人去发现、推荐干部，或者事先拿出名单让群众划圈圈，而是将政策交给群众，发动成千上万的干部推荐人才；（二）不是局限在党政系统中，而是扩大视野，注意从工矿企业、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等各行各业中，推荐和选拔党政领导干部；（三）不只是单纯地推荐人选，而是发动大家对整个班子的组成、谁去谁留、谁适宜担任什么职务提出具体意见；（四）不只是搞一次推荐就了事，而是采取多种方式，比如个别谈话，内外座谈，大小会议，“投石问路”，“几上几下”，反复地征求意见，严格筛选，最后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凡是坚持这样做的，各方面的反映都好，效果也好。这次调整领导班子走群众路线，可以说是新的历史时期大量发现人才、选拔领导干部的一种有效办法，也是改革干部制度的一项重大突破。今后调整各级领导班子都要这样做，并且要作为一项制度，逐步完善，长期坚持下去。

第三、妥善安排退出领导班子的老同志。

这次调整领导班子，有一大批老同志退出第一线。那些已超过离休退休年龄的老同志，要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妥善安排（主要是离休退休），并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还有一批不到离休退休年龄的同志，由于领导班子名额

的限制,这次也要退下来。安排好这批同志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安排的办法:年龄较轻的,鼓励和组织他们学习文化专业知识。年龄较大的,根据他们的特长,担任调研员等一类的职务,做调查或特约专题研究等工作;组织他们参加整党、调整领导班子、整顿企业、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等工作。只要领导重视,措施得当,解决好这个问题是并不难的。希望各地重视这件事,作些调查研究,召开座谈会,总结和交流经验,使这些同志各得其所,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加强领导,确保生产、改革两不误。

这次机构改革牵动全面,涉及到广大干部,许多人因去留未定,思想有些浮动。有些单位发生工作松懈、脱节,甚至出现乘机私分公物、吃吃喝喝、游山玩水、突击提干、安插亲友等不正之风。在4月12日书记处会议上,大家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强调既要抓好改革,又要抓好生产,坚决刹住机构改革中的各种歪风。如果不敢批评,不敢处理,必然败坏党的威望。

二、调整县级领导班子。县级机构改革是整个机构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抓得好坏,直接关系到省、地、市机构改革成果能否巩固,关系到今后整党工作和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这一历史任务能否顺利进行。县级领导班子是第一线的直接组织者和指挥者,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要通过他们去贯彻执行。一个省有几十到上百个县,机构改革牵动的面更广,涉及的人更多,工作更艰巨。因此,省、市、自治区党委一定要十分重视县级机构改

革,应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要像抓部委厅局和地市机构改革那样,精心指导,认真把关,保证善始善终地完成整个机构改革的任务。

配备县级班子,总的精神应当同配备地、市班子一样,即坚决按照精干的原则和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办事。核心问题是选拔一批德才兼备、具有较高文化和专业知识、能够开创新局面的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班子。据反映,县级班子组织不纯的问题,比省、地可能多一些,因此,要特别注意把好政治关。

县级班子的年龄结构要求。鉴于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任务极为繁重,领导干部必须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县级党政领导班子平均年龄 45 岁左右为宜。县委书记和县长一般不要超过 50 岁;县委常委和正副县长 40 岁以下的最好占到一半以上,还应有 30 岁左右的。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梯形的年龄结构。

县级班子的文化结构要求。县级党政班子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应占到 1/3 左右。有些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干部,既有真才实学又有组织领导才能的,应在选拔之列。没有达到高中文化程度的,一般不要新提拔进县级领导班子。选拔大学毕业生进县级领导班子,还要注意一条,即至少要有 3 年实际工作经验。

中央提出,争取在 1985 年县委书记和县长基本上具有大专文化程度。我想,这件事要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凡有条件的地方,争取达到;条件不具备的地方,争取 1985 年县

委书记和县长中有一人具有大专文化程度(包括自学成才,确实相当大专文化程度的)。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实现这个目标可以再推迟一些时间。现在的问题是,这一级干部中,文化偏低的比较多,应当积极选拔和培养一批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优秀中青年干部。我建议采取3条措施:一是从过去已在基层工作的大专毕业生中选拔。二是各省每年选调100至几百名应届大专毕业生和党政机关中年轻的大专毕业生到基层锻炼,几年后把他们中比较优秀的逐步提到县级领导岗位。三是选调一批有实际经验但文化程度较低的年轻同志去学习文化专业知识。

县委常委和正副县长的人数要求。县委常委设1至9人,其中县委书记1人,副书记2至3人。县长1人,副县长2至4人。县委和县政府可分别设顾问1至2人,最多不超过3人。人大、纪委等班子人数由各省拟定。要注意配备妇女干部和非党干部,多民族地区要注意配备少数民族干部。

三、关于加强省级党政领导班子自身建设的问题。这次新组成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班子,老同志占60%,新上来的同志占40%。新班子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搞好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当前最迫切需要抓好以下两条:

第一、老干部要大胆放手地让新上来的干部挑担子。

这次配备省级领导班子,在常委和正副省长中新进了多名中青年干部,其中有些已担任党委二、三把手或政府的二把手。如何大胆放手地给他们压担子,提高全面领导能

力,是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有些老同志,对新上来的干部仍然不敢大胆地放手使用,遇事总想让老同志唱主角,让新上来的同志当配角,怕他们工作抓不起来,甚至怕他们“不合手”、“不听话”,等等。这种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这种考虑问题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大胆放手地使用年轻人,无非是三种结果:一是新上来的干部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挑起了重担,做出了成绩。二是由于种种原因,挑重担比较吃力,步子迈得不大,局面一下子没有打开。三是他们在工作中出偏差,捅乱子。三种情况,第一种可能占多数,第二种可能占少数,第三种肯定是个别的。这次新进班子的200多名干部,大多是好中选优,符合德才兼备的标准。他们经过了10几年,以至30多年的锻炼和考验,完全应该充分地信任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老同志大力帮助新上来的同志克服这些困难和阻力。即使新上来的同志在工作中出点纰漏,也不要紧,可以说这也是很难免的。新上来的干部在工作中犯点错误,只要及时指出,并且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总结教训,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如果经过实践考验,有的干部确实不称职,那时候再调整也来得及。

大胆放手地使用年轻干部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历史任务,需要新老几代人的合作才能完成。从发展的观点看,特别需要年轻的一代人继往开来,敢于创新,敢于改革,开拓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当然,新上来的同志要谦虚谨慎,尊重老同志,严格要求自己;政治上要同中央保

持一致,不要自行其是;要讲党性,不搞派性;要勇挑重担,不回避矛盾,注重调查研究,不浮在上面;处理同志间的关系和个人生活及亲友的问题,要讲原则,不要有庸俗作风,不要向党伸手。现在,发现有个别年轻干部提升后,不那么讲党性、讲原则,如有的要求提拔亲友,争生活待遇,这是很不好。好在组织上没有迁就,并且进行了批评,这才是真正的支持和爱护。如果满足这种要求,反而是帮了倒忙。

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提起来的年轻干部,要让他们在其位,谋其政,经过一两年就能干起来了。如果我们再不抓紧选拔,不放手使用,那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第二、新班子一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和优良传统。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凡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好的时期,党内生活就正常,干部的心情就舒畅,大家的积极性就高,革命和建设就取得胜利。也有一些时候,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执行,直至破坏民主集中制,造成了严重后果。

现在党中央的政治生活是正常的,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心情舒畅。不管谁讲的,都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中央做了决定,大家认真贯彻执行。正因为有了这一条,才保证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紧密团结,卓有成效地领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顺利地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经过省级领导班子调整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比较注意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了,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

但也有少数地方执行得不好,甚至很不好。有的领导同志还是喜欢搞“一言堂”,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能够团结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如本人不到场,别人不那么敢解决问题;集体决定的问题,有时个人可以随便推翻。个别地方“一言堂”的现象有可能更加发展,因为一大批老同志退出了领导班子,敢于讲些不同意见的同志相对少了,而新进来的大多是自己的老部下,更便于发号施令,这样,不仅打不开新局面,而且培养不出人才,甚至会埋没、压抑人才。特别是现在有些领导班子还存在程度不同的不团结,有些是原则是非的争论,有些是在干部的提拔使用和处理上有争议,有些是个人之间的恩怨或误解,有些是派性的纠缠,等等。这些问题的正确解决,也有待于民主集中制的进一步加强。加强民主集中制,我们既要反对“一言堂”,又要反对遇事推诿、不负责任的现象,一定要严格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是集体决定的事,要坚决去办;凡属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应当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地把它做好。对这个问题,希望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特别是党、政一、二把手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各自认真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制定一些必要的措施,真正做到像中央所要求的,“新班子在民主生活方面有一个崭新的气象”。

四、关于“第三梯队”建设问题。最近中央提出,为了使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连续性和继承性,必须从现在开始抓“第三梯队”的建设。就是说,要选拔一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具有较高文化和专业知识的

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从现在开始就抓紧“第三梯队”的建设,到明年7月份,共选出1000人的名单。平均每省20人左右(大省20多人,小省10多人),共600人;中央和国家机关每个部委5人左右,共400人。这项工作每3个月要检查一次。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第三梯队”人选的年龄,我们意见,掌握在40岁左右和45岁左右这样两批人为好。这些干部经过一段时间锻炼,准备逐步选拔到中央各部和省级领导岗位上来。通过这次调查领导班子,各地采取群众路线的办法,推荐了成千上万的中青年干部,这是抓好“第三梯队”建设的一个有利条件。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党委组织部门认真落实,抓紧组织力量考察了解,圆满完成中央提出的这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

贯彻中央正确方针 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1984年9月,我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派,率代表团到南宁参加广西民族团结表彰大会。大会后,我听了区党委和整党联络员小组的汇报,同一些同志交换了意见,在区党委召集的干部大会上,对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工作发表了一些看法。

广西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个特别重灾区,死了不少人。

广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非常强烈地、迫切地要求解决广西“文化大革命”遗留的问题，同时全国各地也重视和关心广西问题的解决。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甚至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后，仍有一部分同志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解决问题的措施不够得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在认真研究了广西的情况之后，采取了果断措施，对一些干部实行停、免、撤和回避的做法。采取这种做法，对于打开处理遗留问题的局面，平反冤假错案，缓和干部、群众以及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情绪，是非常必要的。在执行过程中，曾发现停、免、撤的面大了一些，中央又及时提出要适当控制。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想完全控制是很难做到的。有些同志讲，这就像涨洪水一样，上游关了闸，但下游还在涨水。事实上，广西的问题那么复杂，要求处理遗留问题的工作十全十美，不出一点缺点和偏差也是不可能的。后来，中央又根据广西的特点，提出了“问题要解决，局势要稳定，稳妥坚实，稳步前进”的方针。广西在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主要是区党委坚决执行了中央的各项指示，做了大量深入、细致、艰苦的工作。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的人主动登门向苦主、受害者本人或家属进行赔礼道歉，特别是在农村普遍采用了这种方式。这是群众的创造。采取这种方式，取得了广大受害者和家属的谅解，起到了消除隔阂、弥合伤痕的好作用。实践证明，群众是懂得大局、顾全大局的，人民群众的这一创

造对于广西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工作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广西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涉及的人多，情况又十分复杂。因此，在工作中坚持了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原则，严格掌握政策界限。尽量不牵连太多的人，否则不能团结大多数。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死人比较多。正是因为如此，对死者加上受害者家属一定要处理好，不处理好就不能安定团结。同时受牵连的人也多。如果不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面搞大了，在处理时搞过了头，同样也不能保持安定团结。当时有一部分人说处理过头了，有一部分人说处理还不够，我说这正说明区党委在掌握上是比较稳当的。如果意见一边倒，只有一部分人满意，恐怕就有不妥之处了。

在处理人的时候，坚持该处理的必须坚决处理，但一定要证据确凿，光听说不行，要真正有人证物证，有名有姓。切不可不负责任地听信传说就下判断。另外，也要尽快解脱犯有错误和一般错误的干部。不处分的是解脱，实事求是地给予一定的处分，也是解脱，都有利于安定团结。一些犯了错误受到处分的同志有委屈情绪或者不满意。我说，应该看到你总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或者与杀人有牵连。别人受害甚至死了人，你受点处分还有什么委屈的呢？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只要检讨就应该欢迎。过去“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检讨多少年，就是两条，第一条检讨不深刻，第二条态度不好。挨斗的时候，最后或是四个字，或是八个字。第一个是“态度不好”，第二个是“态度恶劣，顽固不化”。我们不

能搞“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对人家的检讨最后总要来一个“不深刻”。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检讨了就好，不深刻应该找他们谈心，帮助他们检查得深刻一点。通过谈心再进一步让他认识错误。最后，我要求大家支持区党委的工作。我说：“解决广西的处理遗留问题工作，时间紧迫，政策性强，难度很大，工作量也十分大，要真正搞好很不容易。但只要大家统一思想，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搞好也不是太难的。老实讲，如果把我调到广西来做处理遗留问题的工作，也不一定做得很好，甚至可能不如现在的区党委搞得好的。所以大家要体谅他们，支持他们。我们有些同志不在第一线工作，往往体会不到工作难做。”

广西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遗留问题，中央反复研究过多次，有过许多具体明确的指示，区党委作了大量的工作，广大干部、群众顾全大局，通情达理，比较妥善地处理了难度很大的许多问题，以后没有出现大的反复。10年过去了，回过头去看，总的来讲应当说是成功的。

宣布河北领导班子换届 强调省委领导核心团结

1985年初，河北省委要换届，省委经过民意测验，就省委、省顾委和省纪委委员的组成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省委委员平均年龄49.94岁，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62.8%。12名省委常委平均年龄55岁，比原来下降4.4

岁,其中50岁以下的有4名。中央研究后同意省委的报告,同时指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原先省委的领导核心在团结上存在一些问题,使河北省的工作受到一定影响,因此换届后一定要特别强调加强党内的团结,特别是省委领导核心的团结。中央决定派我到石家庄传达中央的意见。

我5月19日到达石家庄,20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省委、顾委、纪委、政府、人大、政协6个班子主要负责同志34人参加,我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的决定。还分别与12位同志谈了话,同他们交换意见。我在会上和个别交谈中,着重讲了加强团结,特别是加强省委常委一班人的团结问题。遵照中央指示精神,我首先充分肯定了在以高扬同志为首的河北省委领导下,河北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指出,河北省有个进一步增强团结的问题。我说,解放初期我进云南的时候,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同我谈话,说进云南后的方针是“团结第一,工作第二”,要把团结放在第一位。开始我感到似乎有点矛盾,工作应当放在前面哪,怎么能把团结放在第一呢?我们坚决按照中央的指示去做,才逐渐认识到这个提法不仅不矛盾,而正是辩证法,完全符合云南当时的实际。实践证明,中央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当时是各方面的同志会师在一起,有南下的部队,有地下党,有边区纵队,还有从山东、河北、延安等地选调的一部分同志,作风不完全一样,工作经验也不完全一样,需要强调团结。而“文化大革命”后,不少省在团结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另一种情况,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问题。如对某些问题、某项工作的看

法,特别在对一个同志的看法上,某些人说好得不得了,又有些人说坏得不得了。两种极端的看法,都不科学,对一个人总得一分为二。因此,当前特别需要强调团结,领导核心的团结,特别是一、二把手的团结显得更加重要。大家都表示同意我讲的这些意见。

我还看望了退居二、三线的军队和地方的 100 多位老同志,同他们进行了座谈,希望他们支持新的领导班子的的工作。老同志们都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坚决支持新班子的工作,齐心协力地把河北的工作搞好。

以邢崇智同志为首的这一届河北省委领导班子一直工作到 1990 年换届。

呼吁全社会重视 青少年思想工作

我是青少年工作的热心分子,在中央组织部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时,经常同一些年轻干部接触和交谈,参加一些青少年的集会,并多次与热心于青少年工作的同志们交换意见。在此基础上,我写了一篇题为《关于青少年思想教育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在征询一部分同志的意见之后,发表在 1984 年 8 月的《红旗》杂志上。文章中提出了 5 个问题。

一、青少年思想工作面临的新课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到了经济建设方

面,但我们还不善于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思想工作,使它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由于采取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一系列重要政策,特别是各条战线兴起的改革,使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青少年中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而我们对此缺乏准备,思想工作缺乏预见性和针对性,显得有些软弱无力。我们还往往习惯于照搬一些在新形势下不尽适用的老办法,习惯于一些形式主义、简单化的东西,脱离青少年的思想实际,思想教育的效果比较差,等等。因此,努力克服工作中的不足,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青少年思想工作,使青少年一代健康地成长起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一项战略任务,应当引起全党和全社会的重视。

二、当代青少年是大有希望的,完全可以信赖的。我国的青年人数在3亿以上。他们中间很大一部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成长起来的,目睹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使我们国家遭到挫折和损失的严重状况,亲身经历了战胜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伟大斗争,亲眼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各项工作重新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日益改善的大好形势。他们从正反两个方面的鲜明对比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长于思考和探索,较少盲目性,这是八十年代青年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们由衷地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各项工作中。精力充沛,思想敏锐,接受新事物快,较少保守思想,勇于改革,敢于创新,

是八十年代青年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在党和国家大力号召和组织下,青年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习热潮,渴求知识,勤于学习,是当代青年的又一个重点特点。在充分肯定主流的同时,也要看到他们的不足。如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容易产生片面性和简单化,不善于团结更多的人一道工作,实际经验缺乏等等。还要看到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受“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极“左”思想和其他错误思想的影响比较严重,对社会缺乏责任感。但是我们有两个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掌握青年一代;我们也坚信,青年一代是积极向上,追求真理的,他们也一定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

三、培养能够开创新局面的一代新人。新时期思想教育的中心任务,是使青年一代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把他们培养成为能够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一代新人。这一代新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呢?他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念,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时代赋予的使命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掌握现代化科学文化知识,具有现代化的管理才能。他们是思想解放,视野开阔,勇于探索,善于创新的闯将,又是脚踏实地,百折不挠,善于团结广大群众的实干家。由于历史的原因,相当一部分青年没有接受过系统思想政治教育,对各种错误思潮缺乏辨别和抵制的能力。因此,有计划有系统地向青年进行这方面的教育,是一项迫切任务,也是培养和造就一代新人必不可少的基本

建设。当前要特别强调和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而培养和造就一代新人最重要的办法是大胆起用年轻干部,给他们压担子,让他们在第一线上锻炼。各条战线的改革是一所大学校,广大青年在这所学校里可以得到锻炼和提高。

四、启发引导,疏通思想,注重实践。应当经常到青年中去,以同志式的平等态度同他们交朋友,摸清他们的思想脉搏,密切结合青年人的思想实际,用生动活泼、青年人乐于接受的方法,引导他们经过自己的学习、思考和实践,自觉地接受党的路线、方针,逐渐学会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对青年中发生的错误思想和行为,要循循善诱,疏通思想,不要简单地斥责和禁止。譬如治水,只依靠筑堤防堵,不能真正达到治理的目的。加强上游和沿岸的林木植被,防止水土流失,同时把河道加宽加深,增强疏导的能力,就能使河水畅通,变害为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认识真理的重要途径。要为青年提供实践的机会,鼓励他们向社会和人民群众学习,使他们在实践中开阔视野,丰富知识。先进人物的形象和事迹对青少年的成长有重要影响。典型人物的宣传要着眼于大多数青年,使他们觉得真实可信,可亲可学,切忌任意拔高和偶像化。

五、从少年儿童抓起。现在的少年儿童,大多数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受到国家和各方面的关怀,对他们的健康成长十分有

利。但是，社会上的一些错误思潮和不良风气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孩子们。不少家长对独生子女娇生惯养，缺乏严格和科学的教育。在少年儿童中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有些孩子自私心理比较重，集体观念、互助观念比较淡薄，劳动观念比较差，等等。少年儿童时期是打基础的阶段，抓好这个阶段的教育，从小培养孩子具有健康的思想意识和良好的习惯，对他们以后的成长有重要的意义。要十分重视学前教育，办好幼儿师范学校，大力培训教养员、保育员，提高学前教育的水平。要为少年儿童提供他们喜爱的读物、电影、歌曲、戏剧和电视节目等，多开辟活动场所。提倡离休、退休的老同志多做少年儿童的工作。

文章最后呼吁全社会特别是共青团、教育部门、工会、妇联等，以及所有从事青少年工作的同志们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工作，使青少年一代健康成长起来。

实地考察榆林地区 建议重视防沙治沙

1984年10月底至11月初，我经西安到延安。抗日战争时期我一直在前方打仗，没有机会到延安。这是我第一次到革命圣地——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全国抗日战争的中心，参观了许多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受到了很大的教育。然后，从延安到陕北的榆林。榆林也是革命老根据地，1935

年长征到达陕北后我曾在这一带打过仗。在榆林，我专门考察了当地造林治沙的情况。榆林广大干部和群众经过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在治沙工作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京后，我向中央写了关于榆林地区治沙情况的报告，并建议中央在可能的条件下，从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对治沙工作给予更多的支持。

榆林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北部，毛乌素沙漠南缘，古长城横贯其间。长城以北是风沙区，面积约 2560 万亩，占全区总面积的 37%。据记载，历史上这里曾是林草繁茂的农牧区，秦汉时水草丰美，羊群塞道，土地肥沃。隋唐以后由于过量垦荒和频繁的战争，植被大量破坏，沙化日趋严重，大片流沙南移。解放前 100 多年里流沙吞没农田、牧场各 100 万亩，有 6 个城镇和 400 多个村庄被风沙侵袭和淹没。1949 年全区植被覆盖率仅为 0.9%，流沙已越过长城 10—15 公里，并以每年 3—8 公里的速度步步向南紧逼，形成了沙进人退之势。更为严重的是，风沙破坏了生态，使气候恶化，对农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沙进人退，风沙起而农牧衰，是大自然对人们违背自然规律的惩罚。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积极组织广大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治沙运动，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收效不理想。30 年来，榆林地区依然多灾贫困，长期依靠国家救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业各项经济政策的逐步落实和放宽，榆林地区的植树种草、治沙也走上了比较自觉、有效、扎实的发展轨道。胡耀邦同志 1980 年 8 月到榆林

地区,根据这里的特点提出了“农林牧全面发展”,“大种林草、治穷致富”的战略思想。

4年多来,榆林地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和胡耀邦同志的讲话精神,把造林治沙做为改变落后面貌、治穷致富的战略措施。他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以个人、家庭承包为主的方针,积极发展家庭林牧场。注重科学,讲求实效。这些,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大大加快了植树种草、治沙的步伐。每年造林 200 万亩,存活率达 70%。到 1983 年底全区累计造林保存面积约 1400 万亩,比 1978 年增长 58%。黄河沿岸建设了 270 万亩红枣林带,公路沿线建设了 17 万亩苹果林带。植树种草起到了固沙防风的效果,对生态、气候和农牧业生产产生了综合效益。全区 862 万亩流沙面积已基本固定 300 万亩,半固定 250 万亩。林带林网保护农田 100 多万亩,荒沙变良田 52 万亩。全区植被覆盖率从 1949 年的 0.9% 提高到 21%,平均风速降低 49%,林地气温夏天降低 2~3℃,冬天上升 1~2℃。水土也得到了保持,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从建国初期的 5.16 亿吨降到 3 亿吨左右。小气候的改善为农业增产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畜牧业所需的草场和饲料,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增加了经济收入,每年林业收入 8600 万元,林草种籽收入 1000 多万元。

我参观了榆林县红山、古城滩等几个造林种草治沙的现场。红山是一块 7 万多亩的沙地。现已种植林、灌、草 3 万

多亩,主要有苹果、踏郎、宁条、紫穗槐、沙打旺等。县委书记石海源告诉我,这3万多亩林草用了大约15年的时间,主要是1980年以后搞起来的。采用水治和植治相结合的办法,即先引水拉沙,变沙丘为平地,然后植树种草,固沙改土。他说,胡耀邦同志1980年曾到达这里,想看看“沙打旺”,但是当时“沙打旺”还没有长起来,未能看到。而今“沙打旺”一望无际,苹果树也已成林结果。虽是深秋季节,依然是枝叶繁茂。“沙打旺”是一种豆科草本植物,耐干旱,根系特别发达,固沙能力强,因而得名“沙打旺”,现全县已种植约20万亩。在谈到下一步打算时,这位县委书记说,红山所剩的3万多亩沙地再有3年即可全部得到治理。他信心十足地表示,任务是艰巨的,但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为我们积累了好的经验,有了更科学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有了能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政策。

据地委的同志介绍,榆林地区已制定规划,决定加快全区造林治沙的步伐。从今年起,每年造林250万亩,种草200万亩。到1990年,全区造林累积保存面积2,200万亩,人工种草保存面积500万亩。把林草覆盖率从现在的21%提高到50%以上,实现人均9亩林、2亩草。这个目标实现以后,榆林的自然环境将会有较大的改善,人民生活和农牧业生产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榆林地区植树种草治沙的工作已经上了路,近几年来有长足的进步,今后发展速度会更快。治理风沙,改善生态是一项造福子孙后代的事业,需要几代人长期不懈的努力。

榆林人民现在付出的辛勤劳动,不仅近期对改变该地区的贫困落后面貌有重要作用,从长远讲将使世代受益。这种“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精神,应该受到特别的赞扬和鼓励。

风沙对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危害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的一个问题。我国在治沙科研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也出现了不少像榆林地区那样的治沙先进地区,受到国际上的重视。但就全局来讲,这个问题远未解决,许多地区主要是西北、内蒙古、东北七八个省直接受到风沙的危害,许多贫困县在风沙区。据有关同志介绍,全国每年沙化面积约 1000 平方公里,足见问题的严重。如果中国把这件事做好了,不仅有利于风沙区群众的脱贫致富,而且对世界上其他有风沙危害的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胡耀邦同志看了我的报告后,于当年 11 月 21 日批示:“此件转杜润生、何康、杨钟同志阅后转新华社:榆林地区治沙,据我所知是全国最好地区之一,值得在《内部参考》上介绍一下。北京地区还没有解决风沙和环境绿化问题。要决心要两市(北京、天津)三地(张家口、承德、唐山)统一规划一下,继续实行大力种树种草,实行乔、灌、草结合播种方针,力争本世纪末彻底改造首都周围环境。希望林业部和农牧渔业部将这件事作为一个问题直接抓一下。”

1989 年 5 月我到兰州时,专门去参观了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听了该所的专家在艰苦条件下执着地进行治沙方面的研究并取得重大成就的介绍,感到十分钦佩。回京

后,我再一次向中央建议重视和加强我国的防沙治沙工作。此事得到了陈云同志的支持。

由于中央的重视,此后召开了全国防沙治沙工作会议。1994年林业部又将全国防沙治沙工作列为该部重点抓好的7大工程之一。

呼吁治理大江大河 改善生态环境造福后代

1984年,我出差到四川。离川时从重庆坐船到宜昌。30年前大区撤销后我曾随贺龙同志坐船沿长江东下。1984年的长江水比起五十年代来混黄得多了,使我深感忧虑。回北京后,我查阅了一些资料,确认长江的含沙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多年来长江中上游的水土流失失控造成的。我向中央写报告恳切陈词,建议中央和有关部门重视和抓紧治理长江中上游的水土流失问题。在报告的最后写道:如果长江中上游的水土流失任其发展,长江有可能变成“第二条黄河”。报告中说,“当然,这是极而言之”。我建议中央和有关部门要下决心用几十年的时间,坚持不懈地治理好大江大河,搞好各支流的小流域治理,造福后代。之后,我又通过多种渠道,口头和书面向中央提出上述意见。1987年我给国务院负责同志的信中再次建议:“长江上游中游水土流失的治理问题,我非常担心。从现在起应再一次督促有关省市和长江上游和中游的各县狠抓长江支流区域

的治理,争取在一定时期内做出成绩,使长江之水由黄变清。”中央和有关部门对此事很重视。水利部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专门向国务院写了报告。

1987年7月,原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在北京召集四川、云南、贵州、甘肃4省和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专家,专题座谈了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问题。同年12月,水电部决定成立长江水土保持局,并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协同有关省着手编制水土保持总体规划。

1987年11月,国务院负责同志专门听取了水利部关于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问题的汇报,并决定采取如下重要措施:(一)确定长江上游水土保持方针为“因地制宜,综合治理;防治并重,以防为主;重点突破,积极推进”。把预防保护放在首位,决不再走“先破坏后治理”的老路。(二)在搞好预防保持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重点治理,首先抓好4片重点防治区的10余万平方公里的治理,第一批集中抓61个县,水土流失面积7.5万平方公里,以小流域为单元,按项目实施管理,1989年开始实施,各省正在编制小流域综合治理规划。(三)在主要依靠群众劳动积累和地方集资的基础上,国家给予必要的扶持,从1989年起,每年拿出5000万元用于补助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治理。(四)加强组织领导。为与开展重点防治工作相适应,重点地区的各级要健全水土保持机构,建立监督体系和技术服务体系。

1988年4月,国务院批准将长江上游列为全国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区,并将金沙江下游及毕节地区、嘉陵江中下

游、陇南地区、川东鄂区三峡库区 4 片,列为第一批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区,并批准成立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委员会,组织协调有关防治工作的重大问题。同年 9 月,在成都召开了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第八章 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

1985年，我年已七十有六，日益感到精力不济，难以坚持第一线的繁重工作，我便找王震同志商议。王老与我是同乡，都是湖南浏阳人，大我一岁。我说：王老，现在我感到很吃力，如果再在第一线干下去，许多事情都力不从心了，真是年龄不饶人哪！我想尽早退下来，腾出位子，让给合适的比较年轻的同志。你看怎么样？王老听后高兴地说：好啊，我也早有此意，现在不少年轻同志干得不错，我们这些到了古稀年龄的老同志，应该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央关于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号召，促进领导班子的年轻化。我们两人很快达成了共识。

与王震同志联名上书中央 主动要求退出第一线

1985年6月25日，我和王震同志联名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内容是：

中央

自中央提出改革干部制度，废止实际上存

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以来,全国已有100多万老同志响应党的号召,自觉退居二、三线,绝大部分已离休、退休,一大批精力旺盛、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先后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他们在老同志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帮助下,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工作做得很好,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年轻干部在各级领导班子里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标志着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我们党的事业大有希望。作为老党员,我们感到由衷的欣慰。

我们党是个大党,当前肩负着领导10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使命。小平、陈云等若干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留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里,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全局的需要,是保持国内安定团结和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的需要,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我们是七十六七岁的人了,虽然雄心犹在,毕竟精力不如从前了。现在成千上万的年轻干部,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正在迅速成长。唐代杜甫有两句诗“古来有老马,不必取长途”。我们年已过限,且身体不好。党章第37条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

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我们恳切请示中央，在9月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上批准我们不再担任中委，以腾出位子，让适合的年轻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1982年7月，小平同志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强调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的同时，明确提出经过一个过渡阶段，要建立起正常的退休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我们认为，老同志应当带这个头，正如中央领导同志讲的，在我们这一代就立下一个规矩：到了规定的退休年龄，除了少量确因工作需要经组织批准留任者外，统统退下来。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废除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带头这样做了，就能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顺利地实现新老干部的交替，保证我们党的正确路线、方针的连续性，保证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

王 震 宋任穷

1985年6月25日

党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要求。在1985年9月18日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我和王震同志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1985年9月20日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王震、李一氓、李德生、黄镇和我，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王震同志和我还当选为中央顾问委

员会副主任。并经党中央全会批准。

从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以后，我就从第一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开始了第二线当顾问的新的生涯。

成立顾问委员会 是邓小平同志倡议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年龄偏大。对于我们干部队伍和各级领导班子年轻化的问题，中央早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就提出来了。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研究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问题时，邓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就作了重要讲话，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他说：中央已经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这样，就可以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选举产生了172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大批原先在中央、国务院、军队系统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政府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并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老同志，如：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王平、王首

道、伍修权、刘澜涛、江华、李井泉、肖克、肖劲光、何长工、宋时伦、陆定一、陈锡联、段君毅、耿飏、姬鹏飞、黄火青、粟裕、程子华、傅钟等率先垂范地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位，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开创了新老干部交替与合作的进程。这一届顾问委员会的主任是邓小平同志，副主任是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同志。

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又有56位同志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经过这次会议的增选和调整，以及有些同志已经逝世，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常务委员的名单如下：

主 任：邓小平

副 主 任：王 震 薄一波(常务) 许世友

宋任穷

常务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平 王 震 王首道 邓小平

伍修权 刘澜涛 江 华 许世友

李一氓 李德生 肖 克 宋任穷

宋时轮 陆定一 陈锡联 段君毅

耿 飏 姬鹏飞 黄 镇 黄火青

程子华 薄一波

任中顾委副主任 协助薄一波同志工作

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结束以后不久，我就到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协助薄一波同志主持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这时，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不过3年，各项工作已有条不紊地走上了轨道。

一、“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性质、任务、成员的条件，包括选举产生的程序、任期，均已作了明确的规定。党章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必须具有40年以上的学龄（到1982年），对党有过较大贡献，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威望。同时还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每届任期和中央委员会相同。它的常务委员会和主任、副主任，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并报中央委员会批准。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产生（“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此款作了修改）。党章还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它的副主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中央政治局认为必要的时候，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也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对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任务，党章也作了明确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的

领导下进行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党章的明确规定,使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各项工作有了依据。

二、邓小平同志对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原则、工作方法从一开始就作了明确的指示。在1982年9月13日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在谈到中央顾问委员会今后的工作怎样做、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明确指出:今后中顾委工作,首先就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因为,我们的牌子大、牌子硬。一个是40年以上的党龄,一个是老上司。我们的态度正确,对于推动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的工作,很有好处。但是,如果我们搞不好,也会妨碍他们的工作。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真正起到党章规定的“助手和参谋”的作用。要注意起传帮带的作用,而不是去发号施令。其次是,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一定要联系群众。他要求除了身体不好的同志以外,凡是还能做点工作的,是不是联系一个或者几个基层单位,深入地了解情况,这就可以对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同时,他还要求中顾委的委员经常把国家的建设情况和对外政策、党在每个时期采取的方针、政策和要解决的问题,及时地给群众讲讲。可以讲现在的问题,也可以讲历史。作报告本身就是传帮带。第三,我们还可以起个作用,就是以身作则,搞精神文明。他说:“精神文明关键的问题,

就是以身作则。我们老同志下去，不管是什么身份，讲话是很有份量的，所以讲话要注意慎重。总之，在工作方式上，一定不要发号施令。”邓小平同志这个讲话，对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根据“十二大”党章的规定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在薄一波同志的主持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开创性的工作。首先，制定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暂行规定》。在“暂行规定”中，从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了中顾委的工作方针是“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其次，对在京100多名委员分别编为6个支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以后，改编为7个小组），统一学习，统一过组织生活。但委员的生活、供给关系一律不变，由原所在单位负责。第三，在内部相应地建立了一些必要的制度。如：（1）学习制度。原则上每两周过一次组织生活，或学习党的文件，或交流思想和心得，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顾委委员一直较好地坚持这一制度，会上都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党内生活很活跃。住在外地区的委员，分别编成华东、中南、东北华北、西南西北4个组，每年集中学习一次，平时参加所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的学习。（2）请示汇报制度。委员在学习讨论中反映的重要情况，提出的建议和意见，都编成简报，及时向中央反映。对讨论中涉及的重大问题，专题向中央报告。（3）报告会制度。根据形势的需要，不定期地组织报告会，请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来作

报告,使大家及时了解国内外形势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准备采取的措施和对策。(4)调查研究制度。除了身体不好的以外,委员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可以到自己过去长期工作的系统和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也可以选择一两个基层单位进行蹲点调查。委员们的调查报告,由中顾委办公厅刊登于内部刊物《通讯》,印送中央和有关部门参阅。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中顾委委员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很重视。第四、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中顾委建立了一个短小精干、有办事效率的工作机构。虽然只有 20 多人,在荣高棠、李力安两任秘书长的带领下,大家兢兢业业地为老同志服务,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中顾委这几年,我的任务就是遵照党章的有关规定和邓小平同志讲话精神,协助薄一波同志做一些工作,一波同志外出或身体有病时,中顾委的日常工作由我主持,事后向一波同志报告。

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以后,党中央对中顾委的工作一直十分重视。1990 年 12 月 25 日,江泽民总书记到中顾委看望了列席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的全体中顾委委员,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希望中顾委委员和其他老同志在保重身体、量力而行的前提和原则下,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教育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李鹏、乔石等同志也到中顾委向大家通报过有关情况。在党的十四大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体成员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中顾委全体委员

并共进午餐。江泽民等同志对中顾委的老同志表示敬意和慰问,感谢老同志对党中央工作的支持。

召开省、市、自治区顾委主任会议 贯彻小平同志对顾委工作的指示

1986年上半年,有一些省、市、自治区党的顾问委员会,陆续向中央顾问委员会反映,希望中顾委能出面召开一个会,建立一些必要联系,以便沟通情况,交流工作经验,进一步做好省、市、自治区一级党的顾问委员会的工作。起初,薄一波同志和我商量,考虑到中央顾问委员会同省、市、自治区一级党的顾问委员会组织上没有隶属关系,这个会不好开。后来,考虑到邓小平同志关于中顾委工作怎么做,做些什么事情的讲话精神,对省、市、自治区一级顾问委员会同样适用,再者,听听各地的情况和经验,对改进中顾委的工作也有好处。因此,经报请党中央批准后,于1986年6月30日至7月4日在北京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的顾问委员会主任座谈会。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20个省、市、自治区的顾委主任(西藏、贵州没有设顾问委员会),和广州、西安、重庆、南京、沈阳、武汉6个市的顾问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共58人。会议开了5天。由王震同志主持,薄一波同志围绕怎样进一步做好顾问委员会的工作,作了重要讲话。通过讨论,大家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交流了经验,也提出了一些问题。

在7月4日的闭幕会上,我针对讨论中提到的一些问题,讲了4点意见。讲话全文是:

“我完全同意一波同志六月三十日的讲话。

这次会,开得好,也可以说开得很好。省顾委的同志早就希望开这个会,都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会上,大家积极发言,热烈讨论。应当说,达到了建立联系、互通情况、交流经验的目的,这有助于今后进一步做好顾委的工作。

对一波同志的讲话,大家都表示同意。一致拥护讲话中传达的中央和小平同志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认为完全切合全国和各地的实际情况。一波同志就做好顾委工作提出的3点希望,大家认为,讲得很中肯,有指导意义。一波同志的讲话,是这次会的主要文件,待上报中央审定后,正式下达。

下面,我就讨论中提到的几个重要问题,讲点看法,和大家交换意见。

第一,关于党委领导。许多同志都强调指出,摆正顾委和同级党委的关系,这是做好顾委工作的重要保证。大家知道,按照党章的规定,顾委是同级党委在政治上的参谋和助手。顾委不是和同级党委平行的,是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从大家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当地党委对顾委工作是重视的,顾委也注意把自己的工作置于同级

党委的领导之下,也就是说党委和顾委都是遵照组织原则行事的,关系是正常的。今后顾委应当经常注意,重大问题该请示的一定要请示,该汇报的一定要汇报。

对新班子要积极支持。各级新班子,是经过党组织多年的考察,并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践证明,新班子的成员绝大多数是胜任的,不称职的是极少数。我们要充分信任、尊重和支持新班子,让他们放手去干,应当相信,新班子会比我们干得更好。我们说,不要妨碍和干扰新班子的工作,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不应当从别的意义上去理解。据说,有的退居二线的老同志,一听到“干扰”二字就有反感。要看到,只有不干扰,新班子才能大胆、放手地进行工作,这本身就是政治上对新班子的很大支持。我很赞成原沈阳市委第一书记李涛同志去年4月离任前讲的3点:一、不当幕后指挥,坚决不干预市委新班子的工作;二、不再享受在职待遇;三、闲不住,搞点调查。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现在,绝大多数顾委委员也都很注意这个问题。开始的时候,有的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列席省委会议,逢会必讲,每讲必长,个别同志甚至行使“否决权”,这样做对谁都不好。目前这种情况很少了,但是还有,值得很好注意。会上,有的同志提出,有些重要的会议,顾

委的同志可以列席,但不一定大小会议都到,这对老同志来说也可以减轻负担。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有的同志讲到,他们那里有两个“生怕”:一是新班子生怕对老同志尊重不够;二是老同志生怕对新班子支持不够。依我看,顾委的老同志谨慎一点有好处。顾委的牌子大,又是老上司,一不注意,就容易发生干扰的问题。

当然,我们希望谨慎些,不要干扰,这决不是提倡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对一个老共产党员来说,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从爱护干部的愿望出发,在适当场合,采取适当方式,提出批评和工作上的建议,这不是不支持,更不能说成是干扰。但是,说话要有根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如一波同志讲话中所说的,“重要的情况,要兼听各方面的意见,弄得准确些,尤其是涉及到人的问题,要慎重,不可轻易表态。”还应当说到,有位刚从一线退到顾委的同志告诉我,有些话党委讲不大方便,由顾委的同志来讲要方便些,他们这样做了,效果很好。我认为,这也是顾委对党委工作的重要支持。

第二,关于工作原则。中顾委成立时,提出“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作为自己的工作原则。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工作原则是切合实际的。应当指出“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这个工作原则,是由顾委的性质、任务决定的;是从顾委的实际出

发,带有它的特点的。大家都知道,顾委是个二线的过渡性组织,这是它的性质;顾委也有权,就是建议权,而不是发号施令的指挥权,这是它的任务,或者说权限;顾委是老人会,绝大多数委员都退出第一线领导岗位了,这是它的特点;顾委委员要会当,要超脱,这是它的基本工作方法。上面说的这些,都是同第一线有根本的或者显著的差别的。因此,我们的工作原则理应同这种状况相适应。从实际情况看,实行这个工作原则,对各方面都有好处。

有些刚退下的同志,年龄、身体都还可以,总想多做一点事情,想闲也闲不住,这种事业心和责任感,应当充分加以肯定。从组织上来说,如小平同志早就讲过的,我们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能使一切确定还能为党做工作的同志不工作。从会上介绍的情况看,目前不少委员,还都担负着一定的实际工作。现在的问题是,应当从实际出发,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逐步适应已经变化了和正变化着的情况,即:从一线的指挥员变为身居二线的参谋、助手,而且还将过渡到离休。大家知道,陈云同志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能多做”。这句话,是就工作和健康的关系讲的,是对老同志们说的,很值得退居二线、三线的老同志们想一想。会上,不止一位同志提到,工作

的多少虚实,如何适度,不好掌握。有几位同志建议,制定个条例,规定个界限,来帮助解决这个困难。这个条例恐怕很难定,定了也未必能有多少帮助。我想,主要还是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思想通了,再经过在实践中摸索,是会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逐步掌握其大致分寸的。总之,要从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出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工作的多或少,固然要注意;究竟做些什么事情,也很重要。在这方面,各地都总结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这些经验告诉我们,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可做的事情还是很多的。就接受党委指派的工作来说,中央曾委托李维汉、王首道等同志解决对陕北历史统一看法的问题,委托伍修权同志解决对宁都暴动统一认识的问题。这些老同志熟悉历史情况,办事公道,协助中央把问题处理得很好,起到了很好的助手作用。各省也可能会有这样一些工作。大家还特别提到,要注重调查研究。我很赞成。应当面向基层,面向社会,通过解剖麻雀,真正取得发言权。调查研究,要防止一般化。有些同志提出,能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这固然好;同时也要注意对党委精力一时顾不过来、而群众又迫切希望解决的那些具体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只要是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我们不嫌事情小。我认为这是个好意见。当然,

顾委委员应当做和能够做的工作还很多,诸如从事各种社会工作,包括教育青少年和儿童的工作,撰写党史资料和回忆录,等等。有几位同志提到,对于人、财、物这一类敏感的问题,尽量不要介入,我认为这个意见是对的。

要做好我们顾委的工作,当好党委在政治上的参谋和助手,加强学习,十分重要。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件、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对于这一点,中顾委和各省顾委都是很重视的。今后要坚持下去,使我们顾委的同志都能够提高理论政策水平,经常清醒、自觉地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

第三,关于组织建设。在座谈中,一些同志强调要加强顾委的自身建设,并且提出这首先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设立顾问委员会的深远意义。这个问题,很重要。应当看到,设立顾委的确是我们党的一个创举。小平同志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花两个5年的时间,通过这种过渡形式,来解决新老交替的问题,那就是很大的胜利。这对于我们国家以后的事来说,就是办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有的同志在发言中也讲到,不能因为顾委是个过渡性组织,只有两三届,因而就忽视对它的重大历史意义的认识。我们必须在不

断端正和加深认识的基础上,把顾委建设好。实际上,各地顾委都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有成效的工作。

会上,提到顾委办事机构的建设问题。我认为,机构设置和人员调配,还是要按照小平同志最近再次强调的精简原则去办。应当说,目前各地顾委的办事机构,大都是精干的和比较精干的。今后,各地顾委都要在精兵简政、提高工作效率方面做表率。至于会上提到的其他一些问题,应当根据中央有关规定的精神,该请示省委的,请示省委研究解决;如省委认为有必要请示中央,则由省委报请中央决定。当然,中顾委也可以向中央反映。

第四,关于工作联系。省顾委的同志普遍希望同中顾委建立经常的工作联系,中顾委也有这种愿望。今后可以采取适当方式,互通信息,交流情况。有些同志提出,把这种座谈会形式制度化,每年开一次。我看,不一定要这样办。可以根据需要,经请示中央同意后,召开一定的会议,这样对大家都比较方便。有的同志建议,没有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的省顾委,其主要领导同志应当列席中顾委全会。这个要求,我们向中央反映,按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去办。

同志们反映,许多省顾委委员要求每年能有一定时间到外省参观考察。这个问题,应当遵照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去办,原则上还是在本省考察

为好。如果省委同意去外地参观，也应当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并事先得到有关省、市、自治区的同意；同时要注意，人数不要太多，时间不要太长，不要搞成变相旅游。从广东的材料中看到，三年来，那里的省顾委接待了来自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顾委前往参观考察的同志，多达 113 批，共 879 人，还不包括中顾委去的同志，不包括广州市顾委接待的。这个数字，相当可观。如果不控制一下，将给兄弟省份增加很大负担，而且影响也不大好。

大家知道，中顾委和省级顾委的工作，目前实际上都还处在摸索前进的阶段。希望我们共同努力，不断总结经验，遵照党章的要求，切实把顾委的事情办好。

我的话，就讲到这里。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列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批评帮助胡耀邦同志

到了 1986 年底，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城市发生了学潮。

引发学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括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失误引起群众的不满。但从根本上来讲，则是由于几年来从中央到许多地方，政治思想工作软弱，特别是党内极少数人带头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造成社会上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在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邓小平同志对反对这股错误思潮曾作过一系列重要指示。但是，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却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对这股思潮的泛滥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负有重要责任。

1987年初，党中央召开党的生活会，对胡耀邦同志进行批评帮助。在生活会的基础上，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胡耀邦同志在会议上检讨了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会议对胡耀邦同志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会议决定：一致同意接受他的辞职请求，继续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推选赵紫阳同志代理总书记职务。

我只列席了1月16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顾委常委都列席了这次会议。我在会上发了言。大意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推选胡耀邦同志任总书记，大家是真心实意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适当的。胡耀邦同志为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在拨乱反正方面的贡献是应当肯定的。在他主持中央工作的前几年，比较谨慎，对老同志比较尊重，作风比较民主，能够听取不同意见，这也是应当充分肯定的。近几年胡耀邦同志逐渐有些变了，变得不谨慎起来，听不进邓小平、陈云等老革命家对他的一再忠告，特

别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忠告,终于发展到在组织纪律和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的严重错误。胡耀邦同志的作风不够深入,他经常下去,这当然是好的,但往往是一个星期跑很多县,很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有时还提一些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和口号。我对胡耀邦同志的缺点有过一些提醒,但是提醒不够,对此我也作了自我批评。

批评帮助胡耀邦同志的生活会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既严肃的,又是同志式的,与人为善,摆事实、讲道理,开得很成功。大家希望胡耀邦同志认真清理思想,真正从中吸取教训,改正错误,今后更好地为党工作。胡耀邦同志在会上的表态是好的。

十三大加快领导班子年轻化步伐 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

早在十三大召开前的 1986 年 10 月,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同志就共同约定“一齐退下来”,而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同志也要求“全退”。那时,对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同志“全退”的要求,尤其是对邓小平同志“全退”的要求,许多同志表示不能接受。后来,经过反复酝酿,才议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同志“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仍担任一个职务,小平同志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同志任中顾委主

任,李先念同志任全国政协主席;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同志“全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三老”半退和“四老”全退的带动下,又有一批老同志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位,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同时,一批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党中央的领导机构增加了新的活力。这些重大举措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并使党中央领导机构年轻化的步伐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党的十三大选举产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 名。在十三大闭幕后的第一天,举行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领导机构,并报经中央委员会的批准。名单如下:

主任:陈云

副主任:薄一波 宋任穷

常务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平	王首道	刘澜涛	江华
李一氓	李德生	杨得志	肖克
余秋里	宋任穷	宋时轮	张劲夫
张爱萍	陆定一	胡乔木	段君毅
耿飏	姬鹏飞	黄华	黄镇
康世恩	程子华	薄一波	

陈云同志主持中顾委常委会 坚决支持中央撤销赵紫阳同志总书记职务的决定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因心脏病逝世，在悼词中党中央对耀邦同志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

五十年代我在二机部工作时，在兰州、包头建了几个工厂，我一直想去看看，原来计划4月上旬走的。因胡耀邦同志逝世，我推迟了行程，在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之后于4月25日到了兰州。离开兰州后，于5月23日经包头回到北京。当时，北京发生的动乱日益升级，形势非常严峻，正常的生产、工作、交通和生活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中顾委的许多委员面对政治动乱引起的严重局面忧心忡忡，纷纷以各种形式向中央提出建议。

正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中央顾问委员会于1989年5月26日下午在陈云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召开了第十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

陈云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多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

会上，薄一波同志，我和所有到会的同志都一致表示：坚决拥护陈云同志的重要讲话，坚决拥护党中央和国务院为制止动乱、稳定局势作出的正确决策和采取的果断措施。中顾委第十一次常委会的决定，受到中顾委全体委员的拥护。

6月4日，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后，局势很快得到控制，社会秩序也逐渐恢复了平静。6月12日，由于薄一波同志因病住院，中顾委由我带队，有王首道、刘澜涛、杨得志、余秋里、宋时轮、陆定一、陈丕显、陈锡联、胡乔木、段君毅、耿飚、姬鹏飞、黄华、黄镇、康世恩等常委，还有部分委员，一起到天安门慰问首都部分戒严部队官兵、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我代表大家讲了话，我高度赞扬和亲切慰问了戒严部队和武警官兵以及广大公安干警。

在平息北京地区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中央决定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在6月23日、24日开了两天。中顾委委员列席了这次全会。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所犯错误的报告，撤销了赵紫阳同志的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及其他职务。同时选举江泽民同志为党的总书记，建立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在全会期间，中央顾问委员会召开了第四次全体会议，一致拥护中央对赵紫阳同志所犯错误所作的决定，一致拥护江泽民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我在会议结束时讲了话，着重指出：这次风波，从4月中旬开始的学潮，最后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到

了赵紫阳同志的支持。赵紫阳同志在关键时刻,采取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立场,问题是极其严重的。赵紫阳同志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长期以来,他实际上消极对待四项基本原则,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不但不执行中央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而且对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加以保护、支持,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

陈云同志对中顾委的工作一直十分重视。他对组织中顾委老同志学习哲学以及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犯错误干部的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

1989年9月16日,陈云同志写信给一波同志、我和中顾委常委,建议组织中顾委常委和在京委员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在信中指出,学习的目的,一是我们这些老同志有丰富的经验,但需要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二是带动新干部乃至全党同志都来学习哲学。

1989年、1990年中顾委对个别同志进行批评、帮助。陈云同志针对此事于1990年5月25日写信给中顾委常委各同志,指出“要把政治问题同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分开。在政治问题上,处理要格外慎重,只要检讨了(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表示本人现在对错误的认识程度),这就是记录在案了,不要扭住不放。扭住不放,不是我们党的好作风。在这方面,我们党是有很深刻的历史教训的。”

中顾委常委会经过讨论,一致认为陈云同志的意见是

完全正确的，表示赞同，并按此精神作了部署。

中顾委光荣完成历史使命 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好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手抓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建设，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认真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全国政治局面迅速趋向稳定，经济形势逐步好转，思想战线也出现了新的转机。

这时，邓小平同志认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已经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工作，并逐步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因此他再次向中央提出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要求，要求实现“全退”。邓小平同志这一愿望完全是从党的最高利益来考虑的。他曾多次讲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面，是很不正常的，是很危险的，也曾讲到了国际共运在领导更迭中的教训。邓小平同志还讲到，他退下来了，也有利于建立干部的退休制度，也可以结束过去实际上存在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他在1989年9月4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在提出自己退下来的同时，还建议：“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

实行退休制，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主张。早在1982年7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议建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时候，就明确指出：“中央顾问委员会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目的是为了实现在干部队伍的年轻化。至于过渡的年限，1982年，他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说过，也许10年，也许15年。最多不会超过15年。因此，从“十三大”以后，我们就逐渐减少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活动。到了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后，我们对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活动有意识地进一步作了收缩。除了坚持每两周一次学习、每周安排一次文娱活动，逢年过节照例慰问和看望有病的委员和已经过世的委员的遗属以外，有组织的对外参观、考察活动基本上已经停止。

1991年上半年，陈丕显同志在上海看望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要陈丕显同志回北京后向薄一波同志和我转达他的意见。陈云同志说：“我十四大以后不再干了，我考虑了，决定了。至于一波、任穷同志干不干，中顾委以后设立不设立，请他们研究。”听了陈云同志的意见后，薄一波同志和我一起进行了商量，我们一致意见是，我们两人都要退，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并向陈云同志作了报告。陈云同志听后表示很高兴。不久，薄一波同志和我的意见也得到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的一致赞同。后来，在准备起草中顾委向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也写进了上述意见，

到了十四大，全体中顾委委员在讨论中顾委工作报告

(稿)时,委员们从关心我们党的事业和前途出发,对是否撤销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同志们各抒己见,有些委员认为应当撤销了,也有些委员思想不大通,认为还可以保留一段时间。会上,薄一波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肯定,不论持哪一种意见,都是从关心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的,充分显示了老同志们对党的一片丹心。同时,他系统地阐述了提出撤销中顾委的意见的酝酿过程,认为从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过渡到退休制,撤销中顾委的时机已经成熟。经过委员们的热烈讨论和反复研究,最后大家还是一致赞同中顾委常委会的意见,建议十四大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中央顾问委员会存在了10年,在邓小平、陈云同志的领导下,在薄一波同志的具体主持下,中顾委光荣地完成了党章所赋予的历史任务。

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对中央顾问委员会10年来的工作和所起的作用,作了高度的评价:

“大会认为,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10年来,协助党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

大会高度赞扬老同志为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新老干部的交替与合作,保证党的事业继往开来、后继有人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大会向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老

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致以崇高的敬礼！

大会认为，全党要继续尊重和关心老同志，学习老同志坚定的政治立场，实事求是的精神，治党治国治军的丰富经验和优良传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开始了退休生活。

退休后，中央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对我都十分关心和照顾。我参加革命七十年，尽力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我长期以来有“左”的思想，致使工作中出现不少缺点和错误。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没有真正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延安整风时期，我在前方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毛主席的几篇重要著作，思想上产生了一个飞跃，最大的收获是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提到了理论的高度。此后，通过学习和实践，思想又不断有所提高，但“左”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解决。思想上的另一次飞跃，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特别是“两个凡是”的禁锢，并进一步根据我国国情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使我在思想上产生了又一次飞跃，“左”的思想才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解决。我高兴地看到，党中央正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贯彻“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中央又适时地提出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

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我深信,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中央基本路线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这个跨世纪的宏伟蓝图一定能够实现。我们一定能够在“一国两制”原则的指导下,圆满地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胜利地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让我们满怀信心地迎接更加灿烂的明天。

第九章 出访朝、南、罗、意、匈五国

1963年10月,应朝鲜劳动党的邀请,我以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的身份,率东北三省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和沈阳军区、丹东市委的负责同志访问朝鲜。1963年和1964年,在东北先后接待了崔庸健、金日成同志的来访。1979年,率领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联络部有关同志组成的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罗马尼亚。1983年和1987年,分别应意大利共产党和匈牙利工人党的邀请,赴意、匈休假,并参加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节活动。几次访问,均受到热情接待,达到了加强联系,增进友谊的目的。

东北三省负责干部访问朝鲜

东北地区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四个道接壤。在革命战争年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北地区与朝鲜的关系都是很密切的,中朝人民并肩战斗,互相支援,结下了鲜血凝成的深厚友谊。

1963年6月,毛主席在武汉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

会委员长、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以及在上海会见朝鲜新闻代表团时讲过：你们可经常派人到中国东北了解情况，或者让东北的同志到你们那里去。周总理在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庸健同志到黑龙江省访问时也提出要东北派农业参观团去朝鲜参观学习。主席和总理的意见是希望东北和朝鲜可以直接往来，加强东北地区和朝鲜边境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增进中朝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

1963年7月29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国际部副部长金珖政约见我驻朝大使馆代办刘祥纶，提出朝党中央邀请东北地区负责干部在8、9月间分两批到朝鲜休养参观。8月2日，中共中央联络部将朝方的邀请意见电告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局书记处就此事进行了研究。我们当时考虑朝方邀请的人员大部分在8、9月间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难以按期前往，建议访朝日期推迟到10月中旬。根据周总理指示的精神，拟先派一个学习访问团于9月上旬赴朝，学习朝鲜的工农业生产建设方面的经验，并为第二批赴朝访问做些准备。8月3日，我们将讨论的意见电告中央。9日中央复电，同意我们的意见。

先期赴朝学习访问团的名称为东北地区学习访问团。团长是东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强晓初同志，副团长是东北局委员、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冯纪新同志和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于毅夫同志。团员有东北局农委副主任徐元泉、经委副主任孙洪志和三省主管工农业的领导同志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

我和三省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访朝的名义，中央的意见，因朝方邀请是去休养参观，无需设正副团长，由我率领即可。访朝人员有我和东北局第二书记、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东北局书记处书记、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同志、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同志、安东（今丹东）市委书记宋克难同志等共 10 人。在出访前，对访问中的一些问题我们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将这些意见通过姬鹏飞、张彦同志报告给总理。

出访前，我在北京见到毛主席，我问主席对东北同志此次去朝鲜访问有何指示。主席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向朝鲜同志学习。”我们一行 10 人于 1963 年 10 月 15 日抵达平壤。这次访问虽然不公开，但朝方接待的规格很高。到车站欢迎的有朝党中央副委员长朴金喆和党中央国际部、财贸计划部、外交部、国防部的部长及平壤市党政负责同志。所到之处，均有当地道、市、郡的主要负责同志出面接待。

在朝鲜访问共 24 天，金日成同志先后两次接见。第一次接见是在我们到达平壤后的次日，朝党中央的副委员长全部在座，他们是崔庸健、金一、朴金喆、金昌满、李孝淳、金光侠，在座的还有外务相朴成哲、党中央国际部部长朴容国等。接见时气氛很热烈，友好之情溢于言表。金日成同志谈得很高兴，有时用中国话与我们交谈。他说：你们到朝鲜访问，我们很欢迎你们。我每次见到毛主席时，他都讲：我们东北和你们要很好地联系。这次邀请各位到朝鲜来，我们就可

以更熟悉更密切一些。今后我也准备到你们那里去看看。金首相还谈到过去战争年代，朝鲜和东北的密切关系及东北对他们的支援。他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期间，我们很多家眷、孩子们到了东北。在战争中你们支援我们很多粮食、被服和物资，甚至我们的工厂、学校和部队也到了东北。如果没有东北，我们是很困难的。金首相还回顾了过去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中，东北地区对朝鲜的重要作用。他说：因为那时朝鲜地面小，打游击不方便，所以我们带人到东北去打游击，我就打了15年。如果没有东北，我们就不能生存，革命旗帜也就不能保持。他还说：在和平时期，东北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东北可以作为国际主义战士的榜样，我们很信任东北的同志。在交谈中我说：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时候，在金首相的领导下，朝鲜就支援了我们，我们并肩战斗，取得了抗日斗争的胜利；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朝鲜全力支援东北。1947年安东、通化被敌人占领期间，山东和东北、南满与北满的物资运送都是经过朝鲜的，我们有些干部的家属和伤病员也是经朝鲜进行转移的。对于朝鲜人民的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谈话时，金首相还谈到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问题，介绍了朝鲜工农业生产方面的情况。

金日成同志的第二次接见，是我们从外地参观回到平壤后的第二天。11月2日上午，金日成首相同李孝淳副委员长来到我们的住地酒岩山招待所。在座的有朝党中央建设运输部部长金泰根、国际部副部长金珣政，我驻朝大使郝

德青同志也在座。我向金首相介绍了东北地区工农业生产、调整工作、社会主义教育、增产节约及“五反”运动和国防等情况。既谈到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也谈到我们在经济上遇到的困难以及工作上存在的瞎指挥、高指标和在执行政策上存在的问题。同时也介绍了我党中央和毛主席正在为恢复工农业生产，纠正存在问题采取的措施。金首相表示：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可以理解，并对已经取得的成效表示赞赏。这次诚挚友好的谈话进行了三小时。

我们这次访朝名义上是休养，实际上是去学习的，看的东西很多，朝方都满足了我们的要求。有些当时对外国人不开放的项目，也都允许我们参观。在平壤期间，我们参观了朝鲜革命博物馆和祖国解放战争博物馆及工农业展览馆，还游览了万景台，瞻仰了金日成同志故居。在外地参观，我们到了金刚山、元山、咸兴、清津、朱乙、熙川等地，参观了合作农场、工厂和军事设施，游览了风景。朝鲜人民在金日成同志为首的劳动党中央的领导下，表现出高度的建设热情，在战后仅十年的时间，恢复了战争创伤，取得巨大的建设成就，使我们感到由衷的钦佩。在开城，我们向朝鲜人民军陵墓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陵墓敬献了花圈。

10月21日下午，我们从元山出发到金刚山。金刚山海拔1600多米，位于江原道，距三八线仅十余公里，是朝鲜著名的风景区。金刚山分内金刚、外金刚、海金刚，我们到的是外金刚。22、23日两天游览了金刚山万物相和九龙渊，此地青松红叶，奇峰怪石，泉水奔流，瀑布飞泻，令人心旷神怡。

回到住所，尚感游兴未尽，填了一首满江红词《游金刚山》：“巍巍金刚，好一个雄伟胜地。清泉奔，苍松红叶，瀑布湍急。仙女梳妆海作镜，万相皱景台前立。忆昔日山上炮声隆，美帝泣。千里马，青山里，勤劳动，齐奋起。十年不算长，建设奇迹！自力更生旗高举，自主经济坚磐石。三千里江山要统一，谁能敌。”这首词抒发了我二十几天参观访问和游金刚山的兴奋之情。八十年代，金日成同志到北京访问时，我把这首词赠送给他，以表达我对朝鲜和朝鲜人民的真挚感情。

从外地访问回到平壤后，我把周总理派到朝鲜学习的著名电影工作者张瑞芳、郑君里同志请到我们住的宾馆，他们向我介绍了在朝鲜学习的情况。还在郝德青大使陪同下在我驻朝鲜大使馆会见了越南驻朝鲜大使黎铁雄同志。我和黎是1950年在昆明认识的。当时我是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黎是设在云南的越南步兵学校校长。老朋友相见，畅叙昔日友情，愉快地交谈了一个多小时。

在访朝期间，我接到中联部电报转告周总理指示，要我们了解一下朝鲜政府系统的组织机构情况。经与朝方联系，组织了两次座谈会。朝鲜内阁事务局第五局局长吴泰凤（相当于我国国务院办公厅负责人）和朝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金锡祚分别介绍了政府系统和党的组织机构情况。

在访问即将结束之前，我们到我驻朝使馆，同郝德青大使就此次访朝的收获和看法交换了意见。11月7日晚9时启程回国。离开平壤时，朴金喆副委员长、朴启哲部长、金珖政副部长和副外相、民族保卫副相及平壤市党委负责同志

等到车站送行。金泰根部长陪我们到新义州。11月9日上午回到安东。

这次访朝，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我们采取认真学习的态度，以地方访问团的身份和对方接触，注意谦虚谨慎，尊重对方，客随主便，达到了加强联系、增进友谊的目的。访朝结束后，我们向中央写了报告。之后，我专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简要汇报了访朝的情况，并对东北与朝鲜的关系问题提出一些建议。主席在我的信上批示：“要征求金日成同志的意见，请他提出要求。此信送金首相看。”中朝两党、两国关系之亲密由此可见一斑。

欢迎崔庸健、金日成访问东北

1963年6月，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来到沈阳。崔庸健同志早年同另一位朝鲜同志毕士梯（又名杨林，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时，我和毕同在红军干部团，陈赓同志任团长，我任政委，毕任参谋长）一起在我国云南讲武堂学习，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教官，后在我国东北地区积极从事抗日斗争，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促进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过重大贡献。6月21日抵达沈阳时，我们组织群众热烈欢迎。下午，崔庸健同志一行到烈士陵园敬献花圈。晚上，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以及东北局的领导同志设宴祝贺崔庸健同志六十三岁寿辰，气

氛亲切、热烈，双方都发表了热情友好的讲话。第二天，崔庸健同志一行参观了一一二厂，并同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进行了会谈，我、姬鹏飞、郝德青同志在座。6月23日，崔庸健同志一行回国。

1964年9月11日，金日成首相、副首相李钟玉、机械工业委员会委员长玄武光、国际部部长朴容国等一行30余人抵达安东，开始对东北地区的访问。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我驻朝大使郝德青到安东迎接。下午抵达沈阳。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和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同志，我和东北局在沈阳的书记及沈阳军区、辽宁省、沈阳市的负责人到车站迎接。到北陵休养所后双方互致问候，小平同志转达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对金日成同志的问候，我表示热烈欢迎首相到东北来访问。在交谈中，小平同志谈到东北和全国工业建设的情况和问题及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情况。金日成同志表示这次到东北访问，主要是为了实现毛主席的嘱托，和东北的同志多见面，加强联系。他简要介绍了当年朝鲜农业生产的情况和金一同志访问罗马尼亚的情况。他认为我党对罗马尼亚的方针是正确的。9月12日上午金首相一行在沈阳参观辽宁工业展览馆一个内部馆和一一二厂。下午，邓小平同志同金首相等七人会谈，主要谈对国际军事形势的估计和建立三线的问题。首相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对形势的看法和采取的对策，他也谈了朝鲜的准备和安排。13日上午首相参观了四一〇厂、一一一厂和沈阳重型机器厂。14日金首相到鞍钢

参观。在火车上，鞍山市委第一书记王鹤寿同志向金首相介绍了鞍钢的情况。到鞍山后看了初轧厂、冷轧厂、薄板厂和无缝钢管厂。首相对薄板厂和无缝钢管厂很感兴趣，参观时不时地询问一些情况，李钟玉和玄武光等看得更细。金首相当天下午回到沈阳，小平同志同金日成同志再次进行交谈并共进晚餐。

几天后，金日成同志主动对我说：小平同志是党的总书记，工作很忙，你们的国庆节快到了，需要他处理的事情更多，不用在这里陪我了，请小平同志回北京吧。我向小平同志转达了金日成同志的意见，于是，小平同志就在沈阳同金日成同志道别，返回北京了。

9月15日，我和伍修权、郝德青等陪同金首相访问长春。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第二书记赵林等到车站迎接。当天即参观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16日金首相参观长春郊区净月人民公社，看了公社粮米榨油加工厂和菜蔬温室，同时游览了净月潭林区。首相赞扬了加工厂和温室勤俭节约，因陋就简办事业的精神。李钟玉和玄武光同志参观了坦克厂和光学机械研究所。金首相在长春参观过程中，对我们建设的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在东北看过几个城市和工厂，感到在毛主席和中国党中央的领导下，东北地区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强国。中国的成就给他们很大鼓舞。还说，长春汽车厂管理得很有秩序，很干净。

16日晚，金首相一行到哈尔滨访问。17日参观了汽轮

机厂、锅炉厂和电机厂。18日上午参观了铝压延厂、直升机场；下午参观银光电镀厂。李钟玉、玄武光等参观了坦克厂、子弹厂和量具刀具厂。金首相在参观小型电镀厂之后与我和伍修权、欧阳钦、郝德青同志谈了一小时的话，主要谈了他访问的印象，同时也谈到朝鲜对建设后方山区的安排，朝方国际部部长朴容国、驻华大使朴世昌在座。19日首相一行参观了大庆油田。

金日成同志访问东北的项目和活动原计划是20日自哈尔滨乘飞机到大连，参观大连造船厂和旅顺海军基地，23日回国。16日在长春时首相向我提出，离开哈尔滨后不去大连，要经吉林省的通化、临江回国，目的是要看看这个与朝鲜毗邻的战略地区。我们将此行动报告了中央。周总理得知这个消息后，19日从北京乘飞机到哈尔滨为金首相送行，晚六时左右周总理陪同金首相离哈，在车上共进晚餐。在车上先后谈话约三小时，除了谈国际共运问题，还谈到当时发生不久的东京湾事件。晚十点总理从长春下车，我们继续前进，于20日下午到达临江镇。金首相一行圆满地结束了对我国东北的访问，与我们一一话别后，乘朝鲜派来的汽车平安回国。

由于我同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过较多的接触，我重新出来工作后，中央曾委派我参加与朝鲜有关的一些外事活动。如出席朝鲜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并讲话；代表中央接受金日成同志特使向小平同志赠送寿礼；会见一些朝鲜访华代表团等。1994年8月金日成同志去世后，我

赠送花篮表示深切沉痛的哀悼。

率代表团访问南和罗

根据中央批准的 1979 年中南、中罗两党的工作者互访计划,我于 1979 年 7 月率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代表团成员中有中纪委的王鹤峰、张顺同志,中央组织部的吕枫、高慈民同志,中央联络部的蒋光化、宦国英同志,共九人。代表团本着热情友好、谦虚谨慎和实事求是、学其所长、为我所用的精神,主要考察南、罗两党的组织工作、干部工作和纪律检查工作的情况和经验,重点考察上述工作如何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当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罗马尼亚共产党和我党的关系很好。1977 年 9 月和 1978 年 5 月,南、罗两党最高领导人相继访华,1978 年 8 月,我党最高领导人访问南、罗,互访取得了重大成果。对我代表团的此次访问,南、罗两党都很重视,对我们的考察内容都有准备地作详细介绍,认真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代表团在南 10 天,与联邦议会选举和任命委员会进行了座谈,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市和克罗地亚和波黑两个共和国、两个区委和两个企业,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执行主席布兰科·米库利奇接见和宴请代表团全体同志,介绍了南共联盟的有关情况。南共联盟中央委员阿·舒克利亚与代表团举行多次会谈,并到机场迎送。在罗两周,访问了布加勒斯特市和康斯坦察、布勒伊拉、瓦斯

卢伊、尼亚姆茨、雅西等五个县(相当于我国的省),八个工厂,一个国营农场,一个农业合作社。罗共主管党的工作的中央政治执委、中央书记兼组织部长德斯格列斯库(后任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理)四次会见代表团全体同志。到各地,都由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出面接待代表团。在雅西县,县委第一书记伊利埃斯库是罗共中央政治候补执委,对华态度友好,同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他现在担任罗马尼亚共和国的总统。

在南、罗访问期间,中央、地方党委的领导干部,基层组织的负责人,都以他们的切身经验,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方面来阐述这样的观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党的活动的一切出发点和基本任务,是大力搞好经济建设,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他们以“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就没有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就不能与别的国家平等对话”的感受,来说明发展国民经济是关系民族存亡的大事。他们把经济建设工作做的好与不好,国民经济计划完成的好与不好,作为衡量党的工作好与不好的主要标志。南、罗两国解放后,经济建设发展速度较快,人民的衣、食、住、行等条件,都比解放前大为改观。从我们了解和观察的情况来看,干部和群众的精神面貌是向上的,社会秩序是安定的。当时,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全党正在进一步拨乱反正,摒弃“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做法,努力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南、罗的同志们具有共识。在

谈到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时，南、罗的同志都讲到建设规模偏大，完不成原定的计划，正在采取措施压缩和调整建设项目和计划指标。

如何实现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南共联盟和罗共各有特点。南主要强调工人自治，独立经营；罗则强调集中管理，统一领导。但南、罗都强调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作用和保证监督作用。党不仅制定经济发展的规划，而且组织社会力量去完成计划，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他们还强调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强调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罗共有党员290万，占总人口的13%；南共联盟有盟员177万，占总人口的8%。南、罗两党都教育和要求党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起模范带头作用，遵守劳动纪律，保质保量地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或工作任务。南、罗两党的党委机关都很精简，脱产人员很少。如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希贝尼克区是个对外开放的旅游区，8万2千人口，6千盟员，区委只有工作人员（包括打字员、司机）9人，其中正副书记3人。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市，200万人口，32万党员，市委机关只有88人。南企业中的共盟基层组织的书记均不脱产。罗企业中脱产的党委书记也寥寥无几。如布勒伊拉“进步”车辆厂，1万2千职工，4千2百名党员，只有党委书记一人脱产。雅西和瓦斯卢伊两县所有企业，包括万人以上单位，都没有脱产的党委书记。不脱产的党委书记，有经济学家、工程师、调度室主任，也有工长。南、罗的县、市、区和大企业的主要领导

干部都比较年轻，县委书记 50 岁左右，大企业经理 40 岁左右，有的 30 岁左右。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我国干部队伍的年龄偏大，干部年轻化还刚刚起步。在这方面，南、罗比我们抓得早。

南、罗两党都重视干部的培训、选拔和管理工作。他们在战争结束转入和平建设之初，就把一批工农干部送进学校脱产学习，或通过业余教育、函授教育等形式进行培养提高，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专家、工程师、教授、学者，大多是党、国家和经济部门的骨干。我们在南、罗接触的一些中央和县、市级领导干部，企业的经理，绝大多数是专家或工程师。罗还规定，凡准备提拔担任县委书记和大企业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必须先送中央党校学习四年。党校既学马列主义理论，也学专业知知识。在职干部大量的采取业余或函授的方式进行学习。罗康斯坦察县 8 万 6 千党员中，参加函授学习的有 1 万多人。南、罗从中央到基层组织都建立了后备干部名单。罗规定企业和乡以上党政机关，每个主要领导职务，都要物色培养 1 至 3 名后备对象，一个领导干部一旦调离，即有 1 至 3 名能接替他工作的对象。布加勒斯特市，用这种办法培养储备了 1 万 6 千名干部。南、罗还建立了干部轮换和交流的制度。南共联盟各级委员会每届选举都规定轮换的比例，但又必须保证上一届委员有 1/3 以上当选，以保证领导核心的稳定。轮换下来的干部，仍回原单位工作。罗共实行干部交流制度，从做党的工作调做经济工作，从中央部长调做县委第一书记等，目的是使干部开阔视野，增长

才干,全面锻炼。南共联盟对安置退休老干部做得比较好。各级都建立老战士协会,组织他们参加各种活动。老战士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都得到妥善安置,又继续发挥作用,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

罗共很重视信访工作,规定答复来信,中央一级机关不得超过40天,县市不得超过30天,乡一级和经济单位不得超过20天。接待群众来访,规定中央书记、副总理每月2次,县、乡党委书记和企业经理每周至少1次。

代表团此次对南、罗党的组织工作、干部工作和纪律检查工作的了解,虽然很不深入,很不全面,但他们的有些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回国后,经过研究,代表团向中央作了报告并提出以下建议:必须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战略方针上来,全党一致,全国一致,同心协力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有组织有计划地重新教育干部,大力培养建设人才;改进和完善干部选举、考核等制度,真正做到知人善任,选贤举能;做好退休、离休干部的安置工作,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党政机关的设置要减少层次,精简机构,精干人员;建立健全信访工作制度。

赴意参加《团结报》节闭幕式

1980年我党和意大利共产党恢复关系后,双方交往增多,领导人互访频繁,两党友谊不断加强。1983年8月,应意共中央邀请,我党中央决定派我代表我党出席意共《团结

报》节闭幕式并作访问。鉴于当时我党和意共之间的友好关系，中央对我的这次出访十分重视，乔石同志专门向我谈了意大利和意共的情况。行前，中联部部长钱李仁同志也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这些对我做好出访前的准备工作帮助很大。

8月31日，我和钟月林等同志一起乘中国民航航班经瑞士前往直意大利。乔石、陈野苹、钱李仁等同志在北京机场为我们送行。9月3日上午，我们由日内瓦乘意航班机飞越峻峭的阿尔卑斯山后不到一个小时便抵达有近3000年历史的罗马。在罗马的达芬奇机场，我们受到了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人和我国驻意大使林中的热烈欢迎。随后在意共一位年轻的联络员、讲一口流利汉语且十分热情的女同志玛丽娅的陪同下，由前意共主席隆哥的司机开车前往达芬奇旅馆下榻。当晚，意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和对外联络部负责人为我们举行了欢迎宴会，代表贝林格总书记和意共中央向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并讨论了我们的访意日程。

5日一大早，我们在玛丽娅的陪同下前往直意大利北方著名的度假胜地科莫湖滨。二次大战期间，这是意共领导的游击队同德国纳粹和墨索里尼法西斯进行过激烈拼搏的地区之一，1945年4月墨索里尼就是在科莫湖岸边的东科镇被意共游击队活捉并枪决的，我有幸参观了这个地方。在此期间，我们访问了意共的好几个基层组织，同基层支部的党员进行了座谈。他们异口同声地赞扬毛主席和我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是对全世界人民的巨大鼓舞。贝拉诺

市镇有位老党员对我说，在中国解放战争胜利进行的年月，他们镇党支部的会议室里挂着一张陈旧的中国地图，每当中国党解放一座城市，他们就在上面插上一面小红旗。1949年10月当得知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该镇全体党员自动聚集在党部，高唱国际歌，举行欢庆会。我们在科莫湖逗留期间，意共领导机构成员（即政治局委员）兼伦巴底大区党委书记切尔维蒂同志和科莫省委书记布茨同志专程来旅馆看望我们，问我们有何要求，祝我们访问愉快、身体健康，并同我们共进晚餐。几天后，他们把我们接到米兰、科莫两市参观，并亲自开车。我们同伦巴底大区党委，米兰省委和科莫省委分别进行了亲切会见和交谈。他们向我们介绍了意共地方组织各方面的情况，包括他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我向他们介绍了我党斗争的复杂历程，以及当前的形势、任务和方针政策。意共各地的同志纷纷表示，今后两党的地方组织也应开展交往，以增进了解、加强友谊。

虽然我在科莫市的访问时间仅有一天，但一位在意大利生活了多年的老华侨林老板，得知我访该市消息后，一再恳请我们到他开办的长城饭店就餐，并请布茨书记作陪。由于盛情难却，只好从命。席间，他如饥似渴地了解祖国的情况，我把祖国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和发展前景向他和他的家人作了详细介绍，请他们有机会回国看看，并希望他们为加强中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而不懈努力。他们听了我的话，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临行时，我应林老板

的要求,高兴地为他题词“祖国爱华侨,华侨爱祖国”。林老板握着我的双手说:“我们华侨决不辜负宋老的厚望,请向祖国问好”。

随后,意共安排我们访问水上名城威尼斯、文艺复兴的摇篮佛罗伦萨和意中部重镇波伦亚,这些城市不仅名胜众多,而且经济也十分发达,是意共力量最强的地方。如波伦亚,意共党员近15万,占全意大利党员总数的10%,在地方选举中意共所得选票在50%以上,战后几十年来该市市长一直由意共党员担任。在访问期间,我深深感受到意共各级组织热烈欢迎中意两党关系的不断发展,一位意共省委书记对我说:“1980年和1983年贝林格同志两次访华,均受到国家元首般的接待,我们党的党员和干部对此都很感动。”

18日,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应邀出席在雷佐·艾米利亚市举行的意共全国《团结报》节闭幕式。报节是意共加强同群众联系、扩大政治影响、筹集经费的一种传统形式。地方性报节每年要举行几千次。全国性报节举行一次,由中央组织部主办,闭幕式是其高峰,非常隆重,意共主要领导人均参加,总书记要发表讲话。1983年的全国《团结报》节从9月1日开始,到18日结束,前后共18天,有250万人次参加。闭幕式在市郊一个大公园内举行,到处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有100多万参加,中、苏、法、西、罗、朝等70多个外国党的代表也应邀出席。闭幕式于下午三点开始,我们在两点半便到达会场,意共领导机构成员兼《团结报》社马卡鲁索

同志在会场入口处迎接我们，他热情地对我说：“您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这次大会是对意共和《团结报》节的巨大支持”，并告诉我大会结束后贝林格总书记将会见我。我向他转达了我党和《人民日报》对报节的热烈祝贺，表示这样宏大的群众场面是意共有伟大力量和影响的表现。

大会结束后，意共领导机构成员布法利尼陪同我步入招待会大厅。贝林格总书记在意共对外联络部长鲁比的陪同下健步来到我面前，同我紧紧握手，向我表示热烈欢迎。我首先转达了胡耀邦、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贝林格同志和意共其他领导人的问候，表示我能应意共邀请访意和参加《团结报》节闭幕式感到很荣幸，我们在意各地受到了意共同志的热情款待，切实感受到中意两党间的深情厚意。贝林格总书记热情地说：“我们两党的关系极为密切，上月我在华休假受到了胡耀邦同志和中国党其他领导同志非常热烈的欢迎，我们十分高兴，十分满意，请转达我对胡耀邦同志、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的最亲切的问候。”

19日，我们返回罗马，住陶里亚蒂别墅。这座别墅是意共的招待所，有两座二层的小楼，座落在罗马东南郊十公里处的阿尔巴诺山脚下，风光秀丽，气候宜人，环境幽静，颇适于休养。1948年陶里亚蒂遭反动分子刺杀而动手术后，就是在这座由党员募捐购买的乡间小院进行了长期休养而康复的。此后，人们称这个小院为陶里亚蒂别墅。六十年代成为意共的招待所，并在其北面建立了意共中央党校和意共信息处理中心。意共中央安排我们参观浏览了世界历史文

化名城罗马市,参观了著名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斗兽场和古罗马广场遗址,意大利悠久的历史 and 辉煌的文化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20日上午,意共领导机构成员兼外委会负责人巴叶塔和对外联络部部长鲁比在位于罗马市中心的意共总部会见我们,林中大使也参加了会见。巴叶塔是意共元老和著名的领导人之一,早在二次大战期间就任意共领导的游击队副总司令,由于我们二人都打过仗,谈起话来特别亲切和融洽。我说,这次访意收获很大,亲眼看到意共是一个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有着巨大影响的党,通过访问我从意共方面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巴说,意共虽比中共大半岁,但中共早已取得政权,走在意共的前面,有得意共学习的丰富经验,目前又在进行改革,在世界工运中肩负着更大的责任。意共确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和很强的力量,但我们不能自我陶醉,更不能睡大觉,而必须努力斗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往往在我们感到了不起的时候,敌人反倒给我们突然打击。今天反共势力还很强大,但意共满怀信心地前进。我高度赞扬两党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巴叶塔表示,意中两党友好关系的发展和加强有助于意共在困难环境中开展斗争。会见后宾主热烈拥抱,巴叶塔和鲁比送我们到意共总部大门外,并亲自为我们关上车门,双方依依惜别,我说:“北京再见”。

21日,我们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付的访意任务,带着意共对我党的深厚情谊告别罗马,返回北京。

赴匈休假

应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邀请,我于1987年6月途经法国到匈牙利休假。6月26日抵达布达佩斯,按匈方安排,次日到巴拉顿湖政府休养所休假,并参观访问了当地的工厂、农业生产合作社、商店、自由市场和博物馆。据一家陶瓷厂的党委书记介绍,该厂1800名工人,只有2名脱产干部:党委书记和工会主席。他告诉我,工厂正在进行改革,最近刚成立了企业委员会,26名委员,厂长由企业委员会选举产生,副厂长由厂长任命。企业委员会定期听取厂长汇报,讨论生产计划。厂长、副厂长对企业委员会负责,企业委员会对厂长、副厂长进行监督。该厂有外贸自主权,80%产品出口。据观察,匈群众的情绪和社会状况都比较稳定。

7月3日回到布达佩斯,匈党主管外事的中央书记絮勒什会见了,介绍了7月2日刚刚结束的匈党中央全会的情况。絮勒什说,这次中央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匈《经济和社会发展纲领》。纲领的核心是在今后几年内加快并全面实行经济改革。改革的中心任务是在坚持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的同时,改变匈经济结构,特别是工业结构,建立有效的、合理的经济结构。匈将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强同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同时也努力发展同西方的经济合作。纲领拟分两个阶段实现,一是稳定阶段,一是发展阶段,任务十分艰巨,要冒较大的风险,但又必须这样做。

絮勒什还高度评价中匈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还提出卡达尔同志希望在中共十三大以后访华的问题。

我向絮勒什简略介绍了我国内的情况和我党十三大面临的任任务，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一个是干部进一步年轻化的问题。关于卡达尔同志访华问题，将向我党中央报告，并希望能成行。

此次赴匈，纯属休假性质，匈方的会见是礼节性的，我所到之处，也是走马看花，了解的只是一般情况，没有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匈方的接待热情周到，又朴素实在。

同越南同志的亲密友谊

1950年，云南曾是我国援越抗法的后方，越南在昆明设了领事馆，办了一所步兵学校，还有其它一些后方设施。中共云南省委和省政府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我作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同越南领导人的接触比较多，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1950年3月19日，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同志赠我一本关于越南抗战的照相册，内有17幅照片，扉页上写的是：“越南抗战 云南省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宋任穷同志存念 胡志明敬赠 一九五〇·三·一九”并盖有胡志明同志的印章。17幅照片中有军事会议，研究沙盘，夜间行军，部队过桥，部队过江，袭击敌营，烧毁敌营，烧毁敌油库，各种武器以及越南人民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大会等内容。这本相册我一直珍藏着。

越南西北战场的负责人双豪同志 1950 年 6 月 15 日在昆明赠我一本反映越南西北地区抗战的照相册，内有 200 多幅照片。扉页上写着“敬赠给宋任穷同志留念 双豪于昆明 一九五〇·六·十五”并附说明：“1947 年，大半个西北地区在法国鬼子统治下受苦难。西北部队在艰苦中英勇战斗，从敌人手中夺回一寸一寸的土地。1948 年，西北奋起驱逐鬼子，到 1950 年，西北欢呼显赫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这 200 幅照片从各个方面生动地反映了越南西北地区军民奋起抗击法国侵略者的英勇情景。双豪同志后任越南人民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上将军衔，他曾被选为越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老战士协会主席等职。双豪同志赠我的这本相册，我也一直珍藏至今。

我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黄文欢同志见面的机会比较多。六十年代，黄文欢同志到辽宁鞍山休养，我作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同中共鞍山市委和鞍钢的主要负责同志王鹤寿一起亲切会见并宴请了他。黄文欢同志在中国出版了诗选，亲自签名送给我一本。

中国和越南是近邻，长期以来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现在，两国都继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十分珍惜中越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亲密友谊，祝愿这种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附录

纪念陈昌、夏明翰老师*

(1987年9月)

回首往事,常常想起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陈昌、夏明翰两位烈士。

记得是1922年,当时我13岁,因为家境贫寒,依靠过继胞兄的资助,考入了湖南浏阳县西乡金江高级小学。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受到了陈昌、夏明翰等老师的革命启蒙教育。60多年过去了,我始终怀念这两位对我走上革命道路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革命先驱,他们的风华笑貌,至今依旧萦绕心际,光彩照人。

陈昌,又称陈章、陈昌甫,早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同学。后加入湖南新民学会,成为骨干成员。陈昌和毛泽东交往甚密,在一起时是朝夕相处;分别时则常有书信来往。当新民学会组织进步青年赴国外勤工俭学时,陈昌亦有出国愿望。毛泽东、蔡和森等考虑国内的需要,希望他留在湖南,以学校为阵地,为革命培养人才。1921年,陈昌应

* 原载1987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

邀来到金江高小任训育主任,辅助进步人士黄甫笙校长治校。

夏明翰 1920 年结识毛泽东,参加了毛泽东等创立的俄罗斯研究会,后成为毛泽东等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的第一批学员。经陈昌建议,从自修大学抽调一部分人到金江高小任教。夏明翰于 1921 年也来到金江高小。

陈昌、夏明翰老师知识渊博,口才雄辩。上课时,结合课文向学生历数帝国主义列强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侵略我国,欺凌和压迫我国人民的种种罪行,从中日甲午战争、中俄璦琿条约、八国联军侵略我国、日本强迫签订 21 条,用炮舰政策迫使我割地赔款,强行设立租界,一直讲到军阀政府、贪官污吏的腐败无能。还给学生讲“五一”节的来历和意义,讲八小时工作时,讲工人要同农民联合起来推翻压迫阶级。陈、夏两位老师的授课,事实摆得充分,道理讲得透彻,感情色彩丰富,很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他们的出色的讲解,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在我们年幼的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燃起了革命的火花。我们开始懂得了中国要摆脱贫困,不受侵略者的欺侮,独立富强起来,必须唤起民众,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在陈昌等老师带领下,我们全校师生还曾到附近的普迹镇游行示威,高呼反帝的口号。

陈昌、夏明翰老师痛恨旧教育之种种弊端,大胆进行改革。陈昌曾在学校的年会上发表试行教育改革的演说,受到热烈欢迎。在陈昌等老师的倡议下,学校在师生必经之处挂

了一块写着《劳工神圣》4个大字的匾额,并将10多亩校田改为农场,组织师生劳动,带领师生改造学校的环境,将周围的一块荒地开辟成环校马路。陈昌自编了一首修路歌,大家边劳动边唱。据我的记忆,歌词是:“修我们的马路,贯彻我们的精神,怕什么寒和暑,雨和风。拿起我们的锄头、铲子,快来做工。怕什么高和低,土和石。凡阻碍我们的,就要把它铲平!大家起来,做一个真正的劳工。”改革所及,以至衣着,学校提倡不着长袍马褂,改穿布料短衫。

陈昌、夏明翰等老师讲课采用启发式,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很受学生欢迎。作文常常在老师的启发下由学生自己选题,老师把不少比较好的作文张贴出来,作为学生自我教育和互相启发的一种形式。我的一篇作文是写打倒省长赵恒惕的,文中控诉了反动省长的罪恶,发出了打倒赵恒惕的呼声。老师对这篇作文表示赞赏,便也张贴出来。

陈昌活跃开朗,夏明翰深沉凝重,尽管性格迥异,但对学生都怀有真挚的感情、殷切的期望,并经常深入到学生中间,讲学问、议形势,同大家打成一片。他们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文娱体育活动,组织赛球,教双簧、小魔术等,还导演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文明戏,寓革命宣传于娱乐之中。

陈昌、夏明翰等进行教育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创办金江高等女子职业学校。在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当时,浏阳各校都不招收女生,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实际上也被剥夺了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在陈昌、夏明翰等倡议下,金江高小决定创办一所高等女子职业学校。毛泽东竭力支持这

件事，特派夏明翰的姐姐、在自修大学任教的夏明森出任女校校长，除专业教师外，其他教师多由金江高小教师兼任。此举遇到的阻力，是可以想见的。陈、夏等力排种种非议，冲破重重障碍，终于使这所学校于1922年秋宣布开学。无疑，这是湖南妇女运动史和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在金江高小的带动下，浏阳大部分学校都开始招收女生，使不少妇女有机会通过学习走上社会，参加各项社会活动。

陈昌、夏明翰老师虽然没有留下系统的教育理论著作，但他们的教育主张和实践，表明他们是我国教育的改革先驱者。他们的改革措施，不仅在当时具有巨大的进步作用，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并从中受到启迪。

金江高小的教员中，除陈昌、夏明翰外，还有陈作为、潘介棠、陈清河、傅昌钰等，他们都为传播革命思想和进行教育改革做了大量工作。该校是浏阳西乡3个区唯一的高级小学，也是浏阳进步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被誉为革命的摇篮。陈昌、夏明翰等老师热情澎湃，诲人不倦，而且身体力行。在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下，学生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不少人思想得到升腾，向往革命。在大革命时期，有一批毕业于金江高小的学生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陈昌的两个弟弟陈安吉和陈安怀就是我在金江高小的同学，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并为我们壮丽的事业献出了生命：一个是在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一个是在广东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牺牲。另一位同学宋伯修，后考入广东国民革命军校为入伍生，亦在革命战争中牺牲。我的入团介绍人

熊振华也是金江高小的学生。

金江高小的革命倾向和广泛影响,使浏阳反动当局十分恐惧,1924年威逼黄甫笙校长辞职,迫使陈昌、夏明翰等离校,委派思想反动的邱培均任校长,学校的进步力量受到很大的打击。一所迈进在康庄大道上的生机勃勃的学校,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的烟雾里。进步师生纷纷提出抗议,当局仍顽固坚持他们的反动行径。

1925年,我在金江高小毕业,因无力升学,找工作一时又茫无头绪,有半年时间在家里闲住。1926年,到当地一所小学任教。其间,熊振华同志介绍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便一边教书,一边从事农民运动。当被选为区农民协会委员长以后,便离开教育岗位,专门从事农民运动了。此时,我才知道陈昌、夏明翰两位老师都是我党建党初期的党员。后来又惊悉两位老师先后于1928年和1930年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时年,陈昌36岁,夏明翰仅28岁。夏明翰在刑场上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至今仍广为人们传诵。陈昌被捕后表现也十分英勇,在法庭上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义正词严地怒斥国民党反动派,在绑赴刑场时沿途演讲,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推翻反动统治,就义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烈士牺牲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充分表现出他们为祖国、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英勇献身的崇高思想境界。

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期间,有一次我在毛主席处谈起

陈昌、夏明翰，说他们是我在金江高小的老师。毛主席对陈、夏的评价很高。特别称赞陈昌是一位杰出的宣传鼓动家。毛主席曾收到过陈昌女儿的来信，并曾亲笔回书，勉励她们进步并照顾好母亲，还汇去 300 元以作生活补助。可见，毛主席对陈昌烈士的革命情谊是很深的。

回忆起两位烈士的生平，心情激动不已。20 年代初的往事，至今犹历历在目。烈士的一生是短暂的，然而他们的离世，就像长空陨落的星辰，那刹那间放出的耀眼的光辉，永远留在人间，留在人们的心里。

冀南十个月来的抗日政权工作*

(1939年1月31日、2月1日)

一 十个月以前的状况

自七七事变以来,日寇积极进攻,以完成其第一期侵略计划,占领太原、济南之线。此时河北省府南迁,国军南退,各县政府县长相继畏寇潜逃,日寇占据某些城市(如威县、平乡、南和、任县、尧山、宁晋、蒿、栾、赵等),汉奸四处活动,各县组织维持会伪政府,以石家庄、德县、邢台、大名、威县、临清为中心,大量组织伪军(如威县清水警备旅,任县李道门、刘磨头,临清崔培德等),以统治冀南鲁西北,奸掠烧杀,惨不忍睹。同时日寇又利用“以华制华”的惯技,发动冀南各地土匪,在冀南内地大肆抢掠,且互相殴斗,以削弱我抗战力量。民众处于此种境遇数月之久,真所谓“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比较优裕之家,即设法南移;一般的平民听天由命,以为中国是被日寇亡掉了,只有坐以待毙;一般的知识分

* 原载重庆《新华日报》1939年1月31日、2月1日。宋任穷当时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副主任。

子,小学教员,每日翘首倾听我国军的作战消息,一遇到我国军胜利捷音,莫不欢舞若狂;另有一部分开明人士极欲组织抗日政府、民众团体、游击队,但在日寇汉奸维持会伪军压迫之下,亦不敢起来。此时冀南整个形成无政府的紊乱状态,真是一夕数惊,民不聊生,饱受各种亡国奴的痛苦,更谈不到抗日民众组织。一般人民总是热烈的盼望国军北上 come 拯救他们,以树立并开展在敌人后方的抗日运动,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以保卫冀南,配合全国的抗战。

二 冀南抗日局面的开展及 抗日政权的建立与巩固

冀南人民不堪其局面之紊乱,和日寇的残酷烧杀及亡国灭种之惨祸,曾数次派代表到山西,要求国军东进,消灭驱逐日寇伪军,摧毁伪政权,收复失地。此时亦当太原失守,敌人占据平遥、介休之际。正太线韩侯岭以北,企图向南向西进攻。为支持晋东南危局,虽有河北人民之请求,然在军事限制上,无法派兵东进,直至今年1月,路东人民再三请求,只得由冀西部队中抽出一部分兵力东进,为共同支持河北危局并函请河北民军张荫梧先生派人在冀南协同开展工作(可惜派去一人不久托故返山西未回),以协同我冀南民众,消灭与驱逐日寇部队,摧毁伪组织,建立抗日政权。在10个月政权过程中,大概可分为建立政权、推行行政工作与领导战争的三个方面来说。

(一)建立政权的经过

自我八路军派一部兵力东进后,于1月间收复隆平、尧山两县,建立该两县之抗日县政府,继续东进钜鹿、南宫,摧毁钜鹿、南宫维持会,争取与改造其伪保安队,建立抗日县政府,建立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委会),及各种救亡群众团体。此时以南宫为中心向周边开展冀南各县工作,一方面以部队经常威胁与打击威县日寇清水部队,并切断其西与邢台、其东与临清之交通,并将汉奸赵山峰部队消灭大部。清河、冀县、枣强、宁晋、束鹿等县在广大民众威胁与觉悟之下,前后取消维持会,建立抗日政府与民众团体。威县清水警备旅千余人全部反正投入抗日军队,许多被迫而为土匪的,亦服从国军坚决抗日,不再为日寇以华制华之政策所利用。3月30日我八路军东进纵队一部占领广宗,伪保安队反正,逮捕维持会副会长两名,在民众中公审,一致表决执行枪决。正在我八路军129师在涉县西响堂铺烧毁敌人汽车180辆,消灭敌人得到胜利之时,我收复广宗部队继续西进,将20年来未被攻破号称小梁山泊之环水村所盘踞汉奸刘磨头部队全部消灭,缴获枪300余支,于5月2日克复任县,缴枪五六十支。继又收复南和,为把整个冀南联成一片,决心消灭威县、临清之敌,于5月9日晚同时袭击威县、临清二城门,因城墙过高,且城壕有水的关系,同时日寇汉奸指使在后方捣乱,杀害我抗日将士,未得将威县、临清城攻下,反在威县一战伤亡我指战员300余人,敌人伤亡亦甚重。威县、临清敌受严重打击后,及受我军长期

的困围与游击战争的空舍清野，交通线切断，不得已突围西窜。我军遂收复威县、临清、平乡三城。乘此胜利派队继续南下，经过数次战斗，相继摧毁曲周、永年、临漳、广平、肥乡、成安、邱县等县之维持会，争取与消灭其伪保安队，将驻永年数县之汉奸首领肖学成生擒，恢复抗日秩序，建立抗日政权及民众抗日团体。同时我派出一个支队东进，与在津南坚持抗战的游击队配合，克复宁津、乐陵、广庆云等县，同样的建立抗日政府与民众团体。经过先后浴血战斗，我指战员的英勇牺牲流血，民众亲密配合与帮助，才把冀南各县伪政府，日伪军初步肃清，土匪亦先后归服，把冀南统一起来，并且把冀南与坚持在华北抗战的吕正操先生，鲁西北专员范筑先先生，直南专员丁树本先生，联成一片，造成一个抗日根据地，使整个民众除平汉、津浦两路点与线外，从日寇铁蹄之下解放出来，得见青天白日旗帜。由此民众亦知道了人民本身力量团结的重要，更证明军民团结在此抗战时期更为重要。3月国民党颁布《抗战建国纲领》，^①5月徐州失守，我最高抗战领袖蒋委员长，发表持久抗战谈话，^②民众益加兴奋，遵照《抗战建国纲领》方针，进行行政工作与民众运动及民生改善之各项工作，抗日运动日益展开。总计我军东进

^① 《抗战建国纲领》是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其内容包括抗日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个纲领一方面被迫对人民作了某些形式上和口头上的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同时又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

^② 1938年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和国防联席会议，确定“持久消耗战”为中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不久，国民政府颁发的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也明确提出以“持久战”为作战指导的基本主旨。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战”，主要不是通过自己的积极作战，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以达到最后战胜敌人的目的，而是拖延时间，以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依靠国际力量形成对敌优势，最后取得胜利。

纵队在这6个月中,大小战斗经过50余次,收复20个县城,我军伤亡指战员战斗员总数在一千数百人以上。由此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冀南今日局面是从浴血战斗中以血和肉换来的,亦为冀南1000万民众奋斗牺牲而得来的。这说明了军队与冀南人民与冀南政权的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关系。

(二)行政工作的推行

在各县政府、战委会及各种民众抗日团体,都是由民众斗争中创立起来的,因此一切由民众自己选举最优秀的分子,来担负这些工作,一切工作均以民意作为依归,但是缺乏一个总的机关领导他。河北省政府南迁杳无音信,不得已由各县抗日政府及群众团体士绅名流及抗日之各军队,提出号召站在统一战线原则上,不分党派阶级军队职别,在2月间召集各县政府、群众团体及军队代表,经过各方面协商与讨论,成立冀南军政委员会筹备会,筹备冀南行政机关之建立,并统一指导各县行政及民众运动。前后召集3次代表会,在统一战线精神下,在蒋委员长持久抗战方针下及抗战建国意旨下,决定许多重要的行政工作及民众运动。如政府工作人员薪金减低,建立游击队,规定县政府组织,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战委会组织与工作,农会自卫队的组织与工作,减租减息的决定等等,且调解了军队与政府互相的许多纠纷与不必要的摩擦。军政委员会筹备会在职权上,仅仅是筹备的性质,然而某些工作已超过了他的职权以外,有时在推行时有不少的困难与顽固分子的阻碍;同时河北省政府曾重新改组,民众极其渴望其北迁领导,因路程遥远,两

月以来亦未见北来消息。为使冀南政治走上轨道，创造冀南抗日根据地，在全冀南民众要求之下，于8月间各县代表开会，一致决定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并选举七七事变以后在河北坚持抗战的杨秀峰先生为主任。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以来，即本着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及鹿主席^①宣言，以及民众的意旨，发表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八大施政方针：

(甲)动员冀南人力物力财力智力，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坚持华北抗战。

(乙)拥护中央政府蒋委员长及鹿主席领导，彻底实行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之抗战建国纲领。

(丙)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体同胞，建立坚强的冀南抗日根据地抗战到底。

(丁)建立民主的廉洁的有工作能力的各级抗日政府，严惩贪官污吏。

(戊)整理各县金融，发展农村经济，提倡土质生产，击破日寇破坏我华北金融之毒计。

(己)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合理税收，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并在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改善人民生活的原则下，安定民生，发挥人民之抗战积极性。

(庚)实施抗战教育，普遍组织民众于战委会、农会、工会、妇女会、学生会、商会、自卫队等抗日救国团体之内。

^① 国民党政府委任的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

(辛)肃清汉奸敌探,实行抗日戒严。

同时为着抗战的需要,及尊重民众的意见,接受了冀南军政委员会筹备会许多重要的决定。该署本身决定许多重要行政工作和民众运动工作;各政府各级人员生活费最高限度每月不得超过 20 元,规定最少的办公费,扫除了过去一切营私舞弊升官发财的行政恶习;成立调解委员会;修改了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建立战委会与群众团体工作;成立冀南工、农、妇、商总会;在国民党二五减租原则下,决定了五一减租半分减息;整理财政税收及各县流通券;决定了拆城破路秋收藏粮,规定新的适合抗战需要的公文呈式;并创造许多新的艰苦的行政工作作风,而在敌人后方树立起真正能与敌人对抗,又能与人民打成一片的抗日的廉洁政府。

各县县政府之县长及行政人员,多为乡村中的知识分子与教员,虽然缺乏行政经验,然而在抗日坚决,工作积极,生活艰苦,接近民众上说来,是具备了这些条件的。同时救亡人员亦多系乡村中一般热心救国“不为名利”“不避牺牲”的青年及士绅名流,不分党派阶级结成牢不可破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手携手肩并肩积极工作,大家心都是一个。为着配合全国持久抗战,坚持华北抗战,创造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伟大任务的道路上前进,并抱着极大的决心奋斗的!

(三)加紧战斗准备与领导战争

冀南处在平汉津浦两路之间,黄河以北,在军事上威胁

平汉、津浦两铁路,特别是威胁敌人作为转移兵力枢纽之石家庄。武汉危急之时,冀南青纱帐下,我们预料在武汉失守以后,或在相持之时,敌人一定要集中相当力量肃清华北,向冀南作残酷的进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为着号召冀南广大民众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保卫冀南抗日根据地,除在民众中进行广泛的深入的战争动员与战争准备工作,曾发布一个战争动员紧急命令,原文如下:

“敌人现在正集中可能的兵力围攻武汉,作灭亡我全中国的疯狂进攻,武汉情势是处在十分严重的局面,同时又抽调一部分兵力开始肃清后方,摧残我抗日根据地及广大的群众生命财产,估计华北将转入严重艰苦与万分残酷的战斗环境中。目前敌人对晋察冀边区的进攻,除烧杀外,还施放惨无人道的毒气,这是扫荡华北计划的开始。敌人继续调集兵力(现在已将国内新编 21 师团调到华北),向河北山东平原及向晋东南晋西北进攻。近来进攻肥乡、永年、尧山的行动,以及南和、任县被敌占领,就是铁证。因此冀南严重局面,是必然到来的。

“目前冀南的局面不是开始的局面,更不是最终的局面。快要到来的对冀南的围攻,敌人采取最惨酷的烧杀政策,我们将处在最严重、最困难、最惨酷战争环境。政府、群众团体将要随游击队打游击,人民亦须帮助军队作战,军队亦须昼夜不停打游击与敌周旋。这些我们事前必须估计到,否则敌人极残酷的围攻,政府将形成张惶溃乱,甚至趋于解体。

“因此我们在保卫武汉、保卫西北、坚持华北抗战整个的任务下，我们的具体任务，是坚持冀南游击战争，粉碎敌人对冀南的进攻，巩固与坚持冀南抗日根据地，配合山西、山东、河南的游击战。我们必须在各级政府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我们各级政府急不容缓的工作是：

“第一，健全各级政府的政治机构，紧缩政府机关中的组织，裁减不要紧的人员，洗刷贪污腐化分子，缩减预算的支出，做到短小精干以适合战时需要。

“第二，坚决迅速实行几个重要抗战法令，如减租、减息、赈灾、公平负担、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立即取消任何摊派制度，这务须 11 月 10 日做到。

“第三，健全与充实各群众中的组织与工作，发动群众积极参战，改善其生活，并在政府群众中开各级会议，进行广泛与深入的战争动员，使每一个人都有战争准备，并知道是自己的责任，进而积极参加。

“第四，各县应根据本署办法，筹集大批的救国公粮，以供战争需要，这一工作需与战争动员密切联系起来（筹集公粮，请各县自行讨论办法，报告本署）。

“第五，城墙土围碉堡，一概彻底拆平，免为敌用。公路除挖深沟外（宽 2 丈，深 1 丈），一律改成耕地，施种麦子，限 10 月底完成，同时经过群众团体，发动群众藏粮（特别沿大路村庄），准备必要时清舍空野。

“第六，县政府各种卷宗，各科应用袖珍日记本记载，其原本必需妥善存藏，并保存收支转发文簿。

“第七，各级政府及战委会，对防空防毒常识，对一般群众应加紧宣传、教育，作种种准备及演习，以免敌人施放毒气及空袭时，遭受重大牺牲。

“第八，各级政府，特别是县长，准备一切在敌进攻时应随游击队打游击。邻县有事应自动策应，不能坐视不理。城市失去，到乡间工作；本县不能立足，移到邻县打游击。总之，要反对毫无准备，敌人一到就四散逃跑的现象。

“以上八大工作的完成，决定将来战争准备的一切，也决定政府本身如何参加游击战争，如何领导军队民众来开展游击战争。同时，抗战法令的执行与否，决定将来在最艰苦的困难环境，政府与民众打成一片，以及提高民众参加战争的积极性。因此执行八大工作与将来战争，有决定意义的。

“各级政府接此紧急命令以后，应召集区村长及战委会主任，深入讨论。除政府本身决定执行完成外，更经过群众团体，深入到每一农村中去。

“动员了各级政府及群众团体，根据这一紧急命令，加紧战争工作的准备。政府一切工作人员，当组织无数工作突击队（而不是普通视察团），都为粉碎敌人进攻，争取战争胜利而努力奋斗。”

柏乡县虽全县均为敌人沦陷，而该县长朱××领导游击队，经常迫近柏乡城袭扰游击，数次击溃敌人。在民众中开会劝导，揭破一切敌人欺骗宣传，领导群众积极进行抗日工作。邯郸县长同样在邯郸以东地区，进行艰苦游击工作。

成安县政府亦经常随游击队行动，与敌作战。该县民众与日寇作战死亡者，在 2000 以上。此外，南和县长乾××、任县县长郝××、尧山县长沈××亦经常领导游击队，不顾一切与敌周旋。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在敌人进攻南宫时，该署主任杨秀峰不顾一切，在敌人将进入南宫城数小时前，在南宫城近郊领导群众破路。在敌人进入南宫后，公署迁移广宗办公，曾派了公署所有工作人员组织了工作突出队，分赴各专员区各县政府到乡村去帮助和突击战争动员工作。当时此种情况紧急万分之时，杨先生从容不迫，精神更加奋勉的领导着冀南各县的行政工作，而且还身临前线指挥其所领导的冀南游击队，击退由任县进攻郝桥之敌数百人。其工作之紧张，为主任公署成立以来所未有。

在抗日战斗中，由民众选举出来的抗日政府，他不但不逃跑，躲避困难，相反的在战争环境中，他需要向民众负责，领导民众起来为国家民族求生存求自由，为身家性命而斗争到底。他与民众同生死共患难，这是抗日政府的特点。

三 总 结

冀南的抗日政权工作，在 10 个月来获得了不少成绩，特别是从七七事变以来，河北坚持抗战，在手无寸铁，且无任何军事经验的一个白面书生北平名教授杨秀峰先生领导下，坚定的把握着统一战线而艰苦工作着。在行政方面，在

民众运动与人民武装方面,均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就是许多从南返回故乡的河北人们,莫不称赞,一致认为现在河北的一切,比过去都有组织,都有进步。在广大的群众中及农村的一般人民中,都开始懂得抗日、国家、民族以及持久抗战等问题。各级政府做到了“坚决抗日”,“廉洁”,“积极工作”的工作作风,不论农人、学生、工人、商人、妇女,都组织了自己的抗日团体。一般人民组织了自卫队,站岗放哨盘查来往行人,捕捉汉奸。国军作战时,地方人民及自卫队都积极参战,自动的帮助军队,带路、送消息、送饭送水、送给粮食。特别是在火线上,一群群的老百姓,冒着弹雨,不顾一切,帮助军队抬伤兵。妇女及老小一个一个的送糖、送纸烟、送粮和青菜,使得受伤战士都表现得非常激昂,提高了他们的作战情绪。这些事实表现了什么呢?事实说明,这都是冀南抗日政府的正确领导,与艰苦工作及斗争所得到的成绩。这不仅是政府的力量,而且是人民的伟大力量。

虽然表现了这些成绩,然而不可掩饰的还有许多缺点:

(一)许多政令,还不能很好的普遍的在广大地区实行。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推行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某些顽固分子在阻碍着。

(二)一般的民众组织宣传训练工作,不够普遍深入,因此,有些机关不能很好的建立自己本身经常工作,缺乏有计划有组织去推行与检查工作。

(三)农村统一战线工作尚嫌不够,因此未能将所有抗日的人士集中起来,和加入抗日团体中去。有个别的还站在

救亡圈子以外，观望不前。

(四)改善人民生活做得非常不够，还未依照抗战建国纲领执行，致人民在抗战中，尚未能很快的改善自己生活，而提高其抗战积极性。

(五)在战争动员与战争准备上，还未能做到充分与圆满。当战争到来，政府群众团体打游击准备不够，个别的救亡团体无形中停顿了工作，自卫队停止站岗放哨，敌人一举一动不能及时侦察报告军队，拆城墙破路工作及民众空舍清野，藏粮工作尚不彻底，加上日寇的欺骗宣传与小恩惠，或暂时讨好极少部分人民，对日寇发生某些幻想。这说明我们平时工作不够，到战时暴露出我们的弱点。以上这些缺点都值得我们警惕的！

可是某些人，他不去或者不愿意去正确的认识冀南抗日政权工作的成绩与我们的缺点，而一味不顾事实，抹煞成绩，歪曲真理，来进行不正确的批判。或者用一些不适合今天抗战环境的观点来看问题。

(一)机械的合法观点——本来在今天的一切，应把握着“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着抗日”的原则，尤其是在敌人后方如何团结一切力量，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域中摧毁了伪政权，消灭了日寇汉奸恶势力，而人民自动的树立了抗日的新政权，在民族国家的观点上说来自无不合法之处。我们今日对问题的看法，只谈抗日与不抗日，也就是合法与不合法的标准。而某些人故意要在政权已经树立，工作正在胜利推行的时候，来曲解事实，认为

未经政府批准,如何不合法。在执行中他并不能将工作推向前进,而是向后拉倒车。这样对沦陷区域中抗战力量的团结只有损失,这种机械的合法观点是不对的。

(二)不适合抗战需要的公式主义——本来在敌人后方建立的政府行政人员,多为过去不会作官的乡村知识分子小学教员,或为热心爱国的青年。可是有人偏要批评这些人“抗日精神有余,人情世故缺乏”,换句话说,“不会作官”,不会“等因奉此”,更不会“逢迎上级”、“拍马屁”,只知为民族牺牲抗战到底。而这些纯洁抗日的人们,反要遭到排除或撤换,这是沦陷区域中团结抗战力量的原则吗?

(三)钱少买不到好货——一个抗日政府的行政人员,应做到“坚决抗日”,“廉洁”,“艰苦”,“与人民打成一片”,因此而决定了把所有行政人员生活费作一最高限度的规定,这是沦陷区域中应该的而且是必须如此。而某些人偏要把“廉洁”解释为“钱少买不到好货”。

此外形形色色的观点还很多,不愿意多写了。我们希望这些抗战的人们,改变他们的观点,改变他们的作法。

冀南目前战斗局面更加严重了,战争动员予冀南政府民众与军队的任务更重大了。我们只有更加团结,避免一切磨擦,消除成见,尊重民意,维持冀南现状,并积极推向前进,以坚持将要进入第二阶段更艰苦的冀南抗战的局面。

纪念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一周年*

(1939年8月)

(一)

冀南也可说是河北全省在前年年底的几个月中,因日寇的进攻,整个区域陷于无政府的状态,各城市均为日寇或伪军所占领,各地成立维持会,敌伪四处窜扰、奸淫、烧杀,尽其极事欺骗蒙蔽与之俱施,再加毒化匪化政策之结果,致土匪蜂起,三五成群,百八结伙,打村劫舍,抢户架票,鸡犬不宁,一夕数惊,使全冀南同胞除受日寇蹂躏外,更加一层匪患痛苦,真是所谓民不聊生,度日如年。而肥沃的田园,亦因民众之无心耕作而濒于荒芜。此时村中则横宇颓垣,焦梁烂柱;田中则禾草并生,不分垄亩,触目凄凉,言之伤心,真乃冀南民众之浩劫,亦中华民族之不幸!更由于敌人的政治欺骗,因交通隔断,对抗战情形不能有力证明,致使恐日心理日形加深。因而,各地政府不敢坚持工作,随军逃跑,从此

* 原载 1939 年 8 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周年纪念汇刊》。

则冀南民众群情惶惶,无所依凭,在政治上失败失望情绪更加发展,敌伪汉奸更乘机猖狂!

自从前年年底,国军受命于蒋委员长及见允于人民,遂东进抗日。在半年浴血斗争中,由于军队将士用命,由于人民的努力奋斗,消灭与击溃了冀南的日寇,打击与争取了伪军,摧毁了伪政府、维持会,由民众公选了县长,成立了抗日政府,并广泛的热烈的成立各种群众抗日组织——战委会、妇救会、青救会、工会、农会、商会等。平汉路以东,沧石路以南,大名以北,天津以南,整个冀南 40 余县成为一片干净土,青天白日的旗帜重现于各城市镇,以至乡村的每一角落。拥护蒋委员长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坚决抗战到底,拥护国共合作,坚持敌后方游击战争等标语,在每一个村庄墙壁上出现,活跃热烈的心情,表现于每一个人的面孔,由此奠定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基础。

由于各县抗日政府的成立,民众运动的开展,需要一个总的领导机关来更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各种抗战工作,统一冀南行政与民运。于是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由各党各派各军各县政府各群众团体代表组织了冀南军政委员会,负起领导行政民运之责。它是统一战线的机关,皆感冀南有成立一最高行政机关之必要。经数月工作之经验,军政委员会全体代表决议,改组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从此,冀南行政走上轨道。

(二)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自成立到今天已整整 1 周年了。它在冀南平原上坚持了 1 年的工作，支持了 9 个月残酷的战争，曾经领导了各级政府及全体民众配合抗日军队粉碎了敌人对冀南的第一次进攻，取得了胜利；敌人第二次对冀南的进攻计划，已遭到我们初步的打击，我们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并正在继续争取胜利；支持了许多人所不能支持的困难局面。在政府工作上，遵照中央抗战建国纲领，颁布了战争动员、公平负担、优待抗战军人家属、破路拆寨、减租减息等等法令，救济了被敌人烧杀和因敌决堤而惨遭水灾破产的灾民难民，帮助了一切抗战军队的供给与战争工作，扩大宣传，四处召集群众会议、村区长会议、士绅名流会议，宣传平原游击战争胜利条件及如何坚持工作，坚定了民众胜利信心。在民生问题上，公允调济各阶层的利益，达到阶级合作、团结御侮之目的。以上都是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一年以来所持之工作原则，也是它的工作中心。

在一年来坚持沦陷区域抗战过程中，它在全国抗战上有很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昭示全国人民：

第一，证明在沦陷区域在敌后方坚持抗战，坚持政府工作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只要我们能够坚决把握统一战线，依靠广大民众力量，在敌后方的政府是能够存在，而且能够工作的。打破过去一些县长专员们不敢在敌后坚持工

作而逃跑的成例。有战略意义之晋冀察边区政府之成立，说明在敌后方能够坚持抗战。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亦在说明敌后方，而且在平原地区上，同样能够坚持工作，这对全国抗战配合有重大的意义。

第二，不但证明能够坚持抗战，而且在敌人两次对平原“扫荡”的进攻中，说明在平原上边能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这主要靠广大群众的协力。在太平时候固然有不少的人可能在这里坚持工作，可是一到敌人进攻和疯狂“扫荡”时，便不免因看不到人民力量，而表现无办法，结果只有逃避。可是我们是在十分困难情形下，在广大人民群众协力之下，坚持了艰苦游击的局面，吸引住几万敌人，配合了全国作战。

第三，一年来人民对自己的政府是尽了批评监督以至撤换的责任。区村政府大部分是人民推举出来的，县政府大部分是经过民选的，专员及主任公署更是民众选举的。对于不能胜任及不能坚持工作的村区县长，赏罚严明加以调换。因之，各专员各县长都是确切能够在最艰苦最困难的环境下坚持工作的。过去不是有很多人说什么人民无知识不能参政吗？今天事实粉碎了这种说法。今天在敌后方的人民，能够选择坚决抗战者执政，今天这些民选村长、区长、县长、专员是在敌人后方出现的，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抗战工作，这还不是铁证吗？

第四，只有从人民中间产生出来的政府，才能是最合乎抗日的民主的廉洁的要求的。因为它是民众公选出来的，一切都须依照人民的意旨，坚决抗战，有大众的民主主义作

风,生活是艰苦的,本身是廉洁的。今天各级政府,这一点是作到了,因为它有广大人民的监督。

第五,要在敌后方坚持工作,必须执行一切进步法令。这也是民主政府的特点。因为要发动广大人民参战,坚持抗战,除对日寇武力进攻外,还须对敌伪汉奸及动摇妥协者荒谬言论作思想上的斗争。为此必须在抗日原则下适当的改善民生,实行公平负担,优待抗战军人家属,救济灾民,适当的减租减息,调济各阶层间的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和阶级合作。如果政府不能如此公允的执行进步法令,则将挑起阶级斗争,造成不团结的现象,坚持敌后方抗战是绝对不能够的。

以上是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在一年来的艰苦工作中所得到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训了我们,也昭示了全国人民,只有如此才能坚持抗战,奠定全国各战区的配合,争取持久抗战的胜利。

(三)

在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 1 周年的今天,正是抗战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敌人是正在积极进攻西北与西南,特别是着重政治进攻。汉奸汪精卫在各地大肆活动,企图以“反共”的旗帜作为投降妥协的借口,企图成立伪中央党部、伪中央政府。由于汪派活动,某些顽固分子也在高唱“反共”的调子配合着。因此,投降妥协成为目前最大的

危险。

在国际上,英、日正在进行谈判。在内容上不论是否涉及中国抗战问题(当然不会不涉及这问题),然而张伯伦此种妥协退让外交政策在东方的重演,企图造成东方慕尼黑协定,掩盖日本侵略中国达到其牺牲中国抗战,牺牲弱小民族的目的,而维护其在远东利益。然而事实却会相反,不但不能如此,将会助长日本强盗的气焰,助长世界法西斯侵略国的侵略。他们这种行动,将遭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广大和平人民、弱小民族的反对和打击!

我们今天的政治任务,在国际上拥护和平阵线,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协定”,在中国抗战上是巩固国共亲密合作,继续坚持抗战,反对任何形式的投降妥协。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今天周年纪念的具体任务是:

第一,反对英国张伯伦对日妥协投降、牺牲中国利益的外交政策,反对任何形式下的东方“慕尼黑协定”,说明这种政策是掩护日寇侵略中国,助长世界法西斯的侵略。苏联至今仍坚持援助中国抗战,我们应扩大宣传,号召英国人民立即制止张伯伦退让政策,而继续援华政策,号召全冀南人民,起来反对此种政策,坚持抗战,自力更生。

第二,反对汉奸汪精卫,反对我国内部因张伯伦对日投降而表现的动摇,反对任何形式下的投降妥协,继续坚持抗战到底,把日寇驱逐到鸭绿江边为止。

第三,健全各级政府的政治机构,充实各部门工作干部,改进和加强区村政权,建立中心村制度,建立政府中各

种工作制度,充实民主主义的作风,使政府工作飞跃的前进。

第四,使政权更加民主化,发动广大人民的参政运动,建立各级参议会,接受人民的意见。

第五,更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特别是农村统战工作。切实检查农村中统战工作幼稚行动,检查各种政策的执行,协调各阶级阶层的关系,促成阶级合作与民族团结。

第六,正确的实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切实整顿田赋税收,取消苛捐杂税,减轻民众负担。发动生产运动,提倡土布小盐,增加生产。

第七,在抗日原则下改善民生,彻底实行公平负担,适当的减租减息,正确的优待抗战军人家属(依本署办法),救济灾民(特别是水灾)。

第八,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抗日军队的热潮,宣传参加抗日军队是最光荣的。反对任何军队派兵抓兵买兵而阻碍民众参加抗日军的积极性。广泛的组织游击队、游击小组,加紧健全与整顿自卫队的组织与工作。

第九,加紧一般的抗日教育,各地开办夜校,督促各小学开学,实行抗日教育,反对奴化教育。

第十,加紧敌伪军工作。各县各专区与军队、群众团体,协同组织敌伪工作委员会,领导敌伪军工作,实行争取瓦解敌伪军,号召他们反正。

以上是我们的具体任务。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是艰苦的,伟大的,只有举起三民主义的旗帜,在中央和蒋委员长

领导之下，坚持敌后方抗战，一直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到鸭绿江边为止！

讨逆工作简略报告*

(1940年11月21日)

第一,叛军情况

叛军的政治欺骗——石(友三)^① 逆对部队宣传欺骗的中心是以“抗日”为名,而进行勾结投降日寇为实。甚至为掩饰其投降日寇的丑态,石匪讲话时说:“过去在山东时代与共产党合作,是为利用共产党发展自己,现在亦是利用日本发展自己”,以隐蔽其汉奸真面目。在石逆告官兵人民书中,满口的赞同“马列主义”,与满口说自己是“唯物论辩证法”为看事物的方法,不过只反对共产党,今天的做法一切归罪于共产党,共产主义今天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此外如共产党杀人放火呀!共产共妻呀!共产党是俄国的走狗呀!等等老一套,仍然在宣传着。总之完全是托派的一些理论。石办

* 奉八路军总部命令,宋任穷与程子华共同负责统一指挥冀中、冀南、冀鲁豫部队进行讨逆战争。

① 石友三(1891—1940),吉林长春人,反复无常的国民党军阀。1939年后,任国民党军第39集团军总司令,在河北南部和山东西南部专门联合日本军队进攻八路军,摧残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

冀鲁豫中学，收高级小学程度以上学生，强制入学，现约 80 余人，加紧反共教育，准备村长及政工人才。令每村办小学。

经过我军的政治进攻，与石友三投降日寇事实日益表面化，一般人民与其部队官兵都知道石友三是当了汉奸了。其具体事实是：

地方群众，特别是受到叛军的蹂躏及日寇直接援助石逆的地区群众，特别清楚地认识了石友三的汉奸事实，老百姓知道石友三的通敌事实比我们更清楚。濮县、观城的群众过去对我们的认识非常不够，且有部分人相当顽固，经过这一个时期的实践，一般群众对我们的态度好了。

石逆内部官兵对石友三汉奸的事实，一般都知道，石嫡系部队比非嫡系部队更清楚这一点。表现为：

1. 严重的逃亡。如冀南清河一县逃回 400 余人，垂阳 40 余人。9 月份濮县政府打路条者 50 余人，元城县政府打路条者 30 余人，清丰县 40 家叛军家属逃回者 21 人，这仅是一个不完整的统计。又据俘虏供称：石友信^①部逃亡也十分严重，如 1 团 2 连只剩 23 人，2 团每连平均只 40 人。又据石部逃兵说，石友信部刚从山东的曹县北上时，每连平均 120 人，至 10 月份部队合编，两连合编一连，每连仅六七十人不等。

2. 打日本负伤的人员不满，他们表示打日本负了伤，今天投降日本是不愿意的。如几个干部(营长)在济南医院

^① 石友信，石友三的弟弟，汉奸。

养伤时,向我在该地住院休养者(他并不知该人是八路军)表示对石不满,伤好后回家(河南)。其次,叛军配合清丰日寇伪军“扫荡”清丰附近时,伪军打老百姓的鸡吃。叛军说你们这些汉奸为什么这样干?伪军答道:“我们是汉奸,你们自己又是什么?”叛军中因此有人流泪。在叛军士兵中,经常说笑,互相讥笑说你是汉奸,最后结论是,我们是小汉奸,石友三是大汉奸。

3. 好多叛军愿意我们去打,好乘作战逃跑回家。每次战斗中,叛军都有乘机逃跑的。

4. 叛军内部仍存着矛盾,如这部与那部之间的矛盾。孙良诚企图编邵鸿基的部队未成功,现石调邵靠近高树勋,有被高编说,孙对石不满。

叛军欺压群众的情形:叛军每到达一地即实行清乡,大捕杀救亡人员、抗日政府人员、共产党员及八路军家属。然后实行保甲制度,压迫群众帮助叛军修筑工事,行动不许有自由。叛军一切吃的、穿的、用的完全取之于民。如今年冬衣每亩地派布8尺,棉花3两,扣子、颜料钱2.5角。征粮食每亩地每天半斤,后改为4两。现叛军地区每亩约出16元,群众生活痛苦异常。按我们估计,如此下去,每亩每年出产物不够供给叛军。特别使群众最为难的就是派兵抓兵,每村300户以上者50余人,200户以下者20人。

第二，会门情况

会门的起源。本来河北、山东的会门是很普遍的，其性质为保卫家乡，反对苛捐杂税的封建组织。石逆煞费苦心，在山东的曹县附近收容了一批地痞流氓，经过训练，成为一批会门专家，名为师付。他们在濮阳东南之徐镇利用该地徐三爷（是个已死的人）的庙，编造出很多神话，并经过很久的酝酿，在该地成立了快刀会，到各地传教，特别在我根据地闹得很凶。这是石友三北上时有计划搞的。

活动的方式，首先是以抗日反叛军为号召，到处组织。甚至在有些地方，还与叛军有些小接触。因此可以组织很多的群众，并且可以迷惑我下级党组织与政府，帮助其组织发展会门，企图以此来代替反叛军的群众组织与群众运动。与叛军冲突后，叛军即派代表与会门接洽，逐渐与叛军来往。最后经过神的口谕（即石派来的），不能打日本的十军团，要打八路军。这样，使会门转移视线，集中力量，坚决反对八路军。特别是利用我群众工作中的弱点及我政策的错误，坚决反对我村区政权及群众工作人员。由此会门组织疯狂发展，几乎使冀鲁豫边区全部及鲁西一部，完全成为会门的世界，威胁着我的一切工作。10月中旬，是会门登峰造极的时期。

会门的现状：会门经过我积极的政治争取，在某些地区配合以必要的、适当的军事打击，同时，加上石友三要组织会门反八路军，又要向会门要款要粮以及对民众的高压与

烧杀政策,特别是要兵,其会门领袖又系外来人,与当地人民没有深切的联系,故会门逐渐脱离石友三的影响,由疯狂而走到沉静的状态。现在一般的会门是:一部分觉悟,倾向我军,与我们共同反对叛军;一部分则守中立;还有一部分则仍在暗中活动。

第三,对叛军的政治进攻

我们对叛军的政治进攻,首先在第一期,是广泛地在群众中揭穿石友三勾结日寇汉奸的事实。召集各种群众大会、士绅座谈会,请石逆俘虏到会讲话。各纵队政治机关,按实际情形,印发传单;用冀南专署、鲁西专署的名义出布告,宣布石之罪恶及号召叛军官兵回家,并利用俘虏官兵发传单。至今,这一群众工作已收到相当成绩,使群众大部分知道石友三是当了汉奸。在俘虏工作上,释放了一批俘虏,左翼队放 100 人左右,中央纵队放 70 人,右翼队放 60 人左右。不过,放俘虏开始都是放难于争取的。使叛军都了解了八路军不杀俘虏,揭破石军说八路军杀人、活埋俘虏的欺骗,促成叛军内部更加动摇与严重的逃亡。有些逃兵逃跑时,到我抗日政府打路条。然而,这个阶段的最大缺点是,没有进行叛军内部的组织工作,因而整班整排逃跑还少见。10 月份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训练人员,派入叛军内部。现在,已在叛军中建立了一些关系,同时在叛军驻地建立党的支部及政治据点,可以得到一些情报。并且已在叛军附近建立

游击小组。但这一工作还是做得不够的。

各纵队都在进行政治进攻。首先,对这项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还是非常不够的。有些人还是认为以打为快。开始讨逆时,还有杀俘虏的现象,后严格纠正了。其次是,反叛军的地方,游击战争发展的非常不够,对叛军的粮食斗争全靠正规军,游击队对这一工作帮助很少。再其次,地方党政机关在讨逆开始时,忽视对叛军的政治进攻,直到最近还存在着这种现象。军队本身对叛军的具体情形,细心了解研究不够。总的说来,只注意了宣传工作而忽视了组织工作。

对争取会门的经验教训:

经过这一时期会门工作的争取与瓦解,综合起来有以下的经验教训:

1. 在会门尚未公开组织,正在秘密酝酿之地区,我抗日政府应利用抗日政府的合法地位,出布告禁止会门组织,并指出会门是不合法的。同时禁止村长代会门筹款筹粮,使会门在经济上受到困难,这种做法是有效的。

2. 一般的叛军组织会门,多利用地痞流氓,士绅不愿参加此项组织,因此政府通过士绅来制止会门组织也是有效的。

3. 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应加强配合,造成我在政治上占上风。打击以后应很好地进行武装宣传和召集士绅会议、群众大会进行解释,将罪恶归于会门首领与石友三,安定民心。否则易造成恐怖。

4. 打就要打痛,打时要沉着,反对轻视,反对害怕。

5. 一村一村去瓦解争取,集中力量打击孤立最坏村庄。

6. 军政党民应集中力量工作,打击以后发动群众,向坏首领要活人、要医药费,死了的要埋葬费。

7. 最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政策,实现进步法令,改造村政权,整顿民运工作,改善民生。

附几个指示

一、会门工作指示:

直南、鲁西会门正在发展,成为叛军破坏我抗日根据地及争取民众的重要部分,如让其继续发展,将对我讨逆战争及巩固根据地工作受到更大的阻碍,因此特提供以下意见:

会门的产生和发展,某些地区系由于我方政策不当,负担过重,部分纪律不好所致。某些地区由于叛军派人混入地方,首先以抗日反叛军的号召,组织会门。其会门组织成立后,即公开反共反八路军,反进步法令。而我某些同志不愿进行艰苦工作,企图以组织会门反叛军的办法,来代替反叛军的群众运动。

会门是反进步的封建组织,其首领多系地主,其群众系劳苦人民或真正痛恨叛军者。

我们对会门的基本方针是以政治争取瓦解,争取广大群众,打击孤立其首领,消灭其组织。不到万一不准军事打击,即使军事打击,也是为了政治争取。其具体办法:

1. 没有组织会门地区,特别靠近会门的地区,政府立即出布告,召开村庄士绅会议,并在群众中扩大宣传,宣布

会门不合法，揭破日寇叛军的阴谋。号召群众组织抗日自卫队或抗日讨逆自卫队。

2. 已组织之会门，正在反对叛军，尚未亲日反共反八路军者，我们应设法领导。反对叛军过程中，争取其中进步分子及群众，驱逐其坏分子的首领，逐渐将会门组织改为抗日自卫队，并建立各种抗日群众组织。

3. 某些会门已公开反共反八路军及反进步法令者，应利用各种关系，进行争取工作。争取其中进步分子及群众，积极揭破石友三的汉奸事实。必要时，以迅速手段打击会门的反动一面，或俘虏其首领，但不准随便打群众。然后进行政治争取解释工作。

4. 对有会门的区域，党政军民必须组织统一工作。在当前应特别注意政策，严防乱打、乱没收、乱杀等现象。担任此项任务之部队，同样应加强政策教育，严防破坏群众纪律。做到不筹粮食，自带菜金，并派得力政治干部领导。以上请按当前实际情形作具体布置。

二、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

今春讨逆战役，将石友三击溃，未能将其大部消灭。研究其原因，在其溃退沿途未能发动广泛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是重要原因之一。为着将来在新的讨逆战役中能更彻底与干脆地消灭石友三，目前应加紧游击战争组织工作。因此决定：

1. 在石逆住地附近，特别是濮阳以南广大地区，经过地方党的关系，组织与繁殖无数秘密的游击小组。军队应负

责调集游击小组长训练,并有计划有组织地抽出自己的干部,不要因干部困难而不抽去领导游击小组的工作,可能条件下发给枪支。

2. 地方党应设法利用党的关系,在叛军驻地建立我们的政治据点及秘密的组织群众,准备我军攻击时作内应。

以上两项,应秘密准备力量,埋头苦干,不要过早暴露,以待时机。

三、瓦解叛军的指示:

为执行彭左罗陆(彭德怀、左权、罗瑞卿、陆定一)30日未训令,坚决在政治上瓦解叛军,特规定如下具体办法:

1. 讨逆军各团,在叛军俘虏中选择最好的5—10人,由政治处分批加以训练,放回叛军,扩大我军影响,并设法组织逃跑。

2. 各纵队政治部与地方党商定,从地方抽调政治坚定的勇敢的有办法的党员,分批加紧训练后,设法混入叛军,进行耐心工作,组织一班一排逃跑。人数分配:左翼队政治部训练40人,右翼队政治部30人,中央队政治部20人。

3. 人员训练时,应研究秘密方式,分作几批办。

4. 濮县周围之暂3师、孟昭晋、孙良诚、张栋臣等部,归左翼队工作。柳下屯、六塔集之高树勋部及18师,归右翼队工作。观城之石友信师及齐子修部,归中央队工作。

5. 人员训练时间,限1个月完成,各部应以最大政治责任心完成此工作。

第四，军事打击情形

1. 在第一个战役组织上，给叛军以相当有力的打击，然而没有以必要的兵力对付日寇，致日寇得以破坏我之战役计划，而不能继续作战，取得更大胜利，而石逆也得在濮县站稳脚和逐渐扩大占领区。

2. 第二个战役出于叛军意料以外，我企图给叛军以大力的打击。在这个战役上有两个缺点：第一，右翼队集中部队时，对各据点敌人侦察不够，致遭日寇 6 路合击。在第二个战役中，仅左翼队 3 个团在濮县以南作战，右翼队不能参加作战。第二，左翼队作战时，既已查明濮县西南之前后郭龙、大小屯到沈鸿烈之第 4 团，带子弹 50 万发，钱 30 万元，同时敌到仅 3 天，工事亦不坚固，有突然将其消灭之把握，但在部署上平均使用了兵力，情况变化仍照原部署，3 个团袭击 3 个地点，仅以 1 个团去打击消灭大小屯沈之第 4 团，没有集中主力将其全部消灭，致失去了一很好机会，甚为可惜。

3. 此外，在一般的战斗上，还不能抓紧一切有利时机消灭叛军的外出部队，这也是由于我侦察工作不够，战术上机动不够之缺点。

冀南游击战争的坚持与 灾荒问题*

(1943年12月)

冀南的灾荒

冀南的灾 4、5 月间发现,秋收后才大量发展,总计占全面积 60%,计有敌灾、旱灾、虫灾、雹灾、水灾、病灾。在重灾下人口死亡占总数 5%,特重灾区更加严重。企之县二区 14000 人,死 2500 人,占 17%;广邱县死亡 14%,四区死亡 32%;东和固 1772 人,死 542 人,占 42%强;又企之县七村 7500 人,死 700 人。不是全被饿死,而大部是病死。人口之整个减少(逃、亡)者占 70%,牲口之减少重灾区占 90%以上。饿死、病死、逃荒者最多的是贫农,中农次之,地主富农极少。在成份上,据两县饿死者统计:饿死者赤贫有 1185 人,贫农有 1700 人;中农有 769 人;富农有 153 人。逃亡者:赤贫有 1900 人,贫农有 2400 人,中农有 1600 人,富农有

* 宋任穷时任中共冀南区党委书记、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主任、冀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80 人。

灾荒中支部、群众组织、村公所受到极大削弱，有些垮台。今年秋收很坏，不收获 5.5 成。调查结果：收 2 至 3 成者，收完吃完秋饱，中农冬饱；鲁西北六七成收成，但要买牲口、还帐，还是灾荒，到明春还是不行。

根据以上材料可以看到：

第一，群众中的生产力、劳动力大大减了，对于明年生产是很大威胁。贫农更成问题。第二，今年春荒，群众的牲口、衣服等东西都卖完了，到今冬则已经无可卖的了，故今冬明春比今春更严重。敌人的嚣张和铁壁合围也厉害多了。第三，群众经灾荒后，靠天吃饭的心理被打破，吃粮节省，少种棉花。

灾荒的原因：

第一，敌人对灾荒的制造。敌修碉堡、据点、沟墙占去土地 13 万多亩，人力消耗特别大，去年的资敌勒索最高每亩 300—400 元，最低 50—60 元（10 元 1 斤粮）。敌区之掠夺亦很厉害。

第二，我们主观的努力和领导不够。

首先，过去群众运动发动不够深入，忽视了生产，不在努力生产上想办法。如水浇地就可收五六成至七成的。这是我几年的最大损失。

其次，反掠夺的斗争不够，92% 地区皆系资敌区。

其三，严重的贪污浪费，干部党员普遍存在着平原富足，够用，不要生产的思想，不注意反资敌、反贪污浪费，机

关虽有进步，下层仍很厉害。假如及早努力反对贪污浪费，发展生产，灾荒是可以减少的。

过去思想上未打通，大唱冀南特殊论，不备粮不生产。

怎样进行生产救灾工作？

7月以前，对冀南具体情况了解不够，倾听群众呼声不够。其二是单纯的慈善观点，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其三，借粮未同生产结合起来。其四，未很好地从农业生产上着手，没有打井，没有从最困难的情况着眼，只是天天盼着下雨。

7月以后，在救灾实践中有了进步。见雨无希望，即发动群众挑水点苗，可惜未形成运动。再即打井（土井、砖井）。下雨后发动抢种晚苗，我们准备了大量的种子，形成了运动。

8月间提出了3个环节：军民努力生产，反资敌斗争，节约运动和4个步骤：保卫秋收粮食，种麦，打井，麦耕。

冬季生产救灾：纺线、运输、反资敌。纺线运动已展开，进行纺纱、织布、织毛巾，每天可织毛巾3至5打，每块赚7元，一人干活可养5口人。

明春生产救灾：种瓜，打井，春耕。

今明生产救灾关键在今冬，因为我群众的准备工作都在此间。要节食，明春再不要借粮。今冬要做思想准备，同时做组织上的准备、物资上的准备。

关于机关生产：

号召每人种1亩地。机关生产的偏向是未建立劳动观

念，所以离奇古怪地出现了这样的方式：贷麦种给群众，过年平半分，当二地主；动员群众牲口，损害群众利益。我们及时发现并纠正了。有些机关亲自动手去生产，这是正确的。

另一偏向，即对自己生产过急，减弱了对群众的组织与帮助。应使二者很好结合，严重的地区只要和群众结合，就能够搞好生产，明春当准备争取自给自足两个月的粮食，可减轻人民 2700 万斤粮食负担。

生产救灾工作中的收获与经验。

收到的成绩：雨后种小菜(蔓菁)、萝卜，每亩四五百斤，我们发了小菜种及萝卜种。种麦，播种的占 25%—30%，多至 70%，贷麦种 200 万斤。抢救水灾，打了几十里路堤(5 分区、6 分区都打了，县长、专员未睡觉)，隐蔽活动的小部队也出来打堤了。

灾荒了，父母妻子不相顾，这时政府还关心他。这也能打破靠天吃饭的心理，群众都准备明春打井，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过去冀南群众工作不深入，支部问题很多，现在则大大地转变了。必须以支部为核心加强领导，村级干部切实负责使成为群众的自救运动。

群众生产热忱不高，但我们的干部一动手拉犁，帮助群众生产，这样就与群众密切结合起来。

冀南灾荒，一面给了我们以大的困难，使群众元气与各种工作受了大的损失；另一方面灾荒也改变了群众的靠天吃饭思想，也锻炼了我们的党和干部，做的好将更加加强与群众的关系。

冀南游击战争是如何坚持的

去年上半年冀南敌据点、碉堡在 1000 多以上,敌主力可全部连接,敌 8000 多人,伪 3.6 万多人,共计 4.5 万人。现在敌人数量上减弱,但质量上加强了。

两年来坚持了冀南的艰苦局面,经验教训是:

第一,基本上巩固了统一战线。

冀南过去在统战上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这在 1939 年、1940 年时最严重,所以我们遇到很多困难。许多地区退出来了,如 1 分区的邯(郸)济(南)路及 2 分区的滏(阳河)西、3 分区的永(年)北、4 分区的威(县)、广(平)、南(乐),6 分区的枣强。永(年)北、肥乡的暗杀等更是严重,至 1941 年在敌“扫荡”中,见我干部工作人员群众就向外推,不理我们,不掩护伤兵。1941、1942 年敌之特务汉奸公开活动,会门组织起来了,军队干部、地方同志都产生悲观情绪。1941 年 11 月、1942 年 1 月两次高干会,在北方局领导下,对“左”的错误进行了斗争与清算,至去年 6 月,才真正具体地解决了群众工作及对敌斗争等工作,反资敌、减租息、借粮、反汉奸等工作比过去做得好了一些,基本群众有些发动。但未注意巩固群众组织,今年上半年又受了灾荒的限制。在反汉奸工作中提出了提高正气、镇压邪气,对地主富农进行了团结工作。经过两年努力,因统一战线工作有了进步,干部、部队就不像过去那样受群众排斥,而是积极掩护我们,不然

战士干部损失就多了，即地主士绅对我亦掩护。因我政策的转变，伪军也给了我以极大的方便，这对坚持斗争有了极大的帮助。

第二，组织形式、斗争形式基本上适合于冀南环境。

(一)所谓一元化领导的问题。这问题几年来未得到解决，给斗争造成极大困难。几次“铁壁合围”我们受了损失。在环境严重时必须实现统一领导，否则互相埋怨，互不协调，结果被敌打痛了，才觉得谁也离不开谁了。一元化领导只在组织上解决不行，思想上也必须要解决问题。

统一领导的思想观念，是党的整体观念问题，党是根据地的最高领导者。以前大家认为党委是书记的，别的委员不在党委整个利益下做工作，而只是站在本位工作上出发。这样，各个党委的关系、部门与党委的关系是很不易搞通的。冀南环境的严重，使大家都感到互相不能离开了，军队觉得没有地方不能生存了，地方觉得没有军队也不能保存了。冀南以整风精神解决军队、地方的思想问题收到了效果。

(二)精兵简政。太平洋战争后，中央即提出精兵简政，冀南觉得冀南富有，养得起，没什么，以后受了损失才开始觉悟。两年来精减了60%，精简相当彻底，但缺点是工作效率未提到应有的高度，只在组织上解决些问题，在作风上未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反“扫荡”的经验教训是要主动，不要被动。冀南已实行了三人团(指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组成的领导班子)的领导制度，大部分干部去进行整风，使干部少受损失。精简，过早简不行，过迟也不行。

(三)开展普遍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实行小部队活动。由大兵团到小部队是艰苦的斗争过程,也必须把思想打通。冀南在反“蚕食”中提出向敌后钻,向小格子里钻,这即是敌进我进的方针。分散活动向北开始。只有正确的指导,斗争才不会受损失。

在战争指导上提出巩固基本区、坚持游击区、开展敌占区,这是坚持根据地的基本原则。三个环节要很好掌握。过去一年,我们基本上做到了无处不到。

冀南小部队已分散了一年多了,给了我干部及部队以极大的锻炼。但因长期分散,战斗力削弱,军阀土匪主义生长,干部有些腐化了,有的投敌叛变了,这是小部队活动中的危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强政治工作,中心是干部问题与支部工作,一切通过支部,做好干部工作和支部工作,斗争的胜利才能有保障。

游击战争中的几个问题。

第一,游击战争的组成,除正规军、地方武装、人民武装外,还必须要加上广大的人民,否则不行,忽视这一点,就不能进行各种斗争。

第二,游击战争的战术思想问题,过去不明确,应主要是:①明确的政策观念,主要是估计各项工作是否符合政策。②明确的群众观念,战争是为保护群众利益,故我要从群众利益出发。“保卫粮食,政治攻势,反特务斗争,打击外出小股敌人”为我作战之4大方针。要宣传藏粮,劫回的牲口、粮食归还群众。③战术指导的普遍性,不要限于狭小地

区,要使每个角落都有游击战争,公开、隐蔽都有。④战术上的主动性,主动性即是结合群众、民兵反特,建设地道,这些问题解决了,即能活动自如,否则永远被动。

第三,县、区、村指挥部的建立问题,这就是战争指挥上的统一问题。取消大队部,统一到指挥部,县大队长、大队副、武委主任为正副指挥员,县长、抗联主任为正副政治主任。

第四,创造坚持小块游击根据地,这是平原根据地必然要出现的一种地区,是小部队生根的地方。这种根据地有两种:一种是敌区经我工作变成小块游击根据地;一种是大根据地被敌分割细碎了。前一种游击根据地往往不很巩固。我们怎样创造呢?

首先,派秘密人员调查了解该地情况:敌情、封建势力、伪军伪组织情形,在此基础上准备干部与自己的部队。在准备中主要是加强对干部、部队的教育,特别是各种政策的教育,并派人进行秘密工作及对知识分子、士绅的联络工作,这种准备工作必须好好做。

准备工作做好了,部队和干部即进入该地,纪律要严明,政策要慎重,扩大宣传我党我军的主张,开始进去后即做社会统战工作,一般的群众宣传工作,及伪军伪组织工作,站稳脚,不要急于打仗,有胜利把握的仗可以打,但切勿过于刺激敌人。但军事上有充分的准备,予来者以打击。

立稳脚后即进行群众工作,主要是减轻群众负担。要在斗争中改造政权,组织群众,对群众的一般问题要适当解

决，中心是减轻群众负担。对负担政策要特别慎重，一定要比敌人要的少。杀人要更加慎重，对最大的坏蛋，罪大恶极、群众痛恨的，可杀，但主要是争取，杀的人要使群众了解，还要使伪军伪组织了解。

对后一种游击根据地，因我过去的工作有一定基础，故普遍要求反资敌反汉奸，争取与坚持在各种负担上的合理负担。至于减租减息，因群众主要痛苦在负担，故不应在先。

反资敌内容即出粮与出夫。要根据既不使群众吃亏又不使地主富农负担不起为原则。此外要和反恶霸、反贪污与反资敌联系起来。实行反资敌、合理负担必须的条件，是我必须掌握政权，而且是“三三制”的。实行“三三制”不但可能，而且必须。

第五，活动方式和工作方式问题。

军队方面使积极斗争与隐蔽活动结合起来，既要积极对敌斗争，又要隐蔽活动，即时隐时现，显是为了隐蔽。地方机关要完全隐蔽。加强地道建设，改进军民地上活动，不是大地道而是本村地道。部队结合群众去挖，要有防毒、防水、防火的准备，要有武装，我们挖，老百姓也要去挖。加强和建立秘密交通线，干部来往一律走秘密交通线。

工作方式。不要开大会，要开小会，要细致研究，个别开会，个别汇报，个别传达。故组织形式要简，工作方式要讲究，适应今之环境。干部分散后，要特别强调干部的党性，用党的小组加强教育、开会批评。

第六，总起来说：

(一)必须把一元化领导的思想问题弄清楚。

(二)组织形式、斗争形式必须与客观环境适合,否则必吃亏。故要不断地研究敌人,不断地改造我之组织和斗争形式,保守的老一套是一定要吃亏的,即不要被动,而要主动。

(三)坚持根据地斗争,在干部中、党员中、群众中,必须做很好的思想准备和进行形势教育,使之有办法有信心。

(四)对斗争的群众性、政治性必须有很好的认识。政治性即利用敌人矛盾、敌伪矛盾。小敌与大敌,敌军与军阀都有矛盾,我可以利用之建立和平据点。如对伪军,我提出只打××伪军,别的伪军就不动了。群众性打仗、侦察都要依靠群众,打仗要和群众商量。政治工作亦要有群众性,如我在5分区突围时,群众为我部队作鼓动。伪军工作更要有群众性,对伪军上晚课;群众伪装成我军,不叫伪军违犯群众利益;对新换防之伪军,群众给我拉关系。没有群众作依靠,没有高度灵活的斗争原则,是不行的。

关于新区工作问题给中央局、毛主席的第二号综合报告*

(1948年10月10日)

中央局、毛主席：

关于土改区的土地调查及新区双减(减租减息),各地干部正在学习和准备经验,尚无系统反映。

最近我们这一段工作是以财经为中心,总结麦征,准备秋征,排除蒋币,发行中钞,建立战勤组织,动员常备担架。我区除1、3分区大部分地区为抗日时期的游击区外,其余6个分区均系日本投降以后及去年大进军以后建立的,这些地区大部工作仍为新区工作范围。兹将新区工作中几个问题报告如下:

第一,新收复地区,敌保安队及乡联防队除有一部随蒋匪主力撤走外,一部多化整为零分散若干小股活动,骚扰群众,形成非常混乱局面。因此新收复区群众首先就要求安定社会秩序,如阜阳群众开始就要求我们三件事:办政(建立民主政权)、安民(剿匪)、讲道(宣传我党政策)。因此我们根

* 宋任穷时任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书记。

据群众这种要求,抽调干部武装,派往新区,建立区乡政权,广泛进行宣传,以我老区武装为骨干积极剿匪,在军事清剿下进行政治瓦解。

其次新区群众对我们一切政策行动,甚至每一件小事都与国民党比,如比负担,比物价,比态度(叫大娘),比作风(言行一致、艰苦)等。因此我们到新区的干部一举一动,执行政策都必须十分谨慎,严格纪律。但是不少干部在新区发生抓押吊打罚,主要是为着要枪,如4地委发生要枪逼死两个贫农的事件,党委对干部不执行党的决议和逼死群众事件采取放任原谅态度。我们正采取严肃手段制止,并坚决纠正党委中包庇干部与群众对立的宗派主义。

再次,新区经过剿匪安定秩序后,由于过去国民党三征苛重,群众开始有清算负担不公的要求;同时由于在我们支前及征粮中的不公,群众也迫切要求劳动力与财力上的负担合理。因此我们应通过合理负担发动群众向地主阶级的当权派进行斗争,求得负担公平合理并改造干部。今年夏征及豫东战役中我们作得很不够。已在今年秋征及战勤组织中强调此一问题。

第二,新区发展武装问题。我区民枪甚多,在野旧军人亦甚多,地主阶级有武装斗争经验及应付南北战争的经验,这些人善于投机以把持武装,因此我在进军与发展武装上应极其慎重。因此我们建立武装队,由部队中抽人派往新区作骨干,在积极剿匪发动群众中个别扩大,或结合地方党与地方关系派出武装干部去扩大并加强阶级教育等。今春沙

南地区到处加委整股的收编土蒋匪，结果掌握不了，严重的破坏政策，脱离群众，影响极坏。后来整编了，只落下些花枪，跑掉的土匪头子，有的便坚决和我们对立。此种方式在新区不应再采取。关于群众武装，在群众未发动前而群众有自卫的要求，我们应从中积极领导争取领导权，否则很容易为地主国特所利用。今夏太和地区，我们干部在群众要求防匪口号下，曾发动组织联防，结果为会门（联庄会）掌握，杀人、派枪、抗粮草、抗担架。为解决会门，我们派去部队扩大宣传我党政策，争取瓦解，逮捕其首领后才平息下去。今春土改中普遍组织民兵，野战军也不了解情况，大批发枪，结果敌人进攻，仅2分区损失枪3000余，今秋8分区也损失数百。因此在新区首先应是我们武装积极剿匪，安定秩序，使初步发动群众后，才可建立群众武装，过早的建立群众武装是很危险的。目前在新区边沿区我们的部队和干部，由于要枪不择手段，首先是要枪要短枪，要好枪，因而发生起枪抓人、吊打人、罚枪的很严重现象，甚至有向地主要枪而逼死佃户者。我已严令制止，并专人检查逼死佃户案件，准备以此教育全党。并规定除土顽或地方公枪外，对民枪，在新区边沿区一律不准随便起枪，区、乡只有报告权，没有处理权；只有在我已控制较久并经初步发动群众，原地区才准由县委掌握，号召登记，由农会借作建立武装之用。

第三，新区争取知识分子问题。在新区开始时由于强调贫雇路线及政策错误，将可以争取的大批知识分子排斥了，因此在特务造谣“共产党不要念书人”下，少数附敌，大批逃

亡,或化装潜藏。如新蔡今是中学校长任之明,原系同情我党,由于我在政策上有偏差,致使任至今未归,那里知识青年因此对我们亦有隔阂。

自我们纠偏以来,各地召开座谈会,阐明党的政策后,知识分子逐渐靠拢我们,各地创办中学 10 所、建立军政干校各一,吸收学生 3000 余人(目前争取到外区参加工作及求学仍有顾虑)。学生入校动机:有的对旧统治不满,愿求真理求知,有的寻找职业,有的投机,借此维护家庭(不少请学校写信证明家中无枪,有躲担架的),有的仍在观望。尽管动机不一,总之敢于来靠近我们,就是一个进步,便于我之改造。

第四,新区财经工作,我们体验首先是抗日时期与自卫战争时期情况不同,抗日时期一切由小到大,因此军需供应容易协调。自卫战争时期,根据地仍是从小到大,而军队则是大兵团,对军需供应不能及时接济,增加部队困难及破坏群众利益。因此今后开辟新区地方工作必须首先解决财经问题,才能争取各方面工作的主动。其次,新区建立财经制度曾经引起抵抗,我们对此采取了坚决态度,特别中央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的决定,对此起巨大的推动作用。再就是我区财经发展估计在明春将发生严重困难,我们已作积极准备。

夏征工作问题。夏征在 8 月份综合报告中说:“除 1 分区因受战争影响尚未全部完成外,其他分区基本上已完成任务”。经过 9 月专员会议了解,估计过高,截至 8 月底止,

麦粮仅完成 2/3,代征款 1/10,尾欠正征中。在麦征中有以下问题:

1. 新区人民对我第一次夏征,因无经验,处处要将我们与国民党对比,故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在新区开始是极端重要的,人民对于我之 1 年征两次虽然一下子要的多些,但比国民党 1 年无一定次数勒索,则表满意,合计起来仍是我们征得少。如国民党征收人员任意用大秤,又往往要人民很远送粮到平汉路,因此对我一律用 16 两秤及就村征粮,非常拥护。

2. 新区初搞合理负担,发动群众主要内容为挤黑瞒地,因瞒地最多者为地富分子。新区人民在国民党时代即有全村互相包庇瞒地的经验,故以此对付我们。经验证明,凡认识挤黑瞒斗争为新区合理负担的主要关键,党委注意这一工作的地区,地富黑地就可挤出来,负担中以自然村为单位分配任务,将任务固定起来,再发动群众挤黑地,是最能启发群众挤黑地的积极性。但统一战线极为广泛,甚至地主富农均可参加这一斗争,对付最坏的统治者。“穷家十户瞒,跟不上富户一家瞒”,这一口号作用很大。

3. 在夏征时间,颇有干部等待秋后恢复土改运动或等待秋后大发动,而忽视从夏征中合理负担中发动群众。有的认为向人民要东西是不能发动群众的,有的认为征收公粮是政府干部的事。这种错误思想很妨碍我们在夏征中发动群众,认真推行合理负担政策。在边沿区征粮中不注意政策,如牵牛作抵押以粮食来赎。

4. 本来我们的夏征办法原来是不杂不苛也只不过重,但由于:①村负担太多,因此使负担更加重了。②由于我们要筹大批军鞋军布且又限定价格,因此将不杂又冲淡了。③由于干部作风不纯,强迫命令,因此将不苛冲淡了。

第五,本币斗争:新区发行本币,排除蒋币,在初期曾发生了较久争论,即打与发(有主张先打后发,有主张先发后打)。行政管理与经济竞争,及普遍没收与有政策的没收等问题,经过实践统一了,并有以下经验:

1. 排法最有效的方法为宣传动员,以具体事实说明蒋币对人民危害后,即组织与指导群众将蒋币封包出口,换货回来,这是公私两利,是排除蒋币极有效的办法。这不但排除我区蒋币保护人民利益,且增加蒋区通货膨胀。强调没收与乱没收不但会引起人民反感,而且不易将法币大量排出去。

2. 为了普遍检查加强行政管制,我们曾采用机动干部,组织经济工作队,进行重点检查,收效很好。我们曾组织各行商联合会,并给予适当贷款,动员他们维护本币,坚决排除蒋币,亦有成绩。

3. 较大市镇之钱贩子,内有为谋生的正当小贩贫民,也有地富流氓,我们在亳州曾分化他们,对前者予以贷款帮助,要他们报告黑市情况,维护本币价格,但对伪币则准他投机取利,或利用封包出口,对后者则不准其经营兑换,亦有效果。但当市场已为本币占据时,钱贩子活动即是有害的。

4. 在新区发行本币,只要军事政治条件基本具备,在国货需要量之范围以内,并有适当的物资准备是可以比较放手发行的,但必须大力排法,然后即紧接着发行,市场交易之物资,即变为是支持本币的。开始排法时,由于青黄不接,市面会冷二三个月,但很快会恢复,且由于法币外流,回货增加,进口货价且可着平。

5. 界首市停止银元流通与兑换的经过与经验,已报告中央局,不赘。

第六,关于对待蒋方人员问题,在要求上有很多困难,他们过去是靠薪水养家,今天靠我们供给制,他们不愿来。如不适当解决,他们可能流落地方扰乱治安。最近阜阳一次登记即 200 余人,有要求发路费回家者,转业者,和愿参加工作。我们决定愿转业者在组织生产上尽量予以协助;愿回家者只能发通行证予以方便,但不能发路费;愿参加工作者除专门技术人才可留队优待外,一般人员以不超过我之供给制为原则,个别愿薪俸者每月按供给制规定折发。估计今后新收复城市此种问题将更增多,我们对此尚未经验,请中央局、中央统一考虑。

以上请指示。

宋任穷

1948 年 10 月 10 日

新区的基本政策*

(1949年9月3日)

同志们,关于新区的基本政策,今天我分4个方面来讲:第一是政策的出发点和政策的重要性,第二是新区政策的掌握,第三是制定政策与执行政策的群众路线,第四是领导作风。

第一,政策的出发点和政策的重要性

政策应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为出发点。在今天来说,就是要照顾到四个阶级的利益,照顾到四面八方。如只照顾增加工人的工资,不照顾到资本家,工厂就会关门,工人就要失业,没有饭吃。劳资两利,正是从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的;同时照顾到资本家,使其有利可图,以求发展生产。从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也就是从实际出发,我们有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就要代表占全国人口90%的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政策的目的是,政策执行的结果是为着孤立敌人,团结广大群众。我们革命20多年,就是为了孤立蒋介石,在农村要

* 这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宋任穷当时任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南京市军管会副主任、西南服务团团长。

孤立地主，在城市要把特务、官僚资产阶级孤立起来。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一段时间，由于我们的政策错误，曾把自己孤立了起来，老百姓不敢接近我们，军队伤亡缺额也没法补充。政策正确时，下面在执行中也可能出现偏差，下面当然要负责任，但领导上也要检讨。领导上要对政策作系统、反复的说明。对政策的学习和执行，各级都要采取严肃的态度。毛主席说过，错误的经验是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正确政策的结果。执行政策必须结合实际情况，不能机械照搬。

为什么我们执行政策会经常发生错误呢？这是由于自己的经验不够，对别人的经验又不重视，再加上急性病，当然要犯错误。要密切上下级的关系，要利用电报、电话、骑兵、自行车等交通工具。下级要经常向上级报告，上级要经常向下级发指示并进行检查。这次邓小平同志在北平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对他说：报告的字数不一定多，要简明扼要，除了定期的报告外，每有一个经验就可以写一个二三百字的简短报告。对下面作指示要少开会，多发电报，利用电台、报纸社论、通报等，用这种方法传达指示，实现领导。

第二，新区政策的掌握

新区掌握政策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谨慎、要稳重，不要捅乱子，不要冒冒失失地乱来。有同志说，南京的日常工作太谨慎了，以致形成了官僚主义。这要看怎么说。南京的政策掌握基本上是对的，是谨慎、稳重的。某些工作进行迟缓、拖延是存在的。太慢了不好，是官僚主义的毛病。但慢

总比搞乱了好，搞乱了要“擦屁股”。昨天，在各界代表座谈会上，有人反映我们听取各方面意见不够，说明我们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不够，这是我们的缺点。

犯急性病是不对的。封建主义统治了三千年，帝国主义侵略了一百多年，国民党统治了二十多年，你想在几天、半年内搞好，是不可能的。要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但谨慎、稳重不等于不工作。稳重，是要积极地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这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不工作是消极怠工。但像冒失鬼一样，不了解情况就蛮干一气，看起来很积极，其实是到处出乱子，实质上也是对人民不负责任。最近，我们犯了两个急性病。1947年南渡黄河后，在新区农村不是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而是搞“打土豪、分田地”，“走马点火”，于是就搞乱了。在城市中也犯了急性病。如对旧人员的处理及工资的决定都很仓促，对国民党统治时停工很久的工厂不进行调查研究，不研究为什么停工，以及开工后原料、销路是否能够解决，就立即开工，结果造成盲目性的生产。到西南，我们还可能犯第三个急性病，就是对待少数民族问题。西南少数民族很多，如犯急性病，几天之内就可能搞乱，搞乱了，几十年都可能翻不过来。对少数民族地区要少派干部，只派一两个能掌握政策的同志就可以了，要他们自己的人当干部。我们要和他们联络感情，利用一切关系，不能急于求成，不要企图几天、几个月、一两年就什么都能搞好。

什么时候容易犯急性病呢？困难时不容易犯，越困难越

需要群众。胜利的时候就容易犯急性病。越胜利，我们的力量越大，就越容易犯急性病。因此胜利时要谨慎。还有，任务紧迫的时候容易犯。另外，自以为是的思想方法也容易犯。

领导对政策的掌握要防“左”和防右。我们为什么常常会左右摇摆呢？因为“左”简单，右也简单，“左”、右都容易。如杀人，要么多杀，要么不杀，下个命令就行了。但执行“不可多杀，不可不杀，杀人越少越好”就不容易了。哪几个应该杀呢？“首恶必办”，哪些人是首恶呢？这就要调查研究，要审判，的确是件麻烦事。我们革命就不能怕麻烦。凡属于正确政策的执行，都是麻烦的。例如，从前在对待区村干部问题上，最初是打击区村干部，后来转过来，“向区村干部致敬”，整党时又转过来大整区村干部。就这样摆来摆去好几次。对区村干部，我们要看到他们的成绩，批评他们的缺点，更重要的是发动群众，实行民主监督。如政策同群众发生矛盾时怎么办？如果只记得政策，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忘记了，是不对的。要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政策，要等待群众觉悟，耐心说服。后来，在整风运动中只强调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也是不对的。因为政策反映了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不能一村一个政策，只去照顾局部地区少数人的利益，这是片面的群众观点。再如中农和贫雇农问题。过去，只注意发动中农积极分子，而忽略了对多数贫雇农的发动；后来，又强调了依靠贫雇农，忽视了巩固地团结中农。我们进南京后，以城市工作为重点，但对广大农村工作的领导放

松了。我们的工作常常是只顾一面，好像猴子在树上摘苹果，右手摘了放在左腋，左手又去摘，腋下的苹果就掉了，这样一摘一放，摘了半天，还只是一只苹果。这就是片面的思想方法。

掌握政策怎样才能正确？首先要好好学习政策，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其他地区的经验，融会贯通，把中央规定的政策与本地区的情况结合起来，才能很好地执行。应该特别注意调查研究。要从全局出发，要有整体观念、国家观念。这样，才能正确执行政策。

第三，制定政策与执行政策的群众路线

制定政策的群众路线，就是毛主席说的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首先，要进行调查研究，征求群众意见，然后形成一个比较成文的东西。调查中要注意群众中有积极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要看是少数积极分子的意见还是大多数人的意见？还要分析大多数人愿意不愿意？进行土改除了群众条件以外，还有战争情况与干部准备两个条件。干部准备主要是指本地干部的培养。搜集到材料后要仔细进行研究，性急了会把事情弄坏，走回头路更耽误时间，想快反而慢了。随随便便就作出决定，会使老百姓吃亏，是对群众的不负责任。决定问题一定要非常谨慎。

要用党的政策教育群众，使它变成群众自己的政策。不能强迫命令。群众起来了；政策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才是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有恩赐观点，就会包办代替，脱离群众。群众运动就是要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单纯几个干部去

做,就只是“干部运动”。少奇同志讲,凡是我们要联合要团结的人们,执行政策时要注意:一、不要损害他们的利益;二、给他们一定的利益;三、进行政治教育,并在实践中提高其觉悟。只作前两项不作第三项,群众是不能提高的。

第四,领导作风

领导作风要注意 3 点:一、要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二、要有民主作风。我们去西南的干部不多,要培养和训练本地干部并尊重他们。本地干部比我们多一个好处,就是了解当地情况。“老子天下第一”的态度是错误的。不能培养干部,便是我们的无能。新区发动群众主要采取先自上而下的发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再自下而上,这就叫作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结合起来的工作方法。还要开代表会议,3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一个月要召开一次。毛主席说开代表会议本质上是一个联系群众的问题,好处多得很。群众意见可以经过代表反映到政府中来,政府的方针、计划可以经过代表传达到群众中去,这是一种很好的工作方法和民主制度。三、领导要掌握住中心问题。工作要注意有先有后,有轻有重,要说服各部门都围绕中心进行工作,每一时期有每一时期的中心工作。事后要有检查,检查要看是否抓住了中心工作,基本政策是否执行得对,执行得好。

为建设真正健全繁荣的 新南京而斗争*

(1949年9月6日)

诸位代表先生们！同志们！

今天南京各界代表会议开幕，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南京市委，在此次会议上，将我党市委建设新南京的方针，向各界代表作报告，并请求各位代表研究讨论审查和指正。

南京解放已4个月了。南京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首都，这样一个反动统治中心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匪帮22年统治的灭亡，象征着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辉而确定的胜利。所以南京的解放，整个世界除了中外反动派以外，没有不欢欣鼓舞的。但南京解放后，正遇到严重的困难。因为我们今天接收下来的南京，由于它是国民党实施卖国独裁内战政策的中枢所在之地，因而构成了一个畸形发展的城市，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留下的劣迹。在这里有广大臃肿的国民党官僚机构和庞大的非生产的消费人口，在这里充分显现着殖民地经济的色彩。由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腐败官僚

* 这是在南京市各界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宋任穷当时任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南京市军管会副主任。

的统治,南京的工业生产基础十分贫弱,在 120 万人口中,真正产业工人只有两万左右;城郊农民约 30 万,农业也遭受很大破坏。商业虽较有规模,但多系供应官僚政客消费性质的商业。国民党反动官僚把南京造成了纯粹的消费城市,把南京变成为帝国主义与买办资本联合压榨城市与乡村农民的一部典型的机器,造成了南京人民普遍的穷困。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 22 年统治中,除掉修筑了无数庞大的衙门和无数极尽奢侈的公馆,过着他们骄侈淫佚的腐败生活和压榨人民以外,从来没有过也不会有有利于人民的建设。国民党反动派,为实施法西斯的总体战,还在这里建筑了广大的大小的特务机构、监狱和集中营,禁锢着无数的爱国人民和英勇奋斗的共产党员,广泛的散布着奴化的法西斯的反动文化毒素,用刀和枪来对待拒绝接受反动文化的有理性的进步的文化工作者。这就是南京人民今天面对着的一副历史重担。改造这样一个腐败的、反动的、寄生的官僚城市,成为一个充满生命力的、进步的、真正健全繁荣的人民城市,这是何等艰巨的工作!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一工作的困难艰巨,才能谨慎的坚定的逐步前进,而不致被任何阻力所吓倒。

同时,4 个月来,我们以恢复与改造生产为中心而进行的各项工作;都是在封锁与反封锁斗争中进行的。解放以来,由于乡村群众还没有发动,国民党残余势力与封建势力相结合来封锁我们,使南京得不到或很少得到新解放乡村的支援,粮食供应及工业原料都感困难。这些反动势力操纵

银元投机，拒用人民币，以捣乱市场，致使物价上涨。再加上帝国主义指使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海上进行封锁并轰炸我们，使我对外进出口贸易，几乎完全停顿，如马鞍山铁矿及皮毛庄等矿厂作坊，不能复工。这样一个内外夹击的封锁轰炸，致使我们城乡互助与内外交流受到极大影响，物价波动很大，大大障碍了城市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

我们建设新南京的方针，应遵照华东局规定的方针，就是“要把过去帝国主义买办官僚剥削压榨中国人民的旧南京，变为国内生产与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新南京；就是要把过去畸形发展的旧南京，改造成为真正健全繁荣的新南京。”但是要完成这一伟大的改造工作，就必须使南京摆脱对帝国主义经济的依赖，必须把那些完全供应官僚机关消费的工商业改造成为生产的与为人民服务的工商业。由于南京的工业多系市政消费性质与装配性质，商业则多系为官僚机关享乐消费的奢侈品，不能与农村结合，服务于农民，因此一旦转变为人民城市，则在相当时期萧条没落是必然的，不可怕的，但这却增加了我们极大困难，比其它城市的改造更困难些。我们必须认识我们这一巨大困难，是由于帝国主义百年来的侵略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 22 年的统治所造成的，再加上帝国主义者指使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封锁轰炸，就使得困难更加增多。这不是偶然的。但是，我们久经斗争锻炼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是不怕这些困难的，我们有信心有勇气去坚决战胜这些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忍受这一切困难，坚决的与这些巨大困难作斗争。为此，必须动

员全南京的工人、学生、近郊农民、一切劳动群众、一切进步的文化界、产业界人士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充分的认识这一困难，并充分利用南京的交通便利、临近广大富庶的农村及大量劳动后备力量等有利条件，在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正确领导之下，大家团结起来，支援战争，粉碎敌人的轰炸封锁，集中力量恢复与改造生产。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的领导，有了这样广大人民的积极努力，参加工作，我们相信，任何困难都将被人民的努力所逐渐克服，新南京的建设是有保证的。

建设健全繁荣的新南京，我们遵照中共华东局提出的目前反封锁方针，结合南京的当前具体情况，提出下列任务：

一、华东局确定：“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迅速解放福建、台湾并配合全国各地解放其他一切尚未解放的地区，这是回答敌机轰炸扫射及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势力对上海和我沿海各港口武装封锁的最有效的办法，现在人民解放军的各路野战军正在向南方和西北各省，执行着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进军。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的力量，支援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全中国！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的力量，支援后方警卫部队，巩固后方，坚决肃清潜伏匪特！我们必须明白，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用各种方法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如果我们轻视这些敌人，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我们认为此项任务在南京必须贯彻执行。我们应积极

的支援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迅速解放全中国，这是粉碎敌人封锁最有效的办法。积极协助本市警备及公安部队，肃清匪特，彻底地摧毁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巩固治安，以保证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华东局确定：“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实行疏散人员和实行将部分学校工厂内迁。首先应动员大批难民与失业群众回乡生产，和到皖北黄泛地区与苏北盐垦区垦荒生产。并劝导一切流亡地主与受敌欺骗来沪的地主富农及被敌压迫来沪的农民及青年，立即各返原乡参加生产，即使其中有一部分是曾经欺压农民的地主富农，只要他们能改过自新，回家生产，则当地政府与人民定能宽大处理。此外，应在可能和必要的条件下，鼓励某些学校工厂内迁，以便就粮、就煤、就原料，以改变目前上海拥挤现象，减少城市负担。但工厂内迁是一件复杂而艰巨的工作，这不但必须依照各厂自愿的原则，而且必须有充分周密的计划和准备，否则，可能造成损失，增加困难。我们对学校和文化教育机关采取严格保护政策，但一切国民教育的计划（大学教育、各专科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和成人补习教育），必须适合当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文化、艺术、新闻工作也应当如此。”

我们认为，关于疏散人员的工作，可完全按照华东局规定的方针执行。至于将部分学校工厂内迁的方针，在南京则应特别慎重执行。因南京工厂很少，一般的不用内迁，亦较容易解决煤粮原料的供应。学校除少数专科学校并入中央所属的学校外，一般亦无须内迁。关于一切国民教育的计

划,及一切文化艺术新闻事业,正如华东局提出的,必须适合当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为普及教育,市内中学应迁郊区一部,以适合农民子弟结合生产当地就学;并增设小学及班次,扩大夜校及各种补习班,以提高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群众的文化政治学习。

三、华东局确定:“改变今后生产方针与发展方向。无论公营或私营企业,都应设法摆脱对帝国主义经济的依赖,并应把国内生产为中国人民服务作为今后上海一切企业生产的方针与发展的方向(如大量生产国内各城市、各矿山所需要的机器,及农村所需要的农具、肥料、布匹等)。因为只有国内各城市经济发展与农业生产力提高,上海工业生产基础才有保证,才可以自力更生和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同时在上海继续生产的各公营企业,必须精简组织,提高效率,真正做到经营企业化和民主管理,并且必须使两者很好地结合。对私营企业必须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必须特别注意正确处理劳资关系。我们必须把工会工作做好,要教育及团结全体工人及其他劳动者,照顾他们的利益,关心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水平;但另一方面,必须防止‘左’的情绪和偏向,一切要求,不但要符合社会的一般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而且要照顾各个工厂的具体情况,对私人资本家,我们除了对投机奸商以及对任何违反政府法令行为应依法取缔外,均应采取坚决保护政策。我们欢迎他们投资到有利国计民生的各种生产事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历史时期,从事有利国计民生生产事业的

自由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必须联合他们,和他们一同努力克服当前的困难,并向他们学习经营生产管理工厂的知识,我们城市工作的方针,仍然是遵照毛主席‘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去正确领导劳资关系、公私关系、城乡关系。”

我们认为此项任务在南京亦必须贯彻执行。可是因为南京是一个畸形发展的官僚消费城市,工业生产基础十分贫弱,且多装配性质及市政消费性质,所以我们当前最切要的工作,是在可能与必要的条件下,大力去恢复与改造生产。这就是,凡一切必要而且可能恢复的,我们就去恢复;凡一切必要而且可能改造的,我们就去改造,以便打下将来发展生产的基础。

四、华东局确定:“动员大批共产党员、干部和工人、学生到农村去开展农村工作。必须动员大批工人、学生与党员干部到农村工作,动员广大农民群众肃清土匪、改造政权、发展生产、克服灾荒,并有系统地、有步骤地进行土地改革,使农民从封建压迫剥削中,完全解放出来。这是目前全华东党全华东人民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任务。因为只有使广大农民生产改善及农业生产提高,才能一面扩大工业品所必需的市场,另一方面可以供给城市更多粮食和工业原料,因为只有依靠广大国内市场及广大农村供给足够的粮食和原料,才能使上海及江南各城市真正走上健全与繁荣发展的轨道。过去由于我们干部首先集中城市进行接管工作及人民解放军继续猛烈前进追歼敌人,来不及加强农村工作,故

今天江南农村区、乡两级政权，仍然大部控制在地主富农和保甲长的手中。他们勾结土匪及国特残余势力压迫人民，破坏社会秩序。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展开农村工作，克服目前江南农村中所存在的严重现象。在上海近郊目前应特别加紧沿海海塘工程的抢修与救济风灾的工作”。

五、华东局确定：“发展内地交通，鼓励城乡物资交流。帝国主义指使国民党残余势力，以封锁办法来阻止和割断我内外交流的关系。为了粉碎敌人这种封锁阴谋，我们就必须迅速发展内地交通，努力修筑铁路和公路，改善内河航运，组织各种合作社，鼓励内地物资交流，加强城乡互助，以发展和繁荣国内经济。”

六、华东局确定：“实行节衣缩食，克服目前困难，一切党政军民组织，必须厉行精简机关、紧缩编制、清理资财、建立制度、节省开支、反对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克服奢侈浮华的习气。特别是我党我军干部，必须以自己模范的行动和艰苦卓绝的精神来影响和推动全上海和华东人民进行节衣缩食运动，以克服当前的困难。但我们精简节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工作效率，以便发展生产，及克服目前困难。因此对一切当减当裁的机关和人员，必须坚决进行精简；但是一切必须的生产机构和工作机关，则必须加强，对一切可节省和应节省的经费，必须节省；但对工作需要的开支与最低限度的供给必须保证。对被裁减的人员，必须妥善地处理不能一脚踢开。总之，一切应从生产与工作必须作出发，并必须从长期作打算。”

以上四、五、六 3 项任务,我们均应坚决贯彻执行。

另外,我们遵照华东局提出的方针指示,顺带声明我们对待外侨的态度,即是:

“我们决不因为帝国主义指使国民党残余势力向我们进行扫射封锁而改变我们对一切外侨的政策,我们仍坚决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在约法八章中所规定的对一切外侨的政策,即对守法安业者必予切实的保护;对违反法令者,必予应得之处分;对犯法改过者予以宽大的处理。”

诸位代表们! 同志们! 这些就是我党建设新南京的方针。我们希望大家亲密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为实现这一方针而奋斗。

南京工人和青年学生,有悠久的光荣的革命传统,过去对中国革命有极大的贡献。南京工人、青年学生、近郊农民、一切劳动群众及进步的文化界、产业界和爱国的民主人士,在南京解放前护厂、护校及其他各种斗争,给我们以很大的鼓励和配合;在南京解放后进行接管工作和我们亲密的合作,给我们以极大的帮助。我们对南京人民对我党所表示的这种信任和拥护的热忱,特致衷心的感谢。我们热烈欢迎南京工人、青年学生、近郊农民、进步的文化界、产业界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们,在今后建设新南京斗争中继续和我们亲密合作。我们相信,我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我们有抗日战争中长期自力更生粉碎敌人封锁的经验,我们有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援助及世界人民力量的支援,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因此我们一

定能克服我们目前的困难,和争取建设新南京的胜利。

最后,正如华东局负责同志所指示的:“今天这种临时性的代表会议,替将来南京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条件和基础。这种代表会议不但便于将共产党的方针与人民政府的政策,传达到广大群众中去,使之成为群众的行动,而且便于将人民的意见反映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使之成为共产党政策和人民政府法令的根据。”

因之,也建议今后这种各界代表会议应多开,以便保证人民政府与人民间的密切联系。

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为工业建设打下基础*

(1952年5月7日)

我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的财经工作如何来扶助农业生产的问题。

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情况

两年多来财政经济工作是有成绩的，收支已取得基本平衡，保证了供给，今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些。农业生产工作大家都开始注意了，发动群众兴修了小型水利，许多中心地区把旱田变为水田的每县在1万亩至3万亩，这是一件很大的事，也解决不少耕牛、农具等生产工具的困难。在市场上稳定了物价，经济工作的摊子基本上铺开了，虽然是极不健全，就我们现有的工作环境和干部条件来讲，能做到这样，应该说是成绩的，而且同志们是努力的。

现在对于农村生产工作提出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农民在土地改革后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非常迫切，而我们的经济工作跟不上，不能及时满

* 这是在宜良、呈贡、安宁3县财经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

足农民的要求。我们必须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们就要脱离群众。我们还必须看到农民特别是贫雇农生产还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山区贫雇农困难更大。贫雇农在生产中较好一些的,有一点资本勉强可以周转一下,到插秧时贫雇农就没有口粮和工钱了,山区的贫雇农及平坝一部分贫雇农的困难则更严重。云南的山区平坝地区又大得多,就成为更大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后农村生产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还有一个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手工业和农副业生产问题。手工业农副业生产是一个很大数量,估计占农业生产总数的 25—60%,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我们财经干部的控制思想(如集中办理),两年来手工业和农副业生产停滞起来了。这些问题,必须加以解决,否则我们既要脱离工人,也要遭到农民的不满。在组织上财经干部在三反中垮了一批。财经系统的各部门中心思想不明确,各干各的,只管完成任务,只管赚钱,各部门互不联系甚至还有对立的互相抢买卖的现象。有的县没有土产公司,农村合作社尚未普遍地发展起来,银行贷款只管完成任务,不问贷到谁的手里,是否用到生产上去。这是由于缺乏明确的发展生产观点,因而也就不明确我们目前的中心工作是什么,各部门如何去抓住这一中心环节去进行和展开自己的业务。这种思想是没有办法去很好地进行人民生产事业的,必须加以改变。

二、目前财政经济工作的方针

根据上级总的方针及云南的具体情况,在巩固工人阶

级的领导权及工农联盟的精神下,云南应当在两三年之内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包括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农副业生产),以改善农民生活,为工业建设打下基础。因此目前财经工作应面向农村,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云南有较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条件,特别是有色金属和矿产,保证任务完成。但是云南绝大部分是农村及农业生产,急需大力发展,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就为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只有农业生产大大地发展起来,农民生活改善,购买力提高,工业品才有广阔的市场。云南目前财经工作就必须明确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这一方针,并为其坚决贯彻而努力。

根据上述方针,在统一领导统一思想的指导下,在思想上必须明确云南发展农业生产目前应该是解决农民特别是贫雇农的生产困难,就是普遍地发展农业生产,普遍地发展供销合作社,普遍地搞群众性的小型水利。适当地而又有计划地恢复与发展手工业农副业生产。农民是普遍存在着生产困难,许多农民还没有裤子穿。因此农业生产的做法上是在统一领导统一计划之下,要强调分散经营,如手工业、农副业就应分散经营,特别是农副业。如铁匠炉、水车、农具制造,要分散经营。水利要发动群众挖沟、挖塘、打井、打坝,明年是否要搞中型水利,看明年情况再说;肥料是挖厕所、多养猪积肥及搞土肥料。兽医设法训练提高土医生,运用现有的西医。贸易公司做生意是从早到晚 12 点不歇。总之,一切做法要适合农民的可能和需要,使农民方便,能及时解决农民的问题。最后,财经工作的许多业务必须不误农时,及

早地准备和计划,如贷款、收购、生产工具的供应等均须及时。

三、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扶助贫雇农生产

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包括手工业农副业)既然是我们两年内的方针,就必须采取有效方法。云南农业生产是极端落后,要改变此种状况,就必须首先大量地发展小型水利,实行民办公助,大量地把旱田变成水田,增产粮食;其次是积肥,挖厕所、养猪、沤粪均是有效办法;第三是改良耕作技术,有些地方刀耕火种,必须教育群众改变。犁耙要加以改良,把两头牛架一张犁,改为一头牛架一张犁。只要能努力将上述工作做好,增产粮食是并不困难的。

另一方面,要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能外销的手工业、农副业生产,以补助农民口粮及小量地积累农业资本。县财委必须很好地作统一调查研究,并加以指导。

扶助贫雇农生产是我们一个相当长期的方针。解决困难的有效办法有以下几种:第一,发动教育农民组织互助组;第二,切实组织农民将斗争果实投入生产;第三,适当地有计划地发展手工业、农副业生产;第四,贸易机构和合作社及时组织收购。以上4种办法是主要的。第五,才是人民政府发放农贷。

云南气候特殊。国民党和地主阶级野蛮残酷的剥削把农民压榨得穷到了极点,生产处于长期被破坏及未开发的状态,以致农民没有抵抗天灾的能力,灾荒成为每年都有的问题,若干年之内不易完全解决。因此领导上应有计划的进

行预防,实行及早地防旱备荒。灾荒是一个较长期的问题,我们就应作长期打算,有备无患。今春霜灾很严重,各地对灾区必须采取一切有效的办法,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应特别注意解决早熟作物及补撒秧种,保证较好的收成。争取不饿死一个人。

四、经济工作

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活跃农村经济,做好买卖,不断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上的需要特别是生产上的需要,因此要使农民的农产品、手工业品、农副业产品能卖得出去,价钱又不太低;同时使生产资料能供给得上,且价格又不太高,否则农民吃亏很大。小春下来的蚕豆、小麦大跌,耕牛、小猪、水车、农具价格在春耕时大大地上涨,有上涨到300%者。这对农业生产来讲是重大问题。因此经济工作必须从这些实际情况去着眼。

在工业方面除以适当力量发展国家工业生产外,主要力量必须大量发展地方工业,而地方工业目前主要是适当地有计划地发展手工业及农副业生产。在山区则还须发展畜牧业和农林业,这种发展必须是统一指导,分散经营。任何企图大量集中及垄断控制的做法都是错误的。昆明17个工厂真正直接供给农民生产工具的只有半个厂,此种现象必须注意改变。

农民生产了东西要卖出去,同时又要买进生产工具及一部分必需生活品。如何将买卖做好,如何稳定物价,我认为,贸易公司不但将东西卖出去完成回笼任务,而且要将农

民要出卖的东西收购进来，农民的困难才能解决一些。因此县里必须有土产公司进行收购。收购工作必须有计划的进行。其次就是价格政策问题，即是掌握工业品与农业品的差价、地区差价及季节性的差价。季节性差价过大的主要原因，是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比如小春蚕豆下来了，农民都急着要出卖蚕豆来挖田栽秧，价格就大大下跌。春耕时耕牛、小猪、水车、农具的价格暴涨，这是由于这些东西供不应求。这些问题是可以适当地解决的。解决的办法就是有计划地收购和有计划地供应，而且必须以十分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去耐心的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做了，就打击了奸商们的投机，相对地缩小工业品的差价，农民就少吃亏了。贸易公司要及时地收购几项主要产品，以免农民再生产发生困难甚至不能进行下去。再次，国营贸易公司要把供销合作社作为活跃农村经济的主要助手，而大力加以扶持。最后，组织私商经营农村土产、手工业品、农副业产品与供应农民需要是很重要的，今天“五反”不是反对正当经营及商人合法利润，更不是打倒和消灭资产阶级。

为要扶助农业生产发展，国家要发放贷款。国家银行要将大部贷款确实贷到贫雇农手里并用之于生产，要反对平均主义。贷款手续力求简化，贷款后要确实进行检查。

为使物资交流便利，除修公路发展汽车运输外，还须大量地发展大路、马行路、小路，以利大量地发展马车、马驮的运输。

在土地改革中给农民以土地，在生产中则须大力发展

农业生产以改善农民生活,这是财政经济工作的重大任务。我们从经济工作这一方面做好扶助农业生产工作,就给了巩固工人阶级领导权巩固工农联盟的一个重要的物质保证。

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生产工作的扶持问题,不仅在经济上是很重要的问题,而且是严重的政治任务。必须明确指出这是对敌斗争及实行区域自治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我们必须切实指导,必须以可能的财政经济力量投入这一工作,派遣有力干部有计划有重点去踏踏实实地去做好有利于少数民族同胞的一两件生产工作,并创造经验,使其更好地普遍地开展起来。

五、学习经济工作

毛主席于1945年1月10日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大会上号召“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我认为今天在云南的情况下,完全须要遵守毛主席这个英明的号召。为此,就必须努力学习。首先是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从各方面加以解决。要反对空喊,不做具体工作。我们必须不断地学习和总结经验,提高群众,提高干部,提高领导。同志们!我们只要立场正确,加上不断努力学习,工作方法当然就可以不断创造新的。同志们!努力吧,让我们在两三年内将经济工作学会。

在在职干部学习班 开学典礼上的动员报告*

(1952年10月6日)

同志们：

在职干部学习班正式开学了。我今天以一个普通干部的身份参加这次学习，听了刚才贺龙同志的指示，现在谈几点我个人对学习重要意义的理解。

我们中国共产党经过30多年的革命斗争取得了胜利，证明我们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30年来，毛主席一贯号召我们重视学习，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大家克服了盲目性，提高了自觉性，达到了党内的团结，形成了坚强的战斗力量，因而保证了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思想是在我党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党的干部和非党干部都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以它来指导各项工作。但是我们是否都学好了呢？正如刚才贺龙同志说的，不是这样。从全党来说，我们的水平是大大提高了，但是从个人来讲，那是非常不够的。现在，就几个方面谈谈我个人的体会。

* 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副书记。

首先,从党内学习的情况来看,今后必须加强学习。经过党内的学习运动,如整风整党运动,全党的思想政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在反对教条主义方面收到了很大的效果。毛主席向我们提出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强调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一切要经过调查研究,要将从群众中得来的材料加以综合、研究、提高。如果不系统的学习理论,就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即使发现了问题,也不能从理论上获得解决。其次,从革命的发展来看也需要加强理论学习。全国胜利已经3年多了,各种社会改革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现在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过去3年多我们所进行的工作,如土地改革等,都有明确的路线方针,加上有过去的实践,只要兢兢业业,是不会出大岔子的。但今后情况就不同了,新时期的经济建设和思想建设都是新的工作,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我们有信心胜利地完成任务。但从个人来讲,负担是很沉重的,因为我们没有这些经验,如基本建设、农村生产合作社等都是新的问题,过去都没有搞过。在新时期的思想建设上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抓紧学习,在工作中就很可能犯错误,甚至会犯原则性的错误,值得我们警惕。今后的工作发展会更快,我自己的思想常常感觉到跟不上。我们的思想要跟上形势的发展,一方面要了解实际情况,加强调查研究,另一方面就要加强理论学习,只有这两方面的结合,才能跟得上形势。再从总结经验的角度来看也需要加强理论学习。否则虽然作了不少工作,有不少经验,也不可能系统地加以总结和提高。

以上是我个人的体会。

学习中的主要障碍正如贺龙同志所指出的，是自满情绪。自满由于有所恃。有些人文化高，也学过一些理论书籍，而有所恃。有些人因斗争时间较长，有些工作经验，而有所恃。他们都认为不进步不学习也可以工作，因此学习不努力。还有些同志迫切要求学习，但是要求脱产学习，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又有些人觉得学习理论不解决业务问题，但他不懂得学习了理论才能明确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才能发挥工作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还有些人说没有时间学习。工作忙是事实，但要懂得，只有把学习搞好了，工作才能做得更好。总之，只有自觉的学习，进步才会快。

最后，关于学习方法问题。

首先我们学习“毛选”，主要的还是要领会毛泽东思想的整个精神。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单是一篇一篇地读是不够的，还要着重地钻研几个问题，从而系统地体会毛主席解决问题的方法。其次，学习一定要与自己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就是要弄清楚毛主席是怎样说的，我们又是怎样作的，结合实际进行钻研，并写出心得。所谓心得，就是把毛泽东思想和自己的工作实际结合起来进行对照研究后所作的总结。再其次，要把个人的钻研和集体讨论结合起来，而以个人钻研为主。不通过自己思想上的钻研，要使毛泽东思想成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是不可能的。而有了个人钻研，如果不与集体讨论相结合，学习也是不会深刻的。

生产改革的中心是生产管理*

(1952年10月)

今天,搞好工业,管理好工厂,对我们来讲是个新问题。

这次会议后我们应该把思想明确起来:我们国营厂矿的民主改革工作已经结束,现在进入了生产改革的阶段。明确了这一点,才不致于使党、政、工、团各搞一套,延误我们的工作。目前,我们应该对厂矿的基本情况作个估计。工作走到哪一步了?下一步如何走?听了同志们的汇报,可以看出我们的厂矿3年来生产直线上升,合理化建议日益增多,这说明我们的民主改革工作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了,工人阶级觉悟提高了,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了。这些都为今后的生产改革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这些成绩却不能说明我们的生产改革搞得好,有的厂矿至今达不到全国定额,质量也达不到国家标准,废品次品很多,说明我们厂矿的生产管理搞得不好,问题很大。所以,在厂矿转入生产改革的时候,我们的头脑应当清醒。

一、首先要把实际情况摸清楚。目前我们厂矿中的关键

* 这是在西南厂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副书记。

问题是什么？我认为，关键就是生产管理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生产管理落后，赶不上群众的积极性。如果不正视这个问题，解决这个关键，我们厂矿的工作就不能迅速前进，说得严重一点，就会寸步难行，民主改革获得的成果也就不能巩固。所以，在民主改革工作结束后，下一步工作就必须开展生产改革工作，而生产改革的中心就是生产管理”。

搞生产改革，首先就要把成本弄清楚，库存怎么样，也就是说家底有多大？这是一件大事。“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我们搞工业也离不开这种工作方法。不然，就无法知道该改些什么，该建立一些什么制度。有同志问生产改革什么时候结束？我们说：实行了经济核算制，实行了计划管理，那我们的生产改革工作就结束了。

在生产改革工作中，行政领导一定要提出中心问题，如定额、技术测定、工资改革……等等。中心问题一经提出，就要下决心解决。要发动群众提合理化建议，推广先进经验来解决，不发动群众，是搞不好的。当群众发动起来了，制度也建立起来了，靠什么来巩固呢？我认为，要靠政治工作，也就是用加强党的工作来巩固。我们要积极慎重地发展党的组织。前一段时间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错。今后不要放松。在工厂中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党组织，生产就不可能搞好。要把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结合起来，把政治工作转向技术上、生产上，提高群众的觉悟，这样就能巩固生产上的成果。

要把生产管理工作搞好，还必须加强工人的安全福利

工作,把不适合于新情况的安全福利设施及时加以解决。思想上要明确“搞好安全福利工作,正是为了搞好生产管理”。

工会、青年团的工作要加强起来,也要转向生产改革工作,工会、青年团的工作内容也应当有所改变。党、政、工、团各系统都要围绕着这个中心——生产改革来开展自己的工作。谁也不应当“扯皮”。围绕生产改革这个中心开展工作并不会削弱党、政、工、团系统的工作,反而是加强了各系统的工作,各系统要同心协力,解决好工厂中的中心问题。

二、如何来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完成这个重要任务的关键在哪里?我认为关键在于领导。

首先,领导上头脑要冷静,对厂矿的情况作个系统的分析。我们厂要解决生产管理问题的关键在哪里?主观、客观的情况如何?工人的情况如何?机器的情况如何……。经过系统的分析后,就决定先从哪里入手,把大的关键问题抓住。同时,也应该把大关键中的各个小关键看清楚。

第二,领导上把关键问题弄清楚后,应当立即进行准备工作:组织力量、宣传教育、动员群众。在这里,应当特别注意在党的领导下把各方面的工作统一起来,把力量安排好、组织好,而且要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要依靠群众,依靠工人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来开展工作。

第三,在生产改革工作中,领导上应当不断发现问题,及时总结经验。以前这方面我们做得不够。

第四,今后领导要少开“一揽子”的会,多开专业会议。西南工业部各局也应该一个厂一个厂的开会,不要把所有

的厂都搞在一起。总之,应该一个一个一个问题提出来,一个一个一个问题及时的、专门的研究加以解决。

加强集体领导 坚持群众路线*

(1955年9月20日)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同意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报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是我们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它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对于今后我们国家的建设和党的建设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从第七次代表大会到第八次代表大会的11年间,我们党和全国人民一起,执行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路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国胜利以后,我们又胜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切伟大的胜利,都是由于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动员了全国人民的力量,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取得的。

现在,我就集体领导问题说一说我的认识 and 在实际工

* 这是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作中的体会。

根据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党坚持民主集中制,确认在一切工作中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必要性。集体领导是民主集中制基本问题之一,其实质是群众路线在党的领导工作方面的应用。集体领导与家长式的个人领导相反,最能发挥党委成员的积极性,也最便于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集中群众的智慧,正确地指引人民群众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任何党的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全党历来就重视并在自己的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这一规定,而且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要保证党的集体领导,必须健全党委制,发挥党委全体成员的作用。1948年9月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全党在贯彻执行中央这一决定中,使党的集体领导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但是还应该看到,目前有些党委,特别是在地委以下的某些党委中,由于前一个时期抽调的干部较多,一般是书记较老,委员较新,加之某些领导同志民主作风不够,这就很容易把过去的上下级关系反映到党委的集体领导中来。同时由于过去突击性的运动较多,党委任务繁重,常常纠缠在日常事务中,不能集中精力认真考虑和讨论重大问题,这就限制了集体力量的发挥。根据我们党的经验,要加强集体领导,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健全党委制,发挥每个委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每次会议,特别是解决重大问题的时候,事前必须进行周密准备,充分酝酿,互相提供有

关情况,交换不同看法,在会上展开充分讨论。对于分歧意见,如非急迫问题,不必忙于作结论,以便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党委书记在集体领导中有重大的责任,他必须和每个委员保持密切联系,经常沟通思想,善于组织大家钻研问题和出主意,发挥集体智慧,并要以身作则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委的每一个成员,都要积极参加集体领导,关心全面工作,互通情报,互相补充,把不同意见和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这样,才能做到思想一致,语言一致,合力搞好工作。正像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的结论中所教导我们的,书记要当好“班长”,要像弹钢琴一样十分和谐地进行自己的工作。

根据我们党的经验,必须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健全党委制和加强集体领导。好的集体领导,不仅需要健全的集体领导制度,重大问题经过集体讨论决定,还要善于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充分地发扬民主,认真反映和集中群众的意见;不但在事情决定之前同群众商量,在执行过程中也要同群众商量,真正地作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作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就能保证我们党的领导的正确,不犯或少犯错误。凡是这样做的,结果总是好的或较好的;反之,结果总是不好的,有时甚至造成错误。

就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增产运动来看,也充分地说明了集体领导与群众路线是密切不可分的。1955年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央彻底地批判了党内

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右倾保守主义思想,作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各地在执行党中央的政策方针的时候,党委不但认真地进行了集体讨论,而且认真地作了调查研究,了解了广大农民的要求和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可能性,把中央的指示和各地具体情况密切地结合了起来,这就使得全国各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的形成了高潮,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快的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满足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但是以后的农业增产运动,各地在根据中央拟定的增产指标制定本地方的规划或计划的时候,大部地区执行得比较好,也有不少地区,由于缺乏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没有虚心听取下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没有认真研究增产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和必须采取的措施,从主观愿望出发,盲目地规定过高的不可能完成的生产指标,结果不得不一再修改,并在某些方面造成损失,使领导非常被动。

这件事例表明,同样的领导集团,同样的领导成员,同样的开会讨论作出决定,其结果却不一样,一件事情做得较好,另一件事情做得不好。人们会问: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其关键在哪里呢?我认为,其关键就在于这个领导集体是否具有明确的、坚定的、进行任何工作都必须贯彻群众路线的观点;是否切实地进行调查研究,虚心倾听和集中群众的意见。也就是说,能不能够真正地把集体领导与群众路线结合起来。我跟几位地委、市委书记交谈时,他们说,农业合作化运动所以搞得比较好,是因为认真地研究了中央的指示,深入地发动了群众,群众又推动了我们;以后的农业

增产运动,虽然我们也研究了中央的指示,召开了各种会议进行讨论,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掌握增加产量的实际可能性,把增产指标定得过高,并且在贯彻过程中向群众“坚持下去”的劲头大,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劲头小,结果出了毛病。这就说明,如果只是一般地注意了集体领导,而不注意与群众路线紧密结合,还是免不了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所以决不能简单地说,有了集体领导的形式,就能够保证党的领导不犯重大错误了,有了集体领导的形式,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那些犯过路线错误的领导集体,它们口头上也讲集体领导,重大问题也往往是经过会议讨论决定的,但是,它们实际上只有主观主义的集体领导,没有建立在群众路线基础上的实事求是的集体领导,结果是犯了严重错误。可见,问题的本质不简单地在于是否有集体领导的形式,而在于是否有集体领导的实质,也就是说是否把集体领导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集体领导和群众路线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只有建立在群众路线基础上的集体领导,才是真正完满的可靠的,才能不断地改进工作和提高领导的水平。

在这方面,党中央的领导方法是值得全党学习的。党中央对于全国性的重大政策问题,只要情况许可,都是事先发动尽可能多的同志充分酝酿的。例如: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解决,《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制定,这次大会的主要文件,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重大事情,都是

经过充分酝酿的。这就告诉我们：党委在决定重大问题的时
候，必须在党内进行充分的酝酿，充分地反映和集中群众的
意见，以便作出正确的决定。那种简单的在短期内写个决
定，或者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在进行酝酿和讨论过程中，应当重视少数人的意见。有
些党组织的负责人常常不愿意倾听和考虑少数人的意见，
甚至害怕有人提出反面意见来，这是不对的。河北省有个县
委书记告诉我，他们在讨论购买粮食和农业增产问题的时
候，都曾遇到过少数人从反面提出不同的意见，而结果却是
采纳了少数人的意见，避免了错误。他们在讨论 1956 年农
业增产指标的时候，大多数县委委员主张每亩增产到 600
斤（超过 1955 年产量 290 斤的百分之一百以上），只有个别
同志不赞成，以后再三考虑了少数人的意见，研究了典型调
查材料，才把增产指标确定为每亩 350 斤。事后证明，这是
符合实际的。这种事例在实际工作中是会遇到的。不可否
认，在一般情况下，多数人的意见是正确的。可是有些时候
少数人的意见也会是正确的。这是因为，这些少数人的意
见，虽然在党委会上看来是少数，但是他们的意见是从群众
中来的，实际上反映着多数群众的利益。可见，一个反面意
见提出来或者保留起来，并没有什么坏处，即使这个反面意
见是错误的，也有助于领导上从多方面反复地考虑问题，使
党的决定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片面性和错误，同时可以使得
党内更加团结。

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并不否认党的领导需要有高度的

集中,而是要把两者辩证地结合起来,既要放手发扬民主,又要高度集中,发扬民主正是为了求得思想一致,保证集中。必须完全实行列宁这一著名的规定:在问题尚未决定以前,允许自由发表意见,进行辩论;但在问题已经多数决定和上级批准以后,就需要完全服从,坚决执行。必须保障党内的民主生活是在集中领导下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必须使发扬民主能够增强党的领导机关解决问题、进行工作的能力和信心,而不是削弱这种能力和信心。党的章程规定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两者是不可偏废的。

真正的集体领导,是一定要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现在,对于破坏党的集体领导的行为一般都有所警惕,党内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现象是减少了。但是,有些地方又产生了另一种偏向,就是把个人负责和集体领导对立起来,把集体领导变成无人负责或者是害怕个人负责,不论大小事情,都要开会讨论;或者是谨小慎微,互相推诿责任,甚至应该讲的话也不讲了,应该作的事也不作了。例如,有一个县,连土产公司的牛圈设在哪里,也要经过县委集体研究;云南省有一个县委,有正副书记5人,所有事情都要5人共同签字才能够办。这种现象表明,有些下级党的组织对于集体领导这个原则的认识还是很不全面的,向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正确地反复地阐明这项原则,仍然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同志们!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在极其复杂的

斗争中,只要党的领导坚决贯彻依靠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坚持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相结合,和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并且同违反这些原则的现象进行斗争,就能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继续取得胜利。

克服干部工作中的保守主义思想和干部工作的全面规划问题*

(1956年2月28日)

我完全同意彭德怀同志的报告,现在就贯彻执行彭德怀同志报告中对干部工作任务的指示,发表如下几点意见,请讨论和指正。

一 坚决克服干部工作中的保守主义思想

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六中全会对农业合作化的指示和刘少奇同志传达毛主席对反对保守主义的指示后,深深的感觉到干部工作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保守主义,使工作落后于客观实际。今年1月我们和总政干部部共同召开的全军任免组织工作会议,即以中央反保守主义的精神,检查和批判了干部工作各个方面所存在的保守主义思想。经过这次会议检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如不大力克服保守主义,提高思想,改进领导,就将

* 这是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宋任穷当时任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

使我军不能大量地、迅速地生长新的干部,以适应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要求。

在过去两年中,我们执行 1954 年 1 月军委高级干部会议所规定的我军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是有一定的成绩的,基本上完成了选调各院校的学员、调配部队进行军事训练所必须的各级领导干部和教育干部、抽调组建预备师和新建单位的干部以及建立军衔奖励工作等任务。但由于我们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保守主义和工作上缺乏全面规划,工作中的缺点是很多的。现在从下面 5 个方面来加以检查并提出一些建议,请予审查。

(一)关于贯彻执行大胆提拔干部的方针问题

对大胆提拔干部的方针,总干部部和各级干部部门虽已逐步引起了重视,在执行中也已有一定的成绩,但思想解决得不透,对部队生长干部的雄厚潜力和新生力量估计不足,普遍的表现是:怕干部级别“低”了、资历“嫩”了,在工作中压不住台;怕干部能力“弱”了,不能称职,即使勉强提拔起来,也不敢大胆使用,还要经过“代理”等职务过渡一下,不看干部有没有培养提高的条件;怕知识分子社会出身不好,怕起义、解放人员复杂,对他们在几年部队工作锻炼和政治运动中的进步程度估计不足,而不敢提拔和使用他们,并充分发挥其潜力;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干部,不区别其所犯错误的性质和轻重程度,具体考察其改正错误情况,即认为不能提拔;有一些本位主义思想严重的,则只强调本单位工作需要,而把大批干部积压起来,甚至有怕干部提起来后被

调走,宁可让缺额空着也不予补齐的现象。总干部部在大胆提拔干部的工作上,虽然也曾一再批判了“资历观点”,提倡打破提拔干部的老程序和拟定提拔干部的预备名单,但由于总干部部本身思想也不够明确,因此,批判不系统、不深透,提倡不够有力,在确定解决干部升调、培养、级别等问题的政策时,总是迈不开脚步,在工作上也缺乏全面规划和基本措施。以上种种都反映了我们干部工作中的保守主义思想,反映了我们干部部门和干部工作上政治性不强,业务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联系不够紧密,干部工作的思想落后于部队建设发展的实际,其结果是干部缺额长期不能补齐,影响部队的训练,阻碍干部的生长,压抑了干部的积极性,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干部间的团结。这些缺点,总干部部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大胆提拔干部,是干部部门长期的经常的任务,也是干部工作的方针,不能有任何怀疑和动摇,保守主义思想是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的主要阻力。为了有效地克服保守主义思想,我们在全军任免组织工作会议上,对这一方针认识上的4个主要问题,又特别加以强调,要求所有做干部工作的同志都要端正认识,并据以改进工作。这4点是:

第一、必须了解大量培养、生长新的干部是当前干部工作最中心的任务。干部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是根据我军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来确定的。我军要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现在还缺乏现成的成套的正规化现代化

建军的干部,如不大量生长新的干部并提高现有干部的质量,就不能适应建军的要求;要防御帝国主义侵略,应付突然事变,也必须有大量的新的干部的生长,不然,也无从储备充分的干部后备力量。这一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必须看到军队中有雄厚的干部潜力,可以源源不断地生长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我军现有的几十万干部,大都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全国解放后,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又有很好的锻炼和进步,文化水平和军事科学知识也不断得到了提高,只要认真进行考核和培养工作,就可以从中发现和生长出大批优秀的干部。同时,在广大的军士和老战士中,也蕴藏有巨大的干部潜力,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年轻力壮、成份好,曾经过战争的锻炼,只要经短期训练培养,即可成为我军的初级干部。

在沿海、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部队中,要大胆提拔本地的干部。沿海、边疆地区是国防的前哨,部队必须与当地人民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才能取得人民的全力支持,顺利完成对敌斗争的任务。本地干部熟悉本地区本民族的情况,他们与当地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在党的教育下也已经涌现出大批优秀的积极分子,只要注意加以培养,就会生长大量的优秀的本地(民族)干部。

第三、必须十分重视新生力量的生长。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必须有大量的具有现代化军事科学知识的各种干部。老干部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政治坚定,有丰富的斗争经

验,是我军的骨干力量,但是他们人数少,有的因年龄大、身体弱、文化低,学习和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已有困难,即或各种条件均好,但十年二十年之后,他们的体力、精力也难以支持,也必须有新干部来接替他们。因此,必须看到新生力量的作用,要特别重视培植新生力量的工作。军队里的老干部应该把这个工作看作是党交给他们的光荣责任。

第四、提拔干部必须和培养提高干部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新提拔起来的干部,因业务生疏,工作上必然有很多困难;但只要他们具有学习和提高的条件,领导上抓紧对其培养,就可以使干部在实际工作中逐步熟悉业务,积累经验,胜任所担负的工作职务。另一方面,培养又是提拔干部的基础,必须帮助干部不断提高军事、政治、文化、业务诸方面的水平,创造提拔的条件。因此,干部的提拔和培养是不可分离的,两者完全是一件事情,应该相互为依。既不能等到培养好了之后再去提拔,也不能提拔后就不再加以培养,而应该是一面提拔一面培养,将干部提拔起来在实际工作中去培养提高其能力,干部在实际工作的锻炼中又创造了提拔的条件。

因此,我们建议: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干部工作的思想领导,提高干部部门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领导和检查各级干部部门进行大胆提拔干部的工作,并建议在部队中掀起一个学习的高潮——特别是文化学习的高潮,以提高干部的学习积极性和展开培养干部的工作。

(二)关于“全面规划加强领导”问题

大胆提拔干部补齐缺额及大量储备干部预备力量的工作,必须有全面规划,并切实置于党委领导之下,才能做出应有的成绩。干部工作的全面规划,必须根据建军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把对干部的提拔、调配、训练、培养、军衔、奖励、预备役、转业、复员的工作,以及与干部工作有关联的一系列问题都包括进去。必须对干部进行全面摸底,发掘潜在力量,经常进行考核工作,了解干部发展变化情况,加强对干部的培养工作,有计划地安排干部调学校深造和组织在职学习,把规划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同时,规划还必须向党委报告,经过党委讨论并作出决定,以便党委加强对干部工作的领导。我们曾召集北京军区两个师两个团两个连的负责干部座谈如何做干部工作全面规划问题,北京军区干部部和总政治部干部部又共同组织两个工作组分别帮助两个师制定规划,并总结了制定规划工作的经验,我们已将这一经验加以推广。

大胆提拔干部和展开军官预备役工作是 1956 年干部工作的两项主要任务。1956 年的干部工作规划即应以反保守主义的精神,及围绕着这两项工作来统筹安排有关方面的工作。我们已要求各级干部部门均按此精神在 3 月 15 日以前把今年的规划做出来,并于 4 月 1 日(训练年度开始)前补齐全部的干部缺额。现在,各级干部部门正在制定规划,补齐干部缺额工作。估计在 3 月底前,所有各级军事、政治、行政、后勤干部即均可全部补齐。但目前专业干部的缺额就突出起来了。专业干部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难以

全部解决。但我们认为只要突破常规,大部分专业干部也可以用先配上尔后再培养的办法来解决的,如防化、汽车、油料等专业干部,即可以调配一些有培养前途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后再逐步培训。

据各部队反映,3月底前补齐干部缺额之后,在训练年度中如须抽调干部,可做到随调随补。由于干部工作与部队其他方面的工作都有联系,各项工作进行中都可能引起干部的流动,要在训练年度中停止干部的流动是不可能的。但目前如能采取若干基本措施,也可以缩小流动的幅度。我们认为,如在3月底前将全年调学校深造的干部预先抽调出来,全年调文化学校学习的干部凡学习期限在1年以上的都定为离职,不足1年的在调学时也指定人代理工作,这样,即可基本上保证干部的相对稳定。因这一问题关系到部队的定员定额,目前我们只将预计数字和全年转业、复员的控制数字通知各大单位干部部门预作准备。

(三)关于团结、教育、改造和使用知识分子问题

知识分子在我军现代化建设中有很重要的作用,军队没有具有文化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就不能掌握复杂的现代化军事技术。我们在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基本上是有成绩的,但由于有保守主义思想,还存在着歧视和排挤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情绪和迁就的情绪(目前来说,前者是主要的)。几年中处理知识分子转业、复员的数字很大,将仅属一般历史问题仍可留队工作的知识分子也草率处理离队了。在使用上也有许多不适当的,没有足够

估计他们6年来在党领导下的变化和进步,不敢大胆提拔和使用他们,因而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已责成部队各级干部部门必须按照此次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对团结、教育、改造和使用知识分子的工作认真进行一次检查,并坚决采取以下措施,以改进工作。这些措施是:

1. 对一般知识分子应继续加强团结、教育、改造的工作。凡是经肃反、审干政治上已经审查清楚的,即应和我军其他干部一视同仁,信任和使用他们,可以提拔的就要大胆提拔起来,工作职务、军衔、级别偏低的必须进行合理的调整。

2. 对高级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应从政治上关心他们的进步,并合理地解决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问题。对于已经在军队工作而是工薪制职员的知识分子,如合乎参军条件并自愿参军的,即应吸收他们参军并授予相应的军衔;不愿参军的则不要勉强,但也必须合理使用他们,工薪等级低的,须调整其工薪待遇。总之,要从各方面做好团结和使用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潜力,使其能愉快地把自己的专长贡献出来。

3. 对已确定转业、复员的知识分子,均应按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重新审查处理,如果不是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和适合留队工作的,即不要处理离队,重新分配适当的工作。

(四)关于军衔、级别问题

全军军官的军衔评定基本上是合理的适当的,反保守主义必须和个人主义严格划清界线,不能借口军衔评定也有保守主义而趁机向组织上闹个人问题。但有以下两个问题是必须检查和解决的:

1. 知识分子的军官军衔有些是偏低的,并且有的参军已经多年已可提拔为军官的,因未予提拔也未评上军官军衔;

2. 有些干部因职务提升快,军衔级别跟不上职务的提升,距离越拉越长。

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解决原则,军委已发了指示,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

(五)关于改进工作作风问题

为着克服保守主义思想,贯彻执行大胆提拔干部的方针和做好全面规划,必须改进干部部门的工作作风。干部部门工作作风的主要问题是经验主义。它表现在不少的干部不勤于开动脑筋,照常规办事,满足于现状,老一套,工作缺乏蓬勃生气。不认真分析和研究部队和干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认识和对待新事物不够锐敏,不善于抓住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忙乱被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到下面检查工作,往往是一般地发现和批评缺点,不善于发现和总结新的经验加以推广。到部队考核了解干部往往缺乏明确的目的,照常规考核。习惯于查阅档案,了解入伍、入党时间和职历,在资历上兜圈子。不善于挖掘干部潜力和发现新生力量。写报告做总结也是一般化,内容枯燥,不能把工作中的主要问

题和主要经验反映上来。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们对中央和军委的指示认真学习和研究不够,不善于根据中央的指导思想来检查工作,提高思想、改进领导和改进工作;同时,我们对“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思想也不够明确,对群众中的新经验和新创造没有能及时去发现和总结,以指导工作。

有经验主义的同志往往自认为有经验,“有所恃而无所恐”,认为经验已可够用一辈子,可以过得去了,因而不愿开动机器多想办法。对于群众的积极性认识和估计不够。

因此,如果不克服经验主义,改进工作作风,就必将影响到大胆提拔干部的方针和全面规划的贯彻执行,不能提高干部工作。我们在任免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大胆提拔干部”、“全面规划”、知识分子问题等几项工作,如果不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如果不去以新的东西充实和丰富其内容,以后仍然还是老一套。我们决定结合今年的工作进行改善工作作风的具体指导,以中央的指导思想来检查我们的工作:学习抓工作中的主要环节;学习在工作中如何“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发现和总结群众中的新经验,并及时加以推广等3个重要环节。我们认为这是提高干部思想和工作效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也可为紧缩机关编制创造条件。

二 关于现役军官工作的七年 (1956年——1962年)规划问题

为了应付美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世界和平,遵照彭德怀同志报告中所提出的“为了满足战时扩建部队和补充部队的需要,必须培养和储备足够数量的指挥军官和技术军官”,我军干部工作的任务,应该是保证现役军官按编制数量满额和储备大量的干部后备力量,并提高干部质量,使每一军官都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现代化军事科学知识和相应的技术与文化水平。

(一)根据总参谋部拟制的平时建军方案及战时扩建部队的最高指标,全军平时应有军官、战时应有军官及预计战争中因伤亡需补充的军官,如果全部由现役来准备,国家的财经负担和军费开支就很大,且现役中也不可能准备这样大量的军官。为了减少国家的财经负担和军费开支,除从现役中解决一部分外,其余军官则均从预备役来解决。我们认为可采取下列办法来解决缺额问题。

一、大胆提拔干部。大胆提拔干部是补齐缺额的基本办法,去年已从部队中选调了7万名工农骨干培养军官,现在部队中仍有百余万老战士。必须从中挑选一批军官。新战士经过两三年的正规训练后,也可以选拔一批优秀的军士提升为军官的。因此,只要贯彻执行大胆提拔干部的方针,所有军官缺额(除一部分技术军官外)都可以补齐,并使战

时各军种、兵种扩建部队所需的连以上军官也调配有战斗经验的军官来担任。

二、培养和补充技术军官。所缺技术军官和各院、校一部分师资(主要是技术教员和较高的文化教育人才)除由各军事专业院、校培养解决一部分外,我们已建议国家计划委员会在7年内拨给相当数量的地方高等学校毕业生,补充部队技术军官的缺额。

三、增设航校培养空勤人员。按目前情况空勤人员尚难以解决,需要增加一定数量的航校。

(二)大力培养干部。办好学校是培养干部的基本环节,各院、校尚缺的教育军官,均争取在1958年以前全部配齐;同时要求部队必须认真选送德才优秀有培养前途的军官和优秀的军士去各院、校学习。为了有计划地培养干部,各部队应将凡适合继续在军队工作的干部,按其年龄、身体状况、文化程度进行全面排队,并据此作出分期分批送各院、校学习,开办短期轮训班和加强在职学习的具体计划。

一、提高军官军事科学知识和技术水平问题。在挑选各院、校军官学员时,必须有计划地首先挑选各级指挥人员、专业人员和有关部门(作战训练部门)的人员入学深造;其余人员则可采用短训或在职轮训的办法来培养提高。

二、提高军官政治理论水平问题。总政已有全面规划,各级干部部门应协助各级政治机关组织实施。

三、提高文化水平问题。要提高军官的政治军事技术水平,必须首先解决军官的文化水平问题。按总政规划,在今

后4年内要把现有高小以下文化程度者提高到初中毕业水平。为了发挥军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应将学习成绩的优劣,作为提升职务、军衔晋级以及奖励的主要条件之一。

(三)有计划地培养高、上级指挥军官。我军战略方针的决定有党中央、毛主席及军委直接掌握指导,胜利是完全有保证的,但还必须要有足够数量的优秀的能坚决果断地执行中央军委战略方针的高、上级指挥军官,以保证战役战术的胜利。因此,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培养高、上级指挥军官的工作。必须长期着眼、从现在开始即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挑选一批德才优秀、年轻体壮、有发展前途的军官加以有计划地培养,几年之后培养成为高、上级指挥军官。具体办法是:有计划有步骤地从少将、大校、上校、中校中挑选一部分培养师长以上高级指挥军官;从少校、大尉、上尉中挑选一部分培养团以上指挥军官;从中尉、少尉中挑选一部分培养营级以上职务指挥军官。这些军官均应从政治、军事科学技术、文化各方面全面地系统地去培养提高他们,并必须在5年内奠定基础。我们计划在今年8月底前将这批军官的初选预备名单提出来,由军委、军区、军三级领导上加以掌握,以后在工作进行过程中再不断加以补充修正。

(四)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培养下级军官。由于部队有战斗经验的军士和士兵,一部分已提升为军官,另一部分已作退役处理或即将作退役处理,因而今后中级军事学校及专业学校学员的主要来源应改为吸收年轻体壮、工农出身、政

治纯洁的中学毕业生,培养成为我军的下级军官。

三 关于军官动员工作的七年 (1956年——1962年)规划问题

彭德怀同志在关于兵役法的报告中曾经指出,“强大的武装力量并不依靠在平时保持过分庞大的现役军队的人数,这不但不利于人民的生产和国家的建设,而且在军事上的意义也是有限的。强大的武装力量主要地依靠强大的现役兵员和强大的预备役兵员相结合。”将武装力量动员工作提到很重要的地位。彭德怀同志在此次会议的报告中又指出:“战时所需军官的数量是很大的,单靠军队内部培养还不够,必须在军队以外有计划地培养和储备预备役。”并具体指示,“要迅速建立预备役军官登记制度,除对每年退伍的军官进行预备役登记外,对过去复员转业的军官和在非军事部门服务的适合担任军官职务的人员,要进行普遍登记。这件工作,应当从1956年开始到1957年基本完成。对于预备役军官的集训和高等学校学生的军事训练亦必须有计划地逐步地开始进行。”我们军官动员工作的7年规划即是根据这一指示和总参谋部拟定的战时部队扩编计划,以及现役军官7年规划来制定的。

(一)根据总参谋部制定的作战方案所提出的部队扩编计划,除去从现役军官中解决外,还有相当数量必须从预备役中储备。这个数字是很大的,但也是必须完成的。

(二)预备役军官的来源与实现上述要求的可能性问题。

预备役军官来源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从军队内部和从高等学校学生中来培养：第一，退伍军官编入军官预备役。第二，军士退伍前经军官训练并考试合格，培养为少尉预备役军官。第三，高等学校受军训的毕业学生培养为少尉预备役军官。以上3方面合计为52万余人。

另一方面是将“非军事部门服务，按其专业性质，可以担任军官职务，授予预备役军官军衔者”(军官服役条例第47条)，经登记后编入军官预备役。我们已确定在1956年至1957年两年中共登记130万名预备役军官。我们认为，以上计划是必须完成的，也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目前主要抓紧预备役军官登记工作，要求按数字完成，并且所登记的预备役军官均能适合战时的需要。因此，除了订出切实可行的关于预备役军官登记工作的规划作为推行工作的依据外，还必须同时注意预备役军官的训练问题，务使所有预备役军官，在经过必要的训练以后具有相当的军事专业知识和政治觉悟程度，能适应战争的需要。

(三)为了完成上述工作任务，必须首先抓紧1956年至1957年的预备役军官登记工作，这是军官动员工作的基础。进行预备役军官登记工作是为军官动员工作创造条件，是决定今后做好军官动员工作的关键问题。而要把这一工作做好，就必须重视和加强军官动员的政治思想工作，认识

这一工作所具有的深刻的政治性和群众性；并必须把这一工作切实置于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之下，纳入地方工作的整个规划中去。

干部工作规划是一个新问题，特别是军官动员工作是一件全新的工作，我们还完全没有经验，这个规划因占有材料很少，也极不完全，请会议加以讨论和指示。

附：给彭德怀同志并军委的一封信

德怀同志并军委：

关于 1956 年军队中大胆提拔干部问题，这一工作我是主持者和积极参加了的，出了很多主意，同时我在总干部部就是由我管理干部任免工作（因徐立清同志病）。如果在贯彻执行大胆提拔干部这一方针时发生了偏差和错误，当然我应负主要责任。听说军委正在召开扩大会议，因我已调离军队工作，我应该向军委说明这一点。

敬礼！

宋任穷

1957 年 1 月 6 日

地矿技术工作 必须贯彻群众路线*

——406 队运用现场会议解决地质
技术问题的经验

(1958 年 7 月)

三局所属 406 队于 6 月 27 日到 7 月 6 日,在该队 1 分队的两个地区召开的现场会议,都是处理铀矿异常点的地质技术会议。其任务是对这两个地区的地质情况和铀矿成因进行分析研究,确定下一阶段应该采取什么技术措施。406 队的地质技术员和物探技术员大部参加了会议,三局和 406 队的 4 位苏联专家也到现场一起开会。会议是开得成功的,真正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大家开始破除了对于地质技术工作的迷信观念,进行了联系实际的学习,并对下一阶段的工作作了布置。会上,中苏专家对工作的看法取得了一致意见。大家都感到满意,认为收获很大。

* 宋任穷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

406 队以解决地质技术问题为中心的现场会议，是运用群众路线解决技术问题的一个成功范例。会议证明：技术工作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走群众路线。这是 406 队现场会议所得到的最基本的经验。从会议的结果看，这种现场会议，为实现加强党对技术工作的领导，为充分发挥中苏技术力量和加速培养锻炼中国技术人员，为加快地质和物探方面的技术工作的进度，作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感到这种现场会议，是值得推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方法。

对于加强技术工作的领导问题，大家的观点是不一致的。过去，一提到技术问题，人们就认为需要多聘请苏联专家，多增加中国高级技术人员。对于摆在面前的这两个地区的地质技术问题，中国技术人员感到无能为力，希望专家来讲课和给以解答。这次他们知道有苏联专家的地质权威来参加现场会议，表示很高兴，但自己参加会议却只是“带着耳朵来听”。担任行政领导的同志，对技术问题有神秘观点，不敢摸，认为山地工作、钻探工作还可以摸，而地质工作，只是专家的事情。当然，在目前情况下，苏联专家还是需要聘请的，但是，这种在技术上单纯依赖苏联专家的思想，是提高技术的障碍，是思想未解放的表现。这对工作是很不利的。例如 2 分队的一个揭露小队，单纯等待苏联专家来布置工作，出队已经 1 个半月，苏联专家才来把工作布置下去，在这 1 个半月中没有很好开展工作。其实，只要破除迷信，发动大家动脑筋，工作是完全可以自己独立布置并将工作做好的。

在技术问题上,较为普遍的错误思想是不相信群众。无论苏联专家和中国专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有个技术员反映,苏联专家对中国技术人员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在这次会议上,一位苏联专家在发言中也谈到过去认为中国技术员“软弱”。另一位专家说:在1957年那次会议上,中国技术员“扭扭捏捏”。在中国技术员方面,既不相信职工群众,又不相信自己。他们在比较复杂的技术问题面前,特别是在苏联专家面前,有的人不敢想,有的人敢想不敢讲,有的人敢想敢讲不敢干。在“地质权威”面前,认为自己完全不行。总之,妄自菲薄,自卑感很突出。但是,反转来他们对初级技术人员、机长、班长和工人群众,则是另一种情况,认为“群众不懂技术,不必听他们的意见”。认为技术工作不能走群众路线。他们既不和职工商量,又不共同研究。这样,就把技术工作限制在狭小的圈子里。由于不能坚决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也就缺乏敢想、敢讲、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

现场会议的召开,大队党政负责人和中苏技术人员一起来到工地,对于技术问题采取由下而上的,首先由中国技术人员报告情况,把问题摊开,然后大家上山下井,调查研究,搜集证据,在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得出包括中苏专家在内的一致解决办法。关于这两个地区的地质技术问题,即是这样解决的。这是一种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它从事实中得到证明,要比过去那种由上而下的,先由苏联专家作报告,未经充分讨论和调查研究即作出决定的办法优越得多。

通过现场会议，显示了群众的力量，砍掉了妄自菲薄。大家认识到技术工作也必须走群众路线，采取群众路线的办法，即使没有苏联专家参加指导，只要能认真地倾听初级技术人员、机长、工长、班长以及工人群众的意见，自己又能动脑筋，也能解决地质技术问题。不少技术员都感到会议对自己收获很大，纷纷写出了心得，有的同志还要求今后多开这样的会议。苏联专家对中国技术人员的看法，也开始改变了。一位苏联专家说：“过去认为中国技术员软弱，现在我相信你们是可以完成任务的。”另一专家说：“这次会议很好地说明中国同志在技术方面有很大提高，你们的发言，从技术角度看，都是合乎逻辑的。”

这次会议所以开得比较成功，是由于在经过总路线的学习的基础上，大家进一步地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并有了出队以来两个多月工作的实践经验。在指导思想，注意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同时在会议的发展中，抓住下面3个环节，贯彻了群众路线的精神。这就是：

(一)强调思想解放，打破技术人员单纯依赖苏联专家的迷信，鼓励大胆想、大胆讲、大胆干。中国技术人员由于长期在一个地区工作，对于该地区的地质情况和铀矿分布比较清楚，应该说，有发言权的首先是他们。但是在过去，对于他们的意见是倾听得不够的。有时苏联专家来上一天两天，看一看图纸，就把工作布置了。对于苏联专家的布置，中国技术人员遇到实行不通，就很为难，结果形成两股劲。有的技术员对这种情形早就不满意。这次一经号召思想解放，他

他们就大胆地提出了这些问题。领导上当即对这一情况作了分析,指出过去这方面存在的缺点,责任不在苏联专家,而是我们的领导方法有缺点;是领导上向苏联专家务虚不够,对苏联专家下队工作的组织领导工作缺乏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尤其是在过去对于技术设计工作的布置,主要是以苏联专家为主,今后必须坚决改变这种情况。经过这样说明以后,大家的情绪就热烈起来,都积极地从作好今后工作来考虑问题,那些只“带耳朵来听”的同志也积极提意见了。会上发言一直很热烈,而且有的技术员讲得很好。

(二)强调调查研究,发扬技术民主,开展不同意见的争论。会议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工地进行现场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每个技术人员都带着“三大件”(锤子、罗盘、放大镜),敲敲打打,搜集标本,进行研究。事实证明,这样的群众性的调查研究工作很重要。为了证明地质问题和铀矿成因,需要找各种证据,大家动手就能搜集到原来依靠少数专家所不能搜集到的证据。有了较充分的调查研究,再进行讨论,各抒己见,发扬技术民主,使大家的思想一致有了较好的基础。苏联专家在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以后,又听取了中国技术人员的意见,就使自己的建议更加充实和完善,工作布置也更加切合实际。中国技术人员对他们也更加信服,两股劲真正扭成了一股劲。某地区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该地区 54 号异常地区的地质构造,岩石性质、铀矿床成因都很复杂,经过群众性的调查研究,开展争论,最后由苏联专家作总结性的发言,初步地解决了对 54 号异常的认识

问题,苏联专家提出的下一步工作方案,也在经过争论以后取得了一致意见。

(三)强调了联系实际地学习。这次现场会议也是学习会议。它的特点是密切联系实际;是对于工作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向苏联专家学习和向自己的实践学习的统一。这种学习方法,对于提高技术业务水平,是很有帮助的。有一个技术人员的学习心得里写道:“我在这次现场会议中对技术的学习,得到一日如一年的重大收获。”这是可以理解的。工作实践的经验,是最亲切和最直接的。通过现场会议,将实践经验加以提高和系统化,就容易为大家所接受。这是一种把技术学到手的好办法,是培养和锻炼技术人员的好途径。通过自己的实践来向苏联专家学习,效果更好,这样也才不至于脱离实际和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脱离自己的实践经验去向苏联专家学习,必然空空洞洞,提不高的。因此应该强调把向苏联专家学习和向实践学习统一起来。

从这次 406 队现场会议所反映的情况看,为了加强对于技术工作的领导,今后三局和大队的苏联专家到地质队时,必须有中国技术人员或行政领导干部陪同,到队后要与地质队的领导干部共同商定应该采取的工作方法。例如采取首先由中国技术员对他们作系统的介绍,提出方案,大家讨论,求得一致意见。贯彻群众路线的精神,不要少数人作决定,造成下面为难。部或局随同苏联专家到地质队帮助工作的领导干部,要参加到所在队的领导集体中,组成领导核心,实行集体领导。

今后,普查分队或小队 在召开这种会议的基础上,还可以召开发现异常点的经验交流会议,把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充分地贯彻到技术工作中去。

原子能事业并不神秘*

(1958年12月)

我们是二机部,是搞原子能的。原子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有些人就产生了很多神秘观点。原子能是什么呢?原子能不外有两种用途:一是用在动力方面,一是用甲、乙、丙射线为工、农业、医务等服务。另外有做原子弹用的,是国防上的事情。原子能事业,从地质勘探到制成成品的过程,是从找铀矿——开采——冶炼——金属铀,然后用到原子堆里,可以发电和生产同位素。

因此,我们这个部门的业务不是太单一的,它包括:地质,也就是地质部的事我们要做;包括开采、选矿、冶炼,也就是说冶金部的事我们亦要做;制造原子堆是属机械方面的,那么机械部的工作我们亦要做;电站是电力部的工作,我们也要做;化工方面的工作也要做。总之,是比较带综合性的事业。可是我们部1956年才成立,只有地质方面比较久,工业方面还不到1年。所以我部是个新摊子,干部也是各方面凑起来的。地质方面原是地质部管的,12局原是冶

* 这是在欢迎中华全国总工会调入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的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宋任穷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

金部管的，是随着工作的开展调过来的，他们都对我们这门事业支援很大。这次总工会调来这批干部，对我们亦是很大的支援。

有些人感到原子能很神秘，其实并不神秘，并不可怕。我们过去没搞过社会主义、土地改革，现在不是也搞了吗？原子能事业原来并没有人会搞，苏联也是同样。搞原子能的技术干部、党的干部、行政干部都是从各方面转来的，我们部去年大学生闹“专业不合”，来找我，我说这不能怪我，因为中国从来没搞过原子能，亦没有培养这样的干部，从哪找这方面的干部呢！只有找相近的专业转做。经过整风和今年成都会议及八届二中全会以后，打破了迷信，提高了觉悟，解放了思想，这些情况大有转变，技术员和专家们一起努力，搞得很好，这就证明原子能事业没有什么神秘和高不可攀，并且还可以提前完成计划。如设计院搞一个工厂的设计，准备明年9月完成，在全国大跃进的影响下，我们技术员准备明年5月1日搞出，专家不同意，认为搞不出来；后来又提出到元旦完成，专家更不通；结果经过努力实际已于今年“十一”设计完了。所以说，只要我们边干边学，就可以钻进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又如我国第一座原子堆和加速器，已经在“十一”移交生产，在8月下旬时还存在着两个问题，是磁场需要调整，离子束也需要调整。原来调整离子束的工作在苏联专家指导下4个月才能完成，可是苏联专家回国了，当时距国庆节只有40天了，怎么办呢？由于发动了群众，30多天就完成了任务，经专家们检查认为修得很好。

另外,磁场的调整,原仅有两三人懂得这门技术,经过这么一搞,就有 34 人学会了这门技术。又如高频振荡器是苏联货,出厂时注明,未经工厂允许不准乱动。但机器出了问题,不能运回苏联去换呀,我们的同志们就和苏联专家反复商量,结果专家允许把机器打开看看,但不准动手摸。机器一打开,他们哪会不动手,后来大家动手修理,专家们也一起干,结果不到半个月,调整好了。所以说,原子能事业并不神秘,你摸几年就会懂得很多。当然这里是有很大的学问,但学问是学来的。同志们不要觉得高不可攀,当然当专家是不简单,但我们可以将基本的知识学得差不多。如前次我到 309 队搞了一个时期,我就学会了一些地质的基本知识,并能识别一些岩石。当然还没有象专家那样的才学,但一般的知识是可掌握的。

同志们调到我们这里工作,也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们都是做党、团、行政工作的,还是要按马列主义一般原则办事,就是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那么我们部门有没有特点呢?如果说我们部有特点,那就是:我们这个部门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特别要强调党的领导,注意思想政治工作。在工、农业大跃进中,我们原子能事业进展也很快,因此还有一部分人容易翘尾巴,这是我们的特点。整风前有些人就是认为我们党不能领导这事业,不能领导原子能科学研究工作,不能搞群众运动等。我们不要有什么顾虑,经过整风,知识分子是有进步了。总之,原子能事业没有什么了不起,是可以学会的,就应大胆地搞起来。

同志们来,大部分是做党、团、行政工作。我听说有人不愿作工会工作,但为了工作需要,也有一小部分同志还要做工会工作。同志们到我们部里,主要的不是加强机关,而是加强厂、矿,许多人要做党、团、行政、工会工作。有的同志要当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工作,你们过去是搞群众工作的,到部里来还是要搞这些工作,因此不算转业。

同志们要问我们的工厂、矿山现在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的工厂、矿山现在还在基建过程中,这对你们是很好的,你们去了可从设计和基建摸起,可把这一套都搞清。厂、矿现在还是很艰苦的地方,可说是最艰苦的,是“鬼都不生蛋的地方”,那里没房子,更没有托儿所,地方偏僻,气候不好,没有人烟,当然现在艰苦,但经过我们大家工作,大家去建设、创造,不久就会好起来。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些地方建厂呢?

1. 因为这些厂子有放射性,它用过的污水对人健康有影响,所以要建在人烟少的地方。当然矿山例外了,哪里有矿就在那里开采。有些人很怕放射性,但放射性是可以防护的。方法是:居住区兴建时注意风向,住房和厂子有一定的距离,有一定的安全防护措施,只要我们注意就可以了。

2. 还有保密问题,若干个工厂是很机密的,密还是得保,因为帝国主义还存在,人家把我们的底子摸去了是不好的。但保密不是神秘。保密有几层,有绝密、有机密,也有一等、二等保密,不该保的保了会脱离群众。

将来工作会遇到很多困难,特别是明年更困难,一个是

初创的摊子,基础差,什么都要做。另外,明年是苦战3年的决定性的一年,我们的口号是:“苦战3年,基本掌握原子能科学。”明年全国都很紧张,可能什么材料都没有,所以工作是很困难的。

我们部要苦干、穷干,再加上大家的巧干,我们的事业发展就快了。

另外我想再介绍一下我们建部以来的思想情况。我部产生过特殊思想,由于我部挂有原子两字,而且请的苏联专家很多,因此觉得很特殊,觉得我们高一等,“你们应为我服务”等。我们强调,不论在什么地方工作,必须由地方党委领导,向他们汇报。当然,在开始时我们还不知道哪些问题能交下去,什么都是由省委第一书记管,别人谁也不知道,形成了知道的不管具体事,管具体事的不知道,事就很难办。这也是历史发展情况,现在好了。不过同志们知道这段历史也有好处,免得重复这方面的错误和缺点。希望同志们本着党的方针,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去做好工作,这样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今天我们就向同志们介绍这些情况,做为礼物来欢迎大家。

在东北局第一次会议上的 总结发言*

(1960年11月7日)

同志们：

我们这次会议，是在中央指示的精神下召开的。原来预定在10月25日召开，后来由于中央在10月底召开会议，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我们的会议便延至11月2日召开，这就使我们的思想更明确了，使这次会议的内容更充实了。我们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讨论了工作安排。同时，在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和3省省委多次研究的基础上，对东北地区的形势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当前怎样作，长远怎样作，都比较清楚了。会议是开得好的。

会议的几个报告，我都完全同意。欧阳钦同志^①《关于东北地区的形势和今后工作的意见》、黄火青同志^②《关于东北地区工业的情况和今后任务的意见》、吴德同志^③《关

* 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

① 欧阳钦，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

② 黄火青，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辽宁省委第一书记。

③ 吴德，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吉林省委第一书记。

于发展东北地区农业的十个问题的说明》，还有喻屏同志^④对建立组织机构的发言，马明方同志^⑤讲到的两点意见，我都同意。会上曾绍山同志^⑥就东北地区国防问题作了发言，还有其他许多同志的发言都很好。这些，对我来说，使我了解了许多情况，是一次很好的学习。

总的印象，3个省10多年来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从东北地区的工作中可以使我们体会到：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是维护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的问题。我们这次会议上，许多同志的发言中，都强调了这一问题。今后还是要特别注意这一条。这是根本性质的问题，也是基本经验，这也回答了我们今后怎样做好工作的问题。

下面我讲几个问题，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一、关于形势问题

国际形势很好，对我们有利，不准备在此多讲。国内形势，中央11月3日的指示信中说：“1958年大跃进以来，工业、农业和其他各个战线所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成绩伟大，史无前例，这几个字，就说明了国内的形势。东北地区，由于贯彻执行了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形势也是好的。10年来，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6倍，农副业产值增长1.5倍，粮食增长65%，还有其他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干部在工作中受到锻炼和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

④ 喻屏，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后补书记。

⑤ 马明方，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

⑥ 曾绍山，沈阳军区副政委。

悟也有很大提高。

在会议的文件中和同志们发言中,分析了矛盾,提出了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和缺点。总的看来,由于工作发展快,出现了几个不相适应:(一)农业和工业不相适应,由于工业发展快,农业相对落后;(二)轻工业与重工业、与人民生活需要不相适应;(三)交通运输与生产建设不相适应;(四)重工业内部尚有薄弱环节;(五)工业布局不够合理;等等。这些,是发展中的问题,有些是难以避免的。现在提出上面几个不相适应的问题,也是为了要我们认识它和解决它,把工作作得更好。

必须肯定,我们的大部分干部是好的或基本上好的。但是也要看到,不少的干部还存在着政策观念不够明确、工作作风不够民主、思想作风不好、贯彻政策不力等问题,还有极少数干部蜕化变质,这些都给工作带来了一定损失。因此必须整顿作风。

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困难,这一点也要看到。自然灾害,是我们无法避免的。由于我们发动群众进行了艰巨的斗争,把灾害缩小了,这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够做得到。过去遭了灾荒,树皮也要剥光。现在我们要大力进行生产救灾,安排人民生活,进行休养生息,使损失减少到最小限度。

分析我们的形势,首先要看到成绩伟大。同时还要看到有些困难、问题,有些困难和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讲这些,并不是泄气,是为了揭露矛盾,注意解决,按照中央的路线、方

针、政策，必须更加鼓起干劲，加强信心，把工作做得更好。

就我们经济建设当中出现的几个不相适应来说，主要矛盾则是农业的发展不适应工业发展需要的矛盾。矛盾的焦点，是劳动力问题。解决劳动力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农业机械化，当前则必须特别注意合理安排劳动力，保护好劳动力，注意劳逸结合，安排好生活，使灾区人民得到休养生息，保护牲畜。我们有中央的紧急指示信为武器，加上其他许多有利条件，困难、缺点可以克服，问题可以解决。同意马明方同志讲的，明年要争取一个丰收年。

二、关于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问题

关于以农业为基础的问题，吴德同志已经讲过了，我同意他讲的。工农业并举，以农业为基础，在我思想上，是逐步明确的。这次到中央开了会，又进一步明确了。

毛主席在我国人民民主革命时期对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于农业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有极重大的意义。从历史上看，农民问题历来是我国革命中的根本问题之一。

全国解放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城市，但仍然在农村中充分发动群众进行了彻底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改革。以后党领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毛主席解决了在没有机械化条件下实行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从初级社到高级社。1956年找34个工业部门和其他部门汇报工作，提出了十大关系，其中重要一条是工农关系，提出了工农业并举。以

后又提出了农、轻、重。去年进一步明确以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从历史上和今后来看，我们都必须把农业摆在重要地位，即国民经济的基础的地位。如果摆不适当，就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农村比较分散、比较艰苦。我们不少干部，在农村搞了几十年，有的搞了10几年，许多人想进城，要看梅兰芳的戏。号召进城容易，号召下乡，比较不容易。在这样情况下，农村容易被忽视。再加上农村卫生条件、文化生活较差，就自然想到城里工作。（欧阳钦同志插话：三个差别消灭了就好办了。）消灭三个差别，主要应从农村着手，发展农业，建设农村，实行农业机械化，做到农村的建设和生活条件与城市大体差不多。这是长期的工作。因此，就应着重扎扎实实地做好农村工作，搞好农业生产，做好提高农民的工作，使三个差别逐步缩小。

从工业发展和国防工作看，也必须搞好农业。工业的原料、市场要靠农村，粮食蔬菜的供应也靠农村。部队的战士，最大量的还是来自农村。国防后方也在农村，没有把后方建在大城市的。

总之，从历史上看，从现在看，从消灭三个差别、工业生产、国防建设来看，都必须认真作好农村工作，搞好农业生产，作好农民的工作。

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这实质上是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问题，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必须非常重视。

三、贯彻政策问题

目前提政策问题,事出有因,即由“共产风”引起的。东北各地“共产风”的程度如何,各省可以进一步摸一下。现在的“共产风”与1958年不完全一样。过去“共产风”在公社内部刮,这一次面更大,机关、学校、工厂、企业、事业部门都有无偿占用公社土地、抽调劳动力或平调其他财物的现象。

“共产风”打击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破坏生产力,必须严肃认真地遵照中央的政策,彻底纠正。现在,必须立即坚决遵照中央指示,把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原原本本地读给党员、干部和社员群众听,并且坚决兑现。

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政策,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党的政策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我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具体表现,是毛泽东思想在党的各项工作中的具体表现。我们深刻理解了党的政策,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也就是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和贯彻执行了毛泽东思想。党的政策,是根据一定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国家的和群众的、长远的和当前的利益等等制定出来的。政策是服务于一定阶段党所提出的任务的。没有政策,就不能把革命干好,也不能把建设工作做好。没有政策,就没有方向。做工作不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就要给工作带来损失。

现在中央决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至少7年不变,这

是一个重要政策。在中央的紧急指示信中对农村人民公社当前的各种政策问题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我们必须认真学习 and 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指示信，加强政策观念。

政策同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正确的政策，体现着群众的利益。政策与任务，也是一致的。有一种说法，认为贯彻政策就不能完成任务，或者是要完成任务就不能执行政策，这些看法是将政策与任务对立起来，是不对的。要进行具体分析，向干部和群众讲清楚。

政策是要通过干部来执行的，干部的政策思想怎样，对执行政策有直接影响。要使我们的干部深刻理解党的政策，很重要。同时必须使政策与广大群众见面。毛主席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使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这段话充分地说明了政策和群众见面的重要性。

为了使政策同群众直接见面，除其他许多方法外，还可以适当出点布告。李范五同志^①，栗又文同志^②，还有黄欧东同志^③，你们是省长，就可以来一个本省长“体念民艰，切切此布”。省长出，县长也要出。过去军队所到之处，要出“安

① 李范五，黑龙江省省长。

② 栗又文，吉林省省长。

③ 黄欧东，辽宁省省长。

民”布告。中国农民中间有这种习惯，这种形式可以利用（黄火青同志：这些年发指示多，出布告少，出布告能使政策和群众直接见面）。出布告是好方法，是个群众观念问题，出了布告，就可使政策为群众了解，也可以为群众撑腰。当然，布告也不要出多了（黄火青同志：不要出不能兑现的布告）。可以以省为单位，根据需要每年都可以出布告。重要问题单独出一次，有好处。

中央对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规定，第一，必须下最大决心坚决贯彻，因为当前农村工作中所存在的4种风和其它严重问题，有的是影响到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发挥，有的已经破坏了生产力，必须严肃地坚决纠正，不允许有任何犹豫动摇。其次，在执行当中，还要结合各地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化。如果掌握不好，不加分析，很可能把社办工业、副食基地、社有经济都搞掉了。社有经济，是与社员长远利益结合的，不能一风吹掉。社办工业，在处理中，要区别3种情况：第一种是要保留的，如为农业机械化服务的加工业；第二种，保持一部分，退掉一部分，做到亦工亦农；第三种，需要停办的应一律停办。凡是来自一平二调的，应坚决清理退赔。总之，社办工业，应以不削弱队有经济为原则，必须为农业生产服务，要根据具体情况，该保留的保留，该停的停，该缩小的缩小，能够由管理区和公社合办的合办，不能不加区别地一风吹掉。

关于防右问题，毛主席说过，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对这问题，领导机关要保持清醒头脑。中央的紧急指

示 12 条未写这个问题，因为写了这一条，纠正“共产风”的政策就怕贯彻不下去了，但在中央的指示信中提到了这一点，目的是要领导机关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掌握。

四、作风问题

除“共产风”要纠正外，某些干部的命令风、浮夸风、特殊风，也是必须纠正的。纠正这些坏作风要对症下药。认真贯彻了中央 11 月 3 日的紧急指示 12 条，也就治了“共产风”。对于浮夸风，用实事求是来治，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必须教育干部养成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现在报粮食产量，有的越报越低，比实际产量低得多，虽不是属于浮夸，但也不是实事求是。对于命令风和特殊化作风，就要用实行“四同”来治，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说起来，都是些老药方了。但只要认真实行，这些药方是一定能治好病的。有一个总药方，就是群众观念，走群众路线。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需要加强群众观念，走群众路线。上面说的实事求是、“四同”，也必须有坚强的群众观念才能做好。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基本上是好的。同时，如上面所说，“共产风”一阵一阵吹，命令风、浮夸风、特殊化作风这些不良作风，也还是比较普遍。对于作风不够民主，不够好的干部，要充分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批评，只有如此才能教育他们。同时要对他们进行耐心教育，使他们自觉地整顿作风，弄通思想，提高觉悟，改进作风（马明方同志：这是很重要的领导艺术，既要批判坏的东西，又要发扬好的东

西)。工作还是要依靠他们去做。作风上有缺点的干部,量大,有的在工作中跌了一下跤,要帮助他们站起来,去掉毛病,做好工作。有极少数干部作风十分恶劣,并且屡教不改,必须在群众中进行严格批判,把他们从工作岗位上撤下来,继续进行教育改造。

为了改进干部作风,要采取一些有效办法。办法之一是,干部要深入到群众、深入到实际中去,进行调查研究。我们在机关里工作的人,有这样的经验,在机关时间太长了,就没有什么话可讲了。到中央开了会,或到下面看看实际工作,回来就有话讲了。3个月不下去,就差不多无话可讲了。要向干部提倡深入群众,问生产、问工作,关心群众疾苦,向群众学习,同群众商量。

深入到下面实际工作一个时期,要上来研究问题总结经验。光下去和群众在一起工作还不够,还要从群众中集中起来。要把下去同群众共同劳动、了解情况,和上来研究问题、总结经验结合起来。地委、县委、公社党委,都应该有这个制度。要把下去和上来作通盘考虑,按照各地情况和生产季节,作出适当安排。下去一个时期,然后坐下来集中情况,研究问题,总结经验,办法就会多一些,提高就快一些。

一个任务、一项工作布置下去,要同时交代政策、交代方法。要使政策、任务和群众见面,否则搞不好。工作结束以后,任务完成了,不能只总结几个简单的数目字,要同时检查是否符合党的政策,完成任务的方法是否得当。

为了整顿作风,除批评教育以外,还要注意表扬好的干

部。这个时期各省报纸已经宣传了一些好人好事，还需要继续深入宣传，树立榜样。

今冬明春的整党整社，对政策、思想问题要严，以提高干部。在组织处理时，除极个别情节异常恶劣，严重违法乱纪的必须加以严处外，一般的应该从宽。对犯错误的干部必须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做到大多数人心悦诚服，心情愉快，既纠正了缺点错误，又发扬了积极性，使各级干部都能对革命事业勇往直前，不缩手缩脚。

思想、政策、作风是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对生产力有直接影响。不良的思想、政策、作风，就会破坏或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要不断整顿，才能保护生产力发展，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

五、工业问题

工业问题，黄火青同志的报告已讲得很清楚了，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东北地区的工业已经建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这是一件大好事，尽管还有不相适应的方面，如农业与工业不相适应等等，但这不是工业发展的不对。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工业大大发展了，现在才有了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的条件。因此不要有错觉，不能因为农业跟不上而怪工业，城市人口多了不完全是工业带来的，有许多不该进城的人也进了城，现在要压缩城市人口，不是压缩工业。

工业今后如何办，还有奔头没有？工业体系初步建成了，农业是基础，工业还干什么？应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工业的重要性并未减弱，任务并未减轻。相反的，东北

地区的工业要进一步大力支援全国,这是头等重要的任务。彭真同志向我谈东北局任务的时候这是第一条。工业还要支援农业,也是很繁重的任务。过去农业支援了工业,供应工业以人力、粮食、副食品、原料,还为发展工业积累了资金。出口商品大部来自农业,换回的机器大部分装备了工业。过去工业支援了农业今后工业更要大力支援农业。因此工业支援全国、支援农业的任务都是十分重大的,工业是大有可为,大有奔头的。

今后工业的努力方向,主要是提高。数量还是要的,必要的还会有适当发展。但今后更重要的是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发展尖端。这是大有搞头的,任务是艰巨的。搞数量,自然也不容易。今后着重搞质量。提高的方针,是积极的方针。这点,要向搞工业的同志们,向工人群众大作宣传。

为贯彻提高的方针,必须把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发展尖端体现在计划上。计划不要光提数量指标,还要有质量、品种等方面的指标。指标是要紧的,能振奋鼓舞人心,必须把质量指标列入计划。(欧阳钦同志:数与质的关系是辩证的,有了数就要讲质,质量提高了,也就等于相对地增加了数量)。

为了完成工业生产任务,还要抓管理。管理制度,要依靠群众,和群众商量来定。管理制度有些尚不够完备,该立的要立起来。现代化工业,没有制度不行。加强企业管理,必须实行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提高质量,建立与健全企业管理制度,也可以有两种搞法,一种是把领导与

群众结合起来,在集中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一种是少数人冷冷清清地搞。制度是要群众来执行的,质量是要群众来保证的。不通过大搞群众运动,冷冷清清是搞不好的。(黄火青同志:现在一长制残余就表现在这个问题上,行政部门关起门来搞一套制度,让群众去执行,而不是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有这样一部分人,对于搞群众运动,讲起来好像也是赞成的,但是谈到提高质量,执行质量的国家标准,他们就认为这只是他们少数人的事,不能搞群众运动。他们把提高质量与搞群众运动对立起来。应该帮助他们改变这种态度。

总之,今后东北工业战线的任务,不论从哪方面看,都很艰巨,工业各部门的同志必须继续鼓足干劲,把工作做得更好。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工业提到更高的阶段。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都不能离开工业的现代化。

东北小型工业少,要特别注意。从国防观点看,也要注意小型工业的发展。

六、目前工作安排

这次会议,对这个问题讨论较多,今冬明春,从现在到明年3月底,工作很多。生活安排、征购粮食、贯彻政策、整党整社、农村三反、镇反肃反、整顿和纯洁工人阶级队伍、当前的生产和明年工农业生产的准备工作、基层选举、编制明年经济计划、精简机构、压缩城市人口下乡、农业机械化准备、接收移民等等。工作是繁重的,都必须做好,其中最重要

的是两项，一为生活安排，一为贯彻政策、整党整社。在 11 月份内，要集中力量把生活安排好，要抓住这两项带动其他工作。

对生活安排，最重要的，要心中有数。不怕粮少，怕无底。心中无底，吃多了，以后就被动。生活安排，既不要盲目乐观，也不要悲观，不要造成人为紧张。安排好就可以过得去。

通过安排生活，要把粮食制度整顿好。安排生活是积极的措施，通过安排生活，要达到以下目的：保证群众过好日子；保证灾区人民休养生息；保证继续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保证人强马壮；保证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同时要通过安排生活，进一步在干部中树立关心群众生活，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在群众中养成勤俭节约的风气，进一步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最后要达到争取明年大丰收的目的。这些就是我们安排生活应争取达到的目标。

七、加强国防

国防问题曾绍山同志讲过了，在东北地区，国防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工业支援全国，搞好农业，加强国防，是中央指示的东北地区 3 大任务。加强国防是 3 大任务中之一。东北是一个战略地区，必须具备独立作战的能力。曾绍山同志谈到的国防工作中的许多问题，建议委托东北局书记处进行研究，这里就不多讲了。

八、东北局的组织和工作

编制，暂按 710 人，开始不要大。调干部的原则，既要照

顾中央局的工作需要,又要不过多地削弱各省的力量。现在和将来做工作,都主要靠省。东北局需要调一定的数量、质量的干部。拔尖,不可不拔,不可多拔。调的方法,大家一起商议,从各省调一些干部,各省就要提拔一些干部补充上来,对各省干部的成长也有好处。

工作做法,中央局本身,中央局各部门,要发挥省的积极性,多商量。工作、计划、政策规定,都要商量着办。要做到不因中央局成立而使各省碍手碍脚。各省有意见也应该提出来。为了做好工作,我们大家要做到无话不说。

九、团结和学习

把国内工作做好,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做好了国内工作,斗争就更有力量。要作好工作,就要团结。我们应该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紧密团结,鼓足干劲,把东北地区的工作做好。

为了做好工作,一要团结,二要学习。要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需要抽时间,坐下来,认真学习和体会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要采取认真的态度。毛主席讲,什么事都怕认真。工作中的缺点、问题总会有。只要我们团结好、学习好,就一定可以把工作做好。

各级干部,都要通过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水平,我们要力求通过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在根本理论和政策问题上作到融会贯通。毛主席说,要有个辩证的头脑,要学点辩证法。我们学习理论,就是要掌

握辩证法,按照辩证法办事。

以上所讲的是个人意见,不成熟,供大家参考。

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1961年5月14日)

主席：

这一封信向您反映牲畜、中型农具、零星树木问题的一些情况。

目前，牲畜、中型农具、零散林木，一般只落实到生产队一级经营、管理和使用，这比贯彻十二条、六十条以前，大大前进了一步。有些生产队对牲畜饲养已建立了奖励制度。但是，责任制、奖励制尚未普遍建立，特别是没有把责任落实到个人身上，还存在着若干问题。

一、牲畜。

耕畜，大队所有，固定给生产队使用，这个办法，大多数干部和社员是赞成的。生产队对大队，实行保本保值。如果因为生产队使用管理不善而致死亡，生产队应设法补偿。对繁殖的幼畜，大队和生产队按比例分成。比例各地不全一致。一般的二八分成。为鼓励生产队和饲养员、使役员（有的加上生产队长）爱护耕畜，积极繁殖牲畜，不少的生产队根据六十条的规定，制定了具体的奖励办法。此外，也有少数生产队的干部，主张牲畜归生产队所有，大队提成。

对羊和猪的饲养，群众一致要求改变过分集中的办法，多下放给社员分养。既可多积肥，多打粮，并且两条腿走路，集体的、社员的都可得到发展。不少生产队，猪已经下放一批，羊也在兑现时退回一批，效果很好。群众对养猪养羊的积极性很高。有个社员分到小猪后，省下口粮喂猪。他说：“我吃啥，它吃啥。”

看来，把集体的猪、羊多下放一些，散牛适当下放一些，给社员喂养，对发展牲畜是有利的。下放的办法，有卖给社员的，也有集体同社员合养，实行分成的。

生产队留下集体饲养的猪、羊和散牛，同样要对饲养员、牛倌、羊倌实行奖励制度，以鼓励繁殖增产。

二、中型农具。

几年来农具的丢失、损坏比较严重。实行“四固定”以后，比过去管得好些。从我们在阜新的调查和到朝阳、锦州了解，各社队对犁杖、大车、水车等农具的保管、使用和维护的责任制度普遍没有建立。一般是交给生产队的保管员管理。比较做得好的生产队，也只落实到作业小组使用和管理，责任没有落实到个人身上。

我分别和干部、社员座谈这一问题，大家主张对中型农具的保管、维修，必须进一步把责任落实到个人身上。例如大车，应把管理使用和维护的责任落在车老板身上。生产队对车老板实行“三包”，即包使用年限，包修理（生产队每年支付一定的修理费，节余归个人，超支不补），包使用。使用年限和修理费，要实行民主评定。大家认为这个办法可以使

农具的管理制度健全起来,延长农具“寿命”,从而节约生产费用。并且不致使农具的生产和供应如此紧张。这一办法,几个生产队正在试点。

生产队自费购置的农具,无论大、中、小,一律归生产队所有。对小农具,由社员自备、自用、自修。

三、零星林木问题。

我到的阜新、朝阳、锦州的几个地区,都没有成片的成材林。零星树木各地都有,荒山不少。树林破坏很多,不少树被剥了皮。但社员房前屋后的和自留地的树木却完好。零散树木被破坏,和所有制不无关系,有的是由于责任不明。

社队干部和社员对零星林木问题,主张:(一)社员房前房后和自留地的树木,永远归社员所有;(二)在各生产队管理范围内的零星林木,固定给生产队所有,其中有的视情况固定给个人经营管理。修枝所得柴禾归社员;(三)大队所有,生产队经营管理的林木,适当固定大队与生产队的收益分配比例。一般是,成材林,八二或七三分成(大队多,生产队少);将来生产队培养起来的幼林,倒四六分成(大队四,生产队六)。

东北地区荒山、河滩不少,划定“自留山”问题,社队干部和群众极为拥护。认为实行自留山政策,不要几年,荒山就可“长出毛毛”,既可保持水土,又可解决部分烧柴,死了人也能有个棺材(现在死了人,有的用柜子装)。为了保持水土,划归个人所有的河滩荒,只准种树,不得开荒。

敬 礼

宋任穷

1961年5月14日

关于揭生产斗争盖子问题的一些讲话、插话要点

(1965年11月25日)

拿出一段时间大揭生产斗争盖子十分必要

看来,群众在运动中最担心、最关心的有两个问题:一是能不能建立起一个好的领导核心,一是经过运动,生产能不能上得去。第一期社教总的说是搞得好的,但凡是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够好的地方,群众的意见都比较大。他们说:“‘四清’办了一大堆好事,可惜的是没有给留下一个好的领导班子,生产面貌没有明显改变。”这个批评是中肯的,说明有些地方的社教运动没有完全达到毛主席提出的搞好运动的六条标准。就生产问题来说,各地在第一期社教中,虽然一般都注意到了,但抓的不够突出。这除了由于工作队有些同志不大关心生产外,主要是在运动中没有专门安排一段时间突出地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看来,在揭阶级斗争盖子的基础上,拿出一段时间,例如1个月左右,放手发动群众,以阶段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根据总路线的精神,大揭生

产斗争盖子,可能是抓革命、促生产,使运动与生产紧密结合的一个好形式。

从一些地方的实践来看,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包括科学实验)是交织在一起的,是相互联系着的,但又是有所区别的。在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的过程中,群众着重揭发的是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问题和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问题,虽然会涉及到一些生产方面的问题,但是,当时群众和工作队一般都是把主要力量放在解决阶级斗争问题上,还来不及集中地、系统地解决生产斗争中的问题。因此,在“四清”、对敌斗争之后,在揭阶级斗争盖子的基础上,拿出一段时间,采取揭生产斗争盖子的办法,突出地解决生产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干部的精神状态问题和生产上的两条道路斗争问题,就是十分必要的了。如果经过运动,这些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生产依然上不去,那末,“四清”运动就可能是走了过场。

因势利导地进行四个主义教育和备战教育

许多地方的经验证明,大揭生产斗争盖子的群众运动一展开,群众立即活跃起来,揭出的问题很广泛,有认识范畴内的问题,也有阶级斗争范畴内的问题。他们提出:“你们只抓钱,不抓粮,只抓当年红,不抓长远建设,这是什么路线,什么方针,什么道路?”现在我们这里守山的,没柴烧,种地的没粮吃,还得吃国家返销粮(海城山区7个公社今年吃

返销粮 800 多万斤),全国要都像我们这样,不用说造原子弹,连手榴弹也造不出来,不要说养几百万人民解放军,连民兵也养不起。”特别是那些生产比较落后、群众生活很困难的队,更是慷慨激昂。他们批评县、社干部:“你们不帮助我们解决思想、路线、方针、道路问题,不帮助我们生产搞上去,有了困难,你们就派信用社干部来,给点救济,结果越救济越穷,这样,一害了国家,二害了自己,这叫什么道路?”在揭生产斗争盖子的过程中,只要领导上注意加以引导,群众很自然地就会把揭发出来的问题,提到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高度。因此,当生产斗争盖子揭开之后,就应当把群众揭出来的活生生的具体事实集中起来,再拿到群众中去,用群众的语言,因势利导地进行四个主义教育和备战教育,做到思想上“纲”,即上四个主义的纲,上两条道路斗争的纲,上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纲。这样,就把四个主义教育搞活了。当然,不论揭生产斗争盖子或进行四个主义教育和备战教育,都应注意引导群众集中力量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拣芝麻丢西瓜;同时也要注意区别一般性的认识问题、工作方法问题同两条道路斗争问题的界限,不要不加分析地把所有的问题都看作走资本主义道路性质的问题。总之,这种抓住活思想,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教育的方法,完全不同于那种照本宣科、脱离实际的方法。这种方法效果很好,大大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鼓舞了他们的革命干劲,增强了他们支援国防、支援国家建设和备战观念,从而

端正了生产方向,有力地促进了当前生产,落实了长远的农田基本建设。

着重解决领导思想问题,促进整党工作

在大揭生产斗争盖子中,揭出的生产问题是很惊人的。有些地方是靠山吃山不养山。如岔沟公社松树沟大队的200亩山林已被砍光,只剩下3棵大树,其中两棵因长在坟地上,一棵据说是“神树”,才保住了。牌楼公社多年来只治了10亩坡耕地。山上不建设,山下成了灾,水冲砂压,耕地面积逐年减少。耕作粗放的情况也很严重,有不少的地只铲趟一遍。有些地方粪肥不但没增加,而是减少了。接文公社接文大队有60亩地,从合作化以来,就没上过粪。有些地方为了当年“红”,不惜用折卖副业家当、出租蚕场、砍伐森林等办法增加分配。群众称之为“三光政策”,即树木砍光,水土流光,不留积累分光。这些地方就是没有天灾,生产也上不去。为什么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一查原因,就查到“司令部”的头上来了。群众说:“就是‘司令部’给领歪了!”“就是‘火车头’晃晃摇摇,不走正道,后面的车厢也跟着东摇西晃起来。”群众批评一些党员有三个带头、三个不带头:带头砍树,不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带头挑轻躲重、闹工分,不带头劳动;带头起“麻烦”作用,不带头起模范作用。有些支部闹不团结,经常吵架,甚至连党的会议也吵散了。群众的这些揭发和批评,对党员的震动很大,在揭生产斗争盖子

的过程中,党支部边整边改,工作进一步加强了。有些支部正在根据党内外揭出的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除了彻底解决生产方向、道路问题以外,准备着重解决党员怎样起模范作用和支部怎样树立三大作风问题,这不仅会进一步促进党员的思想作风革命化,而且会有效地解决领导核心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力地促进整党工作。

对干部进行再教育

通过大揭生产斗争盖子,对一、二类干部震动很大,使他们思想进一步上了“纲”。一、二类干部经过“四清”和对敌斗争,虽然也受到了教育,可是往往触动不深,有些人“下楼”之后,自认为“一没贪污盗窃,二没投机倒把,三没腐化堕落,多吃多占人人皆有,没啥了不起”,又背上了包袱,生产、工作的劲头不大,有的甚至还有怨气。当群众把生产斗争盖子一揭开,他们就坐不住了。析木公社在揭生产斗争盖子的贫下中农代表会和三级干部会议上,群众批评公社干部说:“你们现在都成了‘旱涝保收’干部,把我们贫下中农忘了,不要只看你们那几十元工资,还要看看集体生产搞得怎么样,只要你们真心实意领着我们闹革命、搞建设,就是搞错了,上级要打你们的屁股,我们会趴在你们身上,替你们挨打。”这些批评打动了干部的心。这个公社党委的10名委员,有6名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不少一、二类干部,不是感到自己没啥问题了,而是觉得“良心受责备”了。他们主动

检查说：“我们这里什么也不缺，就是缺一个陈永贵”。有些同志在前一段运动中，听到群众的批评，往后缩，在揭生产斗争盖子中听到群众的批评，则往前凑了，很怕听不清。有些同志听了批评之后，见人就检讨。经过揭生产斗争盖子，这些同志思想上纲了，感情变化了，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也进一步改变了。有的同志谈到自己在大揭生产斗争盖子之后的感受时说：过去我们到落后队一看，觉得这是“填不满的穷坑”，现在再去一看，则觉得“良心受责备，欠了贫下中农的账”；过去见到困难户就心烦，认为他们“好吃懒做”，现在则感到自己没尽到责任，现在重读毛主席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愚公移山》等文章，觉得更亲切了。于是，他们纷纷表示以实际行动来弥补给党的事业所造成的损失。许多公社领导干部在揭生产斗争盖子的三级干部会议之后，便带着“毛选”、带着行李、带着粪筐，到生产最落后的队去参加劳动、访贫问苦。这种边整边做的办法，大大鼓舞了群众。他们说：“你们只要来了，我们就有信心了。”孤山公社党委副书记某同志，过去下乡都在大队吃，大队睡，这次他到了一个生产最落后的大队，住在一户生活困难的贫下中农家里，睡到半夜被冻醒了，他问房东：“你们怎么不烧炕呢？”房东回答说：“我们没有柴烧呀！”这位同志大吃一惊，原来他根本没想到住在山区的人还会没柴烧。经过调查，发现在这个大队的134户中，竟有110户缺柴烧，有些是现拾柴现煮饭的。于是，他和工作队带领群众上山打了3天柴，解决了烧柴问题，群众十分满意。从上面这些情况看

来,在揭阶级斗争盖子的基础上,发动群众再大揭一下生产斗争盖子,是运动深入后对县社队各级干部的一次再教育、再提高。

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觉悟

群众在生产斗争的盖子揭开以后,在干部诚恳检查、认真整改的影响之下,进一步提高了觉悟,纷纷进行自我批评。下房身大队第3生产队有27名社员自觉地进行了检查。他们说:“这几年,生产没搞好,干部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今年铲地时,只有5个人下地,其他人都搞小自由去了,这不能都怪干部”,“光干部改了,我们不改,生产也上不去”。通过揭生产斗争盖子,群众的精神面貌也有了显著变化。有的“刺儿头”变成了劳动带头。有些队的贫下中农也考虑长远问题了。如析木公社缸窑岭大队工作组最近向生产队提议抽出14名强劳力上山挖滑石,经贫下中农讨论,还是决定把这14名劳动力投入农田基本建设。他们说:“挖滑石,多分几个钱是好事,但只顾现在得利,不搞基本建设,就会影响明年和以后的生产”,“若是过去,你们不叫去也不行,今年不能再这样了,宁肯暂时困难点,也要把基本建设搞上去”。当然,就一些地方来说,目前正当的副业不是多了,而是少了。问题是要以粮为纲,多种经营,以副养农,全面安排,全面发展。

在揭生产斗争盖子的过程中,析木公社等都以大队或

公社为单位,组织干部和贫下中农的代表一起开会,充分发扬民主,揭发问题,展开批评。看来,这是一个成功的办法。群众评论得好:这种会是端正方向的大会,解决思想问题的大会,民主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他们要求今后每年开一次,坚持下去。

高举总路线的红旗,鼓干劲,鼓实劲

发动群众揭生产斗争盖子,声势大,震动大,干部和群众慷慨激昂,又鼓起了劲头。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比大寨的条件好得多,只要拿出大寨的干劲,在几年之内就能赶上和超过大寨。”在这种情况下,要特别注意鼓实劲,而不鼓虚劲。不要空喊一阵子,搞形式主义,也不能急躁,搞强迫命令。首先必须使思想落实。这就要更高地举起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红旗,正确地、全面地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坚持那些好的东西,把不完善的逐步完善起来。凡是高举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红旗,用“两分法”前进的地区和单位,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大庆、大寨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在思想落实的基础上,要引导干部和群众,把革命干劲落实到开展以“八字宪法”为内容的农业技术改造和科学实验,贯彻执行“四十条”、“六十条”,改进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以及农村各项建设上,深入地开展三大革命运动。在落实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走群众路线,遇事同群众商量,否则就

可能把好事办坏，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下房身大队5个生产队开始修梯田时，修多少、在哪里修，都是由工作组和干部定的，有的地块选得不合适，修的质量不高，越修人越少。后来，工作组接受了这个教训，在第3生产队修梯田时，一切由群众讨论决定，地块选得合适，修的质量高，参加的人越来越多。群众说：“像这样修，妥啦！保证增产。”

在揭生产斗争盖子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一分为二，首先把问题揭透，然后对过去工作中好的方面加以肯定，把成绩讲够，不要搞得漆黑一团，不要把基层干部揭得灰溜溜的。对于过去农田基本建设抓得不够，生产搞得不好，领导上要适当地担担子。下房身大队党支部在检查问题之后，肯定了4条：一是5队的生产抓得紧，搞得好；二是1队的牲畜管理、饲养、繁殖得好；三是7队的粮食产量比其他各队高；四是林业发展得较好。经过这样一肯定，有些干部脸上有笑容了。原来思想不通的，现在不仅通了，而且积极参加揭问题，查危害，找差距，总结经验，搞规划，定措施。看来，在问题揭透的基础上，肯定成绩，找出本社、本队的样板，使干部和群众感到有奔头、有办法、有信心，是十分重要的。

总之，在“四清”运动中，要揭两个盖子：一是揭阶级斗争盖子，一是揭生产斗争盖子。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在揭阶级斗争盖子的基础上揭生产斗争盖子，把揭两个盖子有机地联系起来，这就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只有如此，才能使“四清”运动更好地落到各项建设上，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

想的伟大红旗,按照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深入地开展三大革命运动,为胜利完成第3个五年计划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

作者注:我在“四清”中提出“揭生产斗争盖子”是基于以下考虑:一、在杭州开会研究“四清”时,我曾问毛主席: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运动,为什么把生产斗争放在阶级斗争的前面?毛主席说,生产斗争是永恒的,阶级斗争则是人类社会产生了阶级才有的,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也就没有了。二、中央提出的搞好“四清”运动的6条标准中有这样一条:生产是否搞上去了。三、在“四清”蹲点中亲自听到广大群众对搞生产有强烈的要求。提到东北局讨论时,由于当时仍然有“左”的思想,采用了“在揭阶级斗争盖子的基础上揭生产斗争盖子”这样的提法。

给东北局书记处 的一封信*

(1965年11月28日)

卓新^①、喻屏、晓初^②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海城县为了在“四清”运动中搞好秋收生产和农田基本建设，在10月前后集中地抓了一段生产，用他们的话说，叫做揭生产斗争盖子。我到海城以后，听了几个公社的汇报，并着重了解了牌楼公社下房身大队进行这一工作的情况。看来，在农村“四清”运动中，在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的基础上，拿出一段时间，集中地揭一下生产斗争盖子，很有必要。揭生产斗争盖子，要放手发动群众，学习大寨精神，以大寨为样板，揭问题，找差距，查原因，并且顺着群众的劲头，用群众揭出来的具体生动的事实，抓住活的思想，用群众的语言，因势利导地进行四个主义教育和备

* 1965年12月27日东北局将此信发至公社党委、大队社教工作组。

① 顾卓新，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② 强晓初，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

战教育，弄清政治和生产的关系，把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进一步提上“纲”，提到贯彻执行总路线的高度，总结经验，制定规划，落实措施。这样做，就可以更加地突出政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贯彻执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改进干部的思想作风，鼓起干部和群众的干劲，使运动更好地落到坚持思想革命化、开展以八字宪法为内容的农业技术改造和科学实验、改进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以及农村各项建设上，深入地开展三大革命运动。

大揭生产斗争盖子，一般地以放在“四清”和对敌斗争之后为宜。目前，各地农村社教运动已经陆续开始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斗争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从整个运动来说，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步骤，必须造成强大的革命声势，通过批判和斗争，把资本主义搞臭，把进行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斗倒斗垮。做好这一步工作，就可以为大揭生产斗争盖子，掀起生产运动高潮和完成社教运动的其他任务创造一个有利的基础。

从点上的经验看，在农村的面上，也有必要安排一段时间，以县或公社为单位，采取适当的形式，例如召开三级干部会或贫下中农代表会等，充分发动群众集中地揭一下生产斗争盖子。这样做，将会有力地促进当前生产和基本农田建设运动，动员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旺盛的士气，为胜利完成第3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以上意见如何，请考虑。如可行，请建议各省具体安

排。在海城县社教运动中，还感到其它一些问题，容另行汇报。

宋任穷

1965年11月28日

落实干部政策要善始善终*

(1979年6月9日)

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座谈会、中青年干部座谈会，两个会议都快要结束了。看了简报，我讲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落实干部政策是做好事。不是有个赵积善同志么！我们做干部工作，落实干部政策也是积善。粉碎“四人帮”以来干部工作的成绩，要充分肯定。粉碎“四人帮”以前，不少同志也做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那时阻力很大，“四人帮”千方百计阻挠，虽然大家做了很多工作，很辛苦，但很难办。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有可能做好这项工作。在华主席、党中央粉碎“四人帮”这个伟大成绩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放手地来做，实事求是地来做。不粉碎“四人帮”就不可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粉碎“四人帮”，这是大局，是个前提。这一点，我们必须看到。

另外还要看到，中央组织部自从胡耀邦同志来了以后，去年一年开了许多小型座谈会，解决了很多疑难问题，划分

* 这是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了政策界限,提出几条标准,为落实干部政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中央组织部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做了很多工作,改变了风气。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们也是很辛苦的。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各级组织部门的同志,尤其是搞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同志,做出了很大成绩,这是我们必须肯定的。

第二个问题,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要看到,落实政策要做到善始善终,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从数字上看,文化大革命当中的案件解决了 90% 的样子,但要完全搞好,还有大量工作。善始我们已经做到了,现在关键是善终。有些案件、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好,需要继续解决。特别是思想工作要做好。据同志们反映,这方面的工作量也还是很大的。例如生活照顾呀,安排职务适合不适合呀,家庭还有些什么困难呀。三中全会以后,湖南、山西,他们抽查了一下,一个是 8%,一个是 14%,结论还不合适,这是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这就是工作量。我看其他地方也很有必要扎扎实实地复查一下。三中全会以前和三中全会以后,有些不同,三中全会以前做的,现在用三中全会的精神来衡量,就大大不够了,三中全会以后思想真正解放了,有些结论又要修改。毛主席有这样两句话:“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的原则是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最后还要验收一下。关于验收的标准,胡耀邦同志已经讲了几条了。现在,有些结论应修改的就修改,不该留尾巴的不留,凡是搞错了的,没有申诉也要主动解决。

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案件,包括 1957 年反右派,1959 年

反右倾,还有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搞错了的,该复查的都要复查。1957年反右派的问题,有两种:一种是改正,一种是摘帽。1959年反右倾,比较容易解决,工作量不大。湖南这方面的案件比较多,有两周(周小舟、周惠),还有彭德怀、黄克诚同志。这个案子比较好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案子不是都搞错了。突出的是贵州,带有特殊性,贵州解决得比较好。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一些案子,不一定再来搞什么平反。三反五反、统购统销、肃反、土改,还有男女关系、贪污腐化、蜕化变质,处理轻一点重一点,没有必要统统翻一遍。至于重要案件完全搞错了的,把人家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公职,把内部问题当成敌人处理的,个别案子个别解决,其他不要翻了。我同耀邦同志讲了,可以搞个界限,写个报告,报请中央审批。基本事实没有什么变化,处理稍微重了一点,就不要再动了。三反五反,不搞一下不得了。我们刚刚进城,不刹住那股风不得了。还有肃反、土改、统购统销,是必须搞的,还有农业合作化。我看这些时期的案件,还是本着这个精神来搞。有的乱搞女人,情节严重,开除了党籍,现在改为留党察看两年,他还不干,还要官复原职,真是岂有此理。如果事实确凿,他还这样胡闹,干脆维持原案,开除党籍。当然,首先还是要教育、说服,说明这个不对,做好思想工作,不要拿我讲的去压。个别无理取闹的,不教育处理不行。

再就是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有没有个结束的时间。我看由各省作些调查,根据工作量自己规定为好,全国不能一刀切。落实干部政策善始善终,现在关键是个善终的问题。要

一个案件一个案件，一个人一个人的扎扎实实地搞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虽然新的任务来了，但落实干部政策不能草率，不能收摊子，不能松一点劲。不但不能松一点劲，而且要加劲，要搞得更加扎实一点，更加细致一点，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才能善终。如果一松劲，可就不得了。所以，这一条一定要抓紧。后边的案件都是最难的，不能松劲。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是全党、全国人民赋予我们组织部门的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一定要抓紧搞好，不能松劲。

还有公安、法院部门的逮捕、判刑案件。最近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要审议通过一个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试行半年就正式生效。现在还未最后通过。在这半年时间内，各省要把这些案件清理一下，抓紧解决。过去康生、谢富治砸烂公检法，现在虽然有一些人归队了，但检察院人手不够，法院也要调整加强，将来还要成立司法部。一个公安部门，一个法院，一个检察院，我们组织部门要为他们三个部门考虑一下，加强一下。

组织部门在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下，还要开好8月份的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讨论如何搞好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的问题。我们议了一下，总的提法，大概是这样的几句话：整顿党风，增强党性，健全党委的领导，巩固党的团结，把我们党的建设搞得更好。总的精神是这样。8月份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要解决的，包括落实干部政策，培养中青年干部，整顿党风，发展党员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已经发了通知，不多谈了。如果会议开得好，文件写得

好,就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这就靠大家了。我们大家一起座谈,共同努力,写出一个一万字左右的东西来,另外还要写出几个决定。解放以来,我们只开了两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搞得不像样子。我们一定要好好整风,把我们党建设好。我们完全有条件把我们党建设好,这是迫不及待的,请各省、市、区组织部门和党委把这项工作抓起来。所以,我们组织部门现在不是可以歇一下,而是工作任务越来越紧越重。我们共产党人是没有歇的时间的。各级组织部、各级党委也是一样。林彪、“四人帮”破坏我们10多年,我们要拚着老命干才行。我今年70岁了,还要拚老命干。我的工作方法不大对头,有些事务主义,思想水平不高,就慢慢学,拚老命干还是要的。我们工作不能放松,要抓得紧,抓得细。这次我们整顿党风,是思想整风,既要不要整人,又是提高,又要解决思想问题,要搞好是很费力很费劲的。我们决不能再整一批人。组织部门作为党的助手,要把工作搞好。这个重大任务,我们要担当起来。我们的任务不是松了,而是很紧很紧。正如毛主席说的,旧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新的任务又来了。要使所有做组织工作的同志都向前看,鼓足干劲,在党中央领导下,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好。这是我们组织部门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另一方面,对于被落实政策的干部,要多做思想工作。除了安排他们的工作、生活之外,很重要的一条是思想工作要跟上。他们很多是老同志,要起模范作用,发扬延安精神,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搞好传帮带。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干部

在落实政策以后是很好的，努力工作，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但是也有极个别的，在落实政策中间，要求越来越高，无理取闹，要官复原职。要好好教育，不能这个样子。都要官复原职，怎么复法？这是不正之风。不能这样。即使是个别的，也不好，要做工作。

对青年干部的培养问题，现在看，有些青年干部确实是好的，有的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除了打砸抢的首恶分子以外，对一般青年干部，我们要区别对待，真心实意地爱护培养他们，有的可以在原岗位上，这些不可能太多；有些需要带职下放，下去锻炼。这些同志大多数本质是好的，但是缺乏领导经验，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像我这个人，是当兵的，在连、营、团工作过，这样起来的，但我有个弱点，没有在地方上当过县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是主张青年干部先搞公社书记、县委书记，车间主任、厂党委书记，没有搞过，一下子拿到省委、地委工作，他们自己也感到为难。对青年干部要真正爱护。在下去之前，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要一个一个谈，一个一个商量，不要急急忙忙，一下子拿下去。要使他们真正知道这样是爱护他们，培养提高他们。

同时，要在全党大讲党性，党的观念，组织纪律性，要大力克服派性，把党风搞好。我们组织部门要在党委领导下，带头做好这项工作。组织部门不准有派性。有人可能会说，你这是主观主义，有些党委都有派性么。我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派性也难免，现在我们要解除疙瘩，要加强团结。组织部门如有派性，我们培养、提拔、调整干部就不好办

了。没有派性,看一个干部才能看准,只有无产阶级党性才是唯一的标准。

现在有几个问题,我们在组织部门工作的要从全局考虑一下:

一个是经济上的3年调整,看起来时间很长,但是各方面的工作,是很紧很紧的,决不能松。组织部门要了解全面的任务,孤立地搞组织工作不行。

第二个,要保证3年调整任务的完成,必须把党风、党的建设搞好。党风不搞好,经济上调整的任务就没有保证。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整顿党风不是孤立的任务,这是保证3年调整,保证和领导四化,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问题。我们组织部门的工作,不能光搞“门市”,要想得远一点。当然应付门面是必要的,目前有许多“门市”工作要做。但是,我们的眼光要看得更远一点,思想要更开阔一些。

第三个,是中青年干部问题。有的同志说中青年不缺。不缺,也有个培养问题。现在省委书记60岁以上的人比较多。70岁当省委书记也还可以,80岁总不行了吧。不是说他能力不行,而是体力不行,不但手脚不行,精力也不行了。到公社要人扶着下去总不好吧。现在,要有50多岁的人,40多岁的人到省委。当然是要搞马克思主义的人才行。这10几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有些青年人脑子里装的林彪、“四人帮”那一套东西比较多,当然不能怪青年。就是

有些中年干部、老的干部也受到影响。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灌进青年的脑子里去,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挤出来,要做艰苦的工作。对青年的培养,要有计划,要有步骤,采取许多办法。现在叫不叫青黄不接?不叫也行。但这些年“四人帮”的流毒,包括犯错误的,没有犯错误的,甚至受“四人帮”迫害的,脑子里一点都没有吗?有些是自觉不自觉的接受了。所以,肃流毒的工作,不光青年,就是中年干部、老干部,都是很重要的工作。要经常过组织生活,搞民主集中制,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这个人,当领导,当第一书记的时间比较长,过去有时候有些事,也是嫌麻烦,嫌别人噜嗦,搞一言堂。当一把手容易搞一言堂,不同意见,特别是批评的话不容易听进去的,表扬的话听起来比较舒服。现在我自己就搞得很好吗?吹不得。所以,讲整顿党风的重要性、迫切性,就是要使我们的党员、干部、工人、社员都能有一个好风气。这样,我们党、我们社会主义就有保证。如果不这样,就没有保证。我们有这个信心,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搞好,我们的党风会越来越越好。

我提出上面这样一些问题,把经济调整搞好,党风搞好,中青年干部培养好,这几个方面要全面考虑。我们组织工作不可能是孤立的,组织部门要有全局观念,这样,我们组织工作才能搞好。

认真解决组织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1980年7月3日)

中央党校领导同志要我来给大家讲一讲。讲什么呢?我想,还是就组织工作问题,讲一点情况,发一点议论,供同志们讨论研究。下面,着重讲3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充分认识组织工作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认真解决组织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从1977年底以来,组织战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党内外反映也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少差距,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好,有些问题还没有来得及解决。尽管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但这些工作基本上还是属于调整的性质,拨乱反正的性质,从新时期新任务的要求来说,整个组织工作还没有完全布局开。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新问题上来,认认真真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组织工作适应四化建设的迫切要求。

* 这是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部长。

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个新时期的根本任务,是要坚定不移地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各条战线都面临着如何适应这种转移的问题,我们组织战线也不例外。组织路线历来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是确保政治路线的实现的。组织路线解决不好,政治路线就会落空。党中央在确定了政治路线之后,紧接着就抓组织路线问题,道理就在这里。现在,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都已经确立,能不能贯彻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工作的状况。我们要充分认识这种地位和作用,提高自觉性,增强责任感,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出色地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四个现代化需要大批内行的领导干部,需要大批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并且年富力强的干部,而我们干部队伍的现状却远远不能适应这一需要。我们现在的1800万干部,是一支可靠的中坚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没有这批力量,我们既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也不能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但是,随着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的变化,这支队伍的弱点也就越来越明显。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主要是干部构成不合理,缺少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多,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少,整个

干部队伍文化程度偏低，大专程度的只占干部总数的18%；在各级领导班子中，中青年干部偏少。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机构庞大，层次过多，人浮于事，严重影响工作效率。由此可见，四化需要的人才和干部队伍现状的矛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矛盾，如果不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随着事业的发展，这个矛盾将日趋尖锐，实现四化就没有希望。

为了深刻认识培养和造就四化需要的建设人才的重要性，我想引用列宁、斯大林的两段精采论述。列宁在1920年说：“任何管理工作都需要有特殊的本领。有的人可以当一个最有能力的革命家和鼓动家，但完全不适合做一个管理人员。凡是熟悉实际生活、阅历丰富的人都知道：要管理就要内行，就要精通生产的一切条件，就要懂得现代高度的生产技术，就要有一定的科学修养。这就是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具备的条件。”斯大林在1926年说过：“我们现在是处在工业建设时期。现在我们需要新的工业指挥干部，需要优秀的工厂经理，优秀的托拉斯领导干部，能干的贸易工作人员，聪明的工业建设计划人员。现在我们需要锻炼出经济方面和工业方面新的团长和旅长、师长和军长。没有这样的人才我们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列宁、斯大林这些话，虽然是针对苏联当时的情况讲的，但是他们讲的基本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我们组织工作面临着许多新课题，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究竟有哪些新课题，我初步想到

这样几点：

1. 如何造就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并且年富力强的干部队伍；
2. 如何按照专业化、年轻化和精干的要求组织和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
3. 怎样培养选拔好接班人，从组织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长期连续性；
4. 怎样按照四化的要求改革现行的不合理的干部制度；
5. 如何大规模地重新教育培训干部；
6. 如何按照新形势的要求重新教育党员，提高党员质量，整顿党的组织；
7. 怎样从制度上、方法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领导水平。

在这些新课题中，当前最主要的还是领导班子的调整和建设问题。这些新课题的解决，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需要用很大的决心，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不仅要有方法上、思想上的改革，更重要的要有制度上的改革。没有这些改革，就冲不破老框框的束缚，就闯不出新路子，因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打开组织工作的新局面。

第二个问题：按照“三位一体”的要求，坚决把各级各部门的领导班子调整好，以适应四化建设的迫切要求。

总的说来，领导班子的现状不够理想，这是我们当前进行四化建设所遇到的许多困难中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今后

两、三年组织工作的主要矛盾,必须集中精力加以解决。

领导班子不理想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第一,各级领导班子中主要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龄普遍偏大。中央和国家机关正副部长平均64岁。省委正副书记平均62岁,66岁以上的占40%。全国地市州委常委,平均年龄56岁,其中46岁至60岁的占72%。有些地市委书记已经70多岁了。全国县委常委平均年龄48岁,40岁以下的仅占10%,56岁以上的占16%。

第二,各级各部门领导班子的人数普遍偏多。中央和国家机关正副部长平均10.6人,超过13人的有18个部,最多的20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平均17.8人,正副书记平均8.9人,最多的有14人。至于地委、县委,省级厅部委办局,中央、国务院各司局,以及其他各部门的领导干部都比较多。

第三,领导干部的文化偏低,懂专业、会管理的干部甚少。全国地市常委中,大专文化程度的只占3.5%。有些省全部地县委书记中,一个大专毕业生也没有。

第四,一部分领导班子,特别是一部分地、县、厂矿企业领导班子还没有调整好,那里的问题还比较多或比较严重,还需要认真地进行调整。

要根本改变领导班子不适应四化需要的状况,仅仅采取个别调整的办法是不够的,必须进行综合治理。按照耀邦同志的说法,就是完成“三位一体”的任务。“三位一体”就是

选拔一大批优秀中青年干部进领导班子,妥善安排一批年老体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老同志,调整部分不称职干部的工作。我的看法,这个调整领导班子的“三位一体”的任务,是在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使干部工作适应四化需要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也是干部结构上的一项重要改革。“三位一体”,统筹解决,缺一不可。现在,我就分别讲讲“三位一体”的问题。

第一项,大胆选拔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坚持党的路线的、有专业知识和本领的干部,充实到各级各方面的领导班子中来。

关于培养选拔接班人的问题,党的十一大就提出来了,三中全会又讨论了这个问题。特别是从去年以来,中央反复强调要我们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抓紧解决这个问题,去年小平同志到天津、上海、山东视察工作,走一路讲一路,回到北京又给中央和国家机关高级干部讲了这个问题。今年1月16日,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又强调了这件大事。3月18日,耀邦同志又亲自向中组部的领导同志传达了中央常委关于培养选拔接班人的重要指示。这些充分说明,中央对培养选拔接班人十分关心,十分重视。在中央的领导下,中央组织部和各级党委也都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一般地说,工作刚刚开始,同中央的要求相差很远,有的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现在,我就以下几个问题讲几点意见:

第一,提高自觉性,增强迫切感。我们的同志,特别是老

同志,一定要把培养选拔接班人看作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一件大事,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深一点。有的同志总认为年轻人不成熟,怕他们不称职,对他们不放心,不肯提拔他们到重要领导岗位上来。应当认识到,现在的中青年干部,都是经过一二十年,二三十年锻炼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而且干部的成长都是有过程的,不可能一下子成熟起来。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老同志是怎么过来的?还不是二三十岁,三四十岁当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或者是领导一个团、一个师、一个军。那时候党组织对我们信得过,很放心,而今天,我们为什么对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年轻干部不放心呢?趁老同志健在抓紧培养选拔接班人,选择我们放心的人上来,正是从根本上解决不放心的问题。

有些同志对于退居第二线、第三线,总有点不甘心,总想活到老,干到老。但是自然规律不饶人,不甘心不行。有人认为,选拔接班人还不是当务之急,可以慢慢来。有人认为,接班人在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没有必要人为地去挑选,部长不在了,有局长顶上,局长不在了,有处长顶上。有的同志说什么,我虽年不富,但力还强,还能顶一阵子,用不着着急。这些看法都是不对的。选拔接班人,操之过急不行,但慢慢腾腾也不行,既要稳妥,又要抓紧,否则,会贻误大事。当年参加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同志,现在都是年近古稀的人了;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干部,也已是五六十岁的人了。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事业继续下去,需要培养千

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从新时期的迫切需要来说,这个问题更是突出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因为四化建设的任务非常繁重,没有年富力强的干部来担起繁重的工作,就会贻误我们的事业,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央是从政治的高度、长远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我们要深刻领会中央的精神,一定要把这件紧迫的战略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

第二,做好规划,明确要求。要做好选拔接班人的工作,首先要不断地、公开地讲清利害,大造舆论,作好打通思想的工作。但是,只停留在口头宣传不行,必须落到实处。不规定具体进度,不提出具体要求,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做出两年规划,提出领导班子逐步年轻化、专业化和精干的要求,订出达到这些要求的主要措施。

在5月份召开的选拔中青年干部座谈会上,讨论制订了一个《关于进一步做好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了这样几条要求:

1. 各级领导班子成员都要具有自己所分管的工作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逐步成为内行。1982年以前,各级党委都要大胆提拔一批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专业干部参加领导班子。这样的干部,在省委常委中应占1/4到1/3;地县委常委中应占1/3以上;省、地、县政府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的领导班子中,比重应更大一些;厂矿、院校、科研等单位的领导班子中,要达到60%以上。

2. 1982年以前,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和中央、国家机关正副部长的平均年龄逐步降到55岁至60岁;地、(市)州委常委的平均年龄逐步降到50岁左右;县委常委的平均年龄逐步降到45岁以下。从现在起,61岁以上的同志,除特殊需要者外,不再提拔担任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和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提任司局长和地委领导职务的应当更年轻一些。要选拔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担任省、地、县委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的二、三把手,有些可以担任地、县委一把手。

3. 要把干部后备名单制度建立和健全起来。除了去年已挑选的后备干部外,今年再从50岁以下,大专、中专、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程度的优秀干部中,选拔一批可进省、市、自治区党委、政府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班子的对象。省、市、自治区各选出4至8名,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各选出1至3名。省委要掌握200至300名45岁以下,准备担任地、市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后备名单;地、市委要掌握100至200名40岁以下,准备担任县、市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后备名单。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也要掌握一批能担任司局长和直属厂矿、院校、科研单位领导干部的中青年后备名单。

4. 今年内或明年上半年,各省、市、自治区,都要选拔二三名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参加党委常委,要有一二名任书记;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要选拔一二名任副部长。地、县、厂矿、院校、科研等单位,也要选拔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班子。

5. 各级领导班子要力求精干,人数不宜过多。第一步,要在 1982 年基本做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一般 7 至 15 人,地、县委常委 7 至 11 人,正副书记不应超过常委人数的一半。正副省长一般 7 至 11 人,正副专员、正副县长 5 至 7 人。中央、国家机关正副部长一般 7 至 13 人,正副司局长 3 至 5 人。厂矿、院校、科研等单位的领导班子也要力求精干。第二步,把中央、国家机关正副部长减到 5 至 7 人。

第三,要把基础搞雄厚,选拔一批人。在选拔接班人问题上,我们有过很多沉痛的教训,其中之一是由个人指定接班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封建主义的余毒。实践证明,这是一种失败的经验,我们再不能这样干了。现在我们选拔接班人,决不能个人指定,也不能只挑少数几个人,必须选拔一批人,一层人。只选一两个人进领导班子不行,这样太孤单。各级党政领导班子都要选一批人上来,各级职能部门,包括企事业单位,也要选拔一批人上来。有了一批人,再从中挑选一、二把手或二、三把手就好办了,基础就雄厚了,工作就主动了。

第四,要大胆选拔,放手走群众路线。选拔接班人的工作搞得不够理想,原因之一是方法不对头,还是手工业方式加神秘化,不敢放手地走群众路线,还是首长点头哇。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方法。一是要大胆,不要这也耽心,那也害怕。说到底,还是没有打破老框框,思想方法不对头。哪有百分之百地都能选准呢?选一百个,有几个不合格,我看成绩还是主要的。选得不那么准、不那么好的,还可以对他们

及时地帮助教育；选错了的，也可以及时调整下去嘛。二是要放手地走群众路线，广泛地听取群众意见，决不能搞首长圈定。这是能不能基本选准的一个重要条件。究竟谁最了解干部的实际表现？是上级领导部门，还是下面群众？我不否认上级领导部门了解一些干部的情况，但是最了解干部实际表现的，还是下面干部和群众。因为干部生活在群众之中，他的一言一行，群众都看在眼里。要敢于让群众评论和推荐，敢于让群众议论纷纷，多方面听取群众意见，在此基础上，由组织部门细心考察，经党委集体讨论决定。

第五，要大规模地开展干部培训工作。目前，有相当数量的干部缺乏专业知识和现代管理知识，工作有一定的盲目性和局限性，不能适应四化建设的要求。这个缺陷的出现，责任主要不在干部本人，而是由于过去政治运动不断和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没有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条件。怎么办呢？根本的出路在于创造条件，帮助他们学习提高。五十年代初，我们党狠抓了干部培训工作，采取各种形式，组织他们学文化，学理论，学业务，培养了一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才。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重新学习的热潮。现在，我们应当掀起第二次更大规模的重新学习的热潮，尽快培养出更多的又红又专的人才来。对有些文化较高、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可以放下去培养锻炼。对列入后备名单的干部，要进行重点培养。在这个问题上，要舍得花本钱，舍得费心血，要千方百计，广开门路；要改革学习内容，注重学习效果，着重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和现代管理能力。

这是我讲的“三位一体”的第一项。

第二项，要认真负责地妥善地安排一大批对党对人民有贡献的年老体弱的同志退居第二线或第三线，使他们既能延年益寿，又能更好地发挥传帮带的作用。

我们一大批老干部，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出生入死，艰苦奋斗，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各级领导班子的骨干力量。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组织部门的同志，对老同志不能存在任何嫌弃的情绪，不要认为人家是什么“老麻烦”、“老糊涂”、“老难办”不要认为他们是包袱，卸包袱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民族，历来有敬老尊贤的好传统。我们一定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造成一种尊重老同志的优良风气。我们年轻的同志，一定要谦虚谨慎，诚恳地向老一辈学习，主动地争取老干部的帮助，尊重老干部的意见，把老干部的好传统、好作风、好经验学到手，提高自己的本领，不断增长才干，新老合作，共同前进。

对于年老体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老干部一定要安排好，不安排好要犯错误。总的原则是，政治上充分尊重他们，生活上充分照顾他们。中央对年老体弱的老同志，确定了4个办法：一是丧失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的，不要选入党政班子了，也不要当代表大会代表了，授予他们一定的荣誉；二是党章修改案规定在中央和省一级组织中设立顾问委员会，在州、市、县一级组织中设顾问；三是离休；四是退休。关于顾问、离休、退休的规定，中央书记处已原则通

过,不久就会发下来。我们要不断地总结和积累这方面的经验,从制度上、办法上、工作上、风气上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当然,我们的老干部也要正确地看待这个问题。年老体弱的老同志,自觉地退居第二线或第三线,是顺乎民心,尊重规律的积极行动。我们有些老干部毕竟年纪大了,身体差了,精力也不行了,这也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为了使老干部延年益寿,从繁重的日常工作中解脱出来,思考大事,保证党的路线长期延续下去,在更适合的岗位上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不仅是党对自己的关怀和信任,而且更能切实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是一件具有极大意义的事情。在这方面,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这样一些老同志,给我们树立了好的榜样。总参情报部政委孔原同志,主动要求当顾问,当中央批准以后,他表示:这是中央对我的信任、关怀,这对工作有好处,对我也有好处,我应当努力,争取做一个合格的顾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协主席张世功同志,学习了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讲话以后,先后4次向区党委申请离休,退出第一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逸伦同志,最近在区党委常委会上表示,下届党代会就不要选他当书记了,会后还向区党委第一书记正式提出了要求。还有中央气象局局长饶兴同志,吉林省委副秘书长陈光烈同志,都已经自动要求当顾问。这些同志的自觉行动,是值得赞赏和学习的。

第三项,正确地解决不胜任现职的干部的工作调整问题,让他们到适合的岗位上去,并且真诚地帮助他们继续进

步。

对于不胜任现职的同志进行调整,是提高领导班子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措施。有的干部考验3年多了,还不称职,是该解决的时候了。不胜任现职的同志究竟有多少人,没有准确统计,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有几个是几个,有多少是多少。

不胜任现职的干部,情况比较复杂,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我们讲的不胜任现职的干部,不包括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人物和打砸抢分子,这种人有多少清除多少。这里所说的不称职,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中毒较深,思想、政治路线不端正,至今仍不觉悟,不改正,即使有能力也不行;另一种情况是,本人品质还好,但缺乏组织领导能力和必要的业务水平,工作不称职,事情办不好,群众不赞成。但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宜于继续留在原来的岗位上,需要做适当调整。这样做,对党的事业有利,对本人也有好处。

最后一个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新的用人观点。

组织工作面临着思想解放的大课题。这个问题,同培养造就干部队伍,调整建设领导班子,调整任免干部,选拔接班人,都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单独讲一下。

由于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由于政治运动连续不断,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10年破坏,在我们的组织工作、干部工作上,还保留了不少过时的东西,落后的东西,一些同志思想不大解放或很不解放,眼光短浅,因循守旧,僵化半僵化,老框框比较多。粉碎“四人帮”以来,中央不断强调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3年多来，在拨乱反正中，我们冲破了一些老框框的束缚，思想也是逐步解放的。但从总体上来说，思想还没有完全解放，一些应当打破的老框框还没有打破，或者说破得还不够彻底。

1. 片面强调干部的资历，忽视干部的才能，搞论资排辈；

2. 只重视工农干部，轻视知识分子干部；

3. 只注重出身成份和历史表现，轻视现实表现和发展前途；

4. 对德才标准缺乏正确理解，片面强调干部的德，轻视干部的才；

5. 不适当地强调干部的全面领导经验，忽视干部的专业知识。

下面，我就如何从思想认识上打破这些老框框，讲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怎样看待干部的资历和能力。

干部的资历，是干部革命历史的记录。资历本身是一种荣誉，是值得尊敬的。资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的实践经验。一般地说，资历长一些，经验就多一些。但是，我们不能把它绝对化。他们的能力，主要不是资历本身给他们带来的，而是主观努力以及其他条件带来的。不这样看，就无法说明，为什么有些人资历很长，但能力却不那么强；有些人资历较短，但能力却比较强。因此，看待干部，不能单纯地看资历，而要看他现有的实际水平。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有

胜任工作的能力,都要有实实在在的本领。这是起码的条件。特别是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真才实学,不懂业务,不会管理,那怎么行呢?所以,今后在任用干部的时候,要在充分考虑其政治表现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要看他有没有能力,能不能胜任工作,是不是能拿得起来。

重资年轻能力,实际就是论资排辈。这种观念可厉害哩!论资排辈的思想,组织部门有,其他部门也有,领导干部有,一般干部也有,党内有,社会上也有。任用一个老干部,也会有人议论,但总是比较容易通得过;提拔一个中青年干部,就会议论纷纷,哇啦哇啦的叫喊,什么压不住台呀,什么不放心呀,什么资历浅呀,都出来了。

事实证明,论资排辈已经成为人才生长的严重障碍。不扫除这种障碍,大批有能力、有作为、年富力强的干部就上不来,干部队伍新陈代谢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我们一定要坚决、彻底地克服这种陈腐观念,落后的习惯势力,牢牢地树立起选贤任能的思想。

第二,关于怎样看待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

在现有干部中,工农出身的干部占有相当的数量。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知识分子干部很少,只能是从工农中选拔干部,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这些工农干部同知识分子干部通力合作,共同努力,取得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对党对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不少人还成为党、政、军的领导骨干。但是,现在不同了,情况变化了。过去是搞革命,现在是搞建设。过去的主要任务是打仗。搞土

改,搞根据地建设,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搞四个现代化。搞四化建设没有一定的文化和专业水平是不行的。建国以来,我们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大都进入了干部队伍,但是,进入领导班子的并不太多。我们整个干部队伍的文化水平仍然比较低,不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十分注意干部的文化程度,必然要妨碍我们的事业。这就要求我们,今后选拔领导干部,一定要注意文化程度,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不宜提拔;同时,在吸收干部时,要严格把住文化程度这一关。今后,脱产干部从哪里来?中央书记处提出,应当根据干部条件,从大专、中专毕业生、高中毕业生以及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青年中挑选,一般不直接从文化低的工人、农民中提拔。

不是说工人、农民不能提拔,而是说要挑选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没有文化的,就是不能提。

有人会问:不从工人、农民中提拔干部,是不是违背了党的阶级路线?对于这个问题,也要用新观点来看。我们不是说工人、农民不行,而是说提拔文化低的当干部不行。连报纸都不能看,连中央文件都读不下来,怎么能做领导工作呢?应当明确认识,我国的阶级状况早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主人,都是四化建设的主力军。认为提拔工人、农民是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提拔知识分子是违背党的阶级路线,这种看法是不对的,错误的。

第三,关于怎样看待干部的历史表现和现实表现。

毛主席在讲到如何识别干部时说过:“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请同志们注意,毛主席讲的是“全部”,并没有说只看历史不看现实。有些同志在识别干部时有一种片面性,只注重干部的出身成份和历史表现,轻视干部的现实表现和发展前途。

要不要看干部的历史表现呢?要看的。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孤立地看一时一事。问题是,是主要看历史表现呢,还是主要看现实表现?注重现实表现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是干部工作的重要原则。所谓重在现实表现,就是着重看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实际表现,看他们是不是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不是在政治上和党一条心,思想作风是不是正派,是不是积极为四化建设作出了贡献。有的人“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受压,粉碎“四人帮”以来精神振奋,心胸开阔,勤勤恳恳,努力工作,这是非常可贵的,应当重用;有的人“文化大革命”中或历史上犯过错误,但已经检讨了,改正了,或者有一般问题,已经作了结论,粉碎“四人帮”以来表现很好,对这样的同志,应当给予信任,该提拔的可以提拔;有的人历史上表现不好,现实表现又不好的,要警惕,不能重用。

第四,关于如何正确理解和掌握德才标准。

我们党的干部标准历来是德才兼备。这一点并没有变。现在的问题是,究竟如何正确理解和掌握这个标准。

我觉得,有3个问题要弄清楚:

一是德和才,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在战争年代,打国民党、打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斗地主坚决,就是德好的重要表现;会带兵打仗,会搞土改,会搞支前,就是好的重要表现才。现在是建设时期,干部的“德”和“才”有了新的内容。所谓德,主要是指干部的政治态度、政治品质和思想作风;所谓才,主要是指干部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具体地说,就是要看他能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能不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思想作风是不是正派,看他有没有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有没有真才实学和实际本领。

二是要全面理解“德”的内容。我们有些同志片面理解德的内容,把唯唯诺诺、不提意见的,尽管工作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也看成是“德”好;对有见解、有能力、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和提批评建议的,则认为是骄傲自满,是“德”不好。不克服这种片面性,就不能正确掌握德才兼备的标准。

三是德才兼备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不能割裂,不能偏废,不能只要德,不要才;也不能只要才,不要德。所谓“兼备”,就是二者都要具备,缺一不可。我们既要重德,又要重才。对那些思想路线不端正,同党不一条心,长期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怀疑抵触,又不认真改正的人,以及坚持派性、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的人,决不能选进领导班子。但是,光有这一条还不行,还必须强调干部的才能。我们干工作,搞建设,不能光凭“德”去干嘛。无论做什么工作,没有必要的才能,事情就办不好。毛主席早在1957年就说过:“一定

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毛主席这段话虽然是对干部提出的要求，但他强调的是要我们注重干部的业务才能。我们要在注重“德”的条件下，强调干部的才能。

第五，关于如何看待干部的全面领导经验和专业才能。

多少年来，在选拔干部中有一种偏向，不适当地强调全面领导经验，忽视专业才能。

有全面领导经验好不好呢？当然很好，也很宝贵。作为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应当力求具有全面工作经验。今后，我们仍然需要从具有全面领导经验的干部中选拔接班人。但是，真正具有全面领导经验的干部毕竟是少数。实际上，领导班子成员，不可能都具有全面领导经验。从四化需要来说，应当充实相当数量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对这样的干部，要求他们具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是对的，但不能不切实际地要求他们都具有全面领导经验。而且，全面领导经验也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锻炼出来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把他放在全面领导工作的岗位上，他的全面领导经验又从哪里来呢？耀邦同志用陕北人的讲法说：走马是压出来的，用重担子压着它走，叫做压马。我插一句话说，这也要身强力壮的才经得住压。不给他们压担子，是锻炼不出好的人才来的。这个问题，一定要在思想上搞清

楚,不然就无法实现领导班子的专业化。

小平同志强调指出:“我们要按照专业的要求组织整个领导班子,充分发挥专业人才的作用。”他还提出:“今后的干部选择,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我们长期没有重视,现在再不特别重视,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他要求“我们要逐步做到,包括各级党委在内,各级业务机构,都要由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担任领导。”中央的方针和要求很明确,我们一定要贯彻中央的方针,努力实现中央的要求。多年来,在“外行领导内行”这个口号的影响下,没有注意选拔专业干部进领导班子,领导班子中懂专业、会管理的人才很少,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我们必须下决心改变这种情况。外行要努力变成内行。领导班子中没有内行的要充实内行。目前在经济战线、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战线,有专业知识、懂技术、会管理的人才是很多的。仅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我们就培养了400多万大学和中专毕业的干部,年龄大都在40岁、50岁左右,正是年富力强、为四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大好时机。他们当中不少人有较强的组织领导才能。这说明,我们选拔人才的基础是雄厚的,只要我们扩大视野,跳出只从党政干部中寻找人才的圈子,放眼于180万干部,就能把大批优秀的接班人发现出来,选拔上来。

用人观点的问题,实质上是思想路线、思想方法的问题。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不克服形而上学观点,就不可能树立新的用人观点。这是能不能正确贯彻新时期干部路线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主要有3个问题要

解决：

第一，要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干部，如实地反映干部的实际情况。看待一个干部好不好，只能从干部的实际表现来判断，决不能单凭个人印象，个人好恶，个人恩怨来判断。老实厚道是一个优点，但是不能只凭这一条判断优劣，还要看他有没有实际工作能力，工作干得好不好。要从实际出发，实际表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如实反映干部的实际情况，不能搞唯心主义，不能附加任何主观的东西。比如，骄傲自满是要反对的，问题什么是骄傲自满？有的人骄横跋扈，目空一切，除了看得起自己以外，谁也看不起，听不得批评，有错也不认错，当然是骄傲自满。但是，不能把有见解，坚持真理，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也看作是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又比如，老实忠厚是值得提倡的，但是不能把唯唯诺诺看作是老实忠厚。无论是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个人的优点、缺点、长处、短处，都要作具体分析，实事求是，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干部，做到知人善任。

第二，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干部，不能用静止的、绝对的观点看待干部。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干部也是发展变化的。有的过去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现在年老体弱、力不从心了；有的过去表现不错，现在表现不怎么样了；有的过去有能力、有本事，现在不行了，或者过去能力较差，现在提高很快，进步很快；有的过去文化低，现在提高了，甚至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内行。干部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都是不断变化的。我们有些同志，不善于从发展变化中

看人，喜好用静止的、绝对的观点看人。好，就绝对地好，没有缺点；不好，就绝对地不好，没有优点。有一点成绩，就一切皆好；有一点缺点，就一无是处。所有这些形而上学的观点，严重妨碍我们正确地看待干部，必须认真克服。

第三，要全面地看待干部。我觉得，看人看事上的片面性，工作上的片面性，相当严重，相当普遍。一说发挥老干部的骨干作用，就忽视中青年干部的作用，一说注重干部的政治表现，就忽视干部的才能，一说提拔中青年干部，就把老干部看作包袱，一强调文化程度，就忽视其他方面的表现，如此等等。对犯错误的同志的看法也有片面性，缺乏全面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列宁说过，世界上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我认为列宁这句话反映了客观真理。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总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一个贯正确”的人是不存在的。如果一犯错误就打倒，那还有什么人能站住呢？对任何错误，都要加以分析；不加分析，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能因为犯过一次错误就否定他的全部历史。要以宽阔的胸怀，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这样可以团结人，得人心，有利于党的事业。这里我想提醒一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定要采取热情帮助的态度，诚心诚意帮助他改正错误。耀邦同志说：有些同志总爱跑热门，谁的官大就往谁家跑得勤。我主张跑冷门，谁犯了错误，就多往谁那里跑，同犯错误的同志交朋友，帮助他们进步。耀邦同志这段话讲得很好，我很赞成这个意见，我们大家都要按照这个精神去办，使党的好风气发扬光大。

要进一步打开组织工作的新局面,使组织工作真正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最根本的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新的用人观点;一个是积极地稳妥地改革不合理的干部制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组织工作,特别是干部工作中,有不少制度是不合理的。比如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能官不能民,能上不能下,一言堂,家长制,权力过分集中,等等,弊病很多,危害很大。如不解决,就不可能实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有完备的民主,不可能建设好适应新时期需要的干部队伍。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并且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加以解决。将提交十二大讨论通过的党章修改草案,明确规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建立干部考核制度,把它用党规党法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是新党章的一个重大特点,特别是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我们党为从根本上改革干部制度所采取的一项战略措施,国际国内都引起了强烈反响。最近,小平同志讲,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在我们这一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应当认识到,废除终身制是制度问题,不是对哪个人的问题,废止它,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干部自己都有好处,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废除了终身制,才有利于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只有废除终身制,权力不过分集中,才能搞好民主集中制,才能真正实现集体领导,克服一言堂和家长制。总之,我们要在制度问题上来个“破旧立新”,逐步加以改革。只要我们树立了新的观点,

建立了新的制度,增强了革命责任心,那我们的工作就一定会卓有成效,把党的组织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

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建设好干部队伍*

(1982年9月5日)

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已经用明确的语言规定:“党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并且要求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组织工作的核心是干部问题。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是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的一个大方针。全党同志都应坚决地无条件地积极宣传、认真贯彻执行这一方针。

这个方针的提出和形成,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在新时期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以后,1979年7、8月,小平同志到山东、上海、天津视察,走一路讲一路,反复指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已经确立了,现在的问题是组织路线问题,是干部问题,特别是选拔接班人问题,必须选懂行的和比较年轻的。同年9月29日,剑英同志

* 这是宋任穷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书面发言。

在建国 3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提出要注意“干部队伍的逐步年轻化和专业化”,努力“使我们的组织状况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任务相适应”。1980 年 5 月,耀邦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召开的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说明,所谓理想的领导班子,就是领导班子的成员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组织领导能力的,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这个期间,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把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议又明确肯定:“党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要求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从以上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干部队伍“四化”的方针,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在反复酝酿、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既符合客观实际,又顺应党心民心。

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客观进程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里程碑,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党要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进行这样一次前所未有的伟大

创举,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尽管国内国际都有许多有利条件,但是困难也不少,而在所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中,突出的困难还是我们干部队伍的现状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当前主要表现:一、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级领导班子的年龄普遍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 15 至 20 岁,比五十年代大得更多,“老化”现象严重;二、相当多的干部缺乏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懂得先进科学技术和知识的人更少。这种状况,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形成了尖锐矛盾。如果我们无视伟大历史转折的客观进程所提出的干部问题,不能及时而正确地加以解决,那么党的政治路线就难以贯彻执行,更谈不上长期延续下去。这样提出问题决不是危言耸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给我们提供了沉痛的教训,我们党在解决接班人问题和建设干部队伍方面的深刻教训也还记忆犹新。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我们有一批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老革命家,他们高瞻远瞩,在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和面临干部新老合作和交替的关键时刻,为党及时地提出了一条妥善解决干部问题的正确方针——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既善于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又善于制定保证实现政治路线的组织路线,并且使其得到有效实施的党,才够得上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党正是这样的党。

干部队伍“四化”,首先要从各级领导班子“化”起。我们设想,经过 5 年的努力,到下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时,使各级各部门领导班子的政治素质大大提高一步,平均年龄比机构改革前力争下降 5 岁左右,其中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占 70%左右,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掌握一定专业知识的占 60—70%,特别是必须有精明能干、可以团结和带领整个班子去开创工作局面的一、二把手。当然,各级各业务部门的任务不同,对领导班子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年龄、知识构成的要求也应当有所不同,但是,要朝着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向迈进,要建设起精干有力、能不断开创新局面的工作班子,则是不能动摇的。上述设想有可能实现吗?今年上半年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各部委进行机构改革的成果,使我们有信心作出肯定的回答。这次改革花了 4 个多月时间,不仅使中央一级的党政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编制大大缩减,而且使部委和直属局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普遍下降了 4 至 6 岁。据国务院所属 38 个部委统计,正副部长、主任共减少 67%,新提拔的中青年干部已占新班子成员总数的 32%,知识水平提高了,熟悉专业的人增多了。在一些尚未进行机构改革的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也有不少成功的事例,说明经过努力,上述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事情的关键在于,必须解决好“退”和“进”的问题。“退”,就是要坚决按照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离休制度的决定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认真地妥善地安排一批年老体弱的同志退居二、三线。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的实践证明,我们绝大多数老同志有很高的政治觉悟,能够出以公

心,荐贤举能,从大局出发,自觉服从革命需要和组织安排,扶持那些资望和经验不及自己的年轻同志上来,自己甘当助手,或者退到二、三线,担当起传帮带的任务。“进”,就是要坚决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把那些经过考验、确属优秀的中青年干部选进领导班子。用陈云同志的话说,不是提拔几十个或几百个,而是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当前要特别注意培养和选拔 30 岁左右、40 岁左右的优秀干部。这一进一退,密切相连。退重要,进更重要。谁退,退到哪里,要妥善;谁进,进到什么岗位,要适当,最重要的是把人看准用好。

在“进”的问题上,中央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一定要大胆地把德才兼备、年富力强、能打开新局面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同时,绝不能让“三种人”和近几年在政治上或经济上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人混进新的领导班子。把这两方面的事情办好,认真执行党的选拔干部的标准,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是各级党委和组织、人事部门的庄严职责。同时,又必须认真听取各方面和广大群众的意见,改变组织、人事工作的一些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做法,开辟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的新渠道。谁是党和人民今天最需要选拔和重用的贤者?前几年,中央强调了 3 条,这次新党章又规定了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 6 个基本条件,精神是一致的。这些条件体现了红与专的辩证统一,是党的德才兼备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化。在掌握这些条件时,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提拔真正的党性强、作风正派、敢坚持原则的同志。不能设想,一个对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缺少坚定信念,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格格不入,对工作不负责任、精神不振、生活作风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的人,能够挑起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担。但是,只讲德还不够。我们的干部队伍总是要变得年轻些,有知识,懂业务,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有德无才的人,政治上固然可信,可惜难当大任;有才无德的人,其才适足以济其奸,重用了有很大的危险。当前,要特别警惕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反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在其它方面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人,决不能让他们混进领导班子。这几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在领导班子里的,发现一个,清理一个,一个也不能留下。这是关系到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保证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延续下去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识别和选拔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严格按照新党章规定的基本条件去办,决不可有丝毫的降低。那么,有没有合格的人才供我们成千上万地选拔呢?不但有,而且基础是雄厚的。这里,不妨对现有干部的年龄、资历(经受的锻炼)、文化和知识构成等情况算几笔大账:一、年龄在36岁至55岁的同志,约有1100万人;二、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参加工作的同志,约有1200多万人;三、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同志,约有1200万人;四、各类专业技术干部约有830多万人。建国以来,我们自己培养出的大学生有

310多万人，高中和中专毕业生有3800多万人；目前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的知识分子，有2500多万人。可见，从我们这个巨大的人才宝库里，好中择优，百里挑一，加快选拔步伐，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近两三年来，中央和各地各部门为实现领导班子的“四化”做了不少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然而整个看来，效果还不够理想。这不是说我们没有选出人来，而是选得太少，加上干部年龄的自然增长，以致不少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变化不大，而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同志却未能被提到适当的领导岗位。这当中的问题和困难，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出路何在？小平同志讲：“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转变，坚持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在这方面，我们中央组织部过去是做得不够的，今后我们要同全党同志一起努力按照中央的要求去做。首先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在选拔工作中经常注意反对“论资排辈”等封建意识，清除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思想的影响，纠正脱离实际地寻找“全才”、“完人”等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把干部工作的立足点，真正转到为实现国家“四化”而促进干部队伍“四化”方面来。

这里还要指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

业化,是必须在整个新时期中长期执行的方针。如果“化”一阵,停一阵,是永远也“化”不了的。这不仅因为人们的年龄在逐年增加,今天年富力强,若干年后就会年老体弱,而且事业的发展,对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何况新选上来的人在实践中究竟能否胜任,也要经受考验,会有变化。所以,我们要以极大的革命韧性和积极稳妥的步骤,来贯彻执行干部队伍“四化”的方针,解决好干部新老合作、新老交替的问题。人们看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通过机构改革,把领导班子的“四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然而毕竟只是第一步。据国务院经济口 34 个部委的统计,现有正副部长、正副主任 137 名,平均年龄 57.93 岁,比机构改革前下降 5.7 岁,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如果不继续选拔中青年干部,再过几年,他们的平均年龄又将上升到 60 多岁。这就可以看出,如果我们的工作稍有松懈,或者搞搞停停,就很难从根本上摆脱被动状态。因此,一定要进行干部制度改革,用制度化来保证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和机构改革、体制改革,要求对干部制度中的不适应部分进行改革,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彼此相伴而行的。如果我们看不到形势发展的需要,不积极地坚决地对干部制度中改革条件已经成熟的方面和部分进行改革,就会误大事;反过来,把这种改革看得太简单,草率行事,也将事与愿违。当前的干部制度改革,首先要严格执行中央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的决定,各级干部的离休退休,都

要按照中央规定的年龄杠杠去办,除个别超过离休年龄、经组织决定仍需留在领导班子中的老同志以外,绝大多数应当在做好工作的基础上离休退休。对离休的老干部一定要照顾好,并且要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在健康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这些同志能继续为党和国家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经过几年的努力,大家对实行干部离休退休制度逐步形成习惯,正常的新老交替就有了制度上的保证。当然,仅有这项制度还不够,还要结合机构改革,自上而下地建立和完善各级各类干部的岗位责任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干部考核、升降、奖惩等制度;结合健全政治生活,按照党章和宪法规定,进一步完善对干部的民主选举和任免制度。改革干部制度是一件新事情,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但是,不坚决进行改革,遇到的困难将会更多、更大。我们希望大家都在这方面下一番功夫,争取经过各级机构改革,为进一步改革干部制度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最后,讲一讲大力加强干部教育和训练的问题。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源源不断地培养、造就数量更多和质量更高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从根本上提高整个干部队伍的素质。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事业成败的战略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国家正在加强和改革学校教育工作,以期逐步给干部队伍补充新血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立足于普遍提高现有干部。除继续坚持在实践中培养锻炼干部以外,还必须大规模地训练干部。最近,中央已经对轮训在职干部做

出了战略性的决策,要求各级党校,政府和企业的干部学校,以及被指定的某些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按照各自的分工,把正规化训练干部的任务担当起来。今后使用和提拔干部,都要把正规化学习的学历和学习成绩同工作经历、工作成绩一样作为重要依据,因此,各级各类干部都必须努力使自己具备一定的学历和学识水平。凡在职而又不具备其工作所要求的文化知识水平的干部,都要分批分期参加轮训。培训中要有考核考试,学习成绩将作为调整干部工作的重要依据之一。现在,有些地方和部门不重视干部训练工作,也有些干部不愿意参加学习,这是不对的,应当加以纠正。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我们必须在全国各级干部中,掀起一个持久的学习热潮,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所要求于我们的一切东西。近几年来,全国已恢复和新建各级党校、专业干部等 8100 多所,教学干部队伍也发展到 10 万人左右;已有 130 多所高等学校开办了干部专修科;各地各部门和一些大中型企业还办了大量干部培训班,参加轮训和培训的干部已逐年增多。据统计,1979 年至 1981 年全国轮训的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已达 20 多万人,占这类干部的一半以上。尽管我们的干部教育和训练工作有些还不够完善,但是总算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只要我们再接再厉,坚持不懈,向正规化、制度化的方向继续前进,到下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时,我们整个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和

业务素质一定会有较大的进步,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水平一定会有较大的提高,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也一定会取得新的令人鼓舞的成就。

后 记

帮助我整理这本回忆录续集的有吴宗华、马利、吴钟淑、张镜明、向培祖、王荣光、胡光伟、张冀人、毛子炎、张振国、钱有坛、费祖望、郑小广、李博、王铁生、何新红、任克、王兴中、谭丽英、刘泽彭、夏方林等同志，同时得到曾志、郑天翔、李力安、郭峰、吕枫、张全景、刘纪原、芮杏文、李淑铮、蒋光化、周家鼎、王纯、任新民、黎虹、滕文生、白治民、赵振清、王照华、杨建生、于清波等同志以及中共中央组织部、航天工业总公司及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的热情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封面
目录
正文